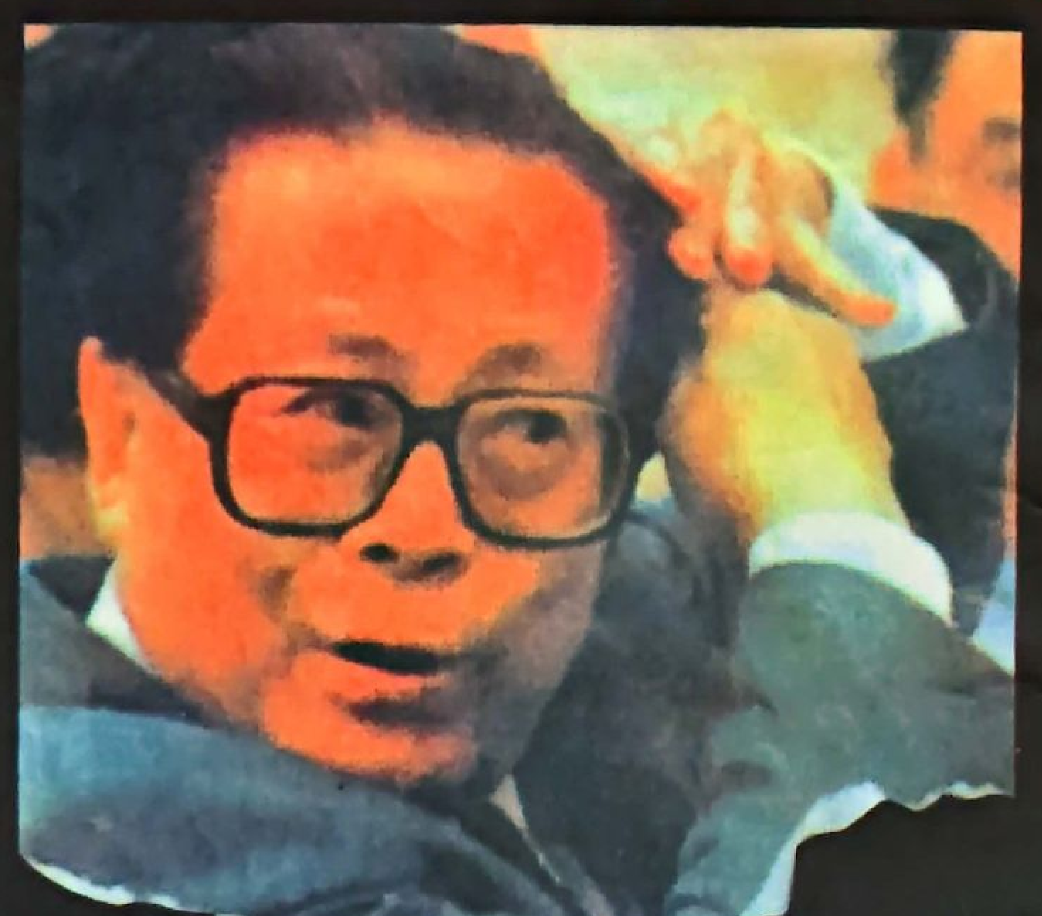


江澤民的幕僚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没有一個成功的權勢人物不是幕僚塑造的。當人們對江澤民近年來一系列似乎超過其本身能量的政治行爲大感意外時，便有了一個待揭之謎：中南海的出謀劃策者何許人？



明镜出版社

《中國局勢》系列(9)

Jinag Ze-min's Counselors

江澤民的幕僚

高 新

明鏡出版社

Jinag Ze-min's Counselors

By Cao Xin

PUBLISHED BY CANADA MIRROR BOOKS
8636 MISSAUGA RD RR10 BRAMPTON
ONT CANADA L6A 3N2
TEL:(905)451-7401 FAX:(905)451-7492
57-17136 ST.2ND FL,FLUSHING,NY11355U.S.A.
TEL:(718)463-1270 FAX:(718)460-6248

ISBN -896745-17-2

目錄

目錄

「黨指揮槍」與「槍指揮江」
救黨圖存對元老子女恩威并舉
內部批判矛頭直指鄧家
一本《鄧選》制服老鄧全家
鄧家子女政治輕狂容易壞事
抓周北方曾慶紅一手操縱
利用鄧小平，限制鄧子女
太子黨成員被分類排隊
願與共產黨共命運者加速提拔
中辦越權插手中紀委事務
攻破北京市委曾慶紅立下頭功
打毆陽德為敲山震虎
清理內貿部震懾國務院
支持石油系統查辦王震公子
王家公子就怕曾慶紅
鄧、王結盟，鬥不過曾慶紅

為樹江核心權威挖空心思
江明主糾正鄧氏假民主
為江澤民開出治國藥方
君臣之間朋友相稱
搞不清恩主是虎還是狐

從鄧力群愛將到江澤民文膽
——江澤民的大内御筆滕文生

江澤民需要飽彤式人物
追隨鄧力群反對胡耀邦
鄧力君研究室的理論特務
堅持與思想解放者為敵
對趙紫陽和飽彤恨之入骨
樹倒狐猻散一度失業
因禍得福官至副部級
開明派元老亦在打擊之列

二百三十七

不但要走對路，還要進對門

第三代領導人的政治辭典

工程師治國需要「文人」幫視

起草十二大關系糾正鄧小平誤區

開墾庸時代的政治處女地

黨報社論要由上海人把關

新聞出版對江澤民至關重要

徐光春被江澤民看好多年

捧江文章令總書記龍顏大悅

競爭中宣部長最有實力

内容簡介

一九八九年六月，因為「六四」鎮壓而將自己的執政黨形象和統治地位之合法性降至歷史最低點的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江澤民出任中共建政后的第五任黨魁．胡耀邦、趙紫陽的前車之鑒，再加之前蘇聯共產黨政權與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不但全中國，全世界都鮮有政治家和老百姓對江澤民的政治前景看好，共產黨內部也已經發出「紅旗還能打多久」的猶疑之聲．

七年多時間過去以后，雖然整個共產黨政權仍然危機四伏，雖然所謂「鄧小平之后」的擔憂仍然困擾着江澤民及其「第三代領導集體」，但至少應該承認江澤民個人權力的相對穩固已經是今非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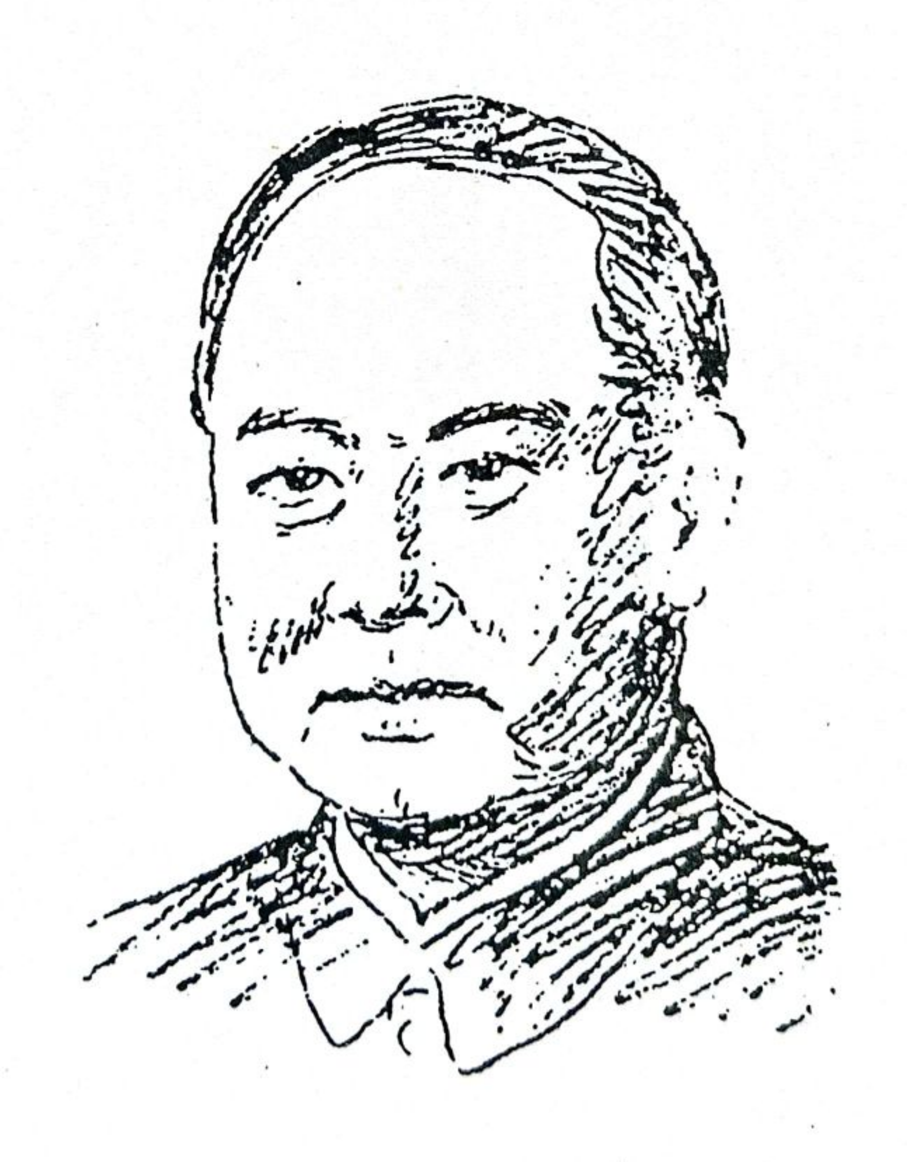
是什么力量能够幫助江澤民一改「阿斗書記」的無能形象，是什么因素促中成江澤民趕在鄧小平去世之前即為避免成為「華國鋒第二」成功地表現了一系列令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政治作為？《江澤民的幕僚》一書中通過對聚攏在江澤民身邊的一批特殊人物的逐一描述，結合一九八九年六月至今在中國共產黨内發生的一系列關鍵政治事件，得出了形象而生動，準許確而詳實的具體

答案．全書披露「紅朝帝師」汪道涵、「大內總管」曾慶紅、「政治化妝師」王滬寧、「政治心腹」劉吉、「大內御筆」滕文生，以及為江澤民共同把首與論陣地的龔文瀚、徐光春、周瑞金等人的各有所長，和他們在江澤民身邊各自分工的內幕，不但可以令中共問題專家和普通讀者真正弄明白江澤民何以能有今天？更可能為人們預測江澤民及中共政權之未來，提供不可多得的準確資料．

江泽民的幕僚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汪道涵



從伯樂相馬到宮邊問政

——紅朝帝師汪道涵

一九九六年七月初，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雷克的一次中國大陸之行，引起臺灣朝野的高度緊張，原因就是此前由美國白宮發言人宣布雷克訪華行程中，特別包括了一項赴上海會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的內容．

臺灣方面認為，美國總統顧問前往中國大陸，特別要會見汪道涵，似有出賣臺灣之嫌．其實，如果僅從汪道涵表面職務分析的話，海協會是為便于海峽兩岸有個初級通的渠道而建立，所以由海協會會長代表中共政權與美國政府官員談判臺灣問題，根本不合中共政權運作常識．

換言之，當年海協會會長之所以被安排到汪道涵頭上，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已經撤銷，而曾為江澤民「恩主」的汪道涵因為此時已經在扮演紅朝「國師」的角色，所以江澤民必須給安找一個既不受「取消干部終身制」之后的老干部離退休年齡標準（正部級干部六十五歲封頂）的制約，同時又體面風光的適當職位．而汪道涵在他那一代領導干部中，是公認的「最有實相」的一位，再加上知識分子出身（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的學長）和過去主持過外經、外貿工作的經歷，故中共高層的其他領導人即使對江澤民這一安排有看法，也沒有理由反對．

如此說來，雷克這位柯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僅僅是從外交角度；而汪道涵這位「國師」則是全方位的幕僚角色——無論是外交還是內政，臺灣問題不過是汪道涵在各類治國安邦方針政策上幫助江澤民出謀劃策的內容之一．

所以，雷克事先計劃到上海與汪見面，唯一的原因恰恰不是汪道涵擔任著海協會會長職務，而是因為汪道涵同他雷克在各自國家領導人面前扮演的角色相同．

當然，獨裁政治條件下的「國師」無論就哪方面提出諫言（無論是內政還是外交；無論是具體到臺灣政策，還是中美關系走向），如果不被采納另說，如果被「聯認為可行」，也必須由君王本人昭告天下，或者由君王本人向外國來使宣布．「國師」畢竟僅僅是「國師」，同胡耀邦、趙紫陽時代鄧小平扮演的「紅朝慈禧」自然有所不同．

黨內三大『伯樂』之一

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儀的「帝師」莊士敦曾經以他的宮廷經歷寫出一本《紫禁城的黃昏歲月》．如今，中國大陸的共產王朝是否已經步入「黃昏歲月」，人算不如天算，而直到被迫「退居二綫」時都從來沒有進入過中央委員（包括候補委員）序列的汪道涵，反而在遲暮之年實際進入中共決策層，在中南海里消磨自己政治上的黃昏歲月．而之所能夠成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的「紅朝帝師」，要從汪道涵當年所以表現出的伯樂慧眼説起．

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一步步掌握中共領導權后，一方面祭出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兩杆大旗，一方面在陳雲的大力配合下，著手解決共產黨政權后繼乏人的問題．「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建立干部

接班梯隊」的舉措相繼推出．

與此同時，又因為否定「文革」而進行的「落實政策」，得以使曾被毛澤東打翻在地的大批老干部「獲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動員這批老干部把第二次上臺后還沒有坐熱的權力交椅甘心情願地交給年輕人，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不過，因為貪權戀位而拒不承認自然規律的老干部也不是全部，比如當時的中共電力部長劉瀾波就非常主動地提出把自己第一把手位置讓給李鵬；當時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實際主持工作）李一氓，就再三要求盡快退位，并力主讓新提拔的副部長喬石出任部長．正是因為有劉瀾波和李一氓的大力舉薦和及時讓賢，才有了李鵬和喬石坐上中共第二、第三把交椅的今天．

而江澤民之所以能够有位居李、喬之上的今天，則是得益于他養父江上青的老戰友、他本人的老上級汪道涵的長期培養、大力保舉和及時讓賢．這樣說來，汪道涵、劉瀾波、李一氓可謂中共元老群體中的三大「伯樂」，個個都是慧眼識珠，分別成就了如今中共接班集體中的一、二、三把手．

上述三大「伯樂」中，劉瀾波年齡最長，去世最早．而靠發動紅色學運起家的李一氓則在去世之前趕上了中共鎮壓八九學潮，一年多后便懷著對「共產黨也鎮壓學潮」的百思不得其解，鬱鬱而死．碩果僅存的汪道涵則被江澤民禮聘為「紅朝帝師」．挂名海協會會長，不過是為了讓他有一個在長期問政過程中便于公開拋頭露面的具體名份，事實上所謂「對臺政策」、「兩岸關系」之類問題在汪道涵的問政內容中至多排在二、三流層次，他更多的精力實際上是放在為江澤民應付內政的排憂解難方

江澤民養父汪道涵恩主

一九八九年六月，來自上海灘的江澤民在鄧小平親自指揮的北京戒嚴部隊的機密保護之下，以坦克開道，借機槍壓陣，逼迫趙紫陽拱手讓出總書記交椅，從此開始了中共政權「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時代，中南海的紅門隨之便向汪道涵日夜敞開．

基于江澤民一九八五年趙上海時，是從汪道涵手中接任的上海市長職務，海外有報導文章曾經報導過此二人關系的非比尋常．但充其量也能說出他們之間曾經有過的上下級和「新老交替」的關系，對于二人如何成為忘年之交的細節，即使在中共內部也是鮮為人知．

無論是劉瀾波之于李鵬，還是李一氓之于喬石，其間不過都是前輩提携后進的關系，用共產黨的官式語言解釋，即所謂「上下級關系」．而汪道涵之于江澤民，在有所謂「上下級關系」之前，即已有多層的私人關系．

首先是同鄉關系．查中共公開的黨內領導人物介紹，汪道涵是安徽人，江澤民是江蘇揚州人．其實，江蘇揚州祇是江澤民出生的地方，其祖籍也是安徽．

江澤民的祖父江石溪早年從安徽老家移居江蘇省江都縣仙女鎮，在此地從醫，先后生下了七個子女，長子江世俊即江澤民的生身父親，六子江上青即江澤民的繼父．

江上青僅比江澤民年長十五歲，少年時代分別在江蘇南通和揚州中學讀書．十六歲秘密加入中共青年組織共青團，十七歲時因為參加學運曾被當地國民黨政府逮捕，出獄后乾脆正式加入了共產黨．一九二九年他考取了上海藝文大學文學系，成為當地中共地下黨里有名的才子．

江上青的夫人名王者蘭，上海人，有較高的文學修養．一九三五年她與江上青結婚從，祇生兩女，長女名江澤玲，次女名江澤慧．按照當時的傳統習慣，長兄江世俊便將自己的次子江澤民過繼給江上青為子．當時江澤民還在讀小學的年齡．

也正是因為江家是安徽省籍，所以抗戰爆發后，已經有近十年黨齡的江上青在揚州地區從事了一段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后，即被派往安徽，從事對國民黨地方政府、地方武裝的統戰工作，很快打入國民黨字徽省第六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盛子謹的身邊，成為專署秘書長兼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共產黨內的秘密職務則是中共「皖東北特派員」，下轄泗縣、五河、嘉山、靈壁等九個縣．而此時根據江上青的要求，從上海地下黨派出的一批城市地下黨員，則被充實到這些縣里擔任黨政職務，其中就有為參加中共活動毅然放弃未競學業的汪道涵，被江上青委任為他領導下的中共嘉山縣委書記．同時，江上青又說服盛子謹，給了汪道涵一紙縣長的委任狀．

一九三九年江上青戰死之前，短短兩年時間即把中共在皖東北地區的地下和公開活動搞得有聲有色，本人再成為在當地頗有影響的抗戰領袖人物．近幾年有中共黨史研究著作稱江上青實際上是中共皖東北抗日根據地創始人．評價如此之高，當然同他養子江澤民突然成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有直

接關系，但也不能否認江上青當年確實是一位杰出的，功不可没的地方抗日領袖．

培養烈士遺孤生者義不容辭

汪道涵比江上青小四歲，從到皖東北工作后，便對江上青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能力深為佩服．聽到江上青戰死的消息時，汪道涵曾難過得嚎啕大哭．前幾年，汪道涵還專程前往泗縣拜謁在當地為江上青修建的烈士墓，可見其昔日交往之深．

按照中國過去的封建傳統，江澤民既然已經被正式過繼給本家叔叔，那么在繼承祖業方面，他就不再從屬自己生父那一支，而是過去的叔父、后來的繼父江上青的唯一繼承人．所以，江澤民之于江上青、王者蘭夫婦，從法統上講就是兒子與爹娘之間的關系，還不像李鵬之于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那樣，僅僅是義子和養父之間的關系─更何况這個「義子」是否曾正式「册封」還是一段歷史懸案．

所以，江澤民也從來為自己是中共「烈士遺孤」而自豪．中共方面的公開宣傳材料也并命强調這一點似乎是要以此彰顯江澤民「紅色接班人」的法統地位是與生俱來．

前幾年，江澤慧被安排為中共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外界有評論認為這完全是中共組織部門領導人在拍江澤民的馬屁．其實，江澤慧之所以有此政治榮譽，當然與江澤民本人是中共總書記不無關系，但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江澤慧本人是中共『烈士遺孤』。如果没有這一層關系，江澤慧僅是一個大學教授的身份出任省人大常 委會副 主任，中共組織部門敢與這樣安排，江澤民本人也要

顧慮一下「一人得道，鷄犬升天」的「群衆議論」．

江澤民步入中南海后，海外關于介紹江澤民身世的文章，衹要提到王者蘭的，幾乎都將其說成是江澤民的生母．其實，江澤民的生母叫吳月卿，早已去世．而海外在報導江澤慧時，也往往都把江澤慧說成是江澤民生父江世俊的女兒．許多曾經與江澤民的家庭有過走動的人，也都把長期被江澤民侍奉供養的王者蘭老太太當成他的生母，所以也難怪海外報刊寡聞．

至至汪道涵，則出于對故去上級江上青的懷念和情誼，從五十年代開始即時常到江家看望烈士遺孀．而同鄉關系加之與其繼父的故舊交是汪道涵與江澤民的交情由淺至深的第一因素．

直到當年江上青去世之時，江澤民還是少不諳事，與汪道涵也從未謀面．在中共對外公開的江澤民簡歷中，他一九四九年大學畢業至一九四九年兩年間的經歷空白．但有海外報導說：一九四七年七月，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機電系畢業后，是從報紙上找到一則美國商人在上海開辦的「海寧洋行」的招聘廣告．前往應該試后，美國佬認為他電機方面的專業知識比較不錯，英語表達能力不行．不過最終還是將他録取了，因為該洋行的動力管理部門實在急需一名懂得這方面業務的職員．

當時的海寧洋行主要經營食品加工業．中共進城后，得知在洋行內任職的中國人中，還有一位叫江澤民的曾經是上海交通大學發展的學生地下黨員，于是便安排他參與軍管會領導的接收工作．不久，洋行下屬的工廠改名上海益民食品一廠，江澤民被委任為副總工程師．

另有報導說：一九四九年在中共接受上海的過程中，汪道涵以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身份主管

工廠接收，江澤民則作為從地下黨員中選調的技術人員參加這一工作，向汪道涵自報山門后，汪道涵才得知這就是他要尋找的江上青遺孤，自此，開始了兩人的忘年之交．

確實如毛澤東、王震等人一貫强調的那樣，共產黨的紅色江山是無數共產黨烈士的生命換來的．有幸活着看到共產黨坐江山的一天并因此而得到論功行賞、封官晉爵者，自然都要把關心和培養烈士遺孤視為生者的義不容辭，所以，對烈士子女關照有加，生者對先烈遺孤滕似己出是歷來是共產黨不成文的黨內規矩，李鵬和鄒家華等人的成長過程也都證明了這一點．同樣道理，自汪道涵與江澤民見面時，無論從「黨性」出發，還是從人性角度，責任感和使命感都驅使他要對這位烈士遺孤倍加關照．

共同經歷建立共同語言

如果說汪道涵對江澤民最初的關照還祇是建立在這種「階級感情」的基礎上，那么令汪道涵與江澤民成為「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忘年之交，除了江澤民在工作中表現出的能力和對汪道涵的尊重之外，兩人投身革命之初的相似經歷也是他們之間有越來越多「共同語言」的一個重要因素．

汪道涵三十年代在上海交通大學就讀，一九三三年起開始參加中共學生運動并加入中共地下黨。比汪道涵小十一歲的江澤民比汪道涵進入上海交通大學的時間晚十年，是在參加中共學生活動的過程中被中共上海交通大學地下黨支部秘接收為黨員。日后兩人論起這段經歷來，江澤民曾慷虛地表示自己是步汪老前輩的后塵，令汪道涵更加感覺自己的這位小學弟簡直就是「相見恨晚」，階級親

情之外，又增加了一層難得的緣份．

五十年代初，大批中共華東系統的干部被充實到北京中央政府，汪道涵被任命為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江澤民則被安排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在上海的直屬機構第二設計分局，任電器科長．當時，汪道涵有心帶江澤民一同赴京工作，因為王者蘭身邊需要有親人照顧，才放弃了這一打算．

王者蘭出身上海的名門閨秀，能詩擅文．其夫江上青戰死后，曾親作七律悼亡詩一首，令參加追悼儀式的汪道涵等人感動至極．其中「十年壯志山河動，一片丹心日月明」堪為佳句，而「誓撫遺孤承素志，盡除奸慝報深情」兩句，更是道出了王者蘭作為烈士遺孀對盡心撫育江澤民和他兩個姐姐的責任感．此后，王者蘭果然終身未有改嫁．

一九五五年，第一機機械工業部在奉命籌劃與建大陸汽車工業時，抽調一批技術力量到蘇聯莫期科斯大林汽車廠實習，在汪道涵的特別關照下，江澤民名列第一批赴蘇實習生名單．一年后，江澤民完成學業回國，無奈他所學的專業當時祇有在東北長春開始與建的第一汽車制造廠才能因才施用，無法再回上海工作．于是，他先是在「一汽」担任动力处副处长，不久又升任动力分厂厂长．

大陆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吉林省长春市郊，不但天寒地冻的气候令江泽民這位江南才子之后難以忍受，当时大陆东北地区的城市居民「供应粮」又是以高粱米、玉米面和大碴子（破碎了的粒，大陆东北人用此熟食稀饭）为主，江澤民這位自幼以大米為主食的南方人更是無福消受．時間一長，得了胃病，祇能私下里向汪道涵訴苦．

汪道涵那里除了江澤民個人的身體原因，同時也考慮到了一直留在上海的王者蘭也確實需要兒子回到身边照顾．于是仅以烈士遗孀不能怠慢这一条理由，江泽民便于一九六二年名正言顺地回到上海，进入一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副局级干部）．

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人都有记忆，当时全国实行「支援三线」，无论原居内地、沿海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都要高唱着「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难苦哪安家」，被调往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区．而要想被调回大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这些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城市，简直比登天还难．而就是因为留恋大城市的原因，往往是夫妻双方有一人被调到艰苦地区后，另一方面宁可长期「两地分居」，过「牛郎织女」的生活，也不愿跟对方前往．为此，不知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而当时江泽民居然能从一汽调回上海，对汪道涵的感激之情可想而知．

患難見真情成忘年之交

「文革」初期，江澤民已經從上海調往武漢市，但仍没有脫離汪道涵所領導的第一機機械工業部系統，擔任該部在武漢熱工機械研究所所長兼黨委書記．雖然也一度小受政治「冲擊」，但一頂「烈士遺孤的保護傘，使得造反派也不敢過分對他為難．不久，他便被調進北京，出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副局長，兩年后又升為局長．

而在這段時間里，汪道涵却一度十分落魄，雖然后來也被「解放」出來分配工作，但長時間家庭

經濟情况不好．雖說「文革」前即已經成為副部級干部，但因「文革」中斷而后又恢復的高級干部「特殊供應」，當時在北京也秖有正部級干部才能享受．所以，汪道涵的家里很長時間也是同北京的普通居民一樣，微薄的物質享受全部都是憑票供應，食油每人每月四兩（兩百克）食糖每人每月半斤．最難堪的是每月一人一斤肉票，買了猪肉就甭想再買牛肉，相吃肉解饞就不能再買鷄蛋．

如今已經官居中共國家副主席，在中共所有「黨和國家領導人」里排名第八的「無黨派民主人士」榮毅仁，說起來在「文革」前即已經提任過上海市副市長、中央紡織工業部副部長等職務，但「文革」中難有周恩來偶然關照，竟然也都抽不上高級香烟．幸而有當時被毛澤東留用的王震及時照顧，將自己的「特供」香烟每月分出一部分，令兒子送到榮府．八十年代初榮毅仁籌建中信公司之始，王震的兒子王軍便可以以軍人加商人的雙重身份進入中信，後來乾脆連王震的另一個兒子王兵也拉了進去，都是因為王震與榮毅仁曾有患難之交．王震去世後，榮毅仁曾親自撰寫并公開發表懷念文章，贊揚王震對「黨外人士」是如何厚待！

無獨有偶，江澤民也是因為「文革」中同情汪道涵的生活境遇而與汪氏進一步成為忘年之交．

七十年代初，江澤民因為沾了從事「外事工作」的便宜，一度提任專家組組長，被派駐羅馬尼亞，雖然當時只是個行政十五級干部，比汪道涵低了六級，但實際生活待遇反而比汪道涵要好得多．從羅馬尼亞滿載而歸后，江澤民立刻趕到汪道涵家，送上從羅國帶回的奶粉、糖果之類，令汪道涵全家老小大開「洋葷」

直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像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如果誰家能夠購得到一套羅馬尼亞家俱，必定會招來街坊鄰里的羡慕和妒嫉的眼光。在此基礎上退後十年，來自羅馬尼亞的奶粉和糖果就更不是一般意義的禮品了．

為江澤民開道犧牲自己

公道地說，江澤民當時如此行事，更多的是出於人與人之間的正常感情，恐怕没有想到過以此為日後升遷鋪路搭橋．但汪道涵却是因此患難情誼對江澤民更為器重，再次出山後自然一有機會便大力舉薦．自此，兩人的關系已經「不是親人，勝似親人」了．

「文革」後期，時任中共對外經濟聯絡部長方毅將汪道涵調到身邊擔任副部長．

方毅比汪道涵小一歲，但參加中共的時間却較汪早兩年．從四十年代初期開始，方毅便一直與汪道涵在安徽一帶共事，其中有六七年時間，方是汪的直接上級，直到中共建政前夕才各奔東西．說起來，方毅同江澤民也有一同間接的歷史關系．抗戰開始后，方毅從鄂東地區奉命調往皖東地區，接替的就是江上青的未竟事業，鞏固狀大了當地的中共新四軍根據地

方毅是中共領導層中的才子之一，平時喜好舞文弄墨．汪道涵則是黨內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干部，平時嗜書如命，涉獵廣泛．兩人平日惺惺惜惺惺，既是多年的上下級，又是共同語言頗為廣泛的私人朋友．

「文革」結束後，方毅受命主持科技領導工作，新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陳慕華是延安「女八路」出身，年齡還比汪道涵小六歲，自然令汪氏感覺十分壓抑．好在此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受命負責全國對外開放的具體組織實施工作，才令汪氏柳暗花明，谷牧在中共建政前也是華東局系統出身，曾擔任汪道涵的間接領導，中共建政後，谷牧長期在國家基建委、國家經委擔任負責工作，與汽車工業部門的負責人汪道涵有工作接觸，一直對他比較欣賞．

與方毅相比，谷牧是修養更上一層樓的中共黨內不可多得的才子之一，琴棋書畫樣樣喜好．特別是在書畫鑒賞方面，技藝高深．

整個毛澤東時代里，知識分子出身的干部從來都是要夾起尾巴作人的．本人稱得上知識淵博的周恩來深知毛澤的「武農干部路綫」，所以對國務院系統的知識分子干部，多不敢大膽啟用．到了鄧小平時代，才真正有了揚眉吐氣的機會．而這也是方毅、谷牧、汪道涵這批人相互結成私交的原因．

一九發七九年七月，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正式組建（兩塊牌子一個機構），谷牧親自兼任兩個機構的主任和黨組書記職務，立刻調汪道涵擔任副主任、黨組副書記．自此，汪道涵升為正部級．

當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曾專門發出一紙《關於加强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統一領導和歸口管理的通知》，規定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會同有關部門制訂發展進出口貿易，技術引進、利用外資以及對外組織合作的方針、政策、條例、規章，研究總結經驗，改革有

關管理體制．會同國家計委審議的制訂全國進出口、技術引進、經濟合作、外匯收支的長期規劃和年度計劃，協調有關方面的工作，檢查督促計劃的實施，組織有關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采取有力措施擴大出口、增加外匯收入根據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組織制訂實施條例和有關管理辦法，組織有關部門審批合營企業的協議、合同和章程．統籌管理各部門、各地方引進先進技術、利用外國資金和進口設備工作．審議中國與外國政府間的長期經濟合作或長期貿易協定、協議，等等．

通知中還要求：這兩個委員會及其黨組，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下，負責管理當時國務院的相關部級機構，包括外貿部、外經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銀行、海關總署、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總局、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貿易促進會等．總而言之，所有與對外開放有關的事項，都由這兩委員會統攬，可見其職權之大、權限之寬．

而汪道涵進入這兩個委員會之後，立刻幫助谷牧招兵買馬，首先自然是已經在第一機械工業部有過幾年掌管外事工作經驗的江澤民．

一九八零年，已經在中央一步步架空了華國鋒的鄧小平，不滿時任上海市委領導人彭冲對華國鋒、汪東興「兩個凡是」的政策跟得太緊，將他調到北京，委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虛職，於當年四月任命陳國棟接任市委第一書記職務．當年十月任命汪道涵出任上海市長職務．但因為還需要市人大會議履行一項人民代表「決定」的手續，故汪道涵正式上任是一九八一年四月．此時，汪道涵已經成為完成了對江澤民的保薦，汪氏離開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的同時，江澤民被任命為

副主任兼秘書長。也就是說江澤民從正局級到副部級這一最關鍵的關卡，便是由汪道涵幫助他順利跳過的。

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共將江澤民任職的兩個委員會以及對外貿易部、對外經濟聯絡部等機構合并成一個對外經濟貿易部，江澤民被任為電子工業部第一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次年，時任電子部部長張挺下臺，專門負責考察副部級以上干部的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及時向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人舉薦由江澤民接任這一職務．而李銳對江澤民的好感，又是汪道涵多多美言的結果．

當然，這里面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客觀因素，即江澤民和汪道涵當時所從事的工作正好是中共政權建政三十年后才正式開始的「對外開放」的窗口工作．事到如今，整個中國大陸的所有政權機構，恨不能十之有五都能夠與「外」字沾邊，從事這方面工作的干部已不再引起同級和上級黨政負責人的特別重視．但在「對外開放」之初，江澤民被汪道涵拉進國務院下屬的外資和進出口管理部門，與江澤民原來擔任的機械工業部外事局局長職務相比，絕對是給他提供了一個能夠更多、更容易引起中共高層和中共元老注意的機會．

到一九八二年的中共十二大江澤民當選中央委員為止，他在黨內的地位已經高于汪道涵，汪道涵因為年齡的原因，十二大上没有被安排中央委員職位，從此也就永遠失去了這個機會．

熟悉這段內情的人士認為，當年汪道涵為推薦江澤民，其實是犧牲了自己的利益．前文已經提到，當時同汪道涵同樣表現出這種「主動薦賢」精神的中共老資格部長級干部中，還有劉瀾波和李一氓．

巧合的是，劉瀾波、李一氓和汪道涵都是因為「文革」的耽誤而一生沒有出任過一屆中央委員（劉瀾波祗當過一屆候補中委）

接上海市府非江澤民不可

汪道涵一九八二年沒有被安排為中央委員，自然意味著他在上海市的職務也已經是過渡性質．一九八五年換屆選舉之時，汪道涵再次推薦由江澤民接替自己上海市長兼市委副書記的職務．雖說當時的胡耀邦、趙紫陽及衆位中共元老對此安排并非意見高度一致，但沒有人不認為汪道涵的這種推薦是出以公心，所以江澤民再次接汪道涵的班也就順理成章，當年劉瀾波、李一氓推薦李鵬和喬石分別出任國務院電力工業部部長和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時，也同樣是這種情況．推薦人自己甘願退隱的「高風亮節」舉動本身，使得還想繼續在領導綱位上多趟一段時間的衆多元老們對他們推薦的人選無法挑剔，也不好意思再挑剔．

擔任上海市長時期，汪道涵與陳國棟等人在工作上的配合談不上十分默契，當時的那一屆上海市委、市府領導班子中，汪道涵是思想、作風最為開放的一個．而陳國棟則受陳雲、姚依林等人的影響較深．

據當時在上海市委工作的人士回憶，汪道涵在北京工作期間，元配夫人已經去世．后經一機部的老部下從中撮合，與北京外交學院畢業的孫維聰再結良緣，一年后便老來得子．上門祝賀的老朋友曾

當面向汪道涵開玩笑．有一位外交學院畢業的賢內助，主管對外經貿工作自然得心應手．為人向來十分和善的汪道涵則跟着開懷大笑．

孫氏的年齡比汪道涵與前妻的孩子大不了幾歲，「文革」前夜大學畢業后，曾被分配到哈爾濱，但她拒絕前往報到，以至長期沒有正式工作．

汪道涵因為是國務院系統的老副部長，在北京居住條件一直比較優越，長期享受着北京東單地區黑芝麻胡同里的一座獨立四合院．

到上海后，市府工作人員考慮到這對老夫少妻已經有一個孩子與汪氏前妻的子女住在一起多有不便，便除了給汪按市領導級別分配的一套住房之外，另加了一套．陳國棟等人的夫人聽説后，心中頗有不滿．在市領導有夫人陪同出席的公開場合里，陳國棟等人的夫人便時常抱怨孫維聰不把她們放在眼里．理由是她們這些市領導夫人最晚也是四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而孫維聰論級別的話，説她是個科級干部都有「突擊提拔」之嫌．

不過，即使陳國棟本人對汪道涵也有看不慣的地方，汪道涵提出從北京調江澤民接任上海市長，也不會引起陳國棟的逆反．當時已經擔任國務院電子工業部長、中共中央委員的江澤民，無論從知識化、專業化和年輕化的角度，接任上海市長都完全説得過去．而從革命化的角度，更令陳國棟自然回想起當年江上青對他的知遇之恩．

江澤民養父江上青在抗戰初期提拔汪道涵時，同時也把陳國棟安排為皖東地區的靈壁縣長．汪道

涵主動向陳國棟提起這段歷史，自然令陳國棟對江澤民產生好感．與汪道涵一起退居二綫后，陳國棟出任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從「發揮余熱」的角度，陳國棟首先希望的是上海市委的新領導班子成員都能夠誠心誠意地尊重乃至服從他這位「政治元老」．僅僅基于這一層考慮，他陳國棟自然會相信與江澤民的情感深，肯定會比與芮杏文的感情交流來得容易．

果不其然，芮杏文到上海不久，便根據群衆檢舉揭發對上屆元老發難．當時上海有所謂「陳國棟的秘書(經濟問題)、胡立教的兒子(流氓犯罪)、汪道涵的房子」一說，芮杏文力主查辦，江澤民則裝聾作啞．結果，陳國棟的秘書和胡立教的兒子分別受到司法處理，汪道涵的房子則不了了之．

上海工作的幾年時間里，汪道涵對于江澤民來講，雖說有點類似鄧小平、陳雲之于胡耀邦和趙紫陽，但不同之處在于汪道涵對江澤民基本上是處處支持，全力維護，而不是像鄧小平和陳雲對胡、趙那樣處處掣肘、隨時提防．另外，除了汪道涵對江澤民的大力提携而外，江澤民本人在與汪道涵長期交往和共事過程中，各方面都受益非淺．

汪道涵畢竟是中共打江山者中為數不多的正牌大學生出身，相對于為數衆多的工農出身的老干部來講，其文化功底和參與中共早期對外開放的領導工作決定了他對新生事物接受較快，其教育程度和長年工作實踐決定了其在官場生涯中足智多謀，這一切都令江澤民佩服不已．熟知其中內情者評價說：江澤民無論是當總書記之前還是之后，在汪道涵面前從來是畢恭畢敬．如果說他對陳國棟(前上海市委書記)之類的元老人物僅僅是敬長的話，那么對汪道涵則有發自內心的敬仰和佩服。

從市長職位上退下來以后，汪道涵改任國務院上海經濟規劃區辦公室主任，實際上是充當了中共中央、國務院與上海市委、上海市府之間的聯絡人．

當時，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對上海的對外開放非常關心，强調既要加快改造老上海，又要用新思想去設計未來的浦東開發．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職務后，更是急于促成上海浦東開發工作．據當時擔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的朱嘉明先生回憶，一九八八年初，趙紫陽的首席智囊鮑彤建議朱嘉明組織一些中青年理論工作者去上海，就浦東開發問題形成一些初步方案．臨行前，鮑彤特別叮囑朱嘉明等人：要聽聽上海方面的意見，尤其是聽汪道涵的意見．

這一細節足以說明當時的汪道涵，絕對是被「趙紫陽一伙」視為改革開放的同路人的．事實上汪道涵，也包括江澤民，自被調到谷牧身邊具體主持全國對外經貿及對內引進工作之后，就已經成為中共最早一批對外開放的身體力行者．雖然如今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道路已經再無逆轉可能，但當年他拉這批人所從事的工作，是頂着黨內保守勢力的很大壓力．許家屯先生曾經在其回憶錄中記述：當年中共保守派元老、擔任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僅僅是個副組長)的李先念，一提谷牧的名字便反感地說：「谷牧是革命派，我不欣賞．」李先念這里所說的「革命派」，其實就是外界所說的「改革派」．就是因為李先念的反對，谷牧沒有能够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職務．

江澤民人主中南海后，汪道涵成為當代帝師；谷牧此時早已「退居二綫」，挂名全國政協副主席。

畢竟也是當年恩主之一，所以江澤民對谷牧還是表現出了特別的尊重，專門抽時間上門看望「老領導」．

但是話說回來，江澤民畢竟是在「六四」鎮壓導致中共高層全面否定趙紫陽之「右傾」路線的大前提下被推到臺前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當時仍然在世的陳雲、李先念等政治元老視為他們這一派的接班人．所以，無論江澤民本人是否情願，都必須被捆綁在黨內改革派對立面的戰車上．至少是李先念等人還在世的時候，他江澤民是無論如何也不會與谷牧走近的．

從伯樂相馬到帝師問政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至今已經六年，雖然整個共產黨政權仍然危機四伏，雖然所謂「鄧小平之后」的擔憂仍然困擾着江澤民及其「第三代領導集體」，但至少應該承認江澤民個人權力的相對穩固已經是今非昔比．而江澤民之所以能够有令外界不能不刮目相看的今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選中了一個好師爺汪道涵和一個好管家曾慶紅．

江澤民自九四年下半年以來所表現出來的對內政策的一系列強勢運作行動和對外事務方面的「對臺新政」，都是因背后有明白人點撥的結果，而所謂的「明白人」雖然不止一個，但汪道涵堪稱第一高參．中共內部有人把如今處處影響江澤民的汪道涵比做當年光緒皇帝身邊的翁同和，多少有些道理．

查汪道涵的簡歷，雖然過去主管過對外經濟聯絡工作，但與他同時代的七八十歲的中共老干部當中，在外交、外聯、對臺事務方面出他汪道涵資歷深、經驗長者，數出一百個來當不成問題，比如前

文提到的方毅、谷牧等．但海協會一經成立，汪道涵立刻獲江澤民提名．此前一年，汪道涵被安排為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也是江澤民親自提名．

一九九二年，汪道涵也在其中擔任委員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宣布撤銷，從此包括陳雲，薄一波等人在內的全部黨內元老都祇剩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頭銜，但在此之前，江澤民早已經為汪道涵安排好了「發揮餘熱」的去處．需要强調的是，目前確實也還有一批元老人物在各種協會擔任名譽職務，但汪道涵與他們相比，擔任的却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職務．簡言之，其他元老雖然也有擔任名譽職務者，但他們在中組部的花名册上已被注明「離休」二字，而汪道涵却仍然屬于「在職領導干部」．

江澤民定期接受汪道涵點撥

而江澤民之所以在汪道涵「發揮餘熱」的問題上如此煞費苦心，除了向汪道涵報恩的一層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江澤民對汪道涵敬仰有加，信任有加，所以他江澤民需要讓汪道涵名正言順地當自己的軍師．汪道涵被任命海協會長消息傳出后，立刻有中共內部人士分析道：汪道涵在江澤民背后出謀劃策的範圍絕不僅僅限于對臺事務方面．江澤民近幾年里與汪道涵凡乎是定時會面，不知情者奇怪江澤民何以在對臺事務上下這么大的功夫，熟知內情者則斷定江澤民向汪道涵求救的問題其實是包羅萬象，甚至也包括如何控制軍隊，如何掌控武警，公安、情報機構等方面的最敏感，也是最關乎江澤民身家性命的問題．

已經為外界所知的江澤民一九九五年春節抛出的對臺新政「江八條」，不但是由汪道涵親自組織專家班子討論起草，而且由江澤民趕在鄧小平、陳雲等人在世時即發布「對臺新政」的主意本身就是汪道涵提出的．

據聞，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閉幕后不久，汪道涵即給江澤民出主意說，第三代領導核心既然要對内服從，對外彰顯與前幾任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根本區別，關鍵是要在繼續第二代核心的基礎上，盡快拿出「自己的東西」，意思是江核心要在理論建樹方面和政策制定方面要有超越鄧小平的東西．

對照一下「江八條」的實質内容就不難發現，其中對鄧小平的所謂「一國兩制構想」祇是在文章的帽子里面虛引，而實際内容至少是比過去葉劍英、鄧小平等人關于對臺政策的一系列講話更具體，而且盡力做出對臺「寬容」的姿態．特別是在統一問題上的「分階段說」，可謂比鄧小平過去的有關講話更為現實，事實上也是承認了兩岸統一時日遥遥無期的事實．

曾經在中共香港新華社擔任臺灣事務部部長的黃文放到臺灣進行私人訪問時曾經表示：近年來由于大陸對臺系統的人事交替，已造成對臺政策的詮釋上的混亂，這是近來出現大陸對臺「動武條件」多種不同版本的主因．

而這種現象直接給臺灣方面帶來的困擾是：不懂得中共内部動作常識，對中共内情更無從知曉的臺灣記者聽見某位口無遮攔的大陸官員出狂言便大驚小怪，自己嚇唬自己：無法判斷是非的臺灣老

百姓經過大陸某些官員和臺灣新聞媒體的雙重誤導，自然不堪其擾，終日心驚肉跳，巴不得無限夸大中共「對臺動武」可能性的臺灣軍方趁亂漁利，抓緊機會讓臺灣納稅人多花軍費而且花得情願，不懂裝懂，自欺聰明的臺灣政府僚在若干自己無法做出正確判斷情況下，唯恐上峰馬自己飯桶，不得不跟着媒體后而起哄，因為他們至少還明白一點，即中共既然是個政治運作完全不透明的鐵幕政權，所以他們交給上峰的「分析」報告就永遠無所謂錯——如果報告中的預測內容沒有被事實證明，也不是因為自己預測的不準，而是中共政策改弦更張的結果．

其實，臺灣方面若想在中共對臺政策，特別是「動武底綫」這樣的關鍵問題上避免判斷失誤，最簡單、最直接的辦法就是隨時注意汪道涵的有關講話內容，或者是找機會直接從他的嘴里套出話來．這還不僅僅是因為汪道涵目前擔任着大陸海協會會長一職，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在江澤民身邊扮演着「紅朝帝師」的角色，擔負着出謀劃策的功能——無論是兩岸關系走向還是中共外交路綫，無論是經濟政策還是黨內權爭……

相比較而言，汪道涵在海協會的主要助手唐樹備在詮釋中共對臺政策時，應該說是實話較多，虛話較少．但是，鑒于他本人的副部級地位，他也無法擺脫中共官員在對外發言時的通病：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說錯半句話．而汪道涵表面雖僅是一個正部級干部，「紅朝帝師」的實際角色決定了他在對外講話是已經不必再有擔心上峰怪罪的心理障礙．

當然，「紅朝帝師」再老謀深算、老馬識途，也還是有「馬失前蹄」的時候．汪道涵為江澤民組織策劃

的「對臺新政」于一九九五年春節正式出籠后，祇是在很短一段時間內起到了拉攏臺灣民心、吸引臺商踴躍投資大陸的正面效果．接下來便是海峽對岸的李登輝太不給面子，不但沒有「善意回應」江澤民的「對臺新政」，反而「甘願給美國反華勢力當棋子」，跑到美國風光了一圈．因此，不但令江澤民飽受黨內、軍內強硬派的冷嘲熱諷，也令汪道涵已經計劃好的臺海之行就此作罷．

如果不是李登輝訪美事件，計劃分別在北京和臺北舉行的「汪辜會談」和「辜汪會談」內容如今已足可以令汪道涵青史留名．

至于未來大陸海協會與臺灣海基會是否能夠恢復正式會談，即使能夠恢復，屆時的汪道涵是否仍然力可從心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情了．

聯絡華東幫共助江核心

汪道涵在高層人事方面暗助江澤民的最突出舉動，莫過于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夕的倒楊成功．

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后，鄧小平便自作聰明地安排了楊家兄弟代他控制江澤民，但萬萬沒有想到江澤民一方面利用汪道涵的華東系統背景，一方面利用自己養父江上青以及曾慶紅父親曾山那一代在中共華東幫元老中的人脈關系，成功地孤立了楊尚昆、楊白冰兄弟，終于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前夜，營造出一個令鄧小平不同意倒楊別無選擇的政治氣氛．

如果說目前的中共高層存在一個「上海幫」的話，那么無論這個「上海幫」的幫主江澤民還是其大內總管曾慶紅，都是中共歷史上華東幫香火的延續．而汪道涵本人更是中共歷史上華東幫的成員之一．

如果說抗日戰爭初期汪道涵曾是江澤民養父江上青的得力部下．那么目前仍在中共軍隊和國務院系統發揮影響力的元老人物張愛萍和張勁夫，則是江上青當年的親密戰友和直接上級．

當年江上青到盛子謹身邊，就是時任中共安徽省工委宣傳部長張勁夫派去的．深得盛氏信任后，江上青不失時機地說服盛氏，必須邀請在皖東北附近活動的八路軍、新四軍主力進入皖東北合作抗日．盛氏同意后，張愛萍將軍協同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進入該地區．同時在該地區開辟中共抗日根據地的還有張震擔任參謀長的新四軍第六支隊．

到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前，張勁夫曾擔任過的最高職務為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張愛萍的最高職務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軍銜上將；張震的最高職務為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軍銜上將．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到一九九四年中共十四大為止，張勁夫和張愛萍均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

張勁夫比汪道涵長一歲，安徽同鄉和長期的華東幫歷史淵源，決定了此二人私交甚厚．張氏自中共建政之后，長期從事財經系統的領導工作，經驗豐富．與趙紫陽時代的另一中共財政管家姚依林相比，張氏最大的特點是思想不僵化．所以，整個趙紫陽時代里，雖然張勁夫因為年齡原因已經退

居二綫，出任中顧委常委，但趙紫陽對他一直十分倚重．

「六四」事件之后，海外突然冒出一批所謂的「趙紫陽前智囊」到處招遥撞騙，其實，當時真正能够稱得上「趙紫陽智囊」者衹有兩人，一是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二是實際充當國務院經濟問題總顧問的張勁夫．當時，趙紫陽遇到政治難題必與鮑彤商量，遇到經濟難題必問張勁夫討教，凡在趙紫陽身邊工作過的人對此無不知曉．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后，張勁夫低調了一段時間便又活躍進來．特別是中共十四大之后，照理已經因為中顧委的撤銷徹底完成政治使命的張勁夫，反而有了越來越多「發揮餘熱」的機會．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受江澤民委托，具體主管與大陸海外學人的聯絡工作．江澤民在接見海外歸國學人之類的活動中，張勁夫也以領導人身份陪同接見．

當然，無論張勁夫過去與趙紫陽關系多么密切，像他這樣的中共元老人物即使對「六四」鎮壓有不同看法，「六四」之后的政治清洗也衹會令他淡出政壇．但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没有他過去與江上青的那層關系，如果没有汪道涵的居間溝通．他張勁夫就没有可能從趙紫陽的顧問摇身一變，成為江澤民認為可以信賴，可以安排其繼續「發揮餘熱」的「老同志」之一．

一九九零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緬懷江上青烈士》一書時，分別收録了張勁夫、張愛萍、張震等人的題詞及懷念詩文．張勁夫在文章中稱贊説：「上青同志的革命激情、敏捷思路和文學才華，是極為杰出的，他的演講和著文，都使聽者（讀者）在心靈深處激起波瀾，是名副其實的革命知識分子

的精英」．

上臺之后時刻不忘標榜自己是「烈士子弟」；時刻不忘高喊以「繼承革命先烈遺志」為己任口號的江澤民，看到張勁夫這段感情充沛的讚揚文字之后，汪道涵為江澤民和張勁夫之間進行的政治溝通自然見效．

中顧委建制正式撤銷，特別是一九九四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正式對外宣布「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力）交接已經完成之后，還能够以領導人身份陪同江澤民出席各類國內活動的政治元老為數有限．而軍內元老張愛萍、葉飛等人的重新出山，以陪同江澤民出席重要活動的形式表示江澤民軍權的穩固，更是汪道涵、曾慶紅兩人為江澤民所做的重要貢獻之一．

當年江上青遇難時，張愛萍曾親自參加追悼大會并發表感人至深的悼文．當時，江上青夫人王者蘭人在揚州，聽到噩耗后由江澤民及其生母吳月卿陪同前往江上青的犧牲地拜祭．張愛萍親率手下八路軍、新四軍將士迎接烈士一家．這是江澤民與張愛萍的第一次見面．當時的江澤民才十三歲，剛剛進入中學讀書．

此后的漫長歲月里，張愛萍與江澤民少有接觸，談不上印象好壞．但「六四」鎮壓事件却導致張愛萍一度對江澤民不屑一顧．

策劃倒楊爭取張愛萍

人們還記得，在天安門廣場爆發八九群衆運動時，張愛萍曾憤筆疾書，在七位老將軍聯名致首都戒嚴指揮部的信中寫道：「軍隊是人民的軍隊，絕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制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入城．」

這七位老將軍都是中共五十年代授勛的上將，在當時聯名上書反對解放軍進城鎮壓時，他們都還有所謂的「二綫」職務，其中張愛萍、蕭克、宋時輪、楊得志四人同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產生的中顧委常委，葉飛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再道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李聚奎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委顧問．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晚上，當這封信在長安街上被大學生的宣傳車廣播后，無數北京市民跟隨宣傳車走了一程又一程，聽了一遍又一遍．場面十分感人．

到本書截稿為止，上述七位上將已有三位作古，他們是宋時輪、楊得志和李聚奎．此三人都比鄧小平年齡要小，故北京有人調侃說「鄧小平與其他中共元老的長壽比賽，已經比贏了陳雲、李先念．剩下的任務除了彭真外，就是當年公開反對他天安北京日報鎮壓決策的幾位上將．

一九八九年的時候，關於當年五月七個老將軍聯名致信戒嚴部隊反對軍隊進城屠殺人民的消息外界曾有詳細報道．除了這則重要信息外，當時的天安門廣場確實也流傳了一些似是而非或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政治新聞」．為此，中共當局在取得「平息反革命動暴亂的偉大勝利」之后，曾經在連篇累牘的文章「揭露」八九年五、六月間天安門廣場的「動亂真相」，舉出李鵬被警衛員打傷、萬

里在國外發表聲明等一系列政治謠言來説明那場「動亂」的「反革命實質」，但偏偏就對七位老將軍的聯名信不發一言．可見此事不但是百分之百的事實，而且是令當時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決策層，最為頭痛的一場「黨內重大政治事件」．

據筆者早在一九九零年得到的消息，當時的鄧小平曾經試圖原諒這七位老將軍，通過楊尚昆傳旨，希望此七人在「適當場合」做做「自我批評」．結果，楊得志率先被楊尚昆說服，在所謂「適當場合」自我解釋參加簽名的「動機單純」，祗是不希望流血．據說后來鄧小平又傳旨要求「此事不要再議」．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當時已經很少出門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雲，在「黨和國家的危難時刻」，拖着病體親自主持中顧委常委會議．當時，連蕭克、楊得志、宋時輪三位與張愛萍一起寫聯名信的老將軍都抗拒不住來自陳雲和鄧小平的壓力，違心地到了會場，舉手同意中共決定采取的鎮壓決策，但張愛萍却拒不到會．以至中共當局在對外公布中顧委常委會議的消息時，不得不寫上一句「有五位常委因病因事請假」．

但是，因為這則消息畫蛇添足地注明了一筆「程子華同志給會議打來電話，表示堅持擁護……正確決策」．這等于是向外界證明，除了程子華之外的張愛萍等沒有到會者，是不擁護所謂「正確決策」的．

此后，七位老將軍中拒不認「錯」者中，又以張愛萍和葉飛表現最為堅決．據一位相當知情的軍

內人士透露：「六四」鎮壓后不久，正趕上一次中央軍委給已經退役的老軍人授勛——即按照他們各自參加中共軍隊的時間分別授各類名目的勛章．結果，通知張愛萍后，張愛萍拒絕前往參加儀式，軍委按照楊白冰的命令，派出一專門小組到家里送勛章，張愛萍却提前到了北戴河．送勛章小組追到北戴河，張愛萍則返回北京，弄得中央軍委十分狼狽．

「六四」鎮壓過后，外界關注焦點集中在一大批「動、暴亂分子」的命運上面，對七位老將軍的行踪和動向則基本無人關心．所以，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自「六四」鎮壓之后，張愛萍和葉飛即長期拒絕參加中共的各種黨、軍慶祝活動，實際上是在表達一種與江澤民政權拒絕合作的態度．

至于在私下里，張愛萍則一再對登門拜訪者高喊：這事（指「六四」鎮壓）早晚要翻案．

一九八九年七月底，總政治部通知一批離退休老將軍參加紀念建軍六十二周年座談會，張愛萍堅辭不去；當年九月底，總政治部又請他參加以國防部名義舉行的建軍節招待會，他再次拒絕．事后海外曾有媒體報導說：張愛萍為此事曾在電話中譏諷道：「平暴」我又沒立功，到了會場不成了：反面人物」了！

此細節不知是否有人向張愛萍求證，筆者細查了當年文獻，中共官方媒體關于這次建軍節的報導中，確實沒有張愛萍、葉飛及李聚奎的名字，七位老將軍中的楊得志、宋時輪及蕭克則有到場．

八九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為了標榜其「六四」鎮壓后的「國泰民安」，同日又趕上一個建國周年的整數「四十年大變」，精心排演了一次天安門歡慶活動，當時，但凡當時還勉强能够出門見風的中共元老，包括鄧小平、陳雲、彭真等，悉數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民同樂」．

當時，中共媒體發表的照片上可以看出，身體最弱的陳雲坐在天安門城樓上，必須頭戴遮風帽，脚蓋厚毛毯，足見在此「黨和國家生死危亡之關頭」，黨性高于一切的責任感之高．可張愛萍、葉飛、李聚奎三位在職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仍然沒有露面．

事后海外曾有報導道說：中共有關部門為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四十年大慶」，曾經再三勸說張愛萍上天安門，并强調是鄧小平的意思．但張愛萍回絕道：當年毛主席接見紅衛兵讓我上天安門我都敢不去．

此后，張愛萍長期閉門不出，《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上再也見不到他的名字．而一些大陸文人基于對他這種表現的由衷佩服，便在一些人物傳記雜志上為他揚名，雖然不敢涉及「六四」情節，但却突出描述他一生中的反左歷史．比如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時，全中國大陸的所有汽笛齊鳴五分鐘，人人都在表示哀痛，但唯有張愛萍偏偏在這種時候警告說：中國黨應該接受斯大林大搞個人迷信的教訓，應當警惕在中國有人一邊說不要「一言堂」，却又一邊正在搞「一言堂」．

再比如，五十年代「三面紅旗」萬萬歲的狂熱時期，張愛萍把他在甘南平叛，在蘇北老區的見聞向中央反映，后又親自寫信給中央書記處，說農村和牧區所有制急劇的變化給農民和牧民造成了災難．

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因為上《萬言書》痛陳毛澤東好大喜功導致的災難后果，而被毛澤東斥責為大逆不道，包括周恩來在內的絕大多數中共高級干部都隨聲附合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唯張愛萍敢說自己的這位老上級耿直剛正、廉潔奉公．彭德懷被罷官后，所有人都避之不及，張愛萍却不聲不響

地鐵進已經失勢的彭德懷元帥那冷冷清清的專機里，陪他回到北京．

「文革」初始，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已經發表了，張愛萍却「不識時務」仍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言，建議從最高領導人毛澤東開始，進行自上而下的黨內整風，中共中央通知他參加「偉大領袖接見紅衛兵」的天安門觀禮，他却佯裝不知，悄悄去了鐵道兵在山東黃河上的演習現場．回京后，發現他工作的總參謀部里一夜之間刷出了五萬張打倒他的大字報．于是，他成了「劉鄧司令部的黑干將」，遭秘密關押后一條腿被打斷．

一九七五年復出后，張愛萍重新執掌國防科研部門，為中共運載武器的研制再立新功．但是，因為他推崇「唯生產力論」，再次為造反派所不容．七六年初，被江青等人批判的「復辟回潮論」一句是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另一句就是張愛萍的「今不如昔」．他二次被打倒后，天天在醫院的病房里挨批斗．當時，「四人幫」把鄧小平和張愛萍名字合在一起，稱為「鄧小平，張二(愛)平」．

在七六的四月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過程中，張愛萍還曾親自賦詩，與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們一唱一和．他在一首「反詩」中寫道：「(右傾翻案)帽子飛，(今不如昔)罪史追．聽狂吠、大棒揮，(革命左派)亂世魁，鶯歌燕舞瞎鼓吹……」「鶯歌燕舞」四字出于當時發表的毛澤東一首夸張「形勢大好」的古體詞，可見張愛萍當時的確是非常勇敢．

當時張愛萍被軟禁在醫院里，沒有行動自由，于是他就請醫護人員從廣場上抄回詩作修改．「四五」天安門事件高潮的幾天里，每天都有張愛萍修改過了詩詞被醫護人員送到廣場．

因為有一貫反左，以及長期領導解放軍核武器、運載武器研制等方面的歷史，張愛萍在中共黨內、軍內威望很高．「四人幫」倒臺后，黨內、軍內對張愛萍期望很高，許多人認為主持軍委常務工作的職權應該落在他的頭上．沒想到，鄧小平却把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職務給了比張愛萍大三歲的楊尚昆，張愛萍僅得到一屆國防部長的虛銜．與此同時，過去與張愛萍長期在新四軍、華東野戰軍共事的葉飛也被鄧小平削去海軍司令員職務，代之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虛位．

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張愛萍被迫退居二綫，楊尚昆却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繼任軍委常務副主席．在此前后，他的胞弟楊白冰在軍內一路高升．

一九八八年，鄧小平又逼迫出身新四軍系統的李先念把國家主席職位讓給比他年長兩歲的楊尚昆．

如上種種事例，導致了華東系統出身的老干部、老軍人對鄧小平長期不滿．軍內在職將領對「楊家將」勢力坐大的現象更是怨聲載道．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以國防部長名義出席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張愛萍進場之后，全場自動起立報以熱烈掌聲，老當益壯的張愛萍則還以標準的解放軍軍禮．此情此景，被冷落一旁的會義主持人楊尚昆感觸極深．而張愛萍也從來把對「楊家將」的强烈不滿公開表現．有一次張愛萍在北京地區的中共高干俱樂部養蜂夾道打牌，看到楊尚昆出現，起身扭頭便走，弄得一些在場的元老夫人都替楊尚昆不下來臺．

替楊尚昆不下來臺．

至于葉飛其人，更是經常在華東系統的老干部面前發牢騷，公開表示對鄧小平打擊、壓制華東幫的強烈不滿．而張愛萍、葉飛的這些表現，早已經被汪道涵看在眼里，記在心里．汪道涵心里非常明白，張愛萍、葉飛在「六四」問題上的表現，與其說是基于同趙紫陽一樣的「支持和縱恿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如說是基于老軍人對維護解放軍形象的考慮更準確．此其一．

其二，「六四」鎮壓之后，張、葉二人所表現出的堅決不合作態度，與其說是基于對江澤民接替趙紫陽的不買帳，不如說是趁機發泄對鄧小平的長期不滿更恰如其分．更重要的是，鄧小平借「六四」鎮壓后對中央領導層的改組，把唯一留在軍委領導層內的華東系統老將，長期與「楊家將」合作不愉快的洪學智也逼出軍委，把他剛剛當了一年的軍委副秘書長職務拿掉，為楊白冰出任軍委秘書長開道．

抗戰時期，李先念是新四軍五師師長兼政治委員、張愛萍是四師師長（參謀長張震）、葉飛是一師師長、洪學智是三師參謀長．如此歷史淵源，決定了李、張、葉等人為洪學智遭貶之事更加憤怒不已．

汪道涵將這些情況向江澤民分析之后，結論自然是祇要「楊家將」倒臺，江澤民才有可能爭取到華東系統老軍頭的支持．起碼可以爭到令這批人不給江澤民拆臺的效果．

抬舉死人安撫在世老軍頭

汪道涵的策劃加上曾慶紅的具體運作，聯絡到黨內、軍內龐大的反楊力量，不但達到了逼迫鄧小平

平廢點「楊家將」的目的，而且還成功推出了被華東幫最信得過的，戰爭年代長期提任張愛萍參謀長的張震，取代了楊白冰．

到此之止，因為鄧小平過去十幾年內用人政策上導致的軍內矛盾大大緩解，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的劉華清即使過去與「楊家將」沒有什么矛盾，日后也衹能順應華東幫打了翻身仗的大趨勢了．

「楊家將」的倒臺，無疑為張愛萍、葉飛等華東系統的老軍頭出了一口惡氣．但畢竟還有一層當年因反對戒嚴部隊進城因而也冷落了江澤民的一層原因存在，所以張、葉二人在十四大召開之后的較長一段時間內，仍然沒有公開露面為江澤民捧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汪道涵，比江澤民更明白這兩位老軍頭對在位將領，特別是對張震的幕后影響力非同小可．一九九四年八月十四日，《解放軍報》頭版上方圖框登出張震的署名文章《一部傳統教育的好教材——寫在〈張愛萍軍事文選〉出版之際》，立刻被認為是張愛萍仍在發揮其軍中影響力的活證據．于是，一直保持與張愛萍密切聯系的汪道涵，又適時為江澤民出了一個對老軍頭在「六四」態度問題上下不再追究，和借抬高死人治喪規格安撫活人的主意．

衆所周知，在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問題上，黨、政高層干部中的反對和抵制情緒還不如軍方的強烈．特別是一批離、退休或退居二綫的老軍頭，都認為派軍隊進城開槍鎮壓之舉，最直接的惡果是「人民子弟兵」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而退役將領們的情緒自然通過各自派系直接影響現役軍官，以至「六四」鎮壓之后軍內論功行賞時無人敢要．

當時鑒于這種形勢，已經把持了軍隊干部任命大權的楊白冰趁機大搞黨同伐异，在軍內搞得怨聲載道．而江澤民成功搬倒「楊家將」后，在軍內面臨的局面就是：要提拔反對「楊家將」的人，就不能繼續以「六四」態度劃綫；反之就祇有繼續楊白冰在軍內的組織路綫．所以，對老軍頭在「六四」問題上的態度不再追究，無疑是幫助江澤民安撫老軍頭，籠絡軍心，盡量爭取在軍內站穩脚跟的一個較明智的辦法．

一九九五年六月初，新華社接連發布了兩名中共退休將軍逝世的消息，一位是前解放軍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五五年授銜少將），另一位是前海軍副司令員劉道生（五五年授銜中將）．

本來，中共對內早已就黨、政、軍離退休干部去世發布消息的規格有明確規定，對五、六十年代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的軍內離、退休干部，去世后分別視其離、退休前的級別高低，決定是由新華社發「通稿」，還是僅僅由《解放軍報》發一個豆腐塊大的「本報訊」．所以，李人林和劉道生的死訊上報并非怪事．而怪的是發消息的時間和報紙對消息的處理方式．

李人林死于三月二十四日，發消息時間拖了整整七十天，劉道生死訊的發布時間也拖了二十多天．另外，像上述二人的生前級別，照慣例其訃告祇能刊登在《解放軍報》四版上，但這次却都是刊登在頭版顯著位置．

而從訃告內容看，對此二人的評價都祇籠統地說他們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上、政治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却沒有具體表示他們二人對「六四」鎮壓是否「堅決支持」——雖然此二人分別

是七屆全國政協常委和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也就是說，一九八九年發生「反革命動暴亂」時，此二人都還身在其位．當時，凡還「身在其位」的中共元老干部，祇要在「六四」鎮壓問題上表示沉默立刻會在政治上被冷落．

對此，有知情者透露說：李、劉二人在八九「六四」之后都表現得非常消極，實際上是在抗議中共對八九「六四」采取的極端措施．所以，如查他們死在前兩年的話，能給他們報出幾句簡短的消息來就不錯了．而這次之所以在他們死后拖了一段時間，也正是因為在「評價」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最后，中央軍委辦公廳突然傳出了「上面」的指示，要求在對老同志的身后評價上，不要過于糾纏一些「思想認識」問題，繞開就是了．而這個「上面」其實就是采納了汪道涵「錦囊妙計」的軍委主席江澤民．

接下來，便趕上曾在「六四」之后與張愛萍、葉飛同步保持不合作態度的李聚奎上將去世，其治喪規格被突然拔高到令人吃驚的地步．

李聚奎于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去世后，中共新華社立刻播發了非常詳細的生平材料，七月四日又為他舉行了非常隆重的「起靈」和遺體告別儀式．刊登于次日各大報刊的消息報導中，高度評價此公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和軍事家」．

按照中共近些年里才做出的嚴格治喪規定，曾經擔任過黨和國家一級領導職務者（政治上犯了錯誤的不算），死后的評價中可用「偉大的……」形容，如陳雲、李先念：曾擔任過二級領導職務

者，死后的評價中祇可用「久經考驗的……」形容，如王任重、胡喬木等等．而李聚奎生前軍內最高職務祇擔任過總后勤部政委、政府內最高職務是石油部部長，黨內則連一屆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綫后，在中顧委內祇能當委員不能當常委（一九九二年以前中顧委常委相當于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中顧委委員祇相當于普通中央委員或正省、部級，領導人）．

也就是說李聚奎生前所享受的待遇是一個正省、部級，而死后治喪及正式評價的規格則被抬高至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的規格．李聚奎生前可能怎么也沒有想到，在他去世以后反而被官升一級．

『死人秀』助江澤民穩定一方

另外，中共官方有關李聚奎去世的消息中，不但詳細介紹了江澤民及其以下的所有中共在職政要都在李聚奎病重期間到醫院看望或在其逝世時「以各種形式向其親屬表示慰問」，而且而特別突出地强調江澤民不但在李氏病重期間到醫院看望，而且因為李聚奎去世時江澤民不在北京，所以「六月二十七日從外地考察回京后，又親自打電話對李聚奎同志的逝世表示哀悼，對其家屬表示慰問」．

如果單獨看這樣一篇報導，自然不會有什么驚奇之感，但如果結合在此之前，中共方面對所有與李聚奎同等地位的其他退役將軍的喪事處理，就會强烈感覺到江澤民正在大做「死人秀」．

與李聚奎相比，七位反對戒嚴部隊進城的老將軍中最先去世的寧時輪待遇最慘、規格最低．氣憤不過的張愛萍自己寫了文章悼念．七位將軍中第二位去世的楊得志上將因為死在江澤民采納汪道涵借

抬高死人安撫活人的主意之前，所以也是死得淒淒慘慘，治喪冷冷清清．

說起來，李聚奎雖然同楊得志都是毛澤東時代的上將，但李獲授上將軍銜的時間比楊晚三年，另外，李生前軍內最高職務祇擔任過總后勤部政委、政府內最高職務是石油部部長，黨內則連一屆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所以退居二綫后，在中顧委內祇能當委員不能當常委．而楊得志前生擔任過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謀長等多項軍內重要職務，黨內職務更是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和中顧委常委．所以，有心人將李聚奎與楊得志的不同治喪規格稍加對比，不可能不感覺奇怪．

不過，當楊得志的家人及老戰友為此憤憤不平，痛感世態炎涼已經一年多后，被江澤民一手提拔的新任總參謀長傅全友却又于九五年底在《解放軍報》上發表長篇紀念文章．不知內情者，自然感覺突兀．而這幕后的背景是，傅全友正是要配合江澤民在軍隊進一步站穩脚跟的重要舉措，借抬舉死人來安撫仍然存活于世，而且對軍隊仍發生重大影響的一大批老軍頭，以保證槍杆子絕對聽從江澤民的『黨』指揮．

所以，李聚奎喪事辦過之后，一些老軍頭都感慨說，楊得志實在是死得早了點；宋時輪更是死的不是時候．如果他們都能够熬到一九九五年下半年才去世的話，至少不會低于李聚奎的治喪規格和身后評價，也不枉其為共產黨政權戒馬一生．

北京政壇內也有分析意見認為，汪道涵適時為江澤民出這種抬舉死人安撫活人的主意并被江澤民及

時采納，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客觀原因從中促成，那就是從一九九五年下半年因為李登輝訪美事件引發的中共軍方態度强硬的表現。

前文已經分析過，汪道涵為江澤民策劃、組織的「對臺新政」講話「江八點」投之以桃後，對岸的李登輝不但沒有用汪、江等人所希望的「善意回應」報之以李，反而於一九九五年年中到美國周游一趟，令汪、江二人一度在內部陷于十分被動的局面。

從一九九五年下半年開始，因為中共軍方的對臺恫嚇行動一度表現得上得快，下不來，特別是劉華清和遲浩田兩人在公開講話中重提所謂「第三次國共合作」，已經被北京政界認為是公開與「江八條」唱對臺——因為一九九五年年初出籠的「江八條」實際上已經放弃了「(國共)兩黨對等」談判的訴求。

當時還有一則重要信息是，《解放軍報》在一段時間內的對臺口徑，似乎同《人民日報》不太一致，前者的口氣，特別是在宣傳軍隊作用方面，要比后者强硬得多。

再者，中共外交系統即對臺責任系統的負責人或發言人在那幾個月里，也表現得明顯跟不上軍隊的動作，不能不被外界認為是中共政治決策系統與軍隊系統意見不統一的外在表現。而當時江澤民、李鵬等黨政領導人的對外講話，更給外界一種被動地跟着軍方强硬態度走的感覺。

一時間，最善于在這種問題上推波助瀾的海外報刊，連篇累牘的所謂「槍指揮江」的分析報導，令江澤民不能不回憶起自己當上軍委主席之后持續了三年之久的，「鄧控制楊，楊指揮槍，槍命令江」

的悲慘時日，而當時北京政界已經流傳一種更為形象的諷刺說法：「槍杆子打到哪里，江核心指到哪里」.

同時，過去一批在對內鎮壓問題上主張綏靖政策的老軍頭，此時在「民族主義」問題上，幾乎是個個堅決主張強硬．無論是張愛萍、葉飛，還是楊成武、洪學智……，總之是一大批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后或消聲匿迹，或被迫交出軍權的老軍頭，此段時期都隨着兩岸敵對關系的日漸升温紛紛出來活動，或參加各種集會，或親自撰寫文章，真真是「老夫聊發少年狂」.

一九九五年年八月，張愛萍在《解放軍報》上發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署名文章．這是他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后第一次在大陸官方主要媒體上發表署名政論文章（此前祇發表過悼念宋時輪的一篇懷舊文章和悼念李一氓的一道短詩），文章中除了追述抗戰歷史之外，有相當篇幅是論及戰后美國政府對日本戰犯的包庇、縱容及將安圖將臺灣變成美國在太平洋上的「不沉的航空母艦」；批判美國「禍心不退，支持李登輝搞臺灣獨立」．可見，張愛萍發表此文最直接的目的還是要表達他對當時中美關系、兩岸關系的强硬態度和立場：「對任何膽敢重蹈舊轍的帝國主義分子，堅决給予有來無回的打擊」.

老軍頭對臺强硬因勢利導

而張愛萍之所以在臺灣問題上如此强硬，在美國「支持臺灣獨立」問題上如此敏感，自然同他的

軍中經歷有直接關系．

按照資歷，張愛萍無疑屬中共開國元勛之列．他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共，次年參加中共紅軍部隊，歷任中共紅軍師政治部主任、八路軍蘇皖縱隊政委、新四軍三師副師長、解放軍華中軍區副司令員和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委．中共建政后，任中共第三野戰軍參謀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國防工辦副主任、國防科委主任、國家科委第一副主任、中央軍委科技裝備委員會主任，一九五五年獲授上將軍銜．一九八零年起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等職．

張愛萍的一生富有生動傳奇色彩．抗戰時期，他以新四軍三師副師長的身分兼任九旅旅長．而這支部隊被蘇北地區的老百姓及國民黨兄弟部隊稱之為「常勝九旅」，令日本侵略軍聞風喪膽．一九四九年，他又被任命為中共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兼政委，親自領導組建了中共解放軍海軍的第一支艦隊．五五年，他擔任華東軍區東海前綫總指揮，指揮了中共解放軍首次陸海空諸兵種聯合立體作戰，從國民黨軍隊手中奪走了一江山島．

在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的紀念文章中，張愛萍還重筆描述了當年描述一江山島期間與美國人的對抗．文中說：美國人「派軍事顧問到臺灣和我浙閩沿海島嶼建立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前哨陣地．1995年初，我軍在解放大陳列島戰役中，當我們勝利攻占一江山島正向大陳本島進擊時，美第七艦隊包括兩艘航空母艦在內的數十艘戰艦，開到我浙東海域，對我進行武力威脅．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卻到莫斯科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替他向周恩來總理求情，不要進攻大陳本島，讓其安全撤走．如今，美國禍心

不退……」

但是，張愛萍在這里沒有講到他當年剛剛奉命組建的解放軍海道走麥城的經歷．事實上，國、共兩軍爭奪大陳列島的所謂「立體之戰」早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即已開始．當時，解放軍的主力艦被擊沉．韓戰暴發后，此地暫時平息戰火．五三年四月十一日，解放軍又有兩艘炮艇被擊沉．此后的數次交戰，雙方均損失嚴重，七月六日解放艦隊雖然重創國民黨海軍 106 號軍艦，但却付出兩艘巡航艦被擊沉的代價．直到當年十一月，解放軍海軍才創擊沉國民黨海軍「太平號」主力艦的海戰勝利紀錄．而這也正是張愛萍對美國和臺灣一直存在的歷史宿怨．而葉飛在「解放臺灣」的問題上更是耿耿于懷．

在國、共兩軍作戰史上中共自己都承認其最大的一次敗仗，正敗在武力犯臺上．而這次敗仗的前綫指揮官就是葉飛．一九四九年十月，身為兵團司令的葉飛在指揮部下攻占他的家鄉福建厦門之后，立刻奉命指揮渡海作戰，力圖一舉拿下金門島．結果三個加强團的近萬人兵力在搶灘之后被國民黨軍隊如數包圍殲滅．按照中共自己的話說是「以解放軍的失利而告終」．

三十年后，中共正視這段歷史，在其軍史著作中承認「這是解放戰爭中，我軍成建制部隊受到的最大損失」．而當時負責指揮這場戰役的共軍最高指揮官葉飛則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征戰紀事》中坦承：金門戰役「因我們的指揮員的失誤而遭到重大損失，真是慘痛的教訓啊！這一仗，我軍損失了近一萬人，成建制部隊的覆滅，在我軍歷史上是少有的．」

事后，葉飛曾寫信給毛澤東要求處分，但被毛澤東原諒．

接着，中共高層又指示葉飛準備在一九五零年攻打金門戰役，祇是由于韓戰的爆發和美國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毛澤東等人才不得不電令葉飛「解除再攻金門的任務」．

葉飛其人是五五年授銜的上將，此后不久為對臺作戰需要而專門設立福州軍區時，毛澤東親自決定讓已經擔任福建省委書記兼省長的葉飛同時兼任福州軍區司令員、政委．從此，整個福建地區的黨、政、軍第一把手長期都由他一人親掌．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戰也是葉飛任第一綫指揮．

就是這樣一段輝煌的對臺作戰史，決定了葉飛一提到「美國支持臺灣獨立」的問題，自然會舊恨新仇并發．

總之，無論是張愛萍還是葉飛，當年臺灣「解放」不了雖然不是因為他們無能，但這口怨氣憋在心里數十年．八十年代以來，鄧小平制定經濟建設第一，國防建設服從經濟建設大局的政策，實際上是希望兩岸關系拖到下個世紀再說——祇要臺灣不宣布獨立．張葉等人雖然對此內心不見得滿意，但從務實的角度，他們也不得不承認現實．

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曾說：「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條件．」「臺灣歸回祖國，祖國統一的實現，歸根到底還是要我們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政治上和經濟制度上比臺灣優越，經濟發展上也要比臺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沒有這一點不行．四個現代化搞好了，經濟發展了，我們實現統一的力量就不同了．」

可見，鄧小平比任何人都明白，第一，要讓臺灣「歸回」，大前提必須是大陸的經濟發展達到長

足進步」；第二，「實現統一」的「力量」不僅僅指軍事上實力．所以，一句「没有這一點不行」，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中共即使要在「統一」問題上訴諸武力，也是在大陸的「經濟發展上也要比臺灣有一定程度的優越」之后．

一九八四年址月鄧小平又說：「香港問題的解決會直接影響臺灣問題．解決臺灣問題要花時間，太急了不行．」「當然，絕不能輕易使用武力，因為我們的精力要花在經濟建設上，統一的問題晚一些解決無傷大局．」

正是基于這種思維，鄧小平在整個八十年代里一再强調「軍隊要忍」，八十年代中期導演的百萬大裁軍自然也是從這種思維出發．當時，張愛萍和葉飛對鄧小平的這一戰略思想如何表態未見有公開文章披露，但此二人自八十年代以來也確實未獲鄧小平重用．

從張愛萍、葉飛等人此時在臺灣問題上的强硬態度，再回過頭去分析當年鄧小平重用「楊家將」而不重用張愛萍、葉飛等人，恐怕還不是出于所謂「山頭主義」的考慮，更重要的是文官出身，被張愛萍等人譏為「連槍都不會放」的楊家兄弟，最能完全徹底地貫徹鄧小平「軍隊要忍」、國防建設服從經濟建設大局的一貫思想．

所以，一批武將出身的老軍頭因為過去就一直對鄧小平關于在經濟建設第一的情況下「軍隊要忍」的提法十分不滿，認為鄧小平的政策是「顧此失彼」，一遇兩岸關系生變，同時也趁着鄧小平已經不能說話或不方便說話的機會，自然要為軍方出口氣．

當然，也許還有更深層的因素，即張愛萍、葉飛等人在步入八寶山革命公墓之前，始終念念不忘如何為「人民子弟們」挽回因為「六四」鎮壓而損失的聲譽問題．他們自認為祗要重提「要準備打仗」，甚至重提「解放臺灣」的口號，就可以令中國政治重現當年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別發動韓戰、越戰時的局面，「人民解放軍」成為全社會的支柱力量和第一宣傳對象；就可以在鼓動起全國各界、黨內黨外民族主義情緒的前提下，鼓動起解放軍官兵「為保衛祖國主權和領土」而戰的局面下，重振因為經商大潮而焕散了的軍隊士氣，重振解放軍在百姓心目中的軍威．

上述原因，決定了自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訪美成行之后，中共軍方在職將領的强硬態度，在北京政壇內都被認為離不開張愛萍、葉飛及其他一大批退役老將軍的幕后鼓動和支持．

面對這種局面，江澤民一方面確實也需要靠軍方發幾枚導彈來警告一下李登輝，同時更需要靠軍隊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活躍來支持他這位「三軍統帥」在政治局里的「核心」地位有名有實．問題是，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實踐早已經有前車之鑒，軍隊系統一旦在政治層面上取得發言權和決策參與權后，「槍指揮黨」的危險性即會隨之升高．他江澤民在既無毛的威望，又無毛的韜略的前提下，怎敢放心讓軍方繼續如現在這樣表現下去．

所以，江澤民一方面頂住軍方的壓力，要求其手下的文宣系統在對臺宣傳，特別是在對美宣傳方面「還是要留有余地」；一方面又在汪道涵、曾慶紅等人的幫助下加緊與張愛萍、葉飛等人的感情聯絡，千方百計揣摸老軍頭們的內心世界及他們在對美、對臺問題上持强硬態度的真正動機，想方設法

對他們進行安撫，平息他們多年來積累的心頭之怨和離退休后的心理不平衡．而祇要讓老軍頭們感覺「心情舒暢」，進而再對劉華清、遲浩田這批人采取又壓、又拉的作法，才有可能保證他江核心的宏觀「戰略部署」不至于完全跟着軍方一味强硬的呼聲走．

滿足老軍頭的軍人榮譽感

事后看來，汪道涵前面提出的抬高死人安撫活人的主意，以及設法滿足老軍頭們「軍人榮譽感」的具體辦法，已經有事實證明對江澤民穩固其軍內領導地位起到了積極效果．

從一九九五年八月開始，在中共報刊上消失多年的張愛萍、葉飛兩人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特別是江澤民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接見一批抗日老戰士、老模範時，已經沒有任何職務的張愛萍、葉飛不是站在被接見的隊伍里，而是被安排其他黨、軍領導人隊伍里，一起陪同江澤民接見別人．這在客觀上絕對起到了為江澤民捧場的作用．

此信息在海外雖未引起任何震動，但在北京却至少令一批政治异己之士在驚訝之余感覺十分遺憾．自江澤民上臺之后，把「六四」平反希望寄于中共內部的政治异己人士，早已經觀察到了張愛萍、葉飛等人與江澤民政權的拒不合作表現，相信待鄧小平歸西以后，這些人肯定會利用其軍中餘威向江澤民政權發難．所以，汪道涵暗助江澤民成功安撫張愛萍、葉飛等人的直接效果，除了大大有助江澤民對軍隊的控制，還適時打擊了一下政治异己分子們對共產黨自己平反「六四」的希望之情．

當然，張、葉二人一改堅持七年之久的故意消聲匿迹，并不見得此二人在「六四」鎮壓問題上也已經回心轉意，問題是無論國內還是海外的政治异己分子，過去把張、葉等人與十四大上被趕下臺的「楊家將」歸里包堆，一并分析成即將逼迫江澤民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所謂「黨內健康力量」，至少是過于簡單化了．即使張、葉二人同「楊家將」都想到過在鄧小平去世之后借「六四」問題向江澤民發難，也很難想像張、葉二人有與「楊家將」在政治上聯手的可能．正如前方分析過的那樣，江澤民畢竟已經被認為是黨內華東幫香火的延續，而楊家兄弟却是作為華東幫的政治對立面被趕下臺的．

斷定李鵬沒有抗爭本錢

據信汪道涵在在為官之道和治黨治軍治國的通盤決策方面，至少還給江澤民出過許多政治權術方面的高招，比如江澤民剛剛入主中南海之后奉行的「聯李壓喬」；九四年底謀劃出的對朱熔基主掌的國務院財經系統實行分權等，都是汪道涵點撥的結果．另外，在對付陳希同的北京市「獨立王國」的問題上，江澤民個人本來并無如此膽量，何况此事一開始就遭到江澤民的政治盟友李鵬的反對．但汪道涵及其他幾位江澤民謀士對下決心采取此行動的利弊比較結果，斷定打陳希同利大弊小．而最終說動江澤民終于下定決心的關鍵理由還是在李鵬身上．按照汪道涵的分析，僅因為李鵬到下屆人大已經不可能留在總理位置上這一點，就决定了李鵬已經沒有與江澤民進行暗中抗爭和暗中抵制的本錢．李鵬

如果還希望自己在一九九八年總理換屆后給自己爭取到一屆全國政協主席的位置；或者在一九九七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五大上繼續留在中央政治局內改作黨務工作，衹能在政治上與江澤民保持高度一致，不然衹能落個一次退到底的命運．

果不其然，雖然李鵬曾經表現出對陳希同和陳氏北京市委的支持，但宣布陳希同下臺后，李鵬仍然是除江澤民而外的所有政治局成員中，高喊「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口號頻率最高的一個．

没有汪師哪來江核心

自一九九六年初開始，伴隨着當時臺海兩岸關系的持續緊張，海外曾傳出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涉嫌經濟犯罪遭受中共紀檢部門審查的新聞．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臺灣聯合報系曾有「來自北京的消息指」出：「汪道涵可能涉及上海萬國證券管金生的經濟犯罪事件，在大陸權力基礎相當穩固的汪道涵未來動向倍受注目．據了解，去年年底上海對臺工作會議，汪道涵因故在北京未能返滬參加，有消息稱系與汪道涵被中紀委檢查有關．一位北京觀察家分析指出，汪道涵是與當前大陸兩大政治勢力——上海幫與北京老當權派交情非淺的重量級人物，顯露圍繞着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政治斗爭．

「分析指出：汪道涵接受檢查這項消息明顯是冲着江澤民的反腐斗爭來的．江澤民的反腐敗同時也為了清除异己，而現在反腐敗却反到江的勢力範圍，達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效果．」

這則報導還說：「海協會三年一屆，去年已換屆，但因中共急欲舉行二次辜汪會談，汪道涵因「任務需

要「繼續留任……．不過，汪道涵是否在中紀委檢查后，藉「身體健康」為由，淡出兩岸政壇，引起關注．」

一九九六年二月上旬，汪道涵在北京召開的海協會理事會上露面，作出上述報導的海外報刊又緊忙自己給自己「辟摇」，用「本報上海訊」否定址天前它自己「來自北京的消息」．該報「上海訊」稱：「今年三月將八十一歲汪道涵，在去年十二月聖誕節其間，因胃部不適入院，其后被迫進行胃部局部切除手術，卧榻休息后于近日出院．」「據悉，汪道涵并未因涉入上海證交尉文淵、管金生的案件，暫時也不會因身體原因辭去海協會會長職務．」「據悉，汪道涵曾以年齡和健康理由請辭海協會會長之職，已為江澤民慰留．」

接着，汪道涵自己親口解釋，此前一兩個月內他老人家之所以一直没有露面，是因為身體略有小恙．其實，汪道涵這段時間的深居簡出，無論是否身體原因，也不大可能是遭受中共紀檢部門調查的原因——除非此時江澤民的黨、政、軍「核心」地位已經摇摇欲墜．殊不知汪道涵老大人如今已經貴為紅朝帝師，中南海里的「刑部」如果把他也打入「另册」，那真是「太歲頭上動土」了．

出生于一九一五年三月的汪道涵到一九九六年已過八十一歲高齡，但却依然擔任着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和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職務．目前中共高層，僅僅是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内的副委員長或副主席尚薦個把年逾八十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而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取消顧問委員會后，所有中共黨内干部，唯有張震（比汪道涵大半歲）和汪道涵年過八十歲仍然擔任具體職

務．大陸政壇有人諷刺說，江澤民主軍需要兩個老黃忠（還有一個比張震小兩歲的劉華清），主政則需要一個諸葛亮．而汪道涵也確實堪稱江澤民的大師爺．特別是在鄧小平宣布不再問政之后，汪道涵對江澤民的影響力更是非同小可．

沒有過去汪道涵的大力舉薦，就沒有江澤民在外經部門一步步出人頭地和到上海主政的關鍵經歷，自然就沒有被選為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機會．而主政中南海后，如果沒有汪道涵的幕后撐腰和及時點撥，江澤民可能至今還在為黨內政敵的四面夾擊而焦頭爛額．北京政壇里曾有人調侃說：「沒有汪師傅，哪來江核心?」確實頗有幾分道理．

汪道涵小傳

一九一五年生，安徽省嘉山縣人．

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共，后改進上海光華大學學習．

抗戰開始后，被中共派往安徽原籍，在江澤民養父江上青領導下工作，先后擔任中共嘉山縣委書記、縣長，淮南區行署主任，蘇皖邊區政府敗政廳和建設廳副廳長，華中軍區軍工部長，華東軍區軍工部長，膠東行署主任，安徽財政廳長等職．

中共建政后，歷任中共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家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

「文革」結束后，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八零年十月任上海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書記相當于后來的副書記）兼上海市長．

一九八五年七月任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

一九八七年十月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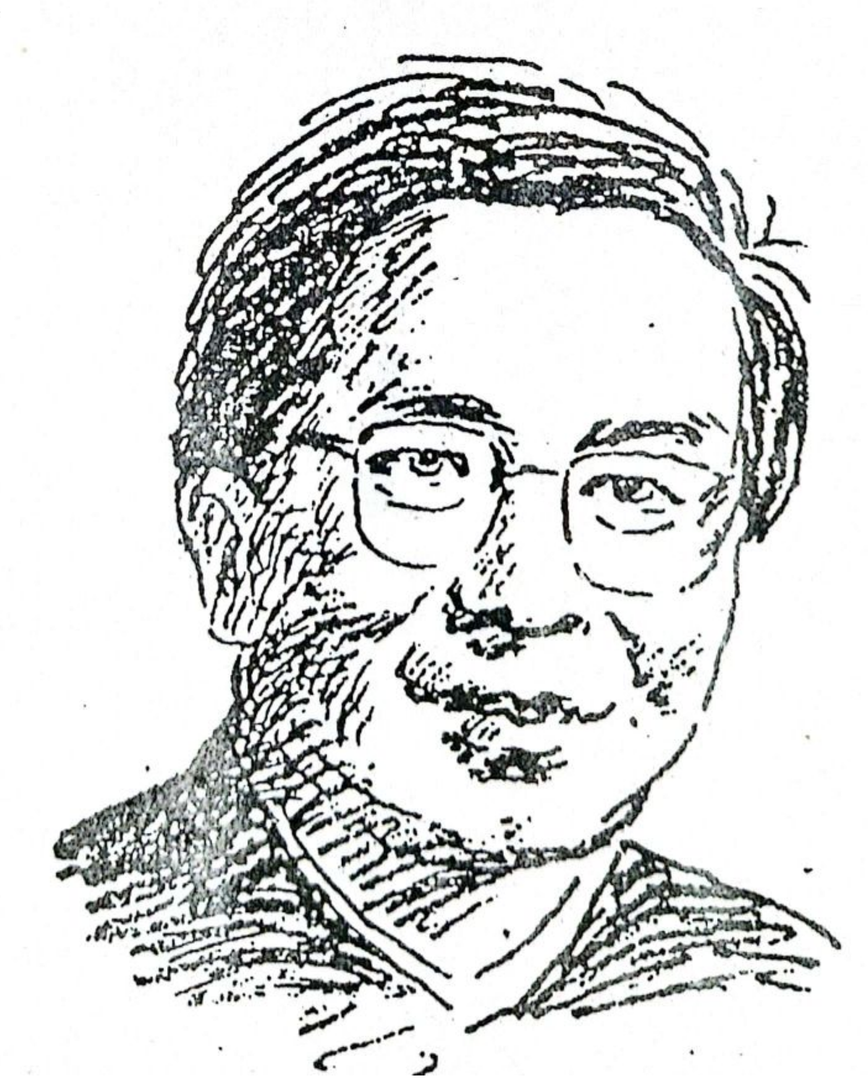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一年任宋慶齡基金會副主任．

一九九三年任大陸海協會會長．

江澤民的幕僚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曾慶紅



位高權重全憑紅色背景

——江澤民的大內總管曾慶紅

如果說鄧小平的政治生命正式結束之后，中共政壇上還有一位身居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者，此人即不是政治局常委會里的第二把手李鵬，更不是政治局里唯一有實力與江澤民唱對臺戲的喬石，而是被江澤民禮聘為「大內總管」的曾慶紅．其具體職務對內稱之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共中央警衛局政治委員」，對外則稱之為「國家主席特別助理」．而他之所以能够官就如今之高位，除了「后天政治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先天政治養分」較別人更為充足．父母及革命戰友們給予他的「胎教」便是誓死捍衛紅色政權，所以政治元老和江澤民不信任他還有什么人值得信任？正所謂「權力基礎來自父輩的生死患難．位高權重全憑紅色背景」．

政治局常委會排名第八

一九九三年初，中共十四大閉幕不久，被江澤民從上海帶來的「第一紅人」曾慶紅正式頂替了「前朝舊臣」溫家寶，被從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位置上扶正．自此，江澤民無論是巡幸中國大江南北還是周游世界大小國家，曾慶紅必定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特別助理」身份隨侍左右；江澤民在京主政時，曾慶紅雖然連個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但却是中共核心

領導層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法定」在座的第八位出席者（政治局常委共有七位）．

按照中共政權自己毛澤東時代定下的規矩，黨、政（包括人大、政協）、軍最高領導機關的人分成三級「政治待遇」．而所謂的「政治待遇」則主要體現在所能看到的中央文件的機密等級和享受「政治保衛」的等級——住房及出門乘車等生活、工作上的物質待遇，又是同「政治保衛」的級別直接挂鈎的．

按照這個規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未名列政治局常委但擔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四套班子第一把手者，在內部通稱為「黨和國家一級領導人」，享受「一級政治保衛」待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包括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副職領導人，最高法院及最高檢察院的正院長，在內部則被通稱為「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順序享受「二級政治保衛」待遇．

一般來說，中央警衛局給領導人安排警衛力量的班次時，凡享受一級保衛者，平時的住宅里要有「內勤」，住宅外還有「外勤」，故警衛兵員不會少于一個排，而享受二級保衛者，如果是住在成片開發建設的首長住宅區內，則整個住宅區被派有外勤，而具體每個首長的家中則配有一個班的警力．如果一個班的警力分四批輪流值班，每批也還有三個人．

至于軍隊方面，因為「工作性質特殊」，更是因為軍方領導自己有一定的調兵權力，保衛級別同黨政系統不太一樣．比如大軍區領導人的警衛力量往往比一個黨內的普通政治局委員的警衛力量强得

多。

另外，還有一些警衛力量相當的待遇區別，比如享受「一級保衛」者，有權利選擇是否住在中南海內；京城內行動有車隊，即警車開道和警車殿后；出遠門則可以享受天上空軍專機師派發專機．地上鐵道部門安排的專列。

享受「二級保衛」的，有資格住獨立宅院或單獨一座小洋樓；京城內活動祇有警車開道，但沒有活動警車殿后——願意「輕車簡從」者雖沒有警車開道，但其所乘專車不但配有防彈設置，而且車內還有活動警燈和警笛，以備一旦遇險時暢行無阻；出遠門雖陸路沒有專列，但卻有資格在客運列車上加掛一至兩節「辦公車廂」；乘飛機則是根據隨行人員的多少，包下某趟民航班機的整個或部分頭等艙，除特殊情況沒有專機，舉個典型的例子，一九八九年六月之前的江澤民還祇是一個政治局委員，進京時祇能乘坐民航班機頭等艙．所以，八九年五月下旬中央派專機接江澤民進京，上海方面的干部立刻據此判斷北京有緊急情況．

至于普通中央委員及各部正職負責人，則是享受「三級保衛」待遇，對外不能稱其為「黨和國家領導人」．

「文革」后，這一制度基本延續下來．因為從一九八二年開始，中共又設立了黨的顧問委員會制度，所以又專門規定：顧問委員會主任和副主任套政治局常委級，顧問委員會常委套政治局委員級．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上，雖然取消了「顧問委員會制度」，但原來顧問委員會的成員所享受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仍然不變．另外，從中共決定「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時，即明確規定領導干部離退休后，原來所享受

的一切待遇不變．另外，從中共決定「廢除領導干部終身制」時，即明確規定領導干部離通休後，原來所享受的一切待遇不變．也就是說，鄧小平也好，楊尚昆、萬里等人也好，至死都要享受「黨和國家一級領導人」的所有待遇．

中共從中央警衛局到各大城市的警備區，從公安部九局（專司政要保衛）至各省公安廳的九處及各省委保衛處，在安排或接待「黨和國家一級領導人」外出行動時，有所謂「特勤」之說．比如江澤民要到北京某大學與大學生們座談，出行時不但前面要有專車「趟雷」（遇有爆炸物可以替死），出行前兩天還要有專車「踩道」（提前探雷）．而對所謂的「三副兩高」則祇是隨行護駕．「三副」即前文所說的副總理、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兩高」則指高法和高檢的正院長．至于國家副主席則是算在一級領導人之列．對中共官方媒體稍加留心就會發現，中共現任國家副主席，「黨外民主人士」榮毅仁在中共所有領導人排序中從來是名列第八，七個政治局常委之后就是他．

但是，在報紙上排名第八僅僅是榮毅仁而已，榮毅仁是絕沒有可能進入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廳的．所以，從實際政治待遇角度講，榮毅仁的地位要遠在曾慶紅之下．與曾慶紅同時代的人都還記得「文革」時期大陸有一部從阿爾巴尼亞進口的電影，名字是《第八個是銅像》．曾慶紅手下的一批「政治哥兒們」時常借此打比方，稱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第八個是曾慶紅．如果說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兼中南海警衛局局長楊德中上將是中南海的「總鏢頭」（有消息說，楊德中已經于一九九六年將中央警衛局局長職務交給江澤民衛士長出身的由喜貴），那么行政職務還在楊德中之上的曾慶紅則堪稱

中南海的「大內總管」.

不圖虛位實權高人一籌

從一九八五年六月開始與江澤民同時進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序列的曾慶紅，到八九年六月又同時離開上海進京．在這四年時代里，曾慶紅先后以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長、上海市委秘書、上海市委副書記的身份充當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的副手，而后又成為新任市委書記江澤民副手．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澤民一躍成為中共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時，曾慶紅同時成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江澤民同志辦公室主任」，被認為是中共政壇位于江澤民一人之下的第一寵臣．而他之所以能夠有如今的權傾朝野，除了確實有過一番「后天努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紅色出身．對紅色政權與生俱來的「階級感情」，令「老同志們」對他十分放心；父輩之間的生死患難令江澤民對他刮目相看．

在曾慶紅之前的中共歷屆中央辦公廳主任，往往因為其地位、身份，尤其是工作性質的特殊重要性，都要在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書記處被安排一席地位．最典型的莫過于「文革」時期的毛澤東第一寵臣汪東興，一度曾以黨的中央副主席身份兼任中辦主任和中央警衛團政委．

如今，不爭于在黨的核心為曾慶紅安排一個表面耀眼的席位正是江澤民為適應新時期黨內斗爭環境的高明過人和別個匠心之處．如果說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撤銷黨的各級

顧問委員會建制，以及「楊家將」的失勢，宋平、姚依林、萬里等人的退出政壇等，標志着中共政權內「江澤民時代」的正式開始，那么這個時代的最大政治特色之一就是新一屆黨的中央委員會及它的政治局在「組閣」之初，即安排進一批不擬安排具體實權職務「名譽成員」；同時，沒有進入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者，并不妨疑出任權高位重的個體職務．比如楊白冰在十四大上進入中央政治局的同時，反被免去軍委秘書長及總政治部主任的軍隊要職；王海在十四大上進入中央委員后其軍內職務立刻從空軍司令員改成「顧問」……．而與曾慶紅出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同時，出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李淑錚衹是中央候補委員，比曾慶紅出任中辦主任時稍晚，接替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張全景在中央委員會里同曾慶紅一樣是個「白丁」．

所以說，從江澤民的角度，其大內總管的忠誠、果敢加處事周全是第一重要；而從曾慶紅的角度，在沒有虛擬的領導席次情況下也許更有利于在暗中、在幕后發揮和使用江澤民授予他的實權．

父輩與國民黨有滅門之仇

曾慶紅雖也是中共高干子弟，但其出身就是在大陸上也是鮮為人知．他在中共上海政壇顯露頭角后，曾有人僅僅根據其姓氏胡亂猜測，有說他是中共元老曾生（廣東寶安人，曾任中共交通部長、全國人大常委）之子，或傳言說他是中共元老曾三「湖南益陽人，曾任中共中央機關黨委書記）之后．實際上，曾慶紅的生父是中共的另一第一代元老人物曾山，無論資歷和在世時的權位，都要高過曾三、曾生兩人

不過，也難怪有人將曾慶紅猜測為曾三的后代，因為曾三在中共政權中擔任過的中直機關黨委副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務，也是后來曾慶紅擔任過的．從『子承父業』的角度，尤其符合中國人結合自己民族歷史的豐富聯想．

曾慶紅的父親曾山原名曾洛生，江西省吉安縣永和白沙錦人，一八九九年出生于一個家境清貧的私塾先生家里．曾慶紅的祖父曾采芹是清末秀才，年輕時曾在本村及鄰村設館教學．

跟着父親讀了幾年私塾后，曾山先是學了點絲織手藝，後來又學作屠夫，自己設攤宰猪賣肉．一九二五年，已經是中共秘密黨員的曾延生（曾山的哥哥）回家鄉鼓動農民造反，正因當地豪紳會和苟勾結官府擠垮了自己生意而憤憤不平的曾山，反叛情緒立刻被鼓動起來．一九二六年，也就是江澤民出生的那一年，曾山在家鄉領導了農民協會，當年十月正式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二月，曾山組織吉安縣農民把曾經欺壓過自己的當地豪紳會和敬抓捕送縣，經農民斗争審判後處死。與此前後，曾山的父親曾采芹和弟弟曾柄生也參加了中共．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曾山參加了葉劍英和聶榮臻領導的中共『廣州起義』，此后長期在中共江西根據地工作，曾先后擔任過相當于省級政權的中共贛西南蘇維埃政府主席、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和江西省委書記．

在此期間，曾山父親曾采芹、哥哥曾延生、嫂子將競英、弟弟曾柄生先后死在國民黨監獄里，所以

說，曾慶紅的父輩曾與國民黨有滅門之仇，毛澤東為此專門隨曾山到其家里慰問，稱贊曾家「滿門英烈」．

權力基礎來自父輩的生死患難

一九三一年中共召開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曾山出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中共中央執行委員，官位與當時的毛澤東并列．一九三四年，曾山又擔任了中共蘇區政權的內務部長．

中共紅軍長征后，曾山奉命進山打游擊，兵敗后衹身逃往上海，淪為搬運夫．幸好此時中共從長征隊伍中派陳雲到上海恢復地下黨秘密工作，曾山才得以被派往蘇聯學習，于一九三五年冬進入莫斯科列寧學院．

由這段歷史不難判斷，陳雲在整個八十年代與鄧小平共同主持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時，一提「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便不忘強調「還是自己的子女更可靠」，自然包括了曾慶紅在內．

抗日戰爭爆發后，曾山從莫期科繞道新疆回國，奉命在華東地區工作，與陳毅、項英等人做南方各游擊隊的集中和改編工作，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共新四軍中的元老地位．此后，他分別擔任過中共東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江西省委書記、華中局組織部長和副書記等職，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缺席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抗戰勝利后國共戰爭開始，曾山先后參與了中共接收山東濰坊、濟南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中

共渡江后，曾山參加了接收南京的工作，接着又參與接收上海，陳被任命為中共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兼財經委員會主任，后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副市長，直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奉調中央．

從抗戰開始到一九五二年，曾山在中共華東系統工作十五年之久，八十年代先后出任上海市黨、政負責人的陳國棟、汪道涵、胡立教等人當年都曾在曾山直接領導下工作．曾山在華東系統負責財委工作時，陳國棟是他手下的財委副主任和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部長，汪道涵是他手下的蘇皖邊區財政廳、交通建設廳副廳長和華東軍區軍工部長；胡立教則是他手下的華東軍區情報處處長、中共華東局社會部長及華東局組織部長．中共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曾山篇中，陳、汪兩人并列出現在曾山的「老戰友、老部下」名單中．在黨史資料執筆人的采訪過程中，陳、汪二人一回憶起他們的老上級曾山的種種好處，便不由得泪眼唏噓．

一九五二年十月，曾山正式調進北京，出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經委員會副主任兼商業部部長，直接接受陳雲領導．調京之前，他已經以華東財經委員會主任身份兼任中央政務院紡織工業部部長職務．正式進京后，這一職務不再繼續兼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曾山的商業部長職務莫名其妙地交給了已經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務院副總理的陳雲兼任，曾山本人則調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長；一九六零年底改任名義上歸屬國務院領導的內務部部長．

到中央工作之后，曾山即大力提携隨他進京的陳國棟、汪道涵、胡立教等人，陳、胡被雙雙委以

中央政府財政副部長，汪道涵則被舉薦為第一機機械工業部部長．

八十年代初，陳、胡、汪三人在一年時間內相繼殺回上海灘，分別就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兼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和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長職務．這一來，整個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大權完全掌控在這「三駕馬車」手上，而他們三人又全部出自曾慶紅老子的門下，所以，曾慶紅剛剛調到上海工作時，熟知內情者紛紛議論：「他不來上海誰來上海？」可見，正是父輩們共同為打江山流血流汗、生死患難而奠定的政治資本，為曾慶紅這樣的紅色后代穩步進入政治接班梯隊和日益執掌更大、更多、更重要的權力，無疑是提供了堅實的保證．

到中央工作之初，曾山還對出身于中共北方局系統的姚依林委以重任，安排姚氏在自己手底上擔任商業部副部長，工作上信任、關照有加．當時，曾山的這些作為也許完全是出于「革命事業」的需要，但客觀上絕對為自己的后代繼承父業做出了至關重要的鋪墊．

從一九八七至一九九二年，姚依林一直擔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并對江澤民在「六四」之后入主中南海堅決支持．而一聽說江澤民隨身帶進中南海的「第一紅人」是曾有恩于自己的老上級曾山的「革命后代」，姚依林衹會產生倍加的愛變之情．

父母結婚完全由『組織包辦』

曾慶紅的母親叫鄧六金，生于一九一二年，因為生下來十幾天即被生母送人，小小年紀時又被繼

江澤民大內總管曾慶紅

母賣作童養媳，所以至今不知生父母是誰．鄧六金剛剛記事時，就碰上地主、鄉丁趕在年關之夜打上家門逼債，將剛剛上桌的一點過年的肉飯和豆腐連鍋端走．這也是她早年即義無反顧地參加了共產黨這支「為窮苦人打天下的隊伍」的決定因素．而父親一家的「滿門英烈」和母親走上「革命道路」的必然原因，也都決定了如今的曾慶紅必定要鐵心維護共產黨政權，也都決定了這個政權的兩代「領導集體」如果不是對曾慶紅這樣的革命后代信任有加，這個政權便不會再有可信任的對象．

一九三八年九月，時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曾山到延安列席了以清算王明為主要內容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議期間要求中央為江西省和東南局補充一批干部．正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的鄧六金被李富春（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叫去，意味深長地告訴她東南局缺少婦女干部．兩個多月以后，鄧六金及其他被曾山要去的干部隨曾山到達西安，準備轉重慶回江西南昌．由于當時蔣介石不準備簽發由西安經重慶的航空護照，曾山一行在西安苦等多日．期間，一對中共中央組織部的電報打到中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批準曾山、鄧六金同志結婚」．此后，鄧六金大着肚子躲避國民軍隊的圍追堵截，歷經千難萬險才活着到達目的地．父母結婚七個月后，曾慶紅降生于中共新四軍軍部．可見，曾慶紅所受的「胎教」就是誓死捍衛紅色政權．

當時，許多為抗拒「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包辦婚姻，抱着婦女解放美好理想的熱血女青年，進入革命隊伍后，大都無法抗拒「革命事業的需要」，而被所謂的「組織上」安排嫁給比他們職別高許多、年齡也可能大許多的共干．躲過了「父母包辦」，換來的却是「組織包辦」：大趨勢使然，

她們自己也祗能認命，私下里將此戲稱為「組織包辦」．而「組織包辦」婚姻的成果，更是地地道道的「黨產」．

按照中共公開的黨史宣傳材料記載，曾山在延安參加了中共中央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會議結束后才離開延安赴西安，并在西安等待護照期間被批準與鄧六金正式結婚．而按照中共公開的人物檔案材料記錄，曾慶紅生于一九三九年七月．那么曾慶紅的姐姐曾海生無疑是曾山在江西老家的前妻所生．

生下四個月時，鄧六金將曾慶紅送到江西吉安交奶奶扶養，取小名丁兒．

仇恨國民黨刻骨銘心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之后，國民黨與中共新四軍再次交惡，為偵查曾山的去向，國民黨軍隊到他的家鄉把他的老母親抓去毒打拷問，并放火燒掉了曾家的房子．祗有三歲的丁兒無處藏身，獨身一個跑到野外的一個大樹洞底里躲了兩個晚上，遠遠看見奶奶慘慘遭毒打，却不敢哭出聲來．

數十年后鄧六金對記者講述起那段經歷，對曾慶紅的苦難童年仍深感内疚．她老泪縱橫地感慨：「那時，這個孩子在鄉下吃了不少苦．」而這段經歷也決定了曾慶紅對國民黨的仇恨正可謂「刻骨銘心」．

一九四九年，中共華東局為其南下干部的孩子及烈士子女辦了一所保育院，鄧六金擔任院長，她

將一百多個坐在毛驢背上的籮筐里的革命后代，一個個送上由濟南開往上海的火車，其中有年已十歲才從江西鄉下接回來的曾慶紅和他的兩個弟弟，大弟弟生于一九四一年，二弟弟生于一九四七年．

中共奪取政權以后，鄧六金又給曾慶紅生了個漂亮的小妹妹．二十多年以后，曾慶紅的這個妹妹已經了出脫的亭亭玉立，在北京的高干子女圈中十分有名．當時，她曾與正在北京師範學院（現名為首都師範大學）就讀的劉少奇公子劉源談過一段戀愛．后來到底為什么沒有成婚，則是外界無法猜測的原因．說起來劉少奇的兒子與曾山的女兒能够結為「革命伴侶」的話，不但稱得上「郎才女貌」，從「門當户對」的角度也完全說得過去．

七十年代末大陸重新興起交際舞熱時，大學生里會跳的人還很少．而劉源與他的女友則因為自幼跟着父母出入中南海貴族舞場，用他們的話說「學跳舞與學走路幾乎是同時開始的」．每當曾慶紅的這個妹妹與劉源雙雙出場時，舉席嘖嘖稱羡，特別是直接從農村考進首都的大學生們，一個勁地感慨如此楚楚動人的相貌和如此令人傾倒的舞姿過去衹在電影上見過．

而事實上此時的曾氏子女與那些長大成人從農村考進城大學的土青年們的唯一區別，就是本也是出自偏遠鄉村的曾山夫婦憑農民造反成功，而給后代創造了在大都市里生活，在紅色皇朝的宮延里成長的條件．此是后話．

對紅色政權的感情與生俱來

曾慶紅的媽媽鄧六金當年曾是參加中共長征的二十七名女紅軍之一．當時她還是個二十多歲的姑娘，但却要同男紅軍一起爬雪山、過草地．因為女紅軍都被編制在「休養連」內，所以她們在冒着天上敵機轟炸、地上敵軍圍追堵截危險的同時，還要照顧戰斗部隊留給她們的老弱病殘，在最艱難的日子里，鄧六金在夜行軍中還要用擔架抬着傷員，直累得很長時間停了月經，兩祇脚都走爛了．如此艱苦支撑和浴血奮戰二十多年，才令曾慶紅等革命后代能够從毛驢背上的籮筐到火車客廂，從江西鄉下的茅舍到上海十里洋場的高大樓房．

當被父親曾山派回家鄉的警衛員接到上海，已經吃了十年的紅米飯加番薯秧，一夜之間變成從國民黨手中繳獲的美制奶粉和猪肉罐頭時，如此由地獄進天堂般的變化，令曾慶紅對「翻身得解放」這五個字的涵意理解得尤其深刻．從與弟弟妹妹們開始共享父輩們用鮮血換來的「革命成果」那一天起，就決定了曾慶紅對中共政權的效忠之情完全是與生俱來，「用鮮血換來的政權必須用鮮血來保衛」的道理也在其頭腦中自然形成．毛澤東時代時常出現在中共報刊上的所謂「樸素的階級感情」這樣的政治語言雖然時下已不再多見，但對于曾慶紅來説，無疑是終生適用．

當時的華東局保育院收養的一百多個孩子全部是華東系統够級別的干部子女，鄧六金為了這些孩子歷盡千辛萬苦，堪稱盡職盡責．她常常是為了照顧別人的孩子而將自己的親生骨肉弃至一旁．為了拯救一個幼年女孩的性命，鄧六金竟然連夜跑一百多里路到教會醫院買到青霉素藥品……

結果，在鄧六金的悉心照料和保護下，這一百多個孩子順利渡過了中共與國民黨大陸政權的最後

決戰階段，個個健康活潑地回到了他們的父母身邊，與此同時，這一百多個孩子的父母們都已經在中共華東系統的主要領導崗位各取其位，他們對鄧六金的感激和崇敬之情可想而知．日后在鄧六金需要他們報答的時候，他們必然會有對鄧六金后代的政治上關懷，來補常鄧六金過去對他們孩子的生活上的撫愛．

而當年那些被鄧媽媽施以恩愛的孩子們如今也先后像曾慶紅一樣，步入『黨、政、軍領導崗位』，比如與曾慶紅一同在中共中央機關共事，擔任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職務的劉延東等，至今不忘鄧媽媽對他們的哺育之恩．鄧六金當年造福于衆多紅色后代的行為，自然也為曾慶紅如今在高干子弟圈子里營建自己的政治氛圍奠定了相當程度的感情基礎．

『文革』中曾氏父子未遭厄運

隨父進駐上海后，曾慶紅在當地讀了兩年小學，一九五二年又隨父進京，在北京高干子弟學校讀完了中學，于五九年考入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大學二年級時加入中共．

『文革』開始后，毛澤東對成千上萬名中共老干部下了毒手，但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頂帽子却始終沒有給曾山戴上．一九六七年，因為有『造反派』開了曾山的批斗會，周恩來于當年九月二十七日作了『關于曾山同志的四點指示』『一，錯誤可以批判，性質應由中央來定；二，他的活動聽命于中央，你們不能干涉；三，外來單位學生不能干擾內務部事務，立即撤出；四，開批判會，

搞噴氣式，大彎腰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央規定的，今后不準再搞體罰和變相體罰．

在林彪當了「接班人」的中共「九大」上，曾山由毛澤東欽定仍然繼任中央委員直至一九七一年去世．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時，毛澤東很不能把劉少奇、彭真、賀龍等一大批中共元老置于死地而后快，却單單對曾山如此保護，主要原因是曾山在江西的時候曾經與毛澤東過往甚密，在所謂「錯誤路綫」當頭時，曾山也會堅定地站在毛澤東的立場上．

至于周恩來對曾山的格外青睞，則同曾山是內務部部長有關．祇要對中共黨史稍有研究和了解的人都應該知道，周恩來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中共建政之后，對于黨內的社會部、調查部、內務部、統戰部，軍隊的情報部等相關系統，從來是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甚至連毛澤東都無法染指．

另外，曾山在歷史上長期屬于華東系統，而「文革」中周恩來伙同毛澤東的主要整肅對象則是劉少奇、彭真等人為代表的北方局系統及西北局系統．

一九七二年，曾山在一個老干部的追悼會上曾拍着胸脯向周恩來說自己的健康沒有問題，但這話說了沒有幾天就因心臟病突發去世了．因為曾山的去世，周恩來下令全國各地被下放的中共老干部，無論是否已經「解放」，統統接回城里進行體檢，凡有患病者，一律保證住院認真治療．因此，當時在江西下放的鄧小平、陳雲等人都托了一次曾山的陰福．

熟知曾氏父子的上海人分析說，曾慶紅的老子曾山生前先是在華東地區和中共核心層身居要津，

而他當年的同事或下級如今還在「發揮餘熱」——特別是被江澤民長期當成「師爺」的汪道涵．這樣的背景對曾慶紅的仕途自然有利．但也幸虧曾山早在七二年就及時過世，如果繼續活着的話，極有可能被毛澤東在「文革」中進一步起用，無法保持所謂「革命晚節」，而到鄧小平時代自然就成了「四人幫」的政治殉葬品——如同當年上海的馬天水一樣．

雖然鄧小平至今也願意徹底否定毛澤東，但事實上中共在選拔干部，尤其是在選擇高干子女擔任領導職務時，絶對是以其本人家長在「文革」中是否被毛澤東整過，作為一條不成文的劃綫標準的．近年來陸續在海外媒介被曝光的「太子黨」成員中，仔細數來，個個都有一本「文革」時期的「血泪賬」，而幾乎所有在「文革」中沒有挨整而且還被毛澤東委以重任的中共老干部，「文革」結束后重則被指為「賣身投靠(四人幫)」，輕則也要被迫辭職或提前離休，其子女也都不大可能擠進「接班人」的圈子，如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吳德等人，無一例外．

因為曾山「文革」中的日子好過，曾慶紅自然也就沒有吃太多的苦頭．「文革」中歷經磨難，甚至下獄坐牢是至今大多數中共「太子黨」成員得引為自豪的政治資本，很可惜曾慶紅缺少這一課．

秘書出身奠定仕途走向

如果說中共高干子女中已經實際形成一個「接班群體」的話，那么如今的曾慶紅無疑已經是這個群體中的核心成員，他的父親曾山在二十年代曾與毛澤東地位相當，特別是從來沒能站在毛澤東的對

立面而犯「路綫錯誤」．中共建政之后，他相繼出任過多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職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于內務部長．可以說曾慶紅如今所處的重要地位正是繼承了父親的衣鉢．

曾山是中共「老革命家」中少有的幾位在黨內權爭中未受波及，迫害的人，但也沒有「得志更猖狂」——至今還沒有關于他列酷整肅异己的劣迹披露．曾山身上有近似于周恩來的政治氣質，無疑是曾慶紅今日需要繼承的重要「遺產」．

不過，因為曾山英年早逝，未來得及培養自己的子女正式步入紅色政壇．而第一個繼承革命戰友遺志直接帶領曾慶紅步入政壇仕途的則是共産黨的另一元老人物余秋里．

余秋里和曾氏父子是江西吉安同鄉，資歷比曾山稍淺．一九二九年，曾山在家鄉組織農民暴動．當時曾山整整三十歲，而當時年齡正好是他一半的余秋里也因為不滿當地豪紳的殘酷壓迫而被認同了曾山宣偉的革命道理．于是，在曾山的帶領下，余秋里參加了區赤衛大隊和共青團，兩年后又正式成為中共黨員，在曾山手下擔任吉安赤衛大隊的中隊長及湘贛省蘇維埃工農檢查委員會委員．

從中共紅軍長征開始，余秋里再沒能繼續與曾山共事，但兩人的同鄉關系及曾山是余秋里「革命引路人」的身份，都決定了余秋里對曾山的后代必須關照有加．特別是在曾山英年早逝后，對曾山的家人生活上照顧，政治上關懷更令余秋里感覺責無旁貸．共産黨之「農民黨」的特質決定了關照先烈后代是一種不成文的「黨規」，這與中國農村無數封建幫會的「幫規」殊無二致．而如果說曾山是早期共産黨里的「吉安幫」幫主的話，那么跟着曾山扯旗造反而奠定其日后在中共政壇崛升之基礎的余

秋里，應該如何對待曾慶紅根本是不需要曾山臨終之前特別交待的事情．

從五十年代中、后期開始，根據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抓緊研制自己的「兩彈」（核彈和導彈）的批示，一批高等院校的相關事業開始軍工服務．于是，許多黨內、軍內高級干部的高考適齡子女，所選院校和事業大都與國防有關．他們中有一部分進入當時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立志成為未來的「現代軍事指揮員」，一部分進入一些直接服務于國防科研的地方院校相關專業，立志獻身「新中國的現代化國防科技事業」，比如清華大學的自動控制系、北京大學與核物理相關的專業等．而曾慶紅所考進的北京工業大學自動控制系，從曾慶紅入校之前，即已經接受了導彈研制任務．因為直接從事國防科研，所以這些專業當時在招生時，「政審」一關極為嚴格，祇有曾慶紅這樣所謂「根紅苗正」者，才有資格入選．

曾慶紅入校的當年，他的老師們便成功完成了研制中國最早一種反坦克導彈265—1型；入校第二年，又完成了中國最早一種地對空導彈256—3型的任務，曾慶紅正是在一片「向毛主席報喜」的歡度活動中，被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一年后轉正．

可見，當時的曾慶紅是立志要在中國導彈研制方面有所作為，成為所謂「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紅色專家」．可惜，此志向剛在心中成熟，即趕上了所謂「三年因難」時期，大陸科研戰綫全面緊縮，北京工業學院完成的各類導彈設計圖都成了廢紙．不然，今天的曾慶紅很可能不是在中南海里充當江澤民的政治心腹，而是在中共第二炮兵部隊，擔負對導彈「試射」的指揮任務．

一九六三年大學畢業時，曾慶紅獻身國防、效命疆場的心早已化為烏有，于是便在父親的安排下，改志從政，被分配至國家計委辦公廳，為當時擔任計委第一副主任秘書長的余秋里當秘書。

「組織婚姻」成果受組織寵愛

而此時的國家計委主任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富春兼任．前文已有敘述．曾慶紅的母親鄧六金當年就是被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李富春以「組織安排」形式派至曾山身邊的．當時的鄧六金曾經向李富春據理力爭，表示「我不想結婚，我還要工作呢．結婚、生孩子會影響工作」．接着，被李富春好一頓開導，鄧六金才表示了「服從革命需要」．

當然，共產黨當年的這種「接郎配」式的，靠所謂「組織手段」解決革命干部的婚姻問題，如今已是中共公開的黨史文獻中既無法避開，又無法坦承地，或乾脆以歌頌的筆調書寫的內容，但無論曾山也好，鄧六金也好，在結婚之后自然對李富春祇有感激而沒有埋怨，而李富春既然眼看自己一手安排的這樁「革命婚姻」日后是一個美滿的結局，自然會對這場婚姻的成果關懷備至．

于是，被安排在李富春為正，余秋里為副的國家計委工作，對于曾慶紅的政治前途地意味着一帆風順．

「文革」中，曾慶紅雖然基本上沒有受到冲擊，但同絕大多數機關干部一樣，到計委「五七干校」參加勞動、改造思想，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一課．而余秋里本人可能是因為六十年代初主持開發大慶油

田有功而被毛澤東和周恩來特別看好，在中共元老級干部中也是受「文革」冲擊較少的一個，而且黨內政治地位不降反升．分別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三年召開的，具有濃厚林彪色彩和「四人幫」色彩的中共「九大」、「十大」上，過去連中央候補委員都沒有當過的余秋里連續當選為中央委員．當時，「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余秋里自然也被看成一個成功領導石油工業「把精神變成物質」的象征性人物．當然，余秋里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的下場同那位大寨領袖截然不同，一是因為余秋里本身就是革命元老出身，戰爭年代曾經因為被敵軍打掉一只胳膊而被稱之為「獨臂將軍」；二是大慶油田的開發建設雖說長期被當成政治樣板宣傳塑造，但它的巨大經濟效益畢竟是有目共睹．直到一九九五年，在中共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五百家多型企業中，大慶石油管理局仍然以百九十九億元人民幣的年創利稅額榮登榜首．

一九七零年六月，一度因為運動需要而與其他國家機關一樣陷于癱瘓的國家計委，恢復了部份工作職能，余秋里被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命為該部門的「革命委員會」主任（自一九七五年一月起不再使用「革命委員會」的提法，衹稱「主任」），曾慶紅也從「五七干校」回到國家計委機關繼續效命余秋里．

拒穿軍裝表現政治遠見

一九七五年一月，李富春病逝，同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上，余秋里升任國務院副總理．

自此，曾慶紅便正式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秘書，主持「余秋里同志辦公室」的日常工作．

一九七七年八月，余秋里在中共十一大上被安排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八零年，中共恢復中央書記處，余秋里被安排其中，直接接受胡耀邦的領導．自此，曾慶紅與胡耀邦多有接觸，成為被胡耀邦看好的「有真才實學」的高級干部子女之一．

同年，大陸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余秋里被鄧小平、胡耀邦等人定為最佳人選出任第一負責人．曾慶紅隨之前往，被委任為辦公廳副處長，實際上仍然是做余秋里的秘書工作．

一九八二年九月，余秋里在中共十二大上再次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國家能源委員會撤銷，鄧小平為肅清軍隊左派勢力，安排余秋里辭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在國務院內祗挂國務院委員職銜，實際工作則是進入軍隊系統，出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兼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職秋，替換了思相保守的韋國清．自此，余秋里的直接上司是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一九八七年十一月，鄧小平安排余秋里「退居二綫」，改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總政治部主任一職讓給了楊尚昆的胞弟楊白冰．自此，「楊家將」的說法隨之出現．但是，因為楊白冰比余秋里小六歲，余秋里即使心里不服氣，在鄧小平「干部年輕化」的招牌面前也無理可講．

當時，征求曾慶紅的意見后，曾慶紅似乎對穿上軍裝進入部隊系統興趣不大．于是，余秋里利用自己過去當過石油部長的餘威和國家能源委員會主任的權力，將曾慶紅安排進新成立的肥缺單位——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安排他擔任聯絡部副經理，主管對外力合資、合作事務．不久，因辦理「洋務」

表現出色，曾慶紅被調回石油部機關，提升為石油工業部外事司副司長．

事后有人分析起曾慶紅的這段經歷和拒絶進入軍隊系統的選擇，認為他當時已經看明白余秋里在軍隊系統的能量有限，自己隨之跟進，將無法與鄧小平、賀龍、陳毅等人的子女爭出高低．果然，事后發生的事情證明，就連陳雲的兒子陳方都認為自己在軍隊里混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論何况他曾慶紅．

當時，余秋里在擔任總政治部主任期間，曾經雄心勃勃地要培養一批軍隊元老子弟大舉接班．他將一批六十年代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元老子弟，特別是軍隊干部已經逐個找去談話，并準備安排他們集中受訓．后來．可能是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感覺這種軍隊接班人「批量生産」的辦法太不嚴肅，而且政治影響不好，此計劃便無疾而終．

在鄧小平的政治生命已經被正式宣告結束之時，再回過頭去縱觀整個鄧小平時代的高層權力斗爭過程，不能不承認曾慶紅當年拒穿軍裝的决定的確是高人一籌．自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完全掌控了中共軍隊領導權之后，所謂軍隊「日常事務」完全控制在楊家兄弟手中（一九八九年之后，鄧小平秘書王瑞林正式開始染指軍隊組織系統）．而楊家兄弟與中共華東系統出身的干部多有不合，自然對華東系統老干部后代不會另眼相待．再看至今仍然留在軍隊里的衆多與曾慶紅同時代的元老子女，如今爬升最高者當屬賀龍元帥的公子賀鵬飛，不過是個軍種的副司令員而已．而且此人被提升中將，還是曾慶紅給江澤民進言的結果．所以，假如當年曾慶紅不幸穿上軍裝，在論資排輩，習慣按戰功比資歷的

军队系统，绝无可能升迁至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从政华东系统如鱼得水

有中共内部人士分析说：曾庆红当年之所以能够由石油系统进入上海领导层，完全是他的母亲邓六金为他活动的结果．

前文已经介绍，邓六金是参加长征的二十七位中共女红军之一．与她同时的还有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陶铸、宋任穷等的夫人，也包括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人的前妻．而这批女红军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党内级别都不是很高．有人认为这是「重男轻女」的所谓封建毒素在共产党人意识里根深蒂固；也有人认为当时中共党内的第一、二把手毛泽东、刘少奇在延安新换的夫人江青和王光美与那些女红军相比，资历甚浅，论资排辈的话，此二人至多是个处长级别（相当於地方的县长）．为了不让毛、刘二人及他们的夫人难堪，乾脆把出身女红军的夫人们统统压住不予提拔．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已经先後去世的周恩来、朱德、李富春等人的遗孀才陆续获得政治上的较高荣誉．

不过，自提倡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之後，这些女红军无论实际职位低，均已倍受中共政要崇敬．从八十年代开始，这批女红军被中共新老权贵统称「大姐」．而此时的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延安时代所娶的夫人，都是当时刚刚从国统区跑去「投奔革命」的「洋学生」，虽然自恃有才有貌，但在邓六金等人童养媳到女红军出身的「大姐」们面前，绝不敢扬眉吐气．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姐」们几乎个个比她们的丈夫久存于世，除了邓六金，朱德、周恩来、李富春、陶铸等人的夫人，也都是在送走丈夫之後，迎来了中共的「邓小平时代」.

熟知中共高层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批「大姐」的「干政」能力并不亚於那些当时还挂着「顾问」头衔的政治元老们，对子女们的庇护她们更是不遗馀力.

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期间，不但对这些「大姐」们的提出的种种「期望」有求必应，而且还要经常抽时间亲自登门拜望.

过去身居高位的杨尚昆也从来是对这些「大姐」们惧让三分，甚至还要专门抽出时间来请她们到自己府上搓几轮麻将，以示对早已去世的老前辈们的敬重. 对她们的各种合理的或非份的要求，不说是有求必应也要尽量体恤.

前些年里，每到新鲜荔枝上市的时节，现中共政治局常委乔石都要自己出钱采买一些新鲜荔枝，分送给这些「革命先辈」的遗孀们.

坚持到九十年代以後，这些大姐们也相继作古，但在此之前已经都为自己的子女、亲属做了力所能及的安排. 所以，邓六金为自己的长子曾庆红考虑政治前途是毫无疑问的. 而曾庆红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大姐」们的子女在政治上更有出息，除了曾山与邓六金夫妇自幼对他的刻意培养，曾庆红自己确实具备一定的能力和聪明才智外，更重要的还是曾山在世时已经在整个中共华东系统为儿子的未来政治前途奠定了坚实的人际和派系基础.

陈国栋向曾山报知遇之恩

为曾庆红从石油系统转至上海市委，并由此奠定进军中共权力核心层的关键人物还是曾山当年的老同事和老部下。其中最早表示要用提拔革命後代以向当年的老领导曾山报答知遇之恩的，就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第一书记陈国栋和第二书记胡立教。

前文已经介绍，中共建政之前陈国栋已经在曾山手下鞍前马後。一九五二年曾山上调中央後，又大力举荐陈国栋出任了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此後，陈国栋在曾山和陈云的器重下，又先後担任过粮食部副部长、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和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等重要职务。并於八零年四月杀回华东系统的大本营，出任上海市委书记。

此後，海外许多政论家都认为陈国栋是陈云为了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坚守上海计划经济大本营而安排到上海去的。比如被海外宣传成「胡耀邦智囊」、「胡耀邦秘书」的阮铭就是这样认为。而因为「胡耀邦秘书」这块招牌的作用，海外自然认为阮铭的分析十分权威——虽然事实上阮铭从来没有作过胡耀邦的秘书。

但据笔者对当时更多当事人和知情者的采访，陈国栋一九八零年被安排到上海，主要目的是为了接替彭冲。彭冲与他的上海市委书记前任苏振华都被认为是在反对「凡是派」问题上态度不鲜明甚至是与华国锋穿一条裤子的。所以说陈国栋进驻上海之初并不是什么邓小平的「对立面」。相反，当时在

与华国锋的『凡是派』作斗争时，陈云与邓小平还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陈国栋後来的表现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陈云也是必然的，因为他五十年代被曾山推荐进京後，陈云长期是他们两人的共同上司，倍受此二人尊敬。

陈国栋到任後，胡立教被安排成市委第二书记，主管组织工作。而胡立教除了是曾山老部下这层关系外，与曾山还有江西吉安的同乡关系。一九三零年，正是曾山这位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长在家乡发展了年仅十六岁的胡立教入党。所以，胡立教长期称曾山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

与陈国栋相比，胡立教曾经有过华东地区情报处长、社会部副部长和组织部长的任职经历，不但人脉宽泛而且为政手段老辣。在位之时，陈国栋在组织人事问题上基本上是遵从胡立教的意见。即使两人双双『退居二线』以後，胡对上海政坛的幕後掌控能力仍然胜陈一筹。所以，市委内部人士都认为胡立教对曾庆红这个小老乡的直接关照，比陈国栋更为直接，更为得力。

八十年代初、中期，陈国栋、胡立教和汪道涵共同统治上海，也正赶上大力培养各级领导班子接班人被中共政权当作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提出，并规定了所谓『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简称『四化』）的标准。而与後来被从上海市基层提拔进来的，技术官僚出身的吴邦国、黄菊（此二人现在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人相比，曾庆红在其他『三化』方面毫不逊色，而在『革命化』方面更是具有先天优势。

陈、胡、汪三人之间当然绝非铁板一块，但基於向他们共同怀念的老上级曾山同志感恩图报，对曾

庆红政治上体贴关照、组织上大胆使用这一点，三人从无分歧。

进入上海市委连升两级

接班人『四化』口号提出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按中央要求上报了所谓『第三梯队候选人名单』。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这类名单上，曾庆红已经名列其中。

按照中共的一般作法，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中被看好的待提拔干部，一般都要外放一段时间，然後再调回中央酌情安排。这一来，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名单与上海方面的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所要的年轻干部人选不谋而合。於是，中组部一纸调令，曾庆红由石油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改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因为市委组织部长是市委当然常委，相当于副省、部级，副部长的级别便是正司局级，所以曾庆红到上海之初即已经官升一级，由副司局级升成正司级。

前文已经说过，陈国栋被安排到上海是为了将上海从『凡是派』拥护者彭冲手中夺回到『实践派』手中，而陈国栋比彭冲还年长四岁，更证明此举并非从『干部年轻化』的角度出发。

一九八五年初，已经七十四岁的陈国栋被中央要求『退居二线』。此时的胡立教和汪道涵也都过了七十岁生日，都无法被安排接替陈国栋市委第一把手的位置。於是，胡耀邦和赵紫阳共同选定的，时任国务院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任芮杏文接替上海市委第一把手，时任电子工业部

部长江泽民接任上海市政府第一把手兼市委第一副书记。陈国栋则改任上海市顾问委员会主任、胡立教仍保留一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道涵改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

当然，因为陈国栋、胡立教和汪道涵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正常换届，所以除了党、政一把手接替者由中央直接安排外，新一届上海市委的其他组成人选还是要在他们交班之前提出「建议」，交中央组织部审定的。於是，曾庆红自然名列新一届上海市委常委名单，而对曾庆红本来看好的胡耀邦那里更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

没有什么可靠的信息证明曾庆红当时亦被邓小平特别看好。但是，上海地方领导力主提拔，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早就看好，陈云因於「还是自己子女可靠」的先入为主……，仅凭这几项过得硬的先决条件，祇要当年邓小平对他曾庆红没有特别的恶劣印象，便再没有任何阻力能够影响曾庆红在上海的升官之道。

一九八五年六月，曾庆红进入上海市委常委，自此进入中共副省、部级干部序列。一个月後，芮杏文的上海市委宣布曾庆红具体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几个月後又被宣布为市委秘书长。至此，调进上海工作两年时间的曾庆红已经连长两级。

上海帮延续华东帮香火

陈国栋、胡立教「退居二线」後，事实上仍被认为是上海党政领导班子中的「龙头老大」，而芮杏文

这个「外来户」则基本上站不住脚．

查包括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在内的中共上海市委、市府的历任主要领导，除了一九七六年为打击「四人帮」势力而派进上海的苏振华，其余全部是中共华东局系统的人马．而芮杏文从一九四五年正式参加中共之後，一直是中共北京系统的「小罗卜头」，根本不是陈国栋等人的对手．

没有任何证据和迹象说明芮杏文在上海期间与曾庆红有过「结怨」的过节，但无论当时此二人关系如何，都影响不了已经成为「顾问老人」的陈国栋和「退居二线」的胡立教就「大胆使用」曾庆红问题的持续督促．

果然，进入市委常委序列才一年零四个月，曾庆红即被「增补」为市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宣传、统战等主要党务工作．当时，正值中共开始提倡「党政分开」、「党要管党」，所以此时的曾庆红实际上相当於市委常务副书记的角色．在此之前两个月，曾庆红的市委组织部长角色已经交给他的副手赵启正接替．

出身于华东系统，日後主政上海的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因过去恩主曾山的「投之以桃」，而对曾山的革命後代曾庆红「报之以李」．而江泽民虽然衹是被过继给了一位「革命先烈」，但他的那位英年早逝的继父同时又是他的本家叔叔，这就决定了江泽民从血缘角度也配称「红色後代」．更重要的是江泽民的本家叔叔兼继父战死之前亦是中共华东系统出身，这更决定了当年江泽民去上海时，与来自北方系统的芮杏文的下场截然相反．接着，老一辈相继退位，江泽民与曾庆红仅仅因为背景相同，也会惺惺

惜惺惺，互为党朋.

自江泽人主中共高层後，开始一段时间除了把曾庆红带进中南海，在提拔上海干部进北京方面还是不敢有太显眼的动作. 至於中共高层有个『上海帮』之说，基本上是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以後的事情了.

而如果从江泽民、曾庆红的匠红色背景及他们在上海发迹的经过分析，就会发现，江泽民目前在中央倚重的上海帮，其实是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华东帮势力的延续，而再向前追寻，陈、胡、汪在八十年代初、中期组成的华东帮，又是毛泽东时代以陈毅、柯庆施、曾山等人为代表的上一批华东帮的传承.

即使是现在已经被江泽民大力提拔，成为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帮』重要成员的吴邦国、黄菊，随便查阅一下他们两人的简历就会发现，此二人最初进入上海市『干部第三梯队』时，仍然是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华东帮老人大力栽培的结果. 所以，现在在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逐渐形成气候的『上海帮』，就是在江泽民、曾庆红两人基础上逐渐扩大起来的.

大概在一九九三年年初，中共十四大召开後不久，曾庆红曾经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对聚拢在他手下的一批『政治哥儿们』感慨：『总书记刚进中南海时，轻易不敢调一个上海干部进京. 现在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

曾庆红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

很长时间以来，外界对中共党内斗争的分析，从来都是将所有中共中央和省部一级的领导人分别划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两大阵营.现在看来，这种划分实在是过於简单，过於表面化、脸谱化了.事实上，如果按照毛泽东一直要防止的「山头主义」和五十年代初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的说法，中共经历过战争年代的各级领导人的派系，甚至上还是按地域和势力范围划分的.这就是芮杏文到上海後根本上站不住脚，和曾庆红调入海後立刻有如鱼得水之感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圈圈」和「摊摊」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淡化，但分析如今中共高层的权力分布，仍能见出其历史阴影.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曾经说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流不进的独立王国」.其实，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後，非华东系统的干部也很难驻足上海市委.

当然，无论是「圈圈」里的老臣，还是「摊摊」里的「新兵」，到了邓小平时代以後又不可避免地面临意识形态上的分化.

比如陈国栋和汪道涵同为华东系统中曾山的老部下，两人在上海的配合不能说十分默契，但至少在排斥芮杏文的问题上却是「心有灵犀」.同时，在所谓「保守」与「僵化」的问题上，汪道涵要比陈国栋开明许多.至少在他们的同龄人中相比，汪道涵的思想已经相当「前卫」.

同样，把同是出身华东系统的曾庆红与江泽民相比，他们在上海工作新时期，至少许多当地知识分子认

为曾庆红比江泽民开明。当然，如果把曾庆红在知识分子中间表现的开明理解成「党的领导艺术」也许更准确一些。而正因为曾庆红具备这种「领导艺术」，所以他在为余秋里效命时，即被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胡耀邦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在党的高级干部子女里。

据与曾庆红有过接触的人说，曾庆红在工作中为人和善，对下属从不指手划脚，有着广泛的人缘关系。这一特点的确同他的父亲曾山在世时的为人处世规则十分相像。

不过也有人认为曾庆红对知识分子的「开明」一面完全是形式上的表现，比如多找知识分子听听意见，定期召开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总而言之是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定范围的发牢骚场合，以此达到市委与知识分子沟通的目的。但这些知识分子们，特别是从事与论宣传工作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绝对不能把事情做得出了格，特别是不能在公开发表的文章方面越过中共的意识形态禁区，这是曾庆红主管上海意识形态界的一条大原则。所以，曾庆红在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尤其是在对党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方面，从来都是在「开明」形式的背後保持了高度的「原则性」。

据一位大陆驻美使领馆工作人员介绍，陈云的大女儿陈伟力到美国访问时，表现得比许多到美国多年的大陆留学生还思想开明和解放，与她在陈云遗体告别仪式上带领众人举手宣誓，「一定要把父辈兑示竟的共产党事业进行到底」的表现，完全判若两人。在与大陆留学生座谈时，陈云女儿听到有人建议以宗教形式聚拢大陆人心时，居然非常感兴趣，并表示祗要对祖国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有好处的建议，都可以汲取。

可见，陈云女儿所说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说到底还是共产党政权的巩固。所以，陈云、曾山这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後代们，如果说比他们的老子「开明」的话，那就是这一代人已经完全不用任何意识形态的教条来自我禁锢，祇要能够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干什么都行，想什么办法都行。当然，前提必须是有效而不是相反。

所以，曾庆红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上之所以让人感觉开明，就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是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一代，所以懂得必须一改老一辈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严加防范的手段，采用「诱以官、禄、德的办法，令知识分子自觉为维护和巩固共产党政权效命。

绝对尊重老的，大胆使用小的

在上海接触过曾庆红的政坛从士大都知道，曾氏自石油系统调进上海执掌组织系统後，其为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最突出特点就是「绝对尊重老的，大胆使用小的」。当时，全国各地方对中央一层的政治元老伺候的最周到的当属上海，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人自不用说，就是在上海基本上没有什么势力的北京帮元老彭真到上海时，上海方面也是竭尽奉承巴结之能事。

按照一般常规，中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的党委保卫处（有的叫公安处）都是直属本地公安厅（局）。如果中央有领导人前往时，则由公安部九局派人前往协助工作。而当时唯有上海例外，其市委保卫处接受中央警卫局的直接领导。所以，「尊重老的」是整个上海市委的「优良传统」，曾庆红去了

以後，又把这一传统在上海市委一班元老，如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人面前发挥到了极限水平．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曾庆红因为自己本身具有的红色背景，就决定了他在『尊重老的』时候，绝不会给被尊重者以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感觉，完全可以表现得像孝敬自己的生身父母一样自然．

而祗在把『尊重老的』这一传统发挥到极限水平，就不担心『老同志』会对自己的工作横加干涉，所以，曾庆红到上海不久，就连续主办了四期干部培训班，而这四期培训班的学员如今除了掌控整个上海市委、市府的大小机构之外，更有一批已经被安插进中央领导层，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现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龚文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现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等．不要小看这批人表面上都是副职，但却统揽了整个中央层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机构，对理论宣传方面不出『杂音』，与『江核心保持一致』起到了不可小看的作用．

在上海，曾庆红注重网罗人才、营建帮派班底的良苦用心人所皆知．一位上海的干部举例说，曾庆红自到上海之後，每与青年人接触，无论此人当时地位是高是低，没谈上三句话就掏出笔记本记下对方的姓名、年龄、职务等等，祗要觉得可用，从此便保持联系．比如他刚到上海时曾到青浦的水上游乐场周游，该单位的团总支书记在接待过程中给曾庆红印象不错．没多久，此人便被列为上海市委『第三梯队』名单，後被提拔至上海市旅游局当副局长．

而在『使用小的』方面，身为中共『太子党』主要成员之一的曾庆红非常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对知识界的青年人，特别是平民出身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给以足够的政治发展空间．同时，在自己政权发

现和培养人才方面，曾庆红确实也表现也比较开放的一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曾经安排上海复旦大学出面，与地处美国广州的一所名牌大学塔芙茨大学进行人才培训交流。

自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後，大陆许多大学都与西方国家大学建立人才交流活动，但全部是限於培养学术人才层面，而曾庆红却大胆地将他物色出来的一批政治上特提拔的知识分子送往美国「交流」。後来，虽然因为「六四」事件及西方物质生活条件本身的强烈诱惑等原因，这批被送到美国「交流」的待提拔干部现已回国发展的可能不足当年送出来的十分之一，但关键是曾庆红这一举动在上海知识界的影响。比如大陆著名青年政治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沪宁不但与曾庆红私交极深，公开场合里也从来对曾庆红评价很高。现在，王沪宁已经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务委员兼政治组组长的身份，成为江泽民最重要的理论幕僚之一

在上海时江泽民配合默契

说起来江泽民是与曾庆红同时被安排进上海市委「第三梯队」人选。曾庆红心里非常明白像江泽民这样即有红色家庭背景，又有个从四十年代末参加中共学生地下党资历者，再加上其曾经留学苏联的红色专家头衔，这一切都决定了曾庆红这一代人被提拔再快，也还要有一个「排排座，吃果果」的先後次序。所以八十年代中期江泽民从北京调进上海市委出任曾庆红上司，并不存在一个曾庆红不服气的问题，但两人之间还是经过了一个从客客气气到配合默契的阶段，而促成两彻度结为朋党，则是那

场八九学潮。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不幸逝世。胡氏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最开明者之一。中共党内著名马列理论家、「六四」後被开除党籍、流落美国的苏绍智先生认为：胡的民主思想、平民作风以及支持改革、关心群众的形象常为人民大众所称道。他在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被非法的所谓「党的生活会」胁迫辞职，一直是以後人们对中共不满的因素之一。他的不幸逝世自然引发人们的悲痛和怀念。中共领导层对他的不公正评价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於是人们自发地追悼胡耀邦，并发展成重评胡耀邦、批评现领导，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制度的群众游行示威。

如果说一九八九年的大学生「闹事」是以胡耀邦逝世为导火索的话，那么当时上海市委封杀《世界经济导报》事件则对那场「动乱」客观上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正如苏绍知先生所说「而在悼念胡耀邦过程中，上海方面的「导报事件」，直接加深了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矛盾，推动了更多的知识界人士参加游行示威。而更多的「六四」参与者在事後的反思中多认为「导报事件」是八九学潮转为「全民抗议运动」的导火索。

事情的原委是：当年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事处和新观察杂志社在文化部联合举行追悼胡耀邦的讨论会。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民主派都有多人参加。会上的发言，都是怀念和颂扬胡耀邦的，除严家其和戴晴的讲话外，都比较温和，没有批评现政权之处。严家其大致讲了党对胡耀邦的不公正待遇，犹如「四人邦」之对待周恩来。戴晴则讲了从陈独秀、瞿秋白到胡耀邦，中共中央总书记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决定导报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第四百三十九期，全文刊载这一讨论会的所有发言，并抢在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正式追悼会之前出版。

此消息由导报驻京办事处首先向境外记者透露，有一份港报於十七日把消息登了出来，恰好被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至立看到，向曾氏汇报後，两人预感事情严重，立刻报告市委第一把手江泽民，在江的批示下，曾庆红和陈至立连夜约见导报总辑钦本立，要求调阅导报「悼胡座谈会」的文章清样，阅後即命令钦本立将两万五千字的座谈会纪要删节刊出，而在此之前，曾庆红一直对钦本立表示特别的尊重，在公众场合见面，从来是以「钦老」尊呼。

被例举删节的内容包括「牵涉到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功过」；「为反自由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案子翻案」；支持北京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等内容，等於是抽去了整个座谈会的全部精髓，而钦本立当面同意「服从组织」，同时却表示该期《导报》已经有一部分散发出去，於是江泽民亲自召见钦本立，严历指责他违反党纪，宣布撤销他的职务後，随派遣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为顾问的整顿工作组进驻世界经济导报，陈至立亲自到场宣布整顿该报的市委常委会议决定。

消息传出，群情大哗，上海首先出现支持导报的游行示威，北京各报纷纷写信向上海市委抗议，严家其、许良英发起签名的致上海市委的公开信题为「保卫新闻自由」，五月四日，北京有五百多名新闻记者走上街

头，支持导报并呼吁新闻自由。自此，大学生之外的社会各界人士抗议活动全面开始。

据导报当时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先生回忆：一九八八年，曾庆红还在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内召集《解放日报》、《文汇报》、《世界经济导报》的驻北京办事处和负责人开会，目的是要摸摸北京的情况。会上他对《导报》的人说：「你们离中南海最近，离国务院最近，离体改委最近，信息最灵。以後要多和市委通通气。」

这件事说明「六四」前《导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地位非同小可，也说明曾庆红甚至江泽民一度要利用《导报》，後来却又「卸磨杀驴」。

曾庆红在事先能发现导报「不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及时查禁，获得江泽民的赞赏。在市委干部会上，江泽民特别表扬曾氏和陈至立「政治警觉性高」。如果曾、陈两人漏查了导报，那么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以後的历史兴许就不会是今天这幅样子。所以江泽民在获知自己将高升总书记之後，惊喜之余，首先就想到了曾庆红。

关键时刻政治嗅觉灵敏

江泽民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任总书记实座後，一度表现得比李鹏还要僵化，张口阶级斗争，闭口反和平演变。邓小平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驳斥的改革「姓社还是姓资」其实正是江泽民最先提出的。而事实上一九八九年以前的江泽民并不是像他当了总书记以後直到一九九二年老邓南巡

这段时间那样僵化。

当年赵紫阳下决心在城市和修理业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时，江泽民在上海曾经率先考虑过股份制的问题，这在当时的省级领导中应该说是具有『超前意识』了。据一位思想较为开明的中共经济理论家吴敬梓回忆，江泽民当年在上海曾几次向他讨教股份制的可行性。

一九八九年五月初，赵紫阳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导报事件』恶果严重，当时的江泽民即明显表现出沉不住气的样子。当赵紫阳怒气冲冲地表示『上海把事情搞糟了，中央不负责』时，江泽民涨红着脸连句辩解的话都没有。会下，他找到李瑞环，希望听听天津处理学连问题的经验办法，而老奸巨滑的李瑞环当然不会把自己那套『祸水引向北京』的妙计告诉他。

参加政治局会议後回到上海，江泽民一度曾经动过给钦本立『赔个不是』的念头，因为此时他一度对形势判断走样，误认为赵紫阳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学潮进而提升其总书记的权威。特别是赵紫阳八九年五月初在亚银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後，江泽民更感到自己处理导报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就在这政治形势变化莫测，一旦『站错队』就会抱恨终生的关键时刻，正是曾庆红凭他在中共元老中的特殊信息渠道以及他自己自幼开始接受的阶级斗争意识熏染，及时嗅出邓小平等中共元老势必会对学运下毒手的血气，甚至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即曾庆红此时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即使北京的大学生们愿意给赵紫阳一个大面子，赵紫阳在党内的政治对立面也绝不会善甘罢休。他们会采取与赵紫阳针锋相对的策略，继续激怒广场上的大学生，让他们继续闹到政府不采取镇压手段便没有平息可能的

地步．祇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党外『杀一儆百』，在党内搬倒赵紫阳的目的．

於是，正是在曾庆红的及时提醒下，江泽民才鼓足勇气、硬着头皮『站稳了立场』．

『六四』镇压之後，江泽民进中南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况就是在组织声讨赵紫阳时狠狠报复了一下，特别要求李鹏在总结赵紫阳『罪行』的报告中加进他曾经指责上海『把事情搞糟了』的政治局会议内容，因为这件事情太让他江泽民现丑，特别是在李瑞环面前．

由此说来，曾庆红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等於是挽救了江泽民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江泽民不是在八九年的关键时刻被曾庆红及时提醒，日後不但总书记实座没他的份，上海市委书记的位置能够继续坐到退休就算幸运了．所以，他江泽民一旦得势，对曾庆红如果不感谢『救命之恩』的话，从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正因为与曾庆红有过这段特殊的经历，所以有海外报刊的分析文章认为『江泽民一是觉得曾庆红放心；同时更觉得曾庆红其人的政治嗅觉极为灵敏，正是出任中办主任一职最难得的素质．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赵紫阳给外界留下的最後一次印象也是最深刻的一次印象，就是他八九年五月十九日凌晨五时许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出现．一句『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充满了无限的伤感和无奈，令现场聆听的绝食大学生和无数电视观众至今记忆犹新，唏嘘不已．

就在赵紫阳离开广场之後几分钟，他在广场上全部活动的现场录相已经送进中南海勤正殿（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点），已经奉命从上海进京，静候总书记黄袍加身的江泽民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不但从赵紫阳的现场讲话中分析出了他『暴露党内矛盾』的罪证，同时也注意到了随侍赵紫阳身边者并不是贴身卫士或一般级别的秘书，而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

当时，温家宝右手紧紧挽扶着赵紫阳，左手帮他扶正手提式麦克风，一付虔诚护主的神态都被摄相机忠实地记录下来并汇报给赵紫阳的继任。也许正是这则电视画面的提示，令江泽民深感自己进驻中南海後，身边也必须有一个新的『温家宝』。

一个月後，江泽民荣升总书记的『决议』被正式昭告天下，接着，由江泽民和李鹏两人签字的一份任命书正式下发：曾度红同意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付主任，于是，江泽民不要红木要『红人』的传说在上海滩不胫而走。

所谓『不要（红木）要（红人）』说的是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时直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进京高就中央政治局委员，离开上海时未带一兵一卒，祇是由捧场者为他购置了全套高级红木家俱，但货物正准备启运时，却被继任者江泽民通知火车站扣发，所以此次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後，自然不会选择红木家俱，但却在自己身边安排了一个『红人』。

曾山的儿子陈云放心

当然，江泽民提协曾庆红进京帮办，一是不忘曾庆红的关键一功；二是考虑到了曾庆红在陈云、姚依林等强硬派政治老人那里的特殊背景，所以提拔曾庆红进京不但不会有结党营私之嫌，反而会因此获得陈云等人进一步的好感。另外，也不排除曾庆红在上海的三年刀笔吏生涯，确实也给江泽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位海外政治评论家认为「江泽民进京後将曾庆红视为第一心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曾氏可以为江泽民在与「老同志」联络感情方面，起到「太子党」圈外的平民出身的干部无法替代的作用。同时，江泽民也考虑到了进一步提拔曾庆红本来就是一种向「老同志」们「表忠心」的模范举动。

陈云在世时，长期控制着中共组织系统，但八十年代里经他亲自过目的所谓「第三梯队名单」一般都是省、部级正职，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刚刚上台，即向陈云汇报准备安排曾庆红「加强」中办力量。陈云祇接了一名话：「他是曾山的儿子。」

就凭这一句话，江泽民立刻明白陈云是在称赞他的选择。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期，陈云到上海暖冬时，陈国栋等人就向陈云特别介绍了曾庆红。陈国栋并借此回顾起五十年代跟随曾山进中央一同在陈云领导人主管财经工作时的历史，捧得陈云两眼直放

一九八九年『六四』後，随着赵紫阳的下台，无论是陈云还是江泽民，都不愿意赵紫阳的阴影继续留在中办，安排曾庆红进去自然最为可靠．

海外评论界一提起中共『太子党』，早已经习惯於把这一概念界定在邓、陈、王、薄等几大家族的後代身上，其实，『太子党』是一个接掌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统治势力延续集团，共产党的政治香火要延续下去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陈云自己说过的，『还是自己的子女可靠』，而这个『自己』指的是一个庞大的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统治集团，其中也包括曾庆红的父母（与邓、陈同时代的老革命家）．

所以，邓、陈尚还在世的时候，如果江泽民把他们的子女直接提拔得过高，反而会引发太多的负作用，邓、陈等人当然明白江泽民的这层『有些事情不能急於一步到位』的良苦用心．而曾庆红父亲早已去世，特别当年邓、陈等元老都同意优先提拔李维汉的长公子李铁映一样，首先是不会引起仍在世的一批政治元老之间的相互攀比．其次是曾庆红的红色背景在海内外，特别是普通党员和普通百姓之间被知之甚少，故提拔他不至於导致『共产党政权大搞世袭制』的负面宣传．但因为在中共元老群体中不可能有人不知道曾庆红是谁人之後，故江泽民对他大力提拔，至少可以给仍然在世的『老同志』们起到一种极强烈的心理安慰作用，认为他江泽民对『革命後代』委实不薄．

不是中央委员的中办主任

进入中南海後，曾庆红鞍前马後，不但随江泽民跑遍了大江南北，出访了十数个大小国家、看他副

谦恭、随顺又不失机敏的得体表现，几乎无人不相信曾庆红会在中办副主任的位置停留太长的时间。

一九八九年六月江泽民入主中南海之初，邓小平特别找李鹏等人谈话，强调党内核心领导层的团结问题。谈话间，邓小平还特别举例子说自己当年从四川奉调中央时，连个秘书都不带，以此说明党内能不搞帮派。江泽民嘴上喏喏连声，仍然没有改变将曾庆红带进中南海的决定，以至政界传出他「不带红木带红人」的非议。也正是因为对这种非议的顾虑，加之初进中南海的时连李鹏都对他颇不服气，江泽民绝不敢让曾庆红在中办系统「一步到位」，祇能先屈就在副主任的位置上。

於此同时，江泽民肯定也还考虑过，如果他本人要是在提拔曾庆红的问题上过多顾虑外界反映，从而使曾庆红在漫长的副部级岗位上熬白了头发，难保曾庆红会做出什么事来。一旦等得不耐烦了，背後给他江泽民使点小动作是完全有可能的。

进入中南海之後，江泽民将大部分业馀时间用来阅读中外历史书籍和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在研读和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开国元勋的治国、治党的经验和教训时，江泽民发现「文革」後期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之所以受江青等人的利诱，背叛了他在共产党内最大的恩人周恩来，心理原因之一就是抱怨在周恩来手下长期得不到提拔。

汲取周恩来的教训，江泽民绝不会让关键时刻为他立了大功的曾庆红产生政治上的失意之感。正是在这种齐心协力共保红色江山的「党性」和「知恩图报」的「人性」在江泽民心中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曾庆红终於得以平步青云。

在一九九二年十月闭幕的「十四大」上，曾庆红的名字不但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之列，甚至连候补委员都没有排上。所以，当时一度传出曾庆红已经失势的消息，认为虽说曾庆红是当年江泽民自上海带进中南海的「跟班红人」，但「伴君如伴虎」，侍奉权贵者从来都是仕宦前景与政治风险并存。

谁知江泽民安排自己班底时，完全不按共产党过去的「惯例」出牌。十四大谢幕两个月，中共中央突然对外宣布曾庆红接替温家宝中办主任职务，使得随时关注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评论界如坠烟云务里，搞不明白江泽民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而据接近中共高层的人士透露，事实上曾庆红接替中办主任职务的计划早在十四大之前就已经布署好了。而之所以没有将他安排进十四届中委，则是江泽民的「计高一筹」。江泽民考虑到了党内对他带着曾庆红进京一事早有微词，同时又由曾庆红的高干家庭背景联想到了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十三大代表落选，陈云长子陈元十四大代表落选的原因，担心如果将曾庆红安排成中委候选人，一旦在无计名投票中被差额下来，再任命他接替中办主任岂不是不尊重大部分党代表的意愿。而等到十四大过後，突然把不是中央委员的曾庆红任为中办主任，将原主任温家宝委以农业「重任」，此举反而会被理解成「正常人事更替」。

十四大的选举结果一出来，果然证明江泽民的担心并不是多馀，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内定出任政治局委员的萧秧、内定出任书记处书记的俞正声及内定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全部落选；安排进候补委员候选人序列後，萧秧、俞正声勉强当选，李克强则名落孙山。後来，中共高层祇好下令将李克强安排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不过，江泽民自以为得计的这一如意安排，令曾庆红所要付出的政治代价就是一直到一九九七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五大之前，他曾庆红没有可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内堂而皇之的占据一个席次．

其实，现在看来，如果江泽民在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之前硬着头皮将曾庆红安排进中央委员候选名单，落选的可能也不是很大．道理是萧秧也好、俞正声也好，当时落选的原因都比较复杂，一是此二人的「邓系」色彩过於浓厚——而且还是「邓朴方系」；二是此二人当时都是「计划单列」负责人，自然与所在省份有利益冲突．至於李克强，因为在当时确实名不见经传，同时中共高层又不好在党代会上直接宣布他已经被内定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接班人选．

至於曾庆红其人，从一九八六年即开始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仅凭其政治上「出道」远比上述二人都早这一项优越条件，多数党代表在候选人名单划圈时就不太可能将他「差额」出去．

那么，如果曾庆红能够在中共十四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即使随即召开的十四届一中全会上不给他安排一个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的席次，九四年九月底召开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也会考虑到他：是山东代表姜春云、上海代表吴邦国均被「增补」为书记处书记，前上海市长黄菊则因为接替吴邦国上海市委书记职务而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自曾庆红被在中办副主任基础上扶正之後，每年中共召开党的中央全会之前，海外媒体必有关

於此次会议上人事异动的分析的『内部消息』，而且每每都要将曾庆红的大名排进『提升』人选之列，殊不知曾庆红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江泽民怎么可能违背党规让曾庆红进入中央书记处或政治局．所以，这种所以曾庆红进政治局或书记处的『内部消息』，就如同猜测的美国的季辛吉（基辛格）要竞选美国总统一样可笑．

当然，按照中共有关党规，采取在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即『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即可增补中央委员，并顺势增补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人选．可江泽民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可能为了曾庆红而搞出这样大的政治动静，何况距中共党的十五大召开时日越近，这种举动便越没有必要了．

到本书完稿的时间为止，连个普通中央委员也不是的曾庆红已经在具体主管中共十五大的筹备工作．届时，祇要江泽民能够继续保住总书记实座，曾庆红进入中央委员序列应该没有任何问题．至於能否进入中央书记处，则要看党内权力分配的结果．不过，如果江泽民在十五大上继任总书记的前提下，曾庆红届时仍然进不了中央书记处，祇能说明江泽民在党内的处境仍然是『有权无威』，一直受到相当程度的权力制约．

暗助江泽民站稳脚跟

一九八九年六月，因为『六四』镇压而将自己的执政党形象和统治地位之合法性降至历史最低点

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江泽民出任中共建政後的第五任党魁。当时，不但全中国、全世界都鲜有政治家和老百姓对江泽民的政治前景看好，共产党内部也已经发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犹疑之声。

「六四」镇压过後，整个中国万马齐暗，整个世界千夫所指。而在北京城里，人们的牢骚、愤怨祗能通过黑色幽默的形式发泄。当时流行的一则政治笑话说：江泽民、杨尚昆、李鹏和李瑞环四人在北京夜查民情时误入一家卡拉OK歌厅，面对歌厅主人的盛情相邀，四位首长在流行歌曲目录上各点了一首「你最喜爱的歌」：杨尚昆先点一首《我想有个家》，李鹏接点一首《我不是个坏小孩》，李瑞环点了《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轮到总书记「钦点」时，一首《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最能表达这位「儿皇帝」此时心情的酸楚。

这四首歌是当时大陆青年人中谁都哼出两句的流行名曲，给杨尚昆安上《我想有个家》，是因为此时杨尚昆已经丧偶；《我不是个坏小孩》安给李鹏，是讽刺他因为「六四」镇压而成千夫所指；李瑞环木匠出身，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相比才疏学浅，但当时却显得相对开明，故让他说明自己「虽然我丑，但是我很温柔」。而江泽民的「希望你明天还爱我」，更是形象地讽刺了江泽民日夜担心自己是否会与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下场。自称从小喜好古典诗词的江泽民到此才真正体会出何谓「高处不胜寒」。

这一切流言都推测江泽民初入中南海时，其心境并不仅仅是像他在八九年六月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所表白的，「没有思想准备」，而是对挽救政权颓势根本没有信心。

当时，北京还有一则政治笑话说的是：某一日江泽民、杨尚昆陪同邓小平视察，路遇一驴挡道，邓小平要求此三人设法将驴轰走，杨尚昆和李鹏轮番向驴子大吼：「再不走开小平同志要派戒严部队了」，驴子置若罔闻。大家目光集中到江泽民身上，祇见江泽民不紧不慢地走到驴子身边附耳瞎话，驴子抬腿就跑。

於是，邓小平好奇地问道：「你同那驴子说了什么竟把它吓成那个样子？」江泽民答曰：「我祇是告诉它，（如果你再不走，小平同志就要选你当下届总书记了）。」

这则讽刺笑话虽有刻薄了点，但依江泽民当时的心境，那种在邓小平、陈云等超级政治元老面前「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多说半句话」，在杨家兄弟面前随时都要听命摆布的「一国之君」，当得也实在有些窝囊。

启用元老秘书掌握看家部队

无论江泽民如今回想起过去那一切会作何感想，外界将过去这一切与近两、三年来江泽民的表现相比，真有点搞不清江泽民其人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而无论我们今天对江泽民是否具有相当的政治智商仍持怀疑，也必须承认他有自己底气最不足的关键时候，选对了管家。早在上海掌管组织工作大权时，曾庆红「不拘一格降人材」的得力表现，就已令江泽民刮目相看。而更为江泽民所倚重的是，曾庆红通过自己本身的红色背景与党内主要元老建立的私人联络，使他

进京後身边自然聚拢了一批中共元老子女和秘书，特别是军内的元老子女和秘书．所以，无须江泽民把话挑明，曾庆红进京帮办後首先想到的事，就是一步步帮助江泽民营建好自己的组织班底．

众所周知，江泽民进京後长期没有抓到军权，但却通过改组武警部队，把这支『看家』部队掌在自己心腹手中．事後，外界祇是看到江泽民把自己在上海的亲信巴忠炎提升为武警部队司令，却没有注意到同时提升的一个副司令和一个副政委的特殊背景．

『六四』镇压之前，武警总部的参谋长王文理是从北京卫戍区平调过来的，此人过去长期担任叶剑英秘书，与叶家关系极深．『六四』後，江泽民把武警部队的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全部撤光，而参谋长王文理不但没撤，反而被江泽民一纸命令，提升为第一副令员．此举不但成功地笼络了对杨家将反感的叶家势力，同时也给众多元老的秘书、子女们很大的安慰．

同时，又把原武警部队後勤部的第二政委徐桂宝，直接提升成武警副政委．而此人的背景是前李先念办公室秘书．

纯从逻辑上推理，就不难相信，那些长期在中共政治元老身边担任秘书工作的人，在维护和巩固共产党政权方面表现出的责任心，不会亚於元老们的後代．而深知这一点的曾庆红为江泽民出了这个重用元老秘书的办法、

拉拢扬德中效忠江泽民

同时，曾庆红亦将他在上海表现的『绝对尊重老的』成功地运用在中办系统。刚进中办时，曾庆红还排名在中办第一副主任杨德中之後。杨氏从华国锋及汪东兴倒台之後，即以『中南海总镖头』的身份，除全盘负责中央警卫工作之外，还按照中共惯例，亲自负责『一号首长』的警卫任务。虽然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後改为总书记』开始，中共最高决策权一直是以邓、陈两位政治元元『垂帘听政』的方式，颇似晚清东、西太後掌控光绪。但表面上还必须称总书记为党内一把手。所以，整个八十年代里，杨德中先是亲自负责胡耀邦，後来又亲自负责赵紫阳的警卫工作。而直接负责邓、陈二人警卫工作的，则是杨德中的部下，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和牟信智。

正像当年毛泽东尸骨未寒，毛的第一宠臣汪东兴便亲自下手逮捕了毛夫人一样，邓、陈两元老决定废出胡耀邦时，首先是通知了杨德中作好『应变』准备；而决定罢免赵紫阳时，杨德中在赵氏面前的身份立刻由首长的警卫变成了人犯的看守。

正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这段活教材，令江泽民夫人王冶平女士在刚刚听到丈夫奉命人主中南海的消息之後，不但没有半点夫贵妻荣的喜悦，反而有大祸即将临头之感。

江泽民入主中南海成为『一号首长』後，杨德中立刻担负起了对他的保卫工作。如何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未来的杨德中不会由江泽民的警卫变成他的看守，也是曾庆红首当其冲和任务之一。

自中共建政以後，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首脑人物的保镖从来是所谓纯奉献性质的『无名英雄』。仍以杨德中为例，『文革』前和『文革』中，他长期以中央警卫局（一度称公安部

警卫局）副局长的身份主要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工作，二十多年时间里，随周恩来出访过多少国家，他自己早已统计不过来了．但所有这些随同出访的活动，杨德中的大名从来是不能公开曝光的．而江泽民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时，公开见报的「陪同出访人员」名单上，杨德中的大名赫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登在报纸上．大半生出入红朝宫廷，并随同领导人周游过世界各地的杨德中，什么样的世面都已经见过，什么样的口福都已经尝过，一生中唯一的遗憾便是走到哪里都必须默默无闻．如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家元首的特别助理名衔，足以弥补杨德中的人生遗憾．

当年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弥留之际，留下的最後遗言，就是委托七个人处理她的後事，而这七个人则人以公开曝光和炫耀，足以令他杨德中光宗耀祖的响亮名份．但江泽民却让他在这方面得到了满足．从此杨德中对江泽民如何感恩戴德，可想而知．而用「国家主席特别助理」名份安抚杨德中的点子，正是曾庆红为江泽民想出来的．

接着，江泽民又在杨德中面前故意漫不经心地透露曾庆红如何为杨德中的名份问题出了一个好点子，然後便就曾庆红接替温家实中央办公厅正主任职务的问题，假惺惺地向杨德中征求意见．杨德中自然是一报还一报，立刻表示坚决拥护曾庆红由自己的下级变成自己的上级．

用上将军衔换取杨德中交权

无论是基於「前朝旧臣可用不可信」的考虑，还是从所谓「干部年轻化」的角度考虑，长期让比江泽民年龄大三岁，党龄长十年的杨德中负责「一号首长」警卫任务总不是办法。至於曾庆红，杨德中入党时他还没有出生，所以让「德高望重」的杨德中在中央办公厅内长期担任曾庆红的副手，工作关系上也难以理顺。据中办工作人员透露，曾庆红自接替中办主任职务後，在批示要求下属副主任办理的文件时，对杨德中的口气必须谦恭许多。

於是，在杨德中因为得了一个「国家主席特别助理」头衔志得意满之时，曾庆红又给江泽民出了一个「趁势打铁」的主意，乾脆给杨德中一个上将军衔，作为动员他交出中央警卫局局长权棒的交换条件，待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後，再安排他彻底退休。

一九九四年三月，中共全国人大通过了对解放军军衔条例的修正案，取消了一级上将的设置。一九八八年中共恢复军衔制後，虽然有一级上将的设置，但还没有人得过这一头衔。而一级上将的设置取消後，解放军军官祗要获得一个上将军衔便意味着熬到头了。当年六月，江泽民一口气在解放军中提升了十九名上将，其中最引人注目，在军内招致一片议论声的，便是「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杨德中竟也名列其中。

在此之前，按照中共内部设定，杨德中领导的中央警卫局归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双重领导，但对外祗称之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按照当时军内的级别，中央警卫局与军委办公厅同级，相当军方「三总部」的二级部。举例来说：解放军总参谋部下面设有作战部、装备部等，解

放军总政部下面设有干部部、群众工作部等，都是所谓『二级部』与警卫局平级.

邓小平一九八五年裁军之後，即已经规定，各大军区比所谓『三总部』低半级，『三总部』下属的二级部则又比各大军区低半级. 简言之，各大军区的正职负责人，与『三总部』的副职——比如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等——是平级待遇. 以此类推，『三总部』下属的二级部，比如总参下属的作战部、总政下属的群工部等，其正职负责干部级别上祗是所谓『副大军区级』.

那么，按照这一级别顺序，当时的杨德中身为中央警卫局长，在军内编制上也仅仅是副大军区级. 而按照中共军队授衔条例，副大军区级的最高军衔祗能是中将. 所以，早在一九八八年，杨德中即已经获得中将军衔，其手下的警卫局副局长孙勇、牟信智等，都获得少将军衔.

如此问题，当然难不倒曾庆红. 江泽民听了他的主意後，立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将中央警卫局在军队建制中的级别升格问题. 从此，对外从来称之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单位，立刻被改称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卫局，同时由中央军委办公厅起草命令，宣布该局在建制上比总参下属的二级部高半级，相当於『正大军区级』. 接着，又通过一九九四年三月人大会议上对军衔制条例的修改，将正大军区级的授衔标准定为上将和中将，而未修改的军衔制规定这一级别『基准军衔』是中将. 这样一来，杨得中便与其他十几位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起『名正言顺地获得上将军衔.

一九九四年六月江泽民一口气授了十九名上将後，海外评论界全部认为这是江泽民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重大举动. 其实，这种分析祗说对了一半，江泽民如此封衔，对其中的一部分来讲确实

是要作为自己拉拢或安抚的对象，比如王克和王瑞林在这次获授上将军衔後，已经於一九九五年九月晋级至中央军委委员．对王克，绝对是拉拢、利诱，而王瑞林，则是安抚、拉拢、利诱兼而有之．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讲，则是要通过一个解放军最高军衔的荣誉，作为迫使一批年满或年近六十五岁的老军头交出兵权的交换条件．为江泽民出此高招的，仍是曾庆红．

所以，一九九四年六月授衔的那批上将里，两年之内便已经有近半数陆续交兵权，解甲还乡，比如前副总参谋长李景、前总後勤部政治委员周克玉、前国防科工委政委戴学江、前国际大学政治委员李文卿、前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宋清渭、前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九龙、前南京军区令员固辉等，都是获得上将军衔後，便陆继交出军权．

更有外界毫不知情的是，曾庆红替江泽民在军队中寻找的依靠对象，主要不是外界通过中共公开报导看到的那样获授上将军衔的人，而是一批与曾庆红同一年龄档，准备在下个世纪初全面接掌军队最高领导权的『少壮派』军官，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现任副总谋长熊光楷和现任海军副司令员贺鹏飞．曾庆红鼓动江泽民在一九九四年下半年，分别将此二人的少将军衔提成中将，以换取他们对江泽民的效忠．

生於一九二三年的杨德中，被江泽民授予上将军衔时已经七十一岁高龄．按照邓小平时代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提倡干部年轻化而制定的军队干部年龄标准，大军区正职负责人年满六十五岁即应该退休．所以，即使将中央警卫局升格正大军区级的举措在军内没有太大反弹，杨德中以七十

一岁高龄获授上将军衔，不知会引出多少不服气的牢骚声．但权衡利弊，江泽民是宁可犯众怒，也必须把杨德中安抚得服服帖帖．

从中共建政之初即开始在中南海里担任警卫工作的杨德中，先是主要负责周恩来的保卫工作，周死前已经被下放陕西．一九八零年，他被正式任命为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自此，杨德中如他的前任汪东兴一样，全权负责整个中南海的保卫、监护，到获授上将军衔时已有十四年历史．

这些年里，中共所有部门的干部任命中，副职虽有名次先後，但已不再有「第一」的形式，唯有中央办公厅还保留「第一副主任」的称呼．

在杨德中全权负责中南海警卫工作期间，中共高层先後经历了贬华、弃胡、废赵、倒杨等四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在杨德中头上挂名办公厅主任职务者，更是替换了六任，从姚依林、胡启立，乔石、王兆国、温家宝到如今的曾庆红．

从进入中南海之初，杨德中先後对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陈云，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等中共最高领导人高度负责，做到了安全保卫万无一失，居家生活「丰富多彩」．以上谁在台上都会赞扬他「忠心耿耿」，堪称硕果仅存的「五朝元老」，其中央警卫局局长职务的重要性和神秘性决定了他轻易不能退休．

「五朝」指的是中共建政後已经经历了五任党中央主席或总书记，毛泽东、华国锋、赵紫阳和

江泽民：到目前为止，对中共高层的重大机密，特别是每次不流血的宫廷政变的内幕，唯有杨德中掌握最全。

从中共建政之初到现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已经换了八任，但办公厅中的所有部门负责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中，唯有杨德中一人是从第一任杨尚昆手下坚持到第八任曾庆红手下。所以，中共自建政以来的所有机密，任何一个担任过中办主任者，都祇是熟悉其中一段，唯有杨德中能够将四十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层秘史」一段不少地复述下来。

举例来说，大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杨德中即开始在汪东兴领导下，具体参与中共高层领导居住的战备工程，工程内容包括防原子工程、防化工程及防震工程、防洪工程等等，涉及地区包括中南海、西山、钓鱼台、人大会堂、京西宾馆和南苑机场等处，甚至包括解放军三零五医院在内。当年「四人帮」被捕後，开始几天就是被关押在中南海的地下战备设施中。

即使在北京也很少有人知道，北京市的地下通道，除了地铁，还有可并排行驶高级防弹轿车的中共领导人地下专线。够级别的中共领导人，从中南海到天安门城楼、人大会堂、钓鱼台、南苑机场等处，要想保密就不走地上。

八九年的「六四」镇压前夜，整个北京城交通瘫痪，除天安门广场完全被「动暴乱分子」占领之外，中南海四周也全无一处「安全地带」。当全副武的戒严部队冒着无数砖头瓦块的袭击从地面攻入北京城的同时，中南海里的中共巨头及其家属却从地下反其道而行之，一批批地安然撤退到有

重兵把守的西山军事要塞．这一切，都是取决於杨德中的护驾之功．

杨德中获授上将军衔後，台湾某大陆研究机构出版的杂志中称江泽民给杨德中一个上将军衔，证明杨的军内职务「无疑将更上一层楼」．殊不知杨德中此时已经七十一岁，江泽民即使想让他「更上一层楼」，他也已经心有馀而力不足了．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江泽民出外访问的随从人员名单，就不难发现，杨德中获授上将军衔之前，江泽民每到一国，杨德中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身份随访；而杨氏获授上将军衔後，负责保卫工作的那位「特别助理」换成了由喜贵可见给杨德中的上将军衔确实是让他交出警卫局领导大权的交换条件．

杨德中同意交权後，江泽民卫士长出身的由喜贵．晋升中将军衔．不过到本书截稿为止，仍然没有确切消息证明喜贵已经被正式任命为警卫局局长．不过，杨德中至迟在中共十五大上正式退休已经是没有异议的事情了．

抬胡压赵拉拢胡耀邦旧部

按照中共有关规定，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及直属机关，协助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也就是说，无论是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还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法委员会，甚至中央军事委员会，都是由曾

庆红负责「联系」并处理其日常工作．举个例子，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兼任，但事实上连个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曾庆红，实际掌握的权限范围要比丁关根大得多．

随着曾庆红在中办负责人的位置上完全实现大权独揽，江泽民在整个中共高层的实际地位也日益巩固．一九九二年召开十四大之前，因为党、政、军的组织人事工作全部被「杨家将」横插一手，使得十四大的人事安排，特别是军队系统，以及省、部一级的人事安排令江泽民感觉十分不合己愿．所以，曾庆红在挤走温家宝独揽办公厅大权之後，立刻将中共规定的办公厅的权限发挥到极致，并创造性地将办公厅对党内纪律检查系统、宣传系统，甚至司法系统的「工作协调」，全部与党内人事权争挂起钩来．而他协助江泽民制定拉拢和培植政治亲信计划的第一步，便是所谓「抬胡压赵」，在彻底肃清赵紫阳部影响的同时，防止已经因「六四」事件失势的一批赵紫阳旧部东山再起．

早在八十年代曾庆红作为「第三梯队」人选调往上海的同时，被胡耀邦安排进上海的青年干部中，还有一个出身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的潘维明．潘氏年龄比曾庆红小许多，同时因为是读大学期间才加入中共，调进上海工作时党龄尚不满五年，故虽然被破格安排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但却不能如曾庆红一样进入市委常委序列．後来，潘氏可能是思想过分自由，观点过於「前卫」，在胡耀邦下台前後，他已经被从市委宣传部长的位置上拿下，改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胡耀邦下台後，一次去上海休养，点名祇见两个人，一个是曾庆红，第二个便是潘维明，由此可见胡耀邦确实对此二人同样器重．

潘氏刚到上海时，职务与曾庆红平级。但曾庆红很快升为市委副书记後，同时还兼任了市委对外宣传领导小组组长，凡是文化、艺术、教育、体育、卫生、政治宣传、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事业全都归他，重要文件、宣传文献的起草、润色也都先由他来敲定，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第一刀笔吏。自然也成了潘维明的直接领导。有当时在他们身边工作过的人士介绍说：曾、潘二人双双到上海之初，私交较好，曾庆红也颇为赞赏潘的才气。但当潘氏因为「自由化」言行受到来自上峰的谴责，并被贬为上新闻出版局局长後，曾庆红则处处钳制潘氏。

「六四」镇压前，潘氏曾经以上书方式表示对大学生的同情与支持。事後，海外民运界传播的消息说：上海方面利用潘氏弱点，派人将潘氏骗至西安并给他安排一青年女子。接着，潘氏便因「嫖妓罪名下狱，直到一九九五年才刑满获释。

不过，对潘的事情上海方面也有另一种说法。一九八九年五月上海大学生紧跟北京学潮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潘、曾二人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护驾到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与学生对话。行进间遇到激进的学生向他们抛掷石块，潘维明敏捷地跳到江泽民的身边，用身体挡住了飞向江泽民的一块小石头。虽然这块石头即使砸到江泽民身上，也不至於有头破血流的严重创伤，但潘维明忠心护主的表现还是令江泽民十分感动。

按照这种说法，潘後来因为「嫖妓」问题下狱根本不是什么「政治阴谋」。而且江泽民知道此事後还说了一句「我对潘维明已经仁至义尽了」。

也有人认为，祇是因为潘维明的平民出身，才决定了江泽民决不会像如今器重和相信曾庆红一样让他潘维明进入中央核心系统．其实，如果说中共政坛存在一个接班『太子党』梯队的话，同时也还有一个『驸马党』在各级政坛里一争高低，潘维明便是其中之一．

八十年代中期，因为吴邦国和黄菊都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从上海本地选出的『第三梯队』人马，而曾庆红和潘维明则是直接从北京派进，故一般人，特别是不太熟知曾庆红背景的人士都认为曾、潘二人都是胡耀邦为向上海市委领导班子『掺砂子』而强行派进去的．熟不知曾庆红实际上是被上海的陈国栋和中央的胡耀邦双双看好的接班人选．而潘维明除了在中央一层被胡耀看好，在上海方面至少有一层胡立教愿意提携的背景．

潘氏的老泰山梁国斌虽比曾山资历稍浅，但也是二十年代即参加中共的政治元老，战争年代长期与胡立教等人共同从事中共华东地区的保卫、情报工作．中共建政之前，梁国斌担任中共华东局社会部长时，胡立教是他手下的副部长和情报处长．

中共建政後，梁氏曾被委以华东行政委员会公司局长兼华东公安军政委、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公安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後又从北京调回上海，出任上海市委书记（当时因为有『第一书记』的设置，故市委书记相当於现在的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

梁国斌在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人际关系对於潘维明在上海的立足，无疑起到了帮亲作用．

可惜，梁国斌自一九八零年去世後，其馀威无法与曾山的影响力相比．再加上潘氏本人思想行动过

份自由化的原因，终於导致潘氏与曾庆红在中共政权内截然相反的政治下场．

曾庆红「抬胡压赵」的谋划，除了帮助江泽民成功摆脱赵紫阳馀荫的政治考虑，也不排除曾庆红本人对胡耀邦确实仍然怀有敬意．早在胡耀邦去世不久，曾庆红就在上海说过：党内从来就没有个「胡派」一说．但如果人们硬要说我是「耀邦的人」，我也从不反驳．

胡耀邦後代也成笼络对象

从九四年下半年至九五年初，人们发现江泽民突然对前总书记胡耀邦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一方面在曾庆红的陪同下亲自在江西「共青城」拜谒了胡耀邦亡灵，亲自为墓碑题词，并向胡耀邦遗孀和子女表示了他对胡耀邦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一方面在几次高层会议上要求高级干部要学习胡耀邦的廉洁奉公精神．北京政界人士的分析说：这是江泽民在面临未来高层权争倍感势孤力单的情况下打出的又一张政治牌，希望通过此举能够赶在邓小平去世之前与现在台上的胡耀邦派系人马尽量联络感情，在党内高层寻找更多支持者．更有中共内部的人士分析说「江泽民突然对胡耀邦如此重视，也还有加外一层原因，那就是江泽民在中共从中央到基层层层腐败透顶的危难局面下，要借宣传和彰显胡耀邦清廉形象的办法「救党图存」．

在江泽民刚刚当上总书记的头几年时间里，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和党内保守派元老的淫威所迫，一方面也是他本人固有的圆滑政治个性所决定，对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不但没有过公正

的评价，而且常常在内部讲话中把胡耀邦与赵紫阳并列批判，动不动就是党的前两任总书记「犯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

一九九零年年底前後，胡耀邦家属曾根据胡耀邦「我死之後埋在青山绿水之间，就是共青城」的遗嘱，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送胡耀邦骨灰去江西安葬的有关事项．结果，空军专机师倒是奉命安排了专机，可因为江泽民等人已经下令安葬仪式从简，且不准任何国内媒体公开报导此事．结果，当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主要领导人中祇有乔石一个驱车前往机场，为他的老领导，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送灵，陪同家属去江西的则祇有温家宝，而当时并没有任何出访或到外地视察活动的江泽民、李鹏等人全都没有露面．

虽然江泽民可能会将如此安排的理由解释为防止「政治意外」，但谁都明白，在当时的那种政治高压气氛下，谁还敢借为胡耀邦送灵之机「闹事」？所以，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他江泽民这位「领导核心」无论从资历到个人威信方面，都自感底气不足，特别担心大张旗鼓地安葬前总书记胡耀邦会起到用死人压他江泽民这位活人的政治效果．

而且，事後大陆还有传说江泽民本人在事过之後不但毫不关心安葬仪式的进行情况，反倒再三追问是否因此事引起过不良的政治影响．无论此传说是否属实，但江泽民本人没有对胡耀邦的安葬表示重视，那些专门擅长根据高层风向决定自已行为的中共传宣部门的左派官员们自然会表现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从八九年六月至九二年初，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不但歌颂胡耀邦的文章和著作一

律都被封杀，甚至连有胡耀邦题词的党史作品、摄影作品等等都一律不准出版。

当时执掌《人民日报》大权的「左棍」高狄就曾经公开在报社声称：胡耀邦是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何况因为他的死还引了一场反革命动乱。所以即使中央没有明文规定，对胡耀邦也应该和对华国锋一样，不宜搞歌颂性的宣传。虽然他历史上有过正确的时候，所犯政治错误也同赵紫阳的错误性不太一样，但现在的政治宣传应该随时突出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即使个别出现一两篇宣传胡耀邦的文章，也会引起不良政治效果。

再比如曾经在胡耀邦逝世之前给胡耀邦留下最後一张彩色照片的前中共皇家摄影师杜山有一本原计划在八九年底正式出版的摄影作品集，就是因为封面题字是胡耀邦手笔，就一直被压在印刷厂不得面世，直到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前夕，此摄影集才被准许公开对外发行。

可是，从九四年下半年，特别是九五年初开始，江泽民在许多公开、半公开的场合里突然一改过去对胡耀邦的恶劣评价，特别是在反腐败问题上，常常以胡耀邦为例要求高级干部廉洁奉公，以胡耀邦家属为例教育高级干部要对自己子女严加管束。言谈间还特别表现出对胡耀邦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

与此同时，江泽民对胡耀邦的家属也表现了异常的关切。一九九五年春节期间，曾庆红专门打电话给胡耀邦的妻子李昭，强调是代表总书记向她全家拜年。江泽民在公众场合见到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时，亲切问候之外，还没话找话地向在场众人询问各位是否知道他是我们前任总书记的长子。

胡德平本人过去可谓中共高干子女中的异类，不但从不贪钱，而且思想特别开放，八十年初中期，曾经有一批党外自由化知识分子聚拢在他的门下，「为自由鸣炮」。

八九年「六四」镇压事件发生後，胡德平一直极为低调，拒绝为这场血腥事件歌功颂德。如此表现，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间得分无疑，但也因此阻死了仕宦升迁之途。一九八四年，胡德平已经是正局级干部，十年以後，仍然原地踏步。

江泽民上台之初，曾庆红曾经就政治元老子女在政坛争风吃醋，互相攀比的现象向江泽民进言，於是高层才在每个元老家族里至少安排一个副部级接班人的问题上达成默契。此後，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来、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万里的儿子万季飞、杨尚昆的儿子杨绍京、彭真的儿子傅平等，陆续被安排到不同的副部级岗位上，唯有胡耀邦的儿子被继续冷落。

决定打出胡耀邦牌之後，又是曾庆红为江泽民解决了胡德平不好安排的问题。当时胡德平仍在中央统战部任局长，因其一贯自由化思想严重，再加上在「六四」镇压问题上立场不鲜明，所以江泽民即使使想安排他担任统战部副部长，中组部那里的说服工作相当难作。难题交给曾庆红後，曾庆红立刻上门与胡德平谈心，具体谈了什么内容外界不得而知。反正是谈了一次便大功告成。

回到中南海後，曾庆红立刻向江泽民汇报说：德平同志和李昭同志向总书记问好。德平同志很高兴去全国工商联工作。

中共治下的「工商联」与其他几个「民主党派」一样，其中中央机构的级别相当於中共中央和国

家机关的部级，祇是因为这些组织的第一把手都被安排成全国政协副主席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享受「国家二级领导人」待遇，而这些组织的副职负责人，都与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副部长平级．而胡德平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当选」工商联副主席後，自然就是副部级待遇了．

这一来，既解决了胡耀邦後代在政治待遇上长期受冷落，与其他政治元老後代摆不平的难题，又能使胡德平的职务去向在中央组织系统易过关，因为「工商联」本来就是个政治花瓶机构，派进去的党内干部如果在政治思想上过於循规蹈矩，反而利於开展工作．

谋划权力斗争水平技高一筹

而之所以要及时打出胡耀邦这张牌的内幕是：曾庆红其人深知胡耀邦在中共内部，特别是在大陆知识界有着相当的影响力．所以，曾庆红认为江泽民既然作为赵紫阳的对立面被扶上总书记的位置，自然无法与赵紫阳的旧部联手，但如果再继续得罪胡耀的旧部，待邓小平百年之後，他江泽民自然会落得个孤立无援的地步．同时，也是因为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之前，已经明确表现出重新重用胡耀邦旧部的意愿，所以曾庆红更要帮助江泽民谋划，把这个在党内得分的事情由江泽民出面来做．

果然，正所谓「工夫不负有心人」．胡德平出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後，甚至在海外与论界都引起不小和震动．而许多仍然感念胡耀邦旧日恩德的一批党内知识分子，以及一批思想较为开明的高

干子女，都称赞江泽民提拔胡德平一事很得人心。

自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後，外界很快就发现这次会议的人事安排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赵紫阳派系基本不安排或不提拔（芮杏文、阎明复等人属於不安排之列；田纪云属於不提拔之列；胡启立属於不得重新重用之列）；而在胡耀邦下台之後，八九「六四」之前曾经一度受压的胡派人马则给以「重新出山」的感觉，特别是胡锦涛和尉健行的冒升及王兆国自福建回到中南海，突出证明的这一点。另外，团中央系统的一批负责干部也在十四大前後分别被安插进人事部、新华社等许多重要部门。

这样的人事安排显然不是巧合。应该说当时的邓小平已经非常清楚「六四」镇压给共产党政权带来了极大的负面效果，但又绝不想在自己生前给这场事件由共产党自己做出新的，公正的评价。所以，他绝不接受杨尚昆、万里等人的建议，让赵紫阳等因为「六四」下台的干部重新浮出水面。但是，他同时又考虑到为了督促江泽民和李鹏不会在他邓小平百年之後不会再遭受一次党内僵化势力的强大压力，必须有一批具备改革意识，在普通党员和民众中公信力又比较好的人进入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层面以利政治平衡。

而江泽民内心也不可能不清楚邓小平的这一想法，所以曾庆红提出「抬胡压赵」的策略後，无疑会令江泽民有「正合我意」之感。江、曾二人都非常清楚，胡耀邦在台上的时候，对於胡锦涛和尉健行、王兆国，甚至温家宝这批人还是很有凝聚力的，乔石与胡耀邦的关系江泽民则更为熟悉。总之，即使从不得罪胡派人马的角度考虑，他江泽民也必须一改他过去对胡耀邦大不敬。

祇要在中南海里混过几年的中共官员都知道，虽然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同被看成改革派的两员大将，但事实上他们两人之间并非铁板一块，在很多问题上都是有分歧的。而在胡耀邦下台的问题上，赵紫阳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所以，江泽民很可能自认为祇要自己对胡耀邦表示一直赞扬，对胡耀邦派系的人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亲切，就可以起到抬胡压赵的作用。

最明显的表现是江泽民在曾庆红的陪同下到海南省视察时，特别在看望武警部队时强调阮崇武是『你们的老部长』，并介绍了一番阮崇武被耀邦同志选中出任公安部长的经过和他在担任公安部长时的工作成绩。

江泽民说的这段历史当然没错，而他没有说出的後一段历史是，一九八七年阮崇武被迫脱下警服改任科委副主任，正是赵紫阳落实自己组织路线的实践步骤之一。而这後一段历史不用江泽民重复，阮崇武也不会忘记。

所以，如果不加分析地看待江泽民在海南的这番表现，祇会觉得江泽民喜欢没话找话，因为海南的任何一位地方领导人和武警干部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省委书记兼省长的大致出身、经历。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江泽民的这番表演，就会发现他的这番废话其实是说给阮崇武本人听的。言下之意，我江核心同胡耀邦一样器重你阮崇武，你在官场上『走麦城』的那段经历，完全是赵紫阳排斥异己的结果。

自此，江泽民『抬胡压赵』的政治手腕已经运用得灵活自如，他身边的智囊们谈论起曾庆红如何就此为江泽民献计献策时，[illegible]

平可谓「青出於蓝而胜於蓝」．

为江泽民起草『独立宣言』

中共关於中央办公厅的职权范围规定中，特别重要的一项就是负责中央会议的准备工作，组织起草文件．按照惯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两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中央全会」至少是每年一次，所以，曾庆红自己入主中南海之後，每年都要投入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负责每次中央全会的组织筹备，特别是文件起草工作．而最後他自鸣得意的，当属一九九四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起草内容．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十四届四中全会，并按照常规，与二十八日的闭会当天对外发表表「会议公报」．「公报」中称：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於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另外，「公报」中也简述了会议《决定》内容的概要．

但是，会议结束後，《决定》内容却一直拖到十月六日才由新华社发出通稿，次日统一见报，中间间隔了八天时间，而江泽民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至今也没有见报．

对比一下「江核心」过去几次重要会议之文件的公开见报时间，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结束後隔了一天，江泽民「政治报告」即全文见报，九三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结束後，也是仅

隔二天，会议《决定》及江泽民「重要讲话」便同时见报．那么，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内容之所以拖了八天时间才正式公诸与众，祇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决定》全文在中央全会通过时，与会者对其中内容要求修改的部分太多，修改後再正式发布自然需要时间；二，《决定》内容引起了某位政治老人，特别是邓小平的不悦，故必须修改至老人满意的程度才敢公开发表；三，《决定》中的关键内容过於敏感，中共高层担心发表出来以後引起与论不安或党内外的骚动，所以才推迟了一段时间．

为了证实《决定》到底是在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笔者在仔细阅读已发表的《决定》全文後，发现其中有一处最为关键的内容，在四中全会结束当天发表的《会议公报》中没有引述．

这段内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取得的巨大成绩包括：「在组织建设方面，恢复和逐步健全民主集中制，废除实际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

这里，用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形式正式宣布「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已经「完成」，等於是向天下昭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接班集体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等於是宣布邓、陈两位「东、西太後」的垂帘听政时代已经结束，「江核心」的政治地位已经从「儿皇帝」转为有职有权的「决策人」．

如此敏感的内容虽然没有引起海外媒体的过多注意，但中共政坛内部却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份洋洋万言的党建《决定》中，几乎所有内容都是早就重复过一万遍．但仍然也没有成为「真理」的套

话，唯有『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这一句才是江泽民等了整整五年才敢出口的『心里话』。

据说，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子女在看到这份《决定》的草稿时，即讽刺说：这分明是一份江泽民的『独立宣言』。

至於《决定》中如此关键的内容到底是经过了邓大人的恩准，还是江泽民擅自行事，北京高干子女圈中持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邓大人在四中全会前身体情况还允许听取文件和工作汇报，在曾庆红送审《决定》草稿时，邓大人看到文中提到关於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益成熟』的说法，认为，『日益成熟』就是『还没有成熟』。曾庆红回去以後便改成现在这个样子。

第二种说法是，邓大人早在四中全会之前即已经处於半睡半醒状态，故对四中全会《决定》草稿根本没有审阅。

第三种说法是，交邓小平『过目』的《决定》草稿同目前公布出来的内容基本一样，而邓小平祇是在草稿上签上『已阅』二字，没有表示赞许也没有表示反对。

无论上述说哪种更接近内幕实情，都必须承认所谓『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从『第二代领导集体』手中完成权力『交接』这句话，是曾庆红挖空心思，替苦苦作了五年『儿皇帝』的江泽民写出的一句最为关键的话语，此话一旦在官方媒体发布的『中央全会决定』中原样刊出，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此话面世之前，中共党史还要被算作『邓小平时代』，而从此话面世的那天开始，中

共党史则正式进入「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之後的第三阶段：「江泽民时代」。所以，邓家子女将此说成是江泽民「独立宣言」，真是恰如其分。

回想四中全会召开的五年前，当邓小平宣布将军委主席一职交给江泽民时，江泽民心里非常清楚自己当时实际处境，不但邓小平本人不甘心真正交权，而且还巷在他江泽民在与邓小平之间安插了杨家兄弟。所以，当时的江泽民不但不敢声言他自己及以他自己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可以「独立思考」、「独立决策」，而且是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声称他这个「军委主席」祇有在杨家兄弟的帮助下，才能「做好工作」。同时，他还特别安排杨尚昆站在六名政治局常委中间合影，并亲自下令各大报刊刊登此照，可谓「谦虚到了极点」。但现在看来，江泽民当时的表现完全是韩信式的「忍辱负重」。所以，无论这句完成权力「交接」的提法在党内引起多大反弹，江泽民和曾庆红都要力排众议，坚持将它保留在四中全会决定的内容之中并公之於众。

大树特树江泽民个人权威

另外，曾庆红在主持起草四中全会《决定》时，力主加进的一处强调江泽民个人作用的内容，据说也在党内引起不小的反弹。这句内容是：「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据说在全会讨论此《决定》草稿时，已经有不少与会者提出这样的提法不妥，似乎又回到了六十年代林彪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及毛泽东死後华国锋自吹自擂的年代，令人想起当年林彪提出的所谓「大树特树毛泽思想的绝对权威」。

无论当时党内反映有多强烈，这份《决定》的核心内容在讨论过程中的阻力有多大，反正是四中全会开过一个星期後，江泽民终於力排众议，要求新华社对外播发的四中全会《决定》内容中，将曾庆红的得意之作逐字逐句全部保

据说《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全文登载这份《决定》的当天，聚体在曾庆红周围的一批「政治哥儿们」奔走相告，声称这是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其重要意义绝不亚於邓小平十六年前主持制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

《决定》正式公布的第二天，《光明日报》便刊登出山西省副省长李泽民的「学习体会」文章，四中全会《决定》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总结成为「六个意识的强化」，其一「强化维护中央权威的意识」，其二是「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文章还肉麻地吹捧说：「强化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领导的意识」，才能「充分发挥党中集中统一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领袖人物对於政党的作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成功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後，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又成功地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处变不惊，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依赖．……实践已经证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爱戴的党中央，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对党的利益、人民利益的爱护．鉴於我们党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交接，党的建设又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持领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李泽民此人也是一个持续术官僚出身，几年前在被提拔为山西省副省长时，就有不服气者讽刺说他『一定是沾了（泽民）二字的光才仕途辉煌』．

十四届四中全会期间，李泽民以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出席．会议刚刚结束，便将他这篇效忠文章送到《人民日报》．据说有《人民日报》理论部的编辑当面挖苦他说：四中全会《决定》的全文我们这些编辑们都还没有看到，目前祇看到的是《会议公报》的内容，可是『公报』中对《决定》内容的概述没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东西．如果我们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党的『机密』吗？

结果，《决定》被全文公布的第三天，李泽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

事後有消息说，曾庆红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即已经在小范围内打过招呼，声称四中全会《决

定》内容是中央今後考察干部的《试金石》，并授意自己的亲信分头联络一批省、部级负责人、示意他们在四中全会之後，要在维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权威』问题上，带头表态．而李泽民想必是被联络到地方负责人之一．所以有《光明日报》编辑讽刺说：过去见到这种文章正好是十八年前的今天，那个时候毛泽东刚死，好多省级领导都写来这种文章向江青表忠心．现在小平同志还在世，就有地方领导急着向江泽民表忠心了．

打出政治前提量避免华国锋下场

李泽民文章发表後，曾庆红所期待的『学习四中全会文件热潮』并没有热起来，而且还有报导说，李泽民的文章在万里等政治元老那里招致非议，认为这样宣传江泽民的『个人作用』，完全是把党的历史倒退回到了华国锋时代，与小平同志一贯强调的『不突出个人』、『领袖是集体』的精神相违背．江泽民身边的政治心腹们，就如此作法也发生了意见分歧，个别意见认为『政治提前量』幅度过大，效果会适得其反．持这种意见者还举出党史上的例子，认为无论是当年的刘少奇还是林彪，都是『政治提前量』的分寸没有把握好，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最後或死无葬身之地，或尸骨无存．但以曾庆红为代表的主流意见却认为，刘少奇和林彪出事的当年，大前提是毛泽东头脑清醒、身体尚好．反之，一九七九年的华国锋就是因为没有考虑『政治提前量』的问题，直到毛泽东病危期间还没有抓紧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以至於自己在正式当上『接班人』後，几乎没有过上一

天有职有权的舒心日子．便很快被政治对手打翻在地．

历史上的华国锋也确实如曾庆红等人所分析的那样．一九七六年毛泽东病危期间，先是毛夫人一伙天天给华国锋气受；毛死後不久，便是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元老人物终日对他进行围攻；待邓小平重新复出後，华国锋这位身兼党、政、军三个一把手的「接班人」竟然可怜到了不敢多说一句话，更不敢说错半句话的地步，政治局一开会便是由他先做检查．

而江泽民本人对华国锋悲剧的深思，还是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工作时期．当时，江泽民曾接待华国锋前往参观，一位随同前往的中央警卫团干部半开玩笑地喊了一声「华主席」，吓得华国锋连说几声「使不得，使不得，这样说会犯错误的」，恨不能冲过去堵住这个干部的嘴巴．

当时，江泽民根本没有可能想到数年後他竟然能够坐到华国锋曾经坐过的位置上，所以对华国锋的那付可怜相仅仅是感慨而已．如今，历史把他江泽民突然推到华国锋当年的位置上，而且面临的政治处境又与一九七六年的华国锋极为相像，自此，他江泽民茶馀饭後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华国锋在毛泽东死後的下场．对此问题，其身边的众多谋士人多嘴杂，出什么主意的都有，但曾庆红所代表的意见最令江泽民信服．曾庆红这派意见认为：既然历史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坐到总书记位置上就已经没有退路可寻．如果现在还不抓紧确立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独立自主形象．总书记个人权威的形象，那么小平同志去世之後肯定还会出现另一个邓小平；

置手下，将他宣传为中共党史上第三位「历史巨人」。

十四届四中全会「独立宣言」正式发表二十多天，《解放军报》上就别出心裁地用半版篇幅发表三张尺雨基本相同，被摄者的姿式几乎一样的「领袖照片」，照片上的三个被摄者分别是不同时代的三个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三张照片的排例顺序是「摄於一九六二年的毛泽东照片横置於报纸的左上方，摄於一九九三年江泽民照片横置於毛泽东照片之下，版面右上角是《解放军报》报头及发行日期，报头下面是竖放的邓小平照片，摄於一九八八年。

从三张照片的选题及整个版面布局来看，编辑人员确实是大费了一番苦心。照理说，到目前为止的中共建政史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不是三任而是四任，毛泽东与邓小平之间还有一个华国锋。虽然无视历史事实的《解放军报》负责人和编辑人员不可能把华国锋同毛、邓、江一起宣传，但该报把这三个人的照片并列排放的做法，给读者的第一个视觉效果就是令人直接联想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之後，大陆各地把华国锋与毛泽东画像并列的历史。

北京政坛有传闻说：这份《解放军报》出笼後，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立刻便有与邓家子女过往甚密的人士向邓朴方、邓榕等人关切地询问：「这种宣传方式很像一九七六年九月老毛刚刚去世时候，你们家的老爷子是不是真的不行了？」氣得邓大公子和邓三公主没有好气地回答说：现在就劝我们「节哀」是不是太早了点？

确实，赶在邓小平仍然在世的前提下，用这种把江泽民与毛泽东、邓小平三人祇分先後，不分

高低的排列方式，除了直接达到将江泽民吹捧成中共党史上的「三位历史巨人」之一的宣传效果，同时也给读者以另一方面的联想，即前任军委主席邓小平也同毛泽东一样，已经是「过去时」，而江泽民这位军委主席才是「现在进行时」，以此暗示中共党史、军史上的「邓小平时代」已经完结，中共政权已经开始了真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纪元」。接下来，曾庆红便为这个中共党史上的「新纪元」，开始了全面的「组织建设」谋划.

号准老邓政治心病对症下药

一九九五年九月底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开过之後，关於是次会议上对於军方人事安排的幕後背景，外界的分析报导文章或仅仅说对了其中的十分之三十，或离谱太远，或干脆与事实完全相悖. 其实这次会议上并未如外界事先传说那样，安排王瑞林出任军委秘书长，亦与曾庆红有直接的关系. 而军委秘书长职务存废之争的来龙去脉，则要回溯到一九九二年十月的倒杨事件才能理出头绪.

早在一九九二年中共召开十四大前夕，邓小平本来已经安排的军委主要领导成员是：江泽民仍以中央总书记名义兼任军委主席；刘华清以军方代表身份进政治局常委，任军委第一副主席；杨白冰以军方代表身份进政治局和书记处，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而杨尚昆则与万里等七十岁以上的元老们一同退休.

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之间，杨尚昆一直是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一

九八九年十一月将秘书长职位让给了他的胞弟杨白冰，「杨家将」自此全面掌控了军队实权．为此，江泽民在成功倒杨之後曾经感慨过一句：我当军委主席三年时间，至今还不知到三座门朝哪里开．三座门是北京城里的一个地名，从五十年代开始便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等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

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以後，江泽民一度在政治上十分被动．但「帝师」汪道涵在「儿皇帝」最危困的时候，及时想出联络党内华东帮和新四军出身的政治元老，从政治上搬倒杨家将的主意，而组织杨家将罪名的秘密运作，则全部由曾庆红负责，具体内容包括杨尚昆支持赵紫阳派第重新出山，意在准备为「六四」镇压翻案，杨尚昆在广州秘密接见赵紫阳女婿，杨白冰借「六四」清洗机会在军内大搞结党营私、排斥异已等等．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则是杨尚昆在多次讲话中，暗示「六四」镇压完全是邓小平作主，企图给他自己「预留政治後路」．曾庆红心里非常清楚，「六四」镇压是邓小平晚年的最大政治心病，最担心的就是他自己死後，也对他进行鞭尸．

本来，邓小平在「六四」事件之後，一方面安排杨尚昆辅佐江泽民，一方面也对他自己去世之後，党内出现第二个「太上皇」的问题有所警惕，所以在江泽民等人鼓动倒杨之前，即已经决定记杨尚昆、万里等政治元老全部退出政坛，同时撤销中央顾问委员会．而在江泽民通过邓质方将曾庆红搜集到的杨家罪状呈上以後，很可能令邓小平不由得回想起他本人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决定调各路野战军前去「拱卫京师」时，杨尚昆就曾表示过调军队进城容易，但对人民军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将会受到何等负面影响，令人担优．

为江泽民搜集打击杨家将黑材料的故事在中南海内外传开後，曾庆红的身价陡然升高，一些过去对他颇有微词的中共元老子女，也不得不佩服曾庆红号准老邓政治心病，对症下药的手段，「真是老辣得可以」。

杨公子目中无人终遭报复

就在曾庆红帮江泽民在老邓那里「对症下药」的同时，汪道涵那边则利用自己的老关系，鼓动了叶飞、张爱萍等一批前华东系统出身的军队元老，集中力量向邓小平逼宫，状告杨白冰反党乱军。而这批华东元老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被曾庆红以「叔叔」、「伯伯」相称，所以曾庆红仅凭父辈为他结下的这层「世交」，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华东帮政、军元老与江泽民之前的直接传话人。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终於同意解除杨白冰军权，安排华东系统推荐出的人选，叶飞和张爱萍的老部下张震替代。同意「倒杨」的同时，邓小平亦提出，因为刘华清和张震都有年龄太大的问题，所以军委秘书长的位置「可以先空在那里，日後在党的某届中央全会上充实军委领导班子时，再作考虑」。

考虑到旬影响，邓小平还提出「杨白冰同志还是要进政治局，这样对尚昆同志也是个交待。」

而这场政治交易的最终拍板时刻，也是中共十四大开幕之时，一切都被蒙在鼓里的杨尚昆公子杨绍明在十四大召开的头一天，还大模大样地胸挂数架德国照相机，在人大会堂畅行无阻，第二天便被警卫礼貌挡了驾，理由是他胸前没有大会组织部门特别颁发的记者采访通行证。

杨绍明其在早在少年时代，因为有一个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爸爸，便可随便出入中南海给毛泽东摄影．邓小平时代开始後，更是因为随意出入邓府而被称之为中共『皇家御用摄影师』．至於中央重要会议的摄影采访已经不是杨绍明是否有资格的问题，而是要看他杨大公子是否有空，是否感兴趣．

江泽民带曾庆红入主中南海後，杨绍明倒不一定对曾庆红个人有什么成见，而完全是习惯性地，从来没有想到过出入中南海，特别是出入中共重要会议场合，还要征得什么人的同意．而曾庆红在中办系统和中央警卫系统的所有下属，对杨绍明的这一特权已见怪不怪．在鼓动邓小平同意『倒杨』之前，曾庆红表面上对如此目中无人的杨绍明从来是佯装没有感觉，但内心的恼怒程度可想而知．所以，邓小平刚刚同意解除杨白冰军权的第二天，曾庆红立刻通知十四大会务和警卫部门：凡胸前没有按规定佩戴出席证、工作人员证和采访通行证者，一律拒之门外．而会务部门负责人一听此令、立刻反应到『杨家将』出了问题，因为当时祇有杨大公子一人享有无须事先请示，无须任何证件，便可随时进出重要会议场合的特殊权力．

至此，曾庆红足足憋了三年多时间，从进京为江泽民帮办开始，便一直不被杨大公子放在眼里的心头怨气，终於找到了彻底发泄的机会．

倒杨後对邓小平敢於说不

「倒杨」成功，是曾庆红、汪道涵帮助江泽民巩固总书记地位的关键之举。因为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九年已经分别发生了邓小平亲自废黜自己选定的两个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的事件，中共内部已经有人因此讽刺邓小平是自断左右臂膀，将自己变成了一具「政治维纳斯」。所以「倒杨」事件发生後，邓小平「卸磨杀驴」的惯伎使得许多过去想借邓家势力一展政治宏愿的人，都开始与邓家疏远。中共政坛的内部与论普遍以为，江泽民、李鹏等人「倒杨」手段再毒辣，都可以理解，这如同战场上两军交战，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一个道理。同时也对邓小平抛弃「杨家将」的行为从道义上进行了彻底的否定。而从邓小平个人来讲，「倒杨」之举无论他事後是否有过後悔，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倒杨」的结果，导致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人彻底失去了控制能力。

中共十四大开过不久，曾庆红封手下心腹说：总书记现在不但有独立决策权，更重要的是使用否决权的的时候，再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事情了。

曾庆红这里说的「否决权」，自然指的是邓小平等政治元老时常向政治局提出的所谓「建议」。所以，曾庆红的心腹把曾庆红的话解释得更白：如令的江泽民已经敢於对邓小平说「不」字了。

而江泽民第一次对邓小平说「不」字，就是在提拔邓府家奴王瑞林的问题上。

本来在决定「倒杨」之前，即已经决定杨白冰十四大之後祇任军委副主席和秘书长，总政主任交给当时的常务副主任于永波。当时，还是江泽民让杨白冰代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与于永波谈了话，让他做好全面接掌总政治部日常工作的准备。同时，杨白冰也将这一决定以口头打招呼的形

级向总政治部下属二级部负责人做了传达：

中共十四大之後，海外有报导妄加分析，说于永波因为在担任总政常务副主任後一直与杨白冰保持距离，所以才被江泽民启用。其实，于永波因为在同龄人中相对资格较老，又因为参加革命之初即开始了，其军内政治宣传的终身职业，而且参加过国共战争和韩战，所以早在一九八七年即被安排成十二大中央委员，一九八八年以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即获得中将军衔，早就是邓、杨两家共同属意的总政治部主任接班人选。

而为了促使邓小平同意「倒杨」，汪道涵和曾庆红还给江泽民出一个主意，那就是主动向邓小平进言，让邓府总管王瑞林接任总政主任，而于永波则继续担任常务副主任兼任军委纪委书记。

江泽民主动如此表示之後，万万没有想到邓小平故意装出不领这个情，反而要求将王瑞林安排在于永波之下，令江泽民一时丈二金刚，不知邓小平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玩阴谋邓家子女不是对手

在再分析当时的邓小平，也许在决定「倒杨」的同时，他心里已经有了让王瑞林等一段时间即出任军委秘书长的想法。试想，当年先废胡、後废赵自断臂膀的作法已令人十分寒心，那么「倒杨」之後，党内外与论疑舞将再次对他邓小平的形象严重不利，此时立刻用自己的「家奴」替换杨白冰，岂不是会遭致更大的反弹——特别是军内各方势力反弹，他邓小平不能不尽量避免.

再者「倒杨」之後，军内也必须先安排资格较老的人物来为江泽民助阵，军人以战功和资历服众，这在哪个国家的军队里都一样，无论是「党军」还是「国军」．对此，连毛泽东都必须适时顺应，何况个人权威总还比毛泽东差着一截的邓小平！

回顾一下中共十一大到十四大之间这十五年之间的中共党、政、军人事更换频率就不难发现，在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搞中途换届或中途增补是老邓惯用的把戏．这四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一届中途不出现人事变动的，必须由党的中央全会「表决」才能对外宣布的军委人事安排也是一样．

所以，有理由认为邓小平在十四大前夕仓促决心倒杨的同时，实际上早已经想好，在十四大开过一段时间後，找机会让王瑞林进中央军委并出任军委秘书长，就像一九八九年增补杨白冰进中央书民处同时出任军委秘书长一样．十四大过後在找江泽民和刘华清、张震三人谈军队的问题时，顺着刘、张两人一再表示要尽快培养接班人的表态话语，邓小平接过话茬，道出了他自己的希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靠你们两位老将树立泽民同志在军队中的威信，加强党指挥枪的宣传教育．等工作理出头绪，一切重新走上正轨的时候，可以在一次党的中央全会上增补军委领导班子，那个时候就以考虑军委秘书长人选了．总之两届党代会之间，要把军委接班人的事情安排完毕．

就在老邓这次谈话过後，大概是一九九四年七、八月间，海内外盛传迟浩田将升任军委副主王瑞林任军委秘书长的「谣言」．其实，这「谣言」或许本来就是出自邓小平之口．

至於邓家亲信或子女如何将这一信息传到国内、党内、军内的比较高层以及海外某本，无论曾夫

红的手下是否侦查得清楚，曾庆红心里也非常明白，这类「谣言」的放出，兴许多高干子女在香港利用「邓小平病危」的假消息炒股票是一样的传播手段和相似的传播渠道，祇是目的各有不同罢了。

对邓家子女或邓家亲信这种利用政治内幕「出口转内销」，企图在王瑞林、迟浩田进入军委拴班的问题上制造「既成事实」的作法，无论是江泽民还是曾庆红，虽然恨得牙根痒，也还不敢邓家子女以「泄露政治机密」论罪。

此时，正在抓紧时间筹备十四届四中全会的曾庆红，利用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汇报全会筹备情况的机会，特别汇报了海外对此次全会议程的种种猜测，并强调海外媒体关於中央军委人事变动的「内部消息」，完全是基於海内敌对势力的政治需要，总想借我们高层人事频繁更动的表面现象，证明我们政权内部不稳。

接下来，江泽民又适时提出，一方面基於干部接班梯队培养的需要，人事上的更动还是有必要，但从政治稳定的大局出发，人事更动每次都不要搞得幅度太大。眼下，加强国务院经济领域领导力量是当务之急的动议。这样一来，军委人事变动的动议无论事先是否有人想过，此时也无法出口。

如此将计就计，正如曾庆红手下心腹所评价：邓家子女玩弄的政治把戏，骗骗香港股民还可以，在曾庆红那里就全都是「小儿科了」。

暗压王瑞林老邓有气说不出

接着，当江泽民便带曾庆红赶到邓府，向仍然未在彻底权问题上吐口的邓小平汇报四中全会筹备情况。因为军委人事安排暂时不动是基於「政治稳定」的考虑，而加强国务院领导力量又是邓小平「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具休落实，所以这种打着老邓旗号否定老邓「建议」的手法，令老邓即使心里明白，也是有气说不出。

接下来，便是四中全会《决定》的最後定稿，以党的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正式对外宣布了邓小平及他所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政治奉命的结束。

据说，江泽民在这次汇报过程中，也特别表示了待一九九五年的五中全会上再进行军委人事更动，届时将会安排王瑞林、迟浩田等同志补充进中央军委，为十五大军委换届提前做准备。因为在此之前江泽民已经遵照老邓的旨意给王瑞林安排了一个上将军衔，如今的这番许诺更令才老邓眉开眼笑，这才比较放心地同意，在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正式宣布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权力）「交接」已经完成。

所以，四中全会公报出台後，有万时身边的人士立刻敏锐地指出：「老邓上当了！」其根据就是军委班子如何交接还没有结果，老邓就被江泽民从「党法」角度堵死了今後再否定江泽民意见的可能。

而从一九九五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出台的军委人事增补的结果看，江泽民在十四届四中全会前确实是不动声色地把老邓玩了一下。

五中全会前夜，江泽民提出的军委委员增补人选，虽然既有迟浩田，也有王瑞林，但却把由他

江泽民亲自提升为上将的张万年排名在迟浩田之前．熟悉中共党内名资排列『学问』者都知道，中共党、军系统，祇有政治局常委名单、书记处书记名单和军委委员名单、是按地位高低排序，而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则是按姓氏笔划排序，唯中央候补委员是按『选举』中的得票多少排序．也就是说：政治局常委内排名第一者，必然是总书记，排名第二者则是政务一把手（地方常委也是一样）．而在军委委员排序中，如今张万年仅仅名列刘华清、张震之後，显然是预示在刘、张两位『老红军』退休之後，要由张万年接替刘华清的位置：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第一副主席．这一来，迟浩田虽然也被安排成军委副主席，但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上，祇能接替目前张震的角色，无法成为政治局党委会内的军方代表．

对江泽民来说，邓小平等政治元老幕後干政的可能已经被从『党法』角度完全杜绝之後，党内对江泽民唯一的制衡渠道，祇剩下政治局常委内的『一人一票』（朱熔基语），所以军委接班队内，谁来出任下届政治局常委，对江泽民至关重要．从治军的角度讲，祇要张万年一人对江泽民表示效忠，万一未来的迟浩田提出任何与江泽民意愿不符的动议，江泽民和张万年两人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足可以令迟浩田甚至再加上什么人，无法逾越『党指挥枪』的阻碍．

更妙的一招是，江泽民虽然表面上没有违背对邓小平的承诺，在五中全会上将王瑞林也安排进中央军委，但具体职务却仍然是个总政治部副主任．所以在军委内的名次排名，祇能放在新任总後勤部长王克之後，按照常规，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除了军委主席、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所谓『三

总部」负责人的排列从来是「司、政、後」的顺序，即司令员（最高指挥机关称总参谋部）、政治部和後勤部．而政治部副主任出任军委委员，在中共军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刚刚开过，海外立刻猜测起新增补的几位中央军委委员具体担任什么职务，因为传全友接任总参谋长、王克接任总後勤部长的任命几天内却对外公开，於是猜测焦点便完全集中在王瑞林身上．当时，甚至有自称内幕消息灵通、可靠的海外亲共刊物，也说王瑞林即将被「任命」为军委秘书长．而事实上中央军委秘书长（包括副秘书）同中央军委副主席一样，是按照党章规定，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决定」的人事事项．而中央军委祗有任命「三总长」及各军兵种、大军区负责人的权力．换个例子说：江泽民可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任命中共中央某个部的部长、副部长，但却不能任命某某人为中央委员或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因为中央委员是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而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则分别要在中央全会上选举或「决定」产生．虽然这些都是地地道道的形式，但既然是「党法」规定的形式，就不能不走．

依此类推，既然五中全会上并没有「决定」王瑞林出任军委秘书长，如果他未来担任这一职务，也是一九九六年六中全会或此後的某次中央全会上的事情了．可见，海外一些亲共报刊的主持人，对中共「党法」中的规定程序也都没有起码的常识性了解．

『党指挥枪』与『仓旨军工』

至於王瑞林被安成中央軍委委員，具體職務却仍然是一個總政治部的副主任，還要從江澤民防止『遲王聯手』，威脅自己對軍權絶對控制的考慮説起。

自一九九四年鄧家子女對外放風遲、王二人要分別接替劉華清、張震兩位『老紅軍』的消息後，海外立刻便有『黨指揮搶』還是『搶指揮江』的評論出現，并立刻被曾慶紅指示工作人員刊録要供中共最高領導層閲訊的《動態清樣》上。

王瑞林其人從一九五四年便開始其『鄧府家奴』生涯，鞍前馬後幾十年，可謂忠心不二，四十多年來，王瑞林日夜跟隨鄧小平，寸步不離。無論是巡幸國内各地，還是周游世界各國；無論是高居金鑾聖殿，還是發配江西工廠，王瑞林始終任勞任怨。當然，最能證明王瑞林與主子既能共享天下，又能共渡患難的還是『文革』下放江西工廠生活的那幾年，雖説在江西實在是没有吃過太多的苦頭，但王瑞林在關鍵時刻所表現出來的忠心不二，感動了鄧府上下。所以，説王瑞林如同《紅樓夢》里賈府上的焦大，在鄧府上占居舉足輕重的地位，的確恰如其分。

在鄧府上，吃喝拉撒等日常生活瑣事當然是鄧小平夫人卓琳份内的事情，而能够在『黨和國家大事』上影響甚至左右(用鄧榕自己的話説是起『咨詢』作用)老太爺的人物，除了鄧三公主鄧榕，就是忠厚老臣王瑞林。至於鄧家其他子女，包括鄧樸方在内，有時都要勞架王瑞林出面説服老太爺。

鄧樸方曾經對自己的知已透露，他有什么重要的想法要同老爺子交流或向老爺子進言，事先總要

揣測一下自己的看法是否與老爺子的想法對路，如果沒有這個把握，但又覺得非向老爺子進言不可的話，祇能先同王瑞林討論，祇要説服了王瑞林，進諫成功的把握就有六、七成了．原因是老鄧不但深信王瑞林對自己從無二心，同時也認為王瑞林比鄧樸0方等在政治上更加成熟．

有人認為，王瑞林在鄧小平眼中比其親骨肉更加可靠，還不僅僅在於他『政治上的成熟』，衆所周知，中國歷史上，幾乎歷代獨裁君主的後代們，都是要么干脆不争氣，『崽賣爺田』，成器者少，誤國者多；要么是『同室操戈，煮豆燃萁』，父皇尸骨未寒，早已内哄四起．

從「孤掌難鳴」的角度考慮，鄧小平有心要由王瑞林出掌軍隊實權，就必須給他安排一個搭檔，而遲浩田同王瑞林「少小無猜，情同手足」的歷史淵源，決定了「遲、王配」是鄧小平最希望看到的局面．

少王瑞林與遲浩田是山東招遠同鄉、同庚，當「兒童團」員和在敵後幾抗日小學認書的時候，即已結下「小無猜」之誼，「參加革命」後，兩人又同在家鄉的招遠省八路軍獨立管開始軍人生涯，而且都是擔任文書工作．

中共建國後，王瑞林轉業地方，遲浩田則長期在二十七軍服役，據説當時遲浩田每次進京，都要前往鄧府與王瑞林叙舊，祇是因為當時遲浩田級別甚低，祇是個團政委的角色，所以還不大可能有機會得到鄧小平的專門召見．

「文革」開始後，王瑞林因為忠心護主而去了江西，護浩田則榮升九大代表、北京軍區副政委

等職，但是，在因為遲在軍中始終沒有上「林彪的賊船」，而且在粉碎「四人幫」時又因為奉命進駐《人民日報》，與同時進駐中央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耿飆一起，在關鍵時刻從「四人幫」手里搶回了至關重要的「喉舌」部門，立刻仕途看好。

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恢復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職務，三個月後，就將遲浩田調到身邊任副總參謀長，主持總參的政治工作，從此，王、遲二人又走到了一起。

一九八五年，遲浩田在中共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為「軍內第三梯隊人選」被增補為中央委員，這證明當時中共高層即已經準備好讓他在「十三大」上接任總參謀長職務。而啟用遲造田的建議，就是王瑞林向鄧小平提示的，八七年，遲浩田順利接任總參謀長，并於次年被册封為上將，王瑞林同時被册封中將。

遲、王之間這段交情，決定了如果能夠實現此二人共同主軍，一是不大她想像誰還能夠離開他們之間的關系；二是「槍指揮江」的局面立成事實。試想，如果遲浩田成為軍委第一副主席，主掌軍委常務工作；王瑞林出任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把持軍隊人事大權那對江澤民這位「軍委主席」來說，與當年受制於楊家兄弟有何區別？

有曾慶紅的政治心腹曾經形容說：楊尚昆和楊白冰是親生兄弟，而王瑞林和遲浩田是拜把兄弟。如果總書記在軍委實權問題上前門趕走楊家兄弟，後門里又引來了一對拜把兄弟，豈不是「才出虎口，又入狼窩」？

正是基於這種既要令鄧小平有苦説不出，同時又要防止再次出現「槍指揮江」局面的考慮，曾慶紅才為江澤民出了一個提升張萬年，壓住遲浩田的計謀，至於王瑞林具體職務的安排，中共政壇內部則有兩種説法，一種説法是，總政副主任進中央軍委，「史無前例」而江澤民就是要有這種令人感覺不合常理的辦法，在黨內，特別是在軍內人為制造對鄧小平政治親信的反感。另一種説法是，江澤民在五中全會的軍委人事更動討論中，藉口防止政治上的負面影響，在王瑞林同志的任命上應該有個過渡，先進軍委，下一步再考慮具體職務安排。而這樣做的目的自然是要吊住王瑞林的胃口，如果他能够在江澤民權術之老道面前表示心服口服，則不排除下一步安排具體職務的可能，軍委秘書長也好，副秘書長也好，總而言之，反正張萬年接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并躋身中央政治局的預備安排已經實現，即使給王瑞林一個軍委秘書長職務，「遲、王聯手」進而「槍指揮江」的局面也已無法實現。

至此，中共黨內、軍內都已傳出議論：一生精於政治權利，擅長搞黨內政治平衡的鄧小平，萬萬没有想到臨死之前在江澤民手里栽了一把。更準確地説，是在江澤民的政治幕僚，曾慶紅等人的手里栽了一把！

中共十四届五中全會開過之後，海外立刻有評論認為，江澤民之所以能够順利完成自己屬意的外人事安排，完全是因為鄧小平已經没有「干政能力」的緣故，其實，當時的鄧小平是否已經成海外所說的「植物人」根本没有必要費神猜測，「遲王聯手」企圖被江澤民、曾慶紅等人識破并

成功[illegible]的關鍵原因，還是在於鄧小平已經在此前一年同意[illegible]的

正好是從曾慶紅調到上海市委工作那年起，鄧小平便持續每年到上海暖冬，曾慶紅則每次都要跟在陳國棟、汪道涵，以及下一屆的江澤民、朱溶基等人後面，前往全家下榻的賓館朝拜，當陳國棟第一次向鄧小平介紹市委「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曾慶紅時，鄧小平還饒有興致的回意起當年與曾山的交往．曾山當內務部長時，鄧小平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經常聽取曾山的工作匯報，回憶到此，鄧小平還慈詳地看著曾慶紅說：那時候你還是個毛孩子．

當時的鄧小平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十年之後，他老好竟然在自己政治生命結束之年，慘遭這個「毛孩子」的算計，且無任何招架之功！更沒有想到的是，十年前當著他老鄧的面，對坐在輪椅上的大太子鄧樸方噓寒問暖的曾慶紅，十年後竟敢把「打擊黨內經濟犯罪」的斗爭矛盾逼向鄧家子女，害得鄧家後代因為擔心「鄧後」也落得當年毛家後代的下場，未等老太爺咽氣，便迫不及待地將孫輩送到美國隱藏起來．

敉黨圖對元老子女恩威并舉

一九九五年春天，隨着周北方及陳希同等人的子女因為「腐敗」問題入獄，鄧小平公子鄧質方灰溜溜撤出香港後，海外一片「江澤民打擊（太子黨）」、中共要「拿（太子黨）開刀」的大驚小怪

也有人說，其實，那位「黨內知識分子」的全部「忠言」內容中，令江澤民的錢杆心腹曾慶紅聽得最痛快、最舒心的正是批判矛頭直指鄧家子女的那段內容，在此之前，曾慶紅早有指示，要求周北方專案組將所有調查材料，周北方的自供狀中，與鄧質方有關的內容全部交給他親自處理，為此，曾慶紅還特別從他主管的中共中央辨公廳信訪局中選派一名副局級干部，并配備中辦機要局的兩名工作人員，在周北方專案組日夜監守，凡涉及鄧質方的材料，專案人員一律不準在個人筆記本上記録，録音帶和周北方的自供材料，一律不得復制、復印，隨時由機要人員集中送曾慶紅處。

有內部人士形容說，從「投鼠忌器」的角度考慮黨國大局，曾慶紅本人對鄧質方的問題也是守口如瓶，但他在控制不住自己情緒時，也曾經在內部場合咬牙切齒地說，有些干部子女的行為簡直就是在挖共產黨的祖墳。

一本《鄧選》制服老鄧全家

但是，正是這位最恨鄧家子女為共產黨掘墓的曾慶紅，親自指示在编選「內參」時一定要「省掉直接對鄧家指名道姓批判的內容，而這正是曾慶紅行事充分為江澤民的處境和地位著想的，政上的老道表現。

曾慶紅非常明白，反腐救黨的行動的開展，鄧小平即使是在能够繼續關心政事的情況下，也無法表示反對意見。在此之前，曾慶紅在審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编選內容時，特別强調要把反腐

傳記的編選以及審閱把關工作，有專門的中央文獻研究史、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負責，而這些中央部級建制的事門機構，都是由曾慶紅把持的中央辦公廳總管。

開始，那些祇懂得執行上級意圖的中辦及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有關部門的人員并沒有看出曾慶紅的用意，待周北方入獄的消息被公開宣布後，才醒悟到曾慶紅不愧是中共前內務部長的兒子，政治道行極深。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的過程，正是鄧家子最為張狂不可一世的一段時間，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曾慶紅已以在背後為他們設計好了「請君人瓮」的政治圈套。為了取信於民，「腐敗、貪污、受賄……該受懲罰的，不管是誰，一律受懲罰。」一旦感覺警告鄧家子女的時機已經成熟，對著鄧質方等人宣讀一段《鄧小平文選》就是了，所以，曾慶紅手下人將他這的這一得意之舉，形容為「一本《鄧選》制服老鄧全家」。

鄧家子女政治輕狂容易壞事

人們還記得鄧小平的三公主鄧榕從一九九四年底到一九九五年初，接連在北京和美國等地接受西方記者采訪的事情。當時，鄧榕顯然是在利用外界對鄧小平壽命的開心，拼命為自己打政治知名度，一些好捧臭脚的人更是在海外撰文，「稱贊鄧榕已經是中共政權內的一顆「政治新星」」殊知鄧

榕在政治上如此輕狂，已經犯了共產黨的大忌，而所謂『政治新星』的說法，更是直接引起江澤民及手下曾慶紅一班政治幕僚的高度警惕.

未來鄧小平去世以後，江澤民權位能够繼續鞏固便罷，如果屆時黨內有人要策劃動搖江澤民的權力基礎，最大的可能就是與鄧家子女聯手，因為鄧家子女手中掌握着江澤民的許多政治把柄，比如由鄧家子女親自整理，江澤民不得不向全黨傳達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已經是一部『潔本』，其中對江澤民和李鵬的不滿，完全刪除，可未來如果因為政治需要，鄧家子女拋出這類東西的可能性不是沒有.鑒於此，曾慶紅為江澤民想出了『先發制人』的主意，即抓緊時間，趁在鄧小平人還在世，黨政政治對手還不敢對江澤民發難的時候，搶先一步行動，先把鄧家子女的經濟把柄抓在手中再說.

一九九四年下半年，無錫鄧斌與北京市國安局合伙騙財的案件事發，曾慶紅即已經覺到這是一個在政治上一箭雙雕的絕好機會.一是可以利用北京市國安局副局長李敏等人的被捕，攻破陳希同在北京營建的政治堡壘；二是可以借李敏之口，供出周北方的行賄問題，并因此達到打擊鄧家子女囂張氣焰的政治目的.

無錫案發後，曾慶紅使出的最高明的一招，就是立即要求此案由中央有關部門，江蘇省和北京市聯合辦案，但所有工作單位在北京的被收審人員，一律押解南京關押審訊，曾慶紅則在中南海里直接遙控指揮.

在此之間，曾慶紅手下的秘密調查人員，早已經掌握了周北方的老婆孩子已經通過北京市國安系統順利移居香港的事實，祇是苦於沒有抓到周北方為此行賄的真憑實據，自然沒有辦法從周氏的嘴里套出鄧質方的事情。所以，眼看李敏在交待問題時妄圖避重就輕，曾慶紅立刻指示，可以直接挑明問題，問他從周北方那里得了多少錢。

而李敏看到自己被關押在南京而不是北京，已經便明白了他的案子已經與政治斗爭直接聯擊到一起了。再加上辦案人員已經把「上面」的意思明確告訴他：不坦白也不要緊，你現在無法說清我們在你家里查獲的八十余萬元現款和銀行存折的來路，法律上還有一條「巨額收入來源不明罪」。

於是，李敏精神防綫的崩潰，令曾慶紅拿到了周北方行賄罪的人證。這才有了前文所說的，中共高層決定對周北方下手。而為此必須要與鄧家打的交道，亦完全是由曾慶紅出面。

抓周北方曾慶紅一手操縱

一九九五年初，隨身帶有各種商務旅行文件，不但出入香港自由，而且隨時隨地可以登機前往多個西方國家（想去臺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周北方，為什么就會那樣從容地回到北京「束手就擒」？一種說法是，江澤民等人經過常委會研究決定拿周北方開刀後，立刻通知鄧辦，同時送上有關部門的全部取證材料以證明「此人不抓不行」。而鄧府上下自然要召開家庭會議緊急研究，結論是為了保全鄧小平老人家的「革命晚節」，鄧質方必須對此保持沉默并不得向任何人走露半點風聲。

第二種說法是，江澤民等人在決定對周冠五，周北方同時下手時，曾專門派中辦主任曾慶紅等人向鄧辦王瑞林等陳情處理周案的必要，并在王瑞林的配合下秘密找鄧質方談話，談話內容當然是舉例說明周北方的經濟問題都是背著其他人干的，為的是特別强調周北方一案同鄧質方毫無干系。於是，鄧質方權衡利弊，也祇有犧牲小弟這一條路可以選擇了。

第三種說法是，中共辦案部門為了讓周北方被捕之前毫無警惕地回到北京，曾請示中央安排由鄧質方出面，編個正當的理由調周北方回京，曾慶紅親自出馬同鄧質方正式談話後，鄧質方祇同意保持沉默并保證不向周北方走露風聲，但拒絕由自己親自出面誘捕周北方。

有熟知內情的人士透露，上述三種說法，都有一定的事實根據，但也都沒有說到事情的源頭。此事的發生過程順序應該是曾慶紅早已在利用自己的管道秘密調查周北方和鄧質方在香港的行動。

利用鄧小平，限制鄧子女

不知是巧合還是確有內在關聯，鄧三公主鄧榕九五年一月份在北京接連兩次接受西方媒體駐京記者采訪後，即從二月三日開始，由鄧家孫輩中最受寵愛的鄧榕兒女羊羊陪同周游西方列國，推銷她的版本《我的父親鄧小平》。當月十二日抵達紐約，十五日，捧場者為她舉行了規模盛大的圖書推銷儀式和記者招待會，十六日，各大媒體爭相報道鄧榕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內容，香港左派報刊更是將鄧榕在美國的表現評價為「不愧是新一代的政治新星」。同日，鄧質方在香港商業搭檔，自稱與鄧質

方「一筆難寫兩個方」的周北方被捕下獄的消息被一家臺灣媒體和一家英文媒體搶先披露．

其實、周北方在此之前的一個多星期即已經被收審，辦案人員當時接到的指令是嚴格對外保密．北京的一位「太子黨」成員透露，本來剛剛決定收審周北方時，曾慶紅要求屬下至少要保密到三月份的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例會結束之後．而之所以突然改變主意，完全是因為鄧榕在法國、美國等地的輕狂表現，令江澤民及其手下人馬感覺忍無可忍．特別是香港左派報紙亂捧「政治新星」的評論，無形中使鄧榕的風頭壓得中共所有領導人都顯得黯然失色，曾慶紅這才安排下屬，立刻將周北方被捕的消息透露出去．

這位「太子黨」成員還透露說：因為鄧家子女適時抓住海內外各界對鄧小平健康情況的特別關注，經常利用自己、「權威發言人」的地位隨時吸引全世界媒體對他們全家的關注，鄧榕更是時常以「鄧小平代言人」自居，動徹透露一點「自家新聞」，曾慶紅在自知無法對鄧家子女如此表現進行約束的情況下，干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自己的政治心腹中，專門安排人選與西方和港、臺記者保持聯系，平時提供一些真真假假，無礙大局的「內部消息」，關鍵時刻便故意「泄密」．

周北方下獄不久，海外便刊出鄧小平夫人卓琳自殺未遂的報導．因為在此之前若干年里，關於鄧家的新聞，特別是鄧小平健康狀況的「可靠消息」大都被後來的事實證明可靠程度十分有限，所以這則卓琳自殺的消息雖然也有幾家媒體轉載．但相信者不多，而恰恰這條消息却是真有其事．卓琳當時因為吞服過量安眠藥而送進三零五醫院急救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卓琳住院期間，江澤民、李

顯等人均親自前往探視過，并當面解釋「周北方的經濟犯罪確實是（個人行為），與質方無關」.

海外披露這則消息時，卓琳已經康復出院，而下令傳越出這則消息的，仍然是曾慶紅.

接下來，曾慶紅繼續采取的手段更為老辣. 有消息說，曾慶紅一是決定將周北方交待出的所有與鄧質方有牽連的內容，統統封存，不準對外曝光；二是在對無錫案的一伙人陸續進行刑事處理時，故意把周北方的處理向後拖. 之所以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用鄧小平，限制子女」.

所謂「利用鄧小平」，是因為江澤民要想坐穩他總書記的寶座，不利用鄧小平的余威，不繼續打着鄧小平改革開放和發展經濟的旗號，簡直無法想像. 但是，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江澤民已逐漸對鄧路綫的角度，悄悄作出些「策略性」的變動，且立刻引起人們的警覺，如果再公開給鄧家子女難堪，政治後果會變得非常棘手.

而鄧家子女也正是看明白了這一點，所以無論是鄧榕的對政治性講話，還是鄧質方的經商行為，都是有恃無恐. 為些，公開對他們奈何不得，而私底是又要達到對他們進行有效限制的最好辦法，當然是要抓到實實在在東西，以利與鄧家子女討價還價. 簡言之，針對鄧家保險箱里存有鄧許多講話，特別是在政治上對江澤民特別不利的講話録音或原始記録稿，江澤民大管家曾慶紅保險箱里就要存有在形象上對鄧氏家族大為不利的有關內容，比如周北方交待材料里所有牽涉到質方經濟問題的內容.

太子黨成員被分類排隊

毫無疑問，雖然《鄧小平文選》寫明了如果他自己的子女違法亂紀，同樣也要接受黨紀國法制裁，但無論鄧質方在周北方的案件中牽涉有多深，祇要老鄧在世一天，周北方的命運就不會落到鄧質方頭上。但即使這樣，還是激起了一大批經商「太子黨」成員的强烈反彈，雖然鄧家之外的衆多高級干部子女，特別是政治元老子女平時與鄧家關系并不親密，甚至老死不相往來，但眼看背靠鄧家的周北方竟然被抓進監獄，其他經商「太子黨」無疑會有唇亡齒寒之感。而這批勢力如果聯合起來，對江核心地位的威脅也不可小看。

所以，曾慶紅在打擊、警告一批經商「太子黨」成員的同時，就必須争取這個階層里的另一部分成員，聚攏在自己周圍。基於這種想法，一九九五年周北方被捕後不久，曾慶紅便專門組織了個討論干部子女教育問題的小型座談會，對京劇有特殊偏好的江澤民到場發表指示時說：大家可能都知道那句「洪洞縣里没好人」的戲文，現在這個問題（指干部子女教育問題）再不抓，老百姓就要引用這句戲文來形容我們共產黨的干部子女了。

大概從一九九五年年中開始，江澤民的一句名言「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常常被中共報刊在强調經濟效益和環境保護等問題時引用。其實江澤民首次說出這句話時，談的完全是政治而不是經濟，是用這句話形容一批中共元老子女不惜敗壞共產黨的「祖傳家業」，斷了以他江澤民為首的

接班集體的後路.

江澤民還表示說:那些趁經濟轉型之機不擇手段地瘋狂占有,敗壞黨和人民政府形象的干部子女.特別是黨的在位和不在位的高級干部子女,其行動其實是在迎合國內外的敵對勢力.各種敵對勢力從「理論」上和所謂「世界潮流」的角度斷言共產黨政權將不再長久,而這些在經濟上違法亂紀的干部子女,無論其主觀願望是什么,其違法亂紀,挖共產黨牆角的行為,就是讓敵對勢力的一厢情願成為現實.

根據江澤民的這些指示,曾慶紅等人已經開始着手實施對掌握着重要政治、經濟實權的干部子女進行分類排隊.要求對那些在經濟上有嚴重問題者,視程度不同給予警告、調離經濟部門實權領導崗位,和黨紀、政紀直至法律處分;對那些在政治上對共產黨領導的生命力和持久性持懷疑態度者,西化思想嚴重,甚至與社會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政治敵對分子不能劃清思想界限者,要提防和限制使用.

願與共產黨同命運加速提拔

同時,對在復雜國內外勢下,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仍然保持清醒頭腦,自覺自願將個人前途與黨的未來、社會主義事業前景緊密聯繫在一起,而且確有一定領導工作能力者,應根據其各自事業、經歷,分別在黨、政、軍各級領導崗位上逐級培養提拔.簡單一句話,就是那些不為全民經商

大潮所吸引，一心一意

根據這一部署，從一九九四年上半年開始，有一大批分別在任職於黨政軍界的「太子黨」成員或被迅速提升或委以重任。比如賀龍的兒子由少將晉升中將；習仲勳的兒子由市委書記升為省委副書記；萬里的兒子由北京市調進國務院；行政級別由正局升為副部；彭真原在廣州工作的一個兒子也被調進北京擔任副部級職務。類似的例子還能舉出很多。

而且，直接聚攏在曾慶紅周圍的，也都是一批「太子黨」的重要成員，特別是在軍界內任職的一批人。最典型的是原在總參二部下屬單位任職的陳知涯（大將陳賡之子），現在已經進入江澤民的高級幕僚層，平時分管在曾慶紅與汪道涵之間的政治聯絡，溝通這曾慶紅與軍界的關係。陳知涯同時又是中共軍界目前紅得的發紫的副總參謀長熊光楷的主要心腹，也是張震和張萬年非常看重的「軍事外交人才」。由此可見曾慶紅在拉幫結派方面是如何的工於心計。

但如此劃分陣營之後，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即許多高級干部家庭中，特別是那些政治元老家庭中，子女們都不約而同地進行了「革命分工」，比如鄧家兒子經商、女兒從政；陳家長子從政、次子經商；薄、萬、楊、李（先念）、習等家族里也基本如此。這樣以來，他曾慶紅在「太子黨」階層中拉攏一批、警告和打擊一批的設想幾乎没有可能實現。怎么能够想像，上述元老家庭中立志從政的子女，會同正在瘋狂經商的兄弟姐妹們「劃清階級陳紅」？

而且，這種家族內部的「革命分工」，恰好説明他們中間的立志從政者，并非曾慶紅所希望的那

様，願意與工產黨政權「同生死，共命運」，而是個個都為自己家族安排好了「進可攻，退可守」的未來計劃．每個家族里出現一至數個子女大舉經商，瘋狂撈錢，說到底是為了應付共產黨一旦垮臺的「不時之需」．而家族里同時還要有人在黨政軍界謀取職位，目的則是共產黨政權如果還能繼續堅持，那么自然可以利用自己的重要職位，隨時保證自己的家族里的經商成員不致於落得周北方的下場．

公道地講，起碼曾慶紅本人是中共「太子黨」成員中決心與共產黨政權同生死、共同命運的一個．據非常接近他的人士講，他的父母都是共產黨里少有的清廉干部．曾山早逝，但生前對自己子女的嚴格要求非常苛刻，五十年代初接管上海時，自己的大女兒從鄉下進城，曾山祇允許她找個紡織女工的工作，鄧六金雖說過去過去曾在自己兒子的政治前途問題上頻頻過問，但她的幾個後代好像還同有一個下海撈錢的，可惜的是，整個「太子黨群體中，像曾慶紅這樣一心維護共產黨利益者，實在是少而又少，他鼓動江澤民直接警告黨內退休元老要教育好自己的子女，「不要做有損於自己政權利益的事情」，豈不知問題并不像「子不教，父之過」那樣簡單，各位政治元老家庭內部的「革命分工」，於其說是「不約而同」，不如說是「各懷鬼胎」更為準確，而正是這些政治元老家庭內部的「革命分工」才迅速加劇了整個共產黨政權以「權錢交易」為主要特徵的內部腐敗，從而自然加速了共產黨政權自身的没落過程．而對這樣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局面，他曾慶紅借分化「太子黨」的辦法救黨圖存，恐怕也是收效甚微．

中辦越權插手紀委事務

在抓周北方警告鄧家子女的同時，曾慶紅的另一得意之作就是協助江澤民，攻破了專與上海幫對著干的北京幫。

一九九五年初自鄧小平公子鄧質方在香港經商的搭檔周北方下獄及北京市官員集體貪污被中共自動對外曝光後，江澤民的政治行情在海外與論中陡然看好，認為過去輕看了江澤民，「没想到他還真有兩下了」。而事實上江澤民這段時間內表現出的「反腐救黨」決心，首先曾慶紅和江澤民身邊其他販個幕後高參共同點拔的結果，用這種抓出個把「大老虎」示衆的作法，除了替整個共產黨政權回籠民心的作用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籍此在黨內高級干部群體中起到强有力的震懾作用，而這個所謂的「震懾作用」又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用打擊「太子」經商集團外圍勢力的手段和在高級干部中揪出幾個腐敗典型的作法，起到警告「太子」集團核心勢力及「教育大多數干部的作用（用江澤民的話説是：「抓出腐敗典刑，挽救大批干部」）；第二層意義則是借反腐敗之名，行維護中央權威和打擊中央與地方都存在的政治離心力量之實。所以，反腐敗，特別是在高層中間開始的反腐敗，已經成了江澤民手中黨同伐异的殺手，而具體江澤民出謀劃策并暗中掌握一批高層腐敗案件「以備不時之需」者，都是江澤民的大内總管曾度紅。

自九三年初曾慶紅被正式安排為中辦主任後，立刻擔負起對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臺灣工作辦

公室、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央編譯局等中共中央直屬機構的「協調領導」任務，在對內宣傳系統、組織系統的；審干工作上也插進一手．由於中央政法委雖也是中共中央直屬機構，但該機構負責人任建新本人在中共黨內的表面級別和地位比、曾慶紅高，曾慶紅不好直接同政法發號施令，於是便采取代表總書記直接聽取公安部、國安部工作匯報的辦法，插手司法工作．

這一來，除了國務院系統的經濟工作和軍委系統的工作，其他各方面曾慶紅幾乎樣樣染指，儼然成為江澤民之下的「副總書記」．另外，曾慶紅還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為基地，組織一批對權威主意情有獨鐘的中青年政治學者，定期組織所謂「課題研究」，給江澤民出謀劃策；以「調研」為名，為江澤民秘密搜集各方面的情報，其「調研」範圍上至國務院、軍委系統，中至各省、市、自治區的黨政機構，下至各地知識分子，特別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動向……無所不包，曾慶紅曾經在中辦系統的工作會議上公開講：我們這班人的工作職責主要有兩項，一是當好助手，二是當好參謀．

按照中共黨務系統的序列，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會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的機構，級別當然在曾慶紅的中央辦公廳以上，中央辦公廳照理也沒有權力插入中紀委的日常工作，就像中央辦公廳無權插入中央軍委工作是一個道理，但是，江澤民藉口中紀委沒有黨務辦公機構，要求中央辦公廳兼具中紀委辦公廳的職能，名義上是統一處理中紀委的行政機關事務，實際上却是要曾慶紅直接插手中紀委的業務工作．這一來，曾慶紅便「名

正言順』地聽取中紀委的日常工作匯報，并不時向中紀委布置工作任務．

同時，曾慶紅還利用他掌管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借政策調研為名，行秘密調查之實，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迅速而直接地掌握了大量地方諸侯及國務院實權部門的貪污腐化、索賄受賄等經濟犯罪事實．對於先由中紀委掌握的案情，曾慶紅更是藉口『統一研究布置反腐敗工作』，專橫地要求中紀委隨時向他匯報工作進展．

現任中共中央紀律檢察委員書記尉健行本人是中共高層中難得的清廉干部，但頭腦却不很清醒．此人過去雖然在陳雲、宋平等人那里不被看好，但因為為人本份、從無野心而被江澤民認為是可以信賴的干部．但是，可以信賴不等於可以依靠，原因就是尉健行本份過頭，衹知道埋頭反腐救黨，不懂得如何利反腐敗幫助江澤民達到政治目的．與其相比，曾慶紅在這方面則是行家里手．

江澤民上臺後，在行使其『領導核心』之權威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最頭痛的問題就是所謂『地方諸侯』不聽指揮的問題．而凡是敢於對江核心明頂暗抗的地方諸侯集團無非有三大特點：一是所在地區經濟地位特殊，以廣東省最為典型；二是所在區政治地位特殊，以北京市最為典型；三是所在地區與中央一些負責人及政治元老的關系特殊，以山東省和四川省最為典型，而這些地區的干部班子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外派干部很難立足，或者干脆打不進去，比如廣東省和北京市的領導班子里，幾乎是清一色的當地人．

針對這種情況，自中共所謂『既打蒼蠅又打老虎』的口號一提出，曾慶紅就給江澤民出了借反

腐敗之機，分化、打擊地方諸侯集團的主意．而老實本份的尉健行哪里想得到這一點．

另外，尉健行辦案也是嚴格按照中共紀律檢查工作的傳統規格和手續進行，將紀檢部門的業務與司法部門的業務嚴格分開．在工作方法上則拘泥於「依靠各級黨委」、「堅持群衆路綫」「開展政策攻心」等傳統模式，而曾慶紅一插手這一工作，便暗示手下人「手段服從於目的」，一是對涉案干部大搞秘密調查；二是必要時避開涉案干部的同級黨委和紀委．

攻破北京市委曾慶紅立頭功

按照曾慶紅的「合理解釋」，如果通過同級黨委調查腐敗案件，一是很可能因為官官相互而不了了之，而是同級黨委很可能會對涉案人員通風報信甚至搞攻守同盟．所以，無論是對歐陽德的突然逮捕，還是對王寶森的突擊談話，事先都沒有通知同級省、市委．

北京市一連串官場腐敗案陸續曝光後，因為是尉健行帶領中紀委工作組進駐了北京市，尉健行人又被安排了北京市委書記職務，故餐界都認為北京方面的腐敗案都是尉健行一手主抓，但事實上由尉健行一手主抓已經是決定讓陳希同下臺之後的事情了．而在此之前，曾慶紅通過自己手下的秘密渠道，在國家安全部門的配合下，已經先後掌握了十六件北京市的腐敗大案，件件都是涉案金額超過千萬元人民幣的所謂「大案」、「要案」因為周北方招供和北京市長李其炎前秘書李敏坦白而向外界曝露的，關於王寶森涉案範圍及關於陳希同之子陳小同涉案範圍的內容，僅僅是曾慶紅手中證

據的一部分.

所以，攻破令江澤民長期頭痛不已的北京市「獨立王國」，實在是曾慶紅立了頭功.

據北京政壇人士分析，依王寶森本人的經歷和性格而言，他之所以敢在前幾年時間里進行大手筆的經濟犯罪，就不可能是那種一遇風吹草動便心驚肉跳的草包飯桶. 所以，他之所以在被曾慶紅的心腹談話之後便心理防綫徹底崩潰，就是因為此前根本没有想到中共高層會用超乎尋常的手段開始這場所謂的「反腐敗」斗争. 同時，王寶森過去之所以敢為所欲為，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背靠陳希同這棵「大樹」，所以，一旦他明白拿他關刀的目的就是要讓陳希同難堪，祇能以死了之.

目前北京市委内部流傳着一種說法，即王寶森之死曾令江澤民、曾慶紅等人懊腦不已，按照曾慶紅給江澤民設計的如意算盤，原本是要以王寶森突破口將北京市的經濟案件徹底查清楚，然後以死刑或者死緩的刑事處理王寶森，這樣，即能够在老百姓那里得分，又能够將陳希同徹底搞臭.

另外，曾慶紅還有一個如意算盤是，祇要能够攻破王寶森的心理防綫，令他坦白出近些年來所有與北京市方面有聯系的經濟還法，還紀活動，必然會順藤摸出許多中共高級干部，特别是黨内政治元老的親屬、子女、秘書們的經濟問題. 本人即是元老子女出身的曾慶紅當然不會計劃將這批人全部打光，但祇要把他們的經濟犯罪證據抓在手，就不用再擔心這批人在政治上與江核心唱反調，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向這些人暗示手中的證據，令這些人明白祇有全國維護江核心才是唯一出路.

但現在王寶森一死，不但許多案情調查無法深入，令曾慶紅的計劃空了一部分，更令江澤民和

曾慶紅都氣急敗壞的是，王慶森的突然自殺令中共政治局不得不采取臨時行動，馬上為陳希同安排繼任：在倉促應戰的情況下，喬石提出尉健行接手北京市委，江澤民拿不出理由反對。

打歐陽德為敲山震虎

另外，在北京市王寶森案事發後之前，曾慶紅派出的中央工作組已經以調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歐陽德的犯罪問題，歐氏是土生土長的廣東省人，參加中共後的第一個頂頭上司便是現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林若，當時林若是廣東東莞縣委書記，歐陽德是縣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林若高升後，歐職德長期主政東莞，直到東莞建立省轄市後升至市委書記。林若自廣東省委書記退居二綫出任省人大主任不到兩年，即將歐陽德安排為省人大副主任，此時歐氏已經整整六十歲，已經到了中共副省、部級以下干部的退休年限，而省人大雖然是所謂「二綫」職務，但對歐職德來講，却是退休年齡不退休，行政級別反而升了一級（省人大副主任的行政級別同副省長一樣），由此可見林若對歐陽德的器重。

分析到此，就不難看出，曾慶紅給江澤民出主意拿歐陽德開刀，實際上是要給林若難堪，自然也是給整個廣東省的地方諸侯勢力難堪。

有人分析說，歐陽德的經濟案可大可小，意思是祇要林若今後保證給江澤民面子，歐陽德至少不會上斷頭臺，誰都知道，林若其人雖然過去在黨內職務上是葉選平的上司（林若是省委書記，葉

選平身為省長，但黨內職務祇是副書記），但在行動上從來是對葉選平唯命是從，對中央號令則可聽可不聽，葉選平上調中央後，林若雖然也退居二綫，但新任省委書記謝非在林若面前從來沒有「不」字，在中央大員面前，比如在朱熔基面前，則處處維護本地利益，甚至不惜與中央指示暗中對著干，所以，打歐陽德，説到底仍然是首先政治上的「敲山震虎」之考慮．

清理內貿系統震懾國務院

北京和廣東的地方諸侯被警告或干脆被動了組織手術之後，曾慶紅的打擊矛頭轉而指向了國務院系統，第一步便是拿國內貿易部開刀，從九五年三月初開始，國內貿易部機關內及在北京之外的派駐機構中，先後有一批干部被司法收審或停職交待問題，總涉案人數説法不一，有説已經達到六十余人，有説已經超過百人，而且有近十名司局級干部．

對而內部的清理，其背後的政治目的并無清理地方領導班子那樣復雜，至少在九四年一年時間里，內貿內部確實有一批人利令智昏，利用聽權做了一大堆傷天害理之事．但是，這一清查行動本身也是由曾慶紅主導．而不是由尉健行的中紀委或任建新的政法委主導，早在這場反腐敗運動的動員階段，江澤民曾經指示中紀委、國務院監察部和政法系統密切配合．這種配合按照過去的傳統程序應該是，紀律檢查系統或國務院監察部門在審理違紀案件時，凡認為觸及刑法者便交由上面討論，決定是否轉交司法系統進行刑事處理．而現在因為曾慶紅主管的系統一再越權，中紀委和政法

委實際上已經成為曾慶紅那套系統屬下的「執行機構」，凡涉及中央或地方重要領導干部、高級干部及政治元老子女的經濟案件，都是先經曾慶紅之手篩過，再根據政治斗争的需要決定先誰、後搞誰、威脅誰、拉攏誰，誰然後才將決定拋出的案件和典型人物交由中紀委系統或者政法系統具體查辦．至此，曾慶紅已經是權傾朝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支持石油系統查辦王震公子

一九九五年十月前後，鄧小平二公主鄧楠曾以國家科委副主任名義率團到美國訪問．所到之處，無論是記者還是與其座談的各方面人員，找個話茬兒就往「鄧小平之後」的敏感問題上扯．鄧楠開始的對策是或輕描淡寫，或叉開此話題，但到參觀麻省理工學院時，可能是因為被這個問題搞得實在不耐煩了，突然没好氣地冒了一句：我們家老頭子過世以後，我們這些人是什么下場還不知道呢？

而在此之前的幾個月里，一是鄧質方從此再没有到香港商場上拋頭露面；二是鄧榕再不敢以「鄧小平代言人」自居；三是鄧小平最喜愛的鄧家孫輩羊羊已經被悄悄送到美國一所私立中學就讀，顯然是要趕在鄧小平咽氣之前就安排後事，衆多信息表明曾慶紅利用周北方的經濟問題打壓鄧家後代的作法，確實收到了預期效果．接下來，曾慶紅又把整治對象，瞄準了依仗與鄧家開系為所欲為的王震公子身上．

一九九五年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深圳東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顯旋在深圳香蜜湖高

爾夫球場被中共前國家副主席王震的長子王兵等人持槍公開綁架.

此事發生後，驚動深圳當局和中共高層. 在深圳當局的介入下，直到二十七日陳氏才從蛇口南山區的暫且禁地點被釋放回家.

事後，大批港澳臺媒體對這個所謂「六·二四」綁架案極盡全力追踪報導，對此事件的前因後果做了詳細調查:

被害人陳顯旋時年四十余歲，比王兵小許多，他是中共另一元老，在王震之前擔任過一屆國家副主席的馬蘭夫的孫女馬遼娜的丈夫，八十年代初曾任深圳原野公司董事長彭建東的司機. 簡言之，中共前國家副主席的「太子」持槍綁架了前國家副主的「孫附為」.

王兵其人七十年代時與他的弟弟王軍都是在軍隊任職，中國國際信托總公司成立後，王家兩兄弟先後進入此間公司，正所謂「亦軍亦商」. 當時，王軍以中信總公司副總經理名義兼任中信公司深圳公司董事長，王兵與吳小蘭（葉選平之妻）一度任過副董事長. 到一九九五年時，王兵已經是大校軍銜，王軍的軍銜據比王兵要高. 如果按職務排座次的話，理應如此.

一九八三年三月，中信公司、中國海洋航空公司、中國直機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和深圳通實業公司等六大股東合股成立了一個中國海洋直升飛機公司（簡稱中海直）. 該公司剛剛成立時，在深圳四川大廈十四樓挂牌，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叫馬相持. 不久王兵接任了該公司董事長的兼總經理的職務.

早在曾慶紅主持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聯絡部工作時，即已經有美國的大公司與這家公司及中國南海石油聯合服務總公司合資，但因為找油的希望不大或成本過高，美國公司後來收回了投資，而後來由王兵所領導的中海直表面上是發展旅游業，如開辦直升機觀看深圳、香港市容活動，但收益甚差，直升機公司真正的發財門路還是做買賣。中國大陸曾有一句話形容皮包公司，「除了飛機大炮，樣樣都作」。而據說王兵的公司是「飛機大炮，樣樣都作」，言下之意是從事軍火貿易。

在深圳，早就有這方面的傳聞，當地的有關部門也曾想摸摸「老虎屁股」，但當時尚未下手王震便到了深圳，把當地政要罵得狗血淋頭，清查王兵的打算也就再不敢有了。

王兵進入中海直擔任副總經理期間，前文說的陳顯旋及時另攀高枝，跳槽至中海直當了王兵的司機。不久，因為服侍王兵得體，深得信任，被委任為中海直下屬子公司新星公司的經理。

此後，王兵顯然是沒有經過自己公司的上級股東同意，擅自決定向陳顯旋拔出大筆公款供其經營，没想到陳顯點一虧再虧，最後干脆賴帳不還。

於是，在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為首的六家上級股份公司的壓力下，一再向陳顯旋追討債務。

王家公子就怕曾慶紅

王兵與陳顯旋的債務糾紛始於九十年代初期。當時，陳氏在新星公司虧空了款項的情況下，却又與深圳市政府當局合資成立了一間東輝實來股份有限公司，更令王兵忍無可忍。而東輝公司的董事長

是葉選平妻子吳小蘭，陳顯旋以「孫附馬」的身份有和葉劍英元帥家族的後臺為雙重背景，開始對王兵態度傲慢，出言不遜，令王兵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同時，又因為當時的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秦文彩堅持追回陳顯旋的欠款，王兵便代表中海直於一九九一年三月正式向北京檢察機關舉報，當年六月，陳氏即被南頭公安局以貪污罪名拘留審查。但過了一天，一個叫李珩的江輝公司董事即給深圳市公司局長梁達均打電話，梁氏大驚失色，立刻著令下屬公安分局的一名處長擔保陳顯旋獲釋。

中共公安部門的中級干部為本部門的嫌犯擔保外出，在公安部門沒有先例，陳顯旋從此更加氣焰高漲，認為靠山夠硬。

當時，吳小蘭挂名東輝公司董事長，在深圳市祇是時任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的副手。而東輝公司董事李珩却是李灝的愛女。試想，當時呈小蘭的丈夫葉選平是廣東省長，李灝除了主掌深圳特區還兼任廣東省副省長，在此之前則是國務院副秘書長，在高層的關系盤根錯節，另外，李灝當時的丈夫是中共元老、前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的愛子劉會遠，當時國家安全部駐深圳站的負責人，據說國家安全部部長賈春旺都經對他忍讓三分，整個東輝公司就是這樣一種復雜的背景，深圳市公安局怎敢對陳顯旋下手？

此時，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那里的總經理換成了鐘一鳴，而無論是秦文彩還是鐘一鳴，當年都會與曾慶紅在石油部門供事，而他們的共同上司則是余秋里和張文彬。

把這些復雜關系簡單概括一下，那就是：過去的石油部門里，張文彬之下有曾慶紅、鐘一鳴、

秦文彩等。如今的曾慶紅在中國大陸已經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張文彬則仍然直接控制和指揮着秦文彬和鐘一鳴。所以，石油系統的現任主管們平時不會麻煩曾慶紅，但遇到中共元老子女相互內哄而引發的巨額財務糾紛問題，就衹能通過張文彬請求曾慶紅為其撐腰。

出以私情，曾慶紅當年在張文彬手下獲益甚多，至今仍尊其為『老前輩』，衹要張文彬到中南海求見，從來没有吃過閉門羹。出以公心，對紅色政權的階級感情與生俱來的曾慶紅，僅僅出於對紅色江山的高度責任感，也絕不能眼看著王兵這樣的『敗家子』，在揮霍黨產和同時也把共產黨僅存的那一點『合法性』和『權威性』當成破抹布弃之一旁。

張文彬帶著鐘一鳴等人從曾慶紅那里討得明確支持發，回到深圳便向王兵後去通知，告訴他誰借出去的錢誰負責如數追回，不然便以『擅自挪用公款』罪名論處。聰明的王兵立刻明白這次上面的來頭實在太大，自覺自己理虧故壓力沉重，另一方面也確實對陳旋恨之入骨，情急之間，竟不顧共產黨的名聲，公然玩起了黑道手法。

鄧、王結盟，斗不過曾慶紅

王兵在深圳無法無天、公然為匪的惡劣行為雖然被中共嚴禁在國內媒體上加以報道和評債，但現代社會的通信設備仍令此事實在北京政、軍、商各界不脛而走。而黨內人士評論此事時，無不認為王兵之所以較一般高干子女相比，如此現加不知收斂，如此公然做出給共產黨政權拆臺的惡行，

與其說是依仗他死去老子的余威，不如說是憑借仍還在世的鄧小平淫威更準確．王家後代表現出比他們的父親在世時十倍的瘋狂、百倍的專橫，應該說與鄧家上下，特別是鄧三公主鄧榕對王震及王家子女的公然吹捧有直接關系．

王兵在深圳公然干起持槍綁架的勾當曝光時，已經很少有人還記得鄧小平女兒鄧榕以毛毛筆名撰寫的《緬懷胡子叔叔》一文，當時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刺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報上．

當時，外界對此文有過報導却無深刻分析，但曾慶紅手下的一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却一針見血地指出：鄧毛毛的這篇文章，與其說是為死去的王震本人樹碑立傳，不如說是為活着的王震子女鋪路搭橋．此話傳到曾慶紅的耳朵里後，曾慶紅衹是囑咐了一句「這種話不要在外面亂講」，其內心顯然是十分贊同這一看法．

仔細分析鄧榕這篇文章的內容，確實如此，她在文章里將王家三兄弟恨不能形容成西方文學史上著名的「三劍客」，說王兵、王軍、王之三人「個個有膽有識，在朋友中口碑甚佳」

所以，王兵公然在深圳綁架商場對頭的消息傳到北京，還是那位中共文獻研究室的研究員立刻諷賴說：正如鄧榕文章中所說，王震之子確實有「膽」，而且已經膽子大到公然為匪的地步了．

在鄧榕的整篇回憶文章里，雖然許多贊美之處的描述都不大合於中國大陸人的閱讀習慣，比如胡子叔叔露出了他那「著名的笑容」之類，但相比於大多數中共官方的人物回憶文章，還是不乏有細節描寫上「生動」和生活化」的一面．比如王軍向鄧榕表功的一段描寫．王軍在鄧小平二次復出

前夜，曾對鄧榕開玩笑說：「我們這么樣冒着風險為你爸爸通風報信，等你爸爸出來後，我們也得要個一官半職的呀」。

鄧榕回家向父親轉述，鄧小平笑着說：「可以，可以，現在要什么都可以。」

「細節上的生動確實沒得說，同時這種描述客觀上也絕對起了為王家三公子揚名，及對外宣稱鄧、王兩家關系「密不可分」、「牢不可破」的作用。

而且，為使王家三兄弟在他們的父親死去後仍能勢力不減，鄧榕已經把鄧家，特別是她本人與王家的關系之「鐵」，赤裸裸地躍然紙上，其文章中毫不隱晦地說：「我和王家三兄弟，便成了無話不談，無事不商，困難之時甚至可以兩肋插刀的莫逆之交。」

衆所周知，共產黨執掌中國大陸政權幾十年來的習慣行為準則人來是要把「身行惡」置於「口言善」的前提之下，其黨內的「幫規」更是要以「原則」、「黨性」之類的冠冕堂皇的詞匯包裝其臺面之下的拉幫結派和爾虞我詐，而鄧榕、王兵這一代比他們老子的最大「進步」，就在於已經完全撕破了那層遮羞的面紗，毫無顧忌地用「兩肋插刀」這樣的幫會、黑社會語言對外昭示其利益集團內部之間的「同榮辱，共進退」的「莫逆」關系。

在鄧榕文章的結尾處，特別强調了王震家有難事時就會向鄧家求援，比如在王震不遵醫囑時，也衹能由鄧家出面，而「胡子叔叔的事，就是我們自己家的事」。

如此推論，在「胡子叔叔」不在人世的時候，王氏家族的事鄧氏家庭更是責無旁代，特別是王兵

在深圳因與其他太子黨成員的巨額債務問題驚動高層的情況下，鄧家子女必然要「拔刀相助」，問題是此時曾慶紅已經通過周北方案把鄧家後代搞得元氣大傷、自顧不暇，即使還想到了「拉兄弟一把」，也已經心有余而力不足，衹能眼看着深圳方面拿著曾慶紅的批示，將王兵送到北京交待問題。

當然，令王兵與周北方同樣下場的可能性幾乎沒有，今後的王兵想必會同鄧質方一樣，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無法無天，張狂不可一世。

據王兵手下的人講，平日酒桌上吹牛侃山時，無論提到哪個家庭的「太子黨」成員，王兵都是滿臉不屑一提的表情，唯獨提到曾慶紅時王兵從不口出狂言，王兵倒霉後，其手下的小兄弟曾經感慨：真没想到鄧、王兩家結盟，竟斗不過一個曾慶紅。

從抓周北方到瓦解「北京幫」，再到與劉家「兩肋插刀」的王兵的氣焰大消，曾慶紅助江澤民完成這幾步「打虎立威」的過程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便是鄧家將府上中學還没有畢業，平時在家最受老太爺寵愛的鄧榕女兒羊羊，悄悄送到美國加州，進入一一所私立中學，此舉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

曾慶紅小傳

一九三九年生，江西吉安人。

一九六〇年入中共。

一九六三年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畢業。

一九六三年後任石油部部長余秋里秘書，國家計委副主任余秋里秘書，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秘書。

一九八〇年任國家能源委員會辦公廳副處長。

一九八二年任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聯絡部副經理。

一九八三年任石油工業部外事司副司長。

一九八四年後任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

一九八六年一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秘書長，十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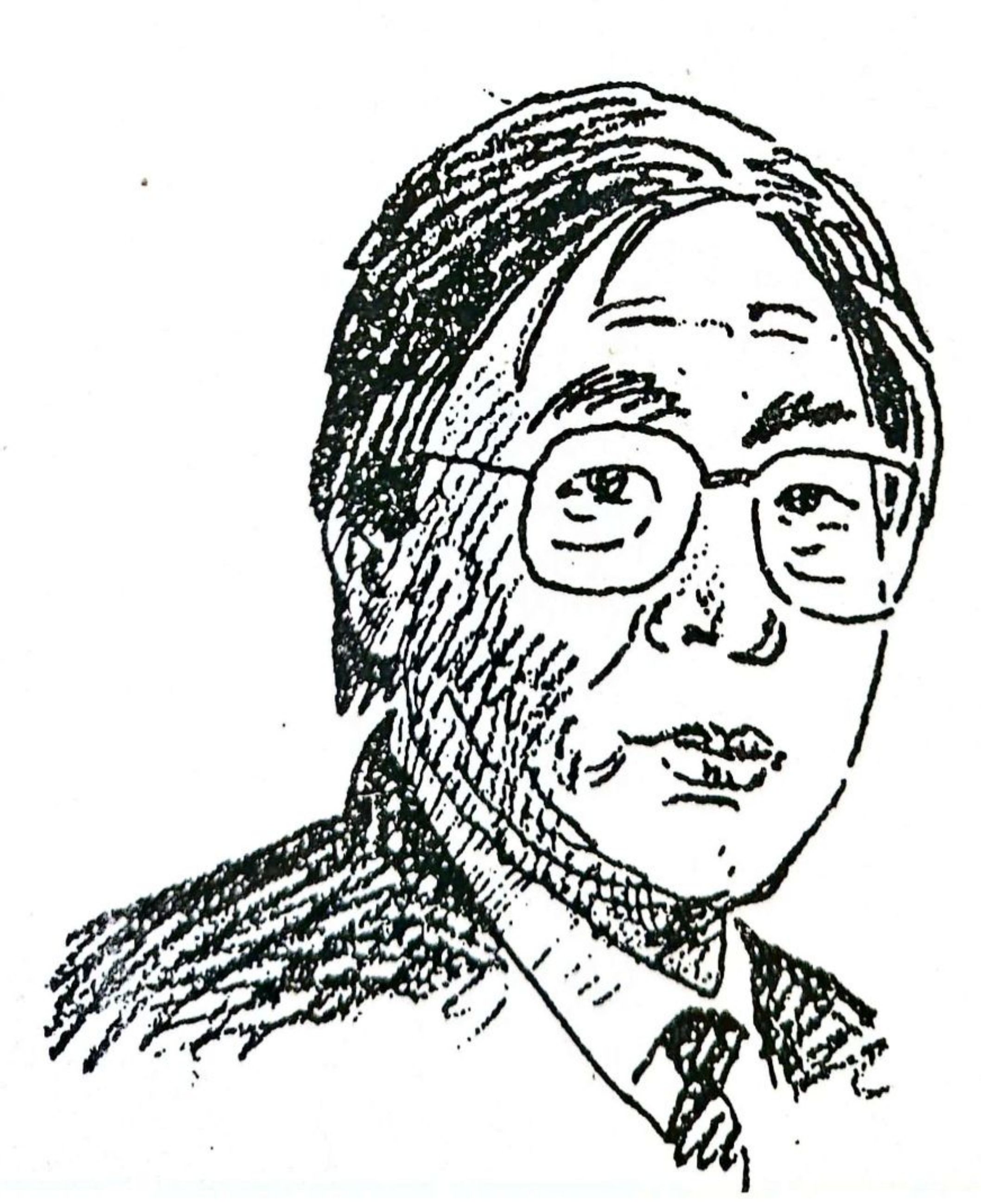
一九八九年六月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一九九三年當選為八屆全國人大代表，一月任中共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三月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任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書記。

劉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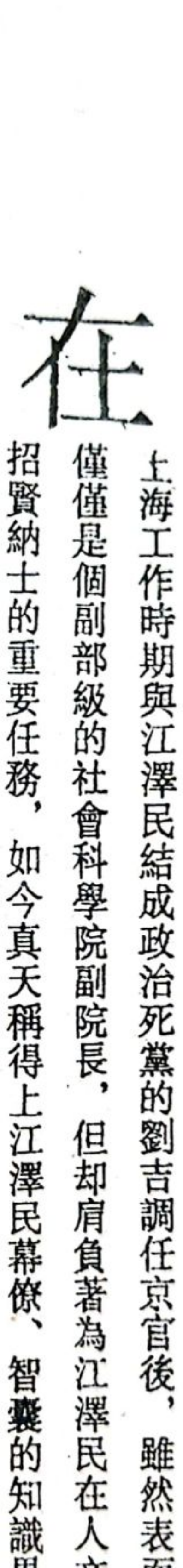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江澤民的幕僚



既得利益決定思想意識

——江澤民的政治心腹劉吉



在上海工作時期與江澤民結成政治死黨的劉吉調任京官後，雖然表面職務僅僅是個副部級的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卻肩負著為江澤民在人文學界招賢納士的重要任務，如今真天稱得上江澤民幕僚、智囊的知識界人士絕不止劉吉一人，但出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官邸」從不須事先通報，在公開發表的個人日記里敢與江澤民以「朋友」相稱，在江府稱「第一夫人」為「大嫂」者，恐怕衹有劉吉一個。由此可見江澤民與劉吉絕非一般意義上的「上下級關系」。

此劉吉非彼劉吉

一九九一年六月前後，中共曾發布一次國務院副部級干部的任免名單，其中一個叫劉吉的被任命為國家體育委員會副主任。聯繫到當時的中共上海市體改辦主任姓劉名吉，立刻有海外報刊評論江澤民和朱熔基為了在中央組建「上海幫」，已經開始從上海調政治親信進京了。其實，劉吉是江澤民的親信不錯，但這個被任命為國家體委副主任的劉吉卻是另外一個「黨內理論干部」。

八十年代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成災」的時候，大陸高校系統，文化系統的人大都知道有那么兩位逆流而上的「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者」，一位是遼寧的曲嘯，另一個位就是這位高就國家

體委副主任的劉吉，曲嘯因為鼓吹他自己正是在被共產黨整得家破人亡之後才更加熱愛共產黨（所謂「母親錯打孩子孩子不能怪母親」），而獲得「德育教授」的「學術」地位；劉吉則因為靠自己的「對話藝術」重新燃起了大學生對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希望之火」而官運亨通。

與此同時，身在上海的劉吉雖然也頗有名氣，但却還被排列在思想理論界開明人物的名單之中，屬於思想解放大潮的弄潮兒之列。

另外，國家體委的那位劉吉升為副部級干部時，恰恰是江澤民想在北京組建「上海幫」却又有心無膽、力不從心的時候。當時江澤民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在上海的政治心腹，上海市委副書記陳至立調到自己身邊。

陳至立生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上海復旦大學物理系畢業本科和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研究生畢業從趕上「文革」，業務基本荒疏。鄧小平時代開始後，轉而從政，與吳邦國、黃菊等人同被列入上海市「干部第三梯隊」增養對象。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後，將她提拔為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江澤民入主中南海的當月，又將她提拔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因為她在上海政壇紅得發紫，故被許多局外人說成是八十年代初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陳國棟的女兒，其實陳至立根本沒有高干家庭背景。

陳至立其人政治理論水平與劉吉無法相提并論，但她為政的最大特點是對自己的頂頭上司唯命是從，很快討得江澤民的青睞。一九九一年，江澤民曾提示中組部考慮一下陳至立在中央機關的工

作安排。第一考慮是讓她出任中宣部副部長；第二選擇是中聯部副部長。

當時，江澤民已經將此動議與上海市委一班人交底，甚至把陳至立丈夫喬某到北京的工作去向計劃妥貼，具體職務是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令江澤民想不到的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執掌中央組織大權的宋平不但不給江澤民這個面子，反而根據「群衆舉報」，責成中組部組織專門小組，赴上海調查陳至立的「風派」表現。

原來，一九八七年學潮期間，陳至立雖然協助江澤民處理了上海《世界經濟道報》全文刊登悼念胡耀邦座談會紀要的事件，但在此前後也還有過「右」的表現，證據之一是她在學潮之初曾經發表支持甚至同情學生「動亂」的言論；證據之二是「導報事件」發生後，因為趙紫陽的批評，上海方面一度壓力很大，陳至立在此情況下，曾經同意過上海宣傳部門一批干部上街游行。

另外，上海方面一度也曾傳說，一九八九年學潮在五月上旬曾一度因為趙紫陽一派人的努而有平息可能，江澤民和陳至立等人擔心學潮如果就這樣平息下去，無疑是趙紫陽得分，而在此前提下，上海方面對導報的處自然是過不是功，慌亂之中，陳至立主動向江澤民表示，中央怪罪下來的話，我一個人把責任全攬下來就是了。

關健時刻，一心保上司過關的俠意之舉，無疑令江澤民十分感動，但這件事情傳到宋平的耳朵里，便是另一種評債了。

整個八十年代里，如果說中共高層中確實存在「開明派」與「保守派」之爭的話，那么這兩派

人馬之間又都有那么一批專會見風使舵的「騎牆派」，而宋平其人則是最堅定的「保守派」，因此比反對「開明派」更憎惡「騎牆派」。

所以，宋平不但對東至立看不慣，一九八九年以前他在擔任中央組織部長期間，對江澤民也没有什么好印象。雖然從「黨性」出發他必須擁護鄧小平、陳雲等人用江澤民替換趙紫陽的決定，但事情一具體到由他主管的組織問題上，「騎牆派」人物很難通過他的組織審查關。

江澤民入主中南海的當月，藉口自己走了以後上海市委領導班子急需充實和加强，安排陳至立擔任市委副書記，宋平拿不出過硬的理由反對。但現在你江澤民要把陳至立安插到中央機關，宋平手下的中組部這道關卡便起到關鍵作用了。

結果，宋平派出的赴上海調查組回京後，一紙報告遞到政治局常委會議桌上，江澤民衹好鄧把提拔陳至立進京的計劃暫時擱置。

曾慶紅在一九九三年初年曾說過：總書記過去輕易不能從上海調干部進京，現在形勢不一樣了。

此慶傳出後，一般人都認為他的意思是鄧小平如今再也控制不住江澤了，其實，更準桷的解釋似乎應該是：總書記已經把中央組織大權搶到自己手里了。

此時，中央政治局主管組織工作的常委已經換成了胡錦濤，雖然胡氏在政治上出道之始是得力於宋平在甘肅的提拔，因此有傳說胡錦濤的人局是宋平一手推薦。但即便如此，依胡錦濤的資壓的

人望，要想如過去的宋平那樣在組織路綫上對總書記進行鉗制，再無可能。何況江澤民在宋平下臺不久，也把擔任中組部長的宋平心腹呂楓替換下去。

總書記欽點，中組部無奈

至此，可能是考慮到陳至立已經以上海市委副書記身份進入副省部級進一檔次，同時考慮到陳至立較劉吉年輕七歲，即使不再晉升一級，按照副省部級干部的任職年齡上限，也能堅持到下個世紀初。而如果再不抓緊時間給劉吉安排一個副省部級職務，祇能落得個在正司局級職位上退休的下場。所以，陳至立是否還需要進京及何時進京的問題，此時對江澤民來說已經不再是當務之急。就在曾慶紅說過「現在形勢不一樣了」之後没有幾天，中組部便向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出調上海的劉吉任副院長的通知。

一位負責找社科學院黨委書記王忍之談話中組部副部長不加掩飾地表示：這項任命是總書記的建議。

一九九三年初，因為鄧小平一句話而被迫從中宣部部長位置上退下來的王忍之，在社科院黨委書記兼第一副院長職位上還没有坐熱，立刻開始了招兵買馬、結黨營的活動。原任副院長汝信過去便是黨內理論界知名的左棍，與王忍之臭味相投，自然是留任對象，但王忍之還嫌自己在社科院內部的政治知已不多，向中央提出調時任國家教委副主任滕滕到社科院任副院長兼黨委副書記。

照理，滕滕其人是工科專業出身，過去的經歷也主要是在理工專業方面，先後擔任過清華大學化工系副主任、國家教委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但因為期間還擔任過中宣部副部長，擔任國家教委副主任期間也分管過人文學科的工作，故被王忍之稱之為「文理雙全」。

滕氏到一九九三年已經六十三歲，早已經超過了中共規定的副部級干部退休年齡（六十歲），但王忍之藉口社科院的領導崗位特殊，主要負責人應該如胡繩一樣「德高望重」，故年齡限制應該人寬考慮，當時，可能是考慮到國務院其他部委的超齡副職負責人可能會與滕藤攀比，組織部門一度不顧同意王忍之的「舉賢」。誰知報告到了江澤民手中，江澤民竟表示王忍之的建議言之成理，沒有表示反對意見。

江澤民在上海的三大政治心腹

王忍之得意之余，在中組部有關負責人找他談話時才知道，江澤民居然早就想好了另外一手，即點名要時任上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市經濟體制體改革辦公室主任劉吉，進京出任社科院副院長。

其實，從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始，劉吉即開始在上海、北京兩地游走，但接到正式調京命令後，却拖了半年多時間，直到一九九四年初才正式到社科院走馬上任。此後，外界時有報導認為劉吉的人主社科院同王忍之等人一樣，都是應江澤民之命前往此地「收復」理論陣地。其實，劉吉被

安插進社科院更直接的目的為了應江澤民「招賢納士」的需要，可惜因為忍之等人的從中作梗和許多中青年知識分子的「不合作」態度，令劉吉在社科院的處境多少有些尷尬，此是後話。

八十年代末期在上海市委或市府工作過的人，大都知道江澤民在上海市委內有一大政治恩師和二大政治心腹，前者是三十年代曾經受到江澤民養父江上青提拔，八十年代全力保薦江澤民一舉成功，如今反過來接受江澤民「政治反哺」隨著江澤民入主中南海而被册封為「當代帝師」的汪道涵；後者是如今已經高就「大內總管」的曾慶紅、前面提到的陳至立，以及本文介紹的劉吉。

出生於一九三五年的劉吉，祖籍安徽，與江澤民首先有了一層同鄉之誼。

至少是在成為中共「第三代領導核心」之前，在上、下級之間認「老鄉」是江澤民為官和為人的一大特點，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期間，江澤民曾經拉住趙氏的秘書之一强認「老鄉」，一度中中南海里傳為笑談。

外人一般都認為江澤民是江蘇揚州人，其實揚州僅僅是他的出生地，安徽才是他真正的祖籍。一九九零年中共中央提供給大英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的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簡歷中，像喬石的內容是寫明原籍浙江，生於上海；而江澤民的內容中則祇有出生地，沒有原籍，但江澤民又確實在中共前中央軍委領導人之一，洪學智上將（安徽金寨人）面前，主動談及自己的祖籍是安徽，籍此與洪學智攀上了「老鄉」。

正像中國老話所說：「親不親，故鄉人」，江澤民這個與人攀「老鄉」的習慣在中共官場上頗

為有用，在上級面前可以籍此討得歡心，在下級面前則能夠表現自己的「禮賢下士」

論證決策科學化奠定理論地位

劉吉一九五八年自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畢業後，就一直在上海內燃機研究所工作，從技術員工程師一直升到技術發展室主任。有人認為這個研究所與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動力分廠多有業務往來和技術交流，使劉吉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即與江澤民開始有所交往。當時，江澤民擔任長春汽車制造廠動力分廠廠長。但即使確實有這么一回事，劉吉在政治上最初得到重用，并逐淡成為江澤民的政治知音并在政治上結為朋黨，還是在江澤民調上海市府和市委工作之後。

劉吉說起來在其老本行內燃機研究方面，并無突破性的造詣。但此人十分聰明，雖然學工出身，却能文擅寫，且對新事物接受很快。八十年代初系統論、控制論等跨學科的現代知識在大陸發燒後，立刻引起劉吉興趣，其理工方面的基礎知識功底決定了他很快成為科學方面的專家，并成功運用這方面的知識，對集權統治下如何實現決策科學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當時，上海科學學界有所謂「四君子」一說，除劉吉外還有上海鐵道學院副教授馮之浚，及夏禹龍和張念椿。

一九八二年，劉吉曾經與馮之浚合作《論決策科學化》一文，發表於「中國社會科學雜志」，很快引起理論界和領導層的關注。因此也奠定了他最終成為領導人幕僚的理論基礎。自此，劉吉即完全脫離過去大學所學專業，出任了上海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一度與一又批呼吁思想解放、積極鼓吹改革開放的理界人士為伍。

劉吉在與人合作的這篇論文中，呼吁改變「經濟決策」模式，認為憑個人閱歷、經驗決定政策，是與小生產方式相適應，而不能與現代科技、生產的發展及其「社會化」適應，認為決策必須從經驗上升到科學，決策科學化是檢驗干部領導水平的重要標志．領導者僅憑個人的知識、經驗決策，失誤的可能性更大，一旦失誤，危害巨大．

據説是因為有人將這篇論文推薦給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萬里，被萬大人拍案稱奇．一九八六年，萬里的秘書孟小蘇等人為萬里起草在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其中開於「改變長期封建社會留下來的舊的落後愚昧的決策意識和決策方法，樹立新的科學的決策意識和決策方法」等內容，都是汲取了劉吉文章的精髓．萬里這篇題為《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講話，至今仍被認為是八十年代中共政治體制改革宣傳的代表作．

八十年代中後期，劉吉亦是「重新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的一群鼓吹者之一，理論同黨還有于光遠、龔育之、鄭必堅、童大林、吳明瑜、任仲夷、蘇紹智等人，均被稱為學當時的「理論風雲人物」．當時身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龔育之曾經出版一本《思想解放的新起點》；劉吉則與童大林、吳明瑜合作出版了《資本主義問題引論》，後者由北京科學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年出版、書中反駁了列寧關於《腐朽的資本主義》之説，否定資本和生產的集中必然導致壟斷．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采用先進設備，發展科學技術，發展科學技術，提高競爭能力，因而使它仍然充滿活力．

曾經是經濟改革積極鼓吹者

除了政體改革領域的試探性涉足，劉吉當時更突出的大膽表現是在經改領域與黨內保守勢力大唱對臺戲。創立於八十年代初期的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老板欽本立曾經對劉吉比較欣賞，劉本人當時也對欽氏十分尊重。再加上劉吉在杭州讀中學時，欽本立的夫人是他的老師，所以當年劉吉在上海出入欽本立家時，從來是對男主人稱「欽老」對女主人稱「老師」，絕無半點狂傲表現。

直到《世界經濟志報》因為八九學潮被停辦之前，劉吉一直是該報的主要作者之一，其文章內容多有反左特色。據該報當時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先生回憶，八十年代中期，因為有黨內左派借溫州發展商品經濟過程中出現了剝削現象」、使用童工等問題，鄧力群本人及手下人馬抓住把柄，大加撻伐。劉吉就此寫了一篇文章，將中國農村長期存在少年兒單從事農業勞動的普遍現象，與溫州地區的少年兒童作工現象作比較，認為「童工」相比於「童農」總還是一種社會進步。

導報編輯對這篇有理有據又有力度的文章十分欣賞，特別為它提供了一整張版面，以示重視，當時的思想理論界也都認為這篇文章是射向鄧力群之流的一發「重磅炮彈」。

出名之後，劉吉擔任了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但此一職務是個名譽性的虛職，套不上具體的行政級別，更談不上「有職有權」。

在此期間，無論是基於落實自己「科學決策」的理念，還是基於個人志向考慮，劉吉特別積極

地鼓吹知識分子「人仕」。比如一九八八年在成都出席「中國學者展望二十一世紀」研討會時，劉吉宣講了一大通知識分子積極「參政」的現實需要，認為二十一世紀知識分子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因為知識分子有科技知識，在將來的「科技革命」中是生產力的代表，必然要領導社會。

劉吉更為敢言的內容是：馬克思的主要錯誤，是主張由工人領導社會。面對這種錯誤，五百萬知識分子應該積極教育五千萬「知識水平低的勞動工人」。這不但是在質疑馬克思，而且直接否定了共產黨的黨章和中共憲法中的原則內容。

到此為止，劉吉可以稱得上是一個標準的改革派理論家。可惜「人仕」之後，不但理論棱角逐漸被自覺自願地磨平，而且在八九學潮時期，基於他自己已經躋身其中的統治集團之「大局」，已經對外彰顯多年的「思想解放」形象被他自己毫不吝惜地抛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可謂既得利益寫定思想意識。

整頓導報與開明派反目成仇

當年芮杏文被派往上海擔任市委書記後，曾對劉吉十分欣賞。但一是因為上海市委的組織大權始終沒有被芮氏真正掌握，二是因為芮氏其人在管建個人派系方面很不擅長，所以劉吉在芮氏那里僅僅是個理論知音，并未被接納為政治心腹。江澤民接任上海市委書記後，僅僅是因為當時的大趨勢使然，其思想和行動上也不似地但任總書記之後這樣保守。而其開明表現之一，就是對劉吉的這

樣有爭議的理論界人士大膽啟用。所以，公正地評價，劉吉從被江澤民納入私人組織體系之始，就已經對江澤民懷有一種「士為知己者死」的感情因素，再加上劉吉個性比較直率，接觸不久就令江澤民感覺十分放心，這些都是劉吉終於成為江澤民鐵杆心腹的重要原因。

劉吉在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之間被江澤民任命為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正式上任不久，便趕上了如火如荼的八九學潮。此時，劉吉正好奉召到北京參與一項中央會議的文件起草，不知從什么渠道打聽到上海《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等人，正在籌集一個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於是便不請自到。

張偉國此前僅在欽本立家中見過劉吉，接觸不多。祇是因為劉吉的大作經常在導報上發表，且內容十分解放，所以對這位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印象頗佳，根本沒有想到劉吉事後會在「導報事件」中扮演一個令欽本立大失所望的角色。

在悼念胡耀邦的紀念會上，劉吉僅以一個旁聽者的身份，未發一言。會後便飛回上海向江澤民、曾慶紅及當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作了匯報。接下來，江澤民聽說導報決定將悼胡座談會中的內容不加刪改地全部發表，立即傳欽本立談話，希望他「顧全大局」。欽表示印好的報紙已經出一部分，令江澤民大怒，市委連夜開會，決定對導報進行整頓，劉吉為整頓工作組組長，馬達為顧問，陳至立親自帶領工作組成員前往導報宣布市委決定。

馬達是上海的老報人，思想一直比較解放，在此之前他與欽本立私交甚厚，却又無法抗拒市委

的命令，祇能在欽本立面前老泪縱橫，而過去在欽本立面前口口聲聲「欽老」的劉吉則使了一個手腕，進導報之後便到處找人談話，暗示江澤民的本意是要保護欽本立和導報過關，但因為上面有鄧小平欽旨，上海市委不能不作些表面動作。

此消息傳到北京後，張偉國當即分析說：導報的悼胡事件在鄧大人那里不過是小事一樁，這樣處理導報，明顯是江澤民想對上邀功而采取的「主動措施」。

客觀方分析此事，即使鄧小平確實過問過導報悼胡事件，也應該是江澤民主動向上匯報之後的事情，而且鄧很可能是在某次談話中，借此事一有揚上海市委做得對、做得好；甚至民可能表示過導報這樣的「自由化」行為就應該整肅，而劉吉所散布的「内幕」消息，正好是把此過程的因果關系倒置。

張偉國在北京批駁劉吉的消息傳到上海，劉吉立刻令人打電話傳張偉國回滬「學習中央文件」，并在報社里大肆指責張偉國進行動亂煽動，在北京時常到天安門廣場與動亂學生攪在一起，張則表示自己最欽本立派到北京的，如今仍然祇聽欽老一人調動，電話打到欽老家中，欽老表示：北京是黑中央所在地，就近學習中央文件既方便又直接。

六四」與恩主榮辱與共

上海方面，劉吉進駐導報的第一槍就没有打響，顏面盡失；北京方面及全國範圍内，處理導報事件引起軒然大波，特別是引發了北京新聞界「聚衆上街鬧事」之後，江澤民奉昭進京開會，特別

辯上了曾慶紅，負責在京城內與一批「老同志」通氣，劉吉則在上海市委里度日如年，提心自己的

這一政治賭注下錯了時機，選錯了地點．

政治局會議上，趙紫陽一句「上海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并表示中央不負責任．屁股底如坐針氈的江澤民未等會議結束，便追著出去上厠所的時任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希望討到幾句意．過去從來看不起江澤民的李瑞環一頓冷嘲熱諷，江澤民衹好回到上海靜等形勢變化．

一時間，江澤民幾乎沒了主意，劉吉則死了一條心，決心繼續緊跟江澤民，與恩主共進退．江民同劉吉談了自己在趙紫陽那里受到壓力後，劉吉及時領會江澤民竭力，親自上門對欽本立進行勸誘，希望他「顧大局，議大體」主動作個檢討，給江澤民一個臺階，「導報事件」即可收場，欽本立在「感謝劉吉同志關照」之余，却不同意妥協，不死心的劉吉又建議在思想理論界找幾位與欽本立觀點相投、私交甚好者，繼續對欽氏作說服工作．

當時，導報的老作者之一蘇紹智先生，曾經接到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季崇威的電話．季崇威是中國老一代知名記者，抗日戰爭勝利後曾在上海《大公報》任經濟記者，與欽本立和蘇紹智都是老相識，後來調到北京國家經濟委員會任司長，八九年時已退休，在國務院研究中心擔任顧問工作．當時，他的妻子朱謹在世界經濟導報北京記者站任負責人．

當時季崇威在電話里告訴蘇紹智說：江澤民到北京來向趙紫陽匯報「導報事件」，趙紫陽很不高興，但沒有說話；同時在場的黃杏文說：你這樣做法，使我們很被動．江澤民很慌張，找到季崇

威，要季想辦法讓欽本立檢討，說只要欽本立肯檢討，他可立即恢復欽本立的職務．季崇威知道蘇紹智與欽本立很熟，請蘇打電話給欽．蘇回答說：要欽本立檢討是不可能的，可以建議欽本立說一下經過，如何？季崇威表示，江澤民很著急，希望蘇趕快打電話給欽本立試試看．

蘇紹智先生事後回道：我和欽本立在一九四三年開始認識．欽抗戰前在杭州讀中學時即同情中共，抗戰時在重慶商務日報工作，我常投稿該報，遂與他認識．後來我在上海「解放」雜志工作時又與他同事．「文化大革命」以後他創辦《世界經濟導報》，我是該報的經常撰稿人之一．在爭取民主的斗爭中，我們是同舟共濟的．

但是，蘇紹智先生在長途電話里向欽本立轉達了季崇威的好心建議後，欽本立毫不猶豫地表示：「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新聞界爭取新開自由的問題」．蘇遂將欽本立的回答告訴季崇威．至於季氏如何向江澤民交待，便不得而知了．

蘇紹智先生認為：從這一小插曲中，可見江澤民當時無所適從的慌亂之象於一斑．

「六四」以後，欽本立受到各種迫害，堅强不屈，當為報人楷模．他終因受迫害太甚，患胃癌，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逝世．據說欽老住院期間，劉吉還曾登門盾望．不知是為了表達自己的一絲歉疚之情，還是為了繼續對欽老進行政治意義上的「治病救人」．

理論界内得罪日子難過

到一九八五年五月下旬，因為趙紫陽的失勢，江澤民等人處理導報事件的「草率」反而收到一舉兩得」之功效，成為「在黨和人民共和國生死危亡的關鍵時刻立場鮮明、政治堅定」的最有力證明。一九年五月底，鄧小平召江澤民進京談話，告訴他作好接替趙紫陽職位的準備。一時間，江澤民竟不喜是悲，劉吉則在替整個共產黨前途强烈擔憂之余，又慶幸自己關鍵時刻下對了政治賭注。

且到「六四」槍聲，江澤民即將龍袍加身的消息，上海的全部在職干部，除了他本人，衹有四心里清楚但不敢提前走露風聲，這四個人便是時任上海市第一副書記兼上海市長朱熔基，和曾、陳至立、劉吉三人。

「六四」事件之後，黨內極左派全綫復辟，報章上逐條批判的「資產階級自由化」論調也包括吉過去時常宣揚，并因此得到開明派認同的內容。同時，因為在整肅導報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理論界的關明派們則紛紛辟劉吉而遠之。無奈之間，劉吉自己嘲弄自己的「老鼠鑽進風箱里，兩頭受氣」。

「六四」清查開始後，從北京回到上海的張偉國被抓進監獄，欽本立病倒在家。劉吉曾有心保住導報這塊牌子，上海市委也傳出話來，由劉吉接替欽本立職務，令導報重振旗鼓。可惜導報內部人員大都與劉吉保持距離，弄得他十分狼狽。向江澤民訴苦後，江澤民令導報的事情不要再攪，全部人馬就是遣散，而宣傳部副部長也已經當得心灰意懶的劉吉，則被安排出任了上海市府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

調北京任社科院副院長後，雖然院内高層人人知道他劉吉通天，但明白自己當一屆社科院黨委書記必須退休的王忍之，已經失去了巴結總書記的動力，所以偏偏不買他們主僕二人的帳，也有人認為王忍之冷落劉吉，還有一層過去的積怨作祟.

早在胡耀邦時代，劉吉剛剛在思想理論界出山不久，即與王忍之分屬於壁?分明的兩個陣營，王被認為是思想僵化派典型，劉被看作是理論開明派代表. 從而兩人正式交往則是從劉吉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之後. 當時，王忍之作為胡耀邦思想路綫的對立面被安排接掌了中宣部，劉吉作為地方黨委的宣傳部負責人，時常要接待中央大員王忍之到上海巡幸，或到北京向王忍之匯報工作.

一九九一年春節前後，自認為在北京説話已經没人要聽的鄧小平，利用到上海暖冬的機會，講了一通重振改革開放的鼓動話. 參與「小平同志内部講話精神」整理的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處長朱某，事後在與上海《解放日報》時任黨委書記兼評論部主任周瑞金閑聊時説起鄧大人的談話内容，立刻被周氏感覺有文章可作. 於是，周瑞金又約上了自己在報社的體己，評論部副主任凌河（常用筆名「司馬新」在報上發文章），加上朱姓處長，三人共謀用「皇甫平」筆名在報上發表系列改革文章.

當時，此事即没有請示上海市委宣傳部領導，更没有請示市委朱熔基和吴邦國. 結果文章面世之後，立刻引起軒然大波，王忍之親自向上海市委宣傳部打電話質問，并派出一個調查組前往上海了解此事背景. 氣急敗壞的王忍之與北京的其他個極左派理論家還所言要抓出「皇甫平」文章的幕後「黑手」. 一時間，上海市委一千人馬全部慌了手脚，吴邦國、陳至立等人首先拼命撤撤清自己. 特别是陳至立，因為宣傳工作由她主管，考慮至中央如果深究此事，在中央還没有站穩脚跟的江澤

民可能都保不了她，一再表示自己對此事毫不知情．

皇甫平文章劉吉自我貼金

周瑞金等我眼看上海市委不給自己撐腰，擔心此事又可能演化成上海的第二次《導報事件》，趕緊求助於正在上海拍照，與《解放日報》來往熱絡的楊尚昆長公子楊紹明．楊紹明飛回北京向家父匯報後，楊尚昆立刻告訴上海市委：《解放日報》文章內容都是對小平同志最近講話的詮釋，立意很好．這一來，上海市委方面又拼命搶功．此番表現被宋平等人看在眼里，氣在心里，也是陳至立上調北京未果的因素之一．

當時，隨時可以從江澤民那里得到信息的劉吉立刻也口氣大硬，根本不把王忍之放在眼里了．接下來，劉吉奉昭進北京開會，舊朋新友紛紛找他打聽「皇甫平」文章的背景，劉吉便趁此賣弄，得意地表示：上海的宣傳理論口從來「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所以，外界很多報導都說是劉吉主持的「皇甫平」文章寫作．其實此事從醞釀到事發，與他根本沒有關系，而搞不清其中內幕的王忍之，則把怨憤全都記在了劉吉頭上．

所以，劉吉和王忍之前後脚入主社科院，正應了那句「不是冤家不聚頭」的老話，要本不像外界是所傳的什么「左派理論家結幫組隧」．

過去，海外多有文章將王忍之、滕藤、汝信之流與劉吉并列撻伐，認為此四人都是中共商層「收復」社科字理論陣地的得力干將，但事實上劉吉與上述三人後從組織系統講不是一「幫」，從立場觀點講也還有區別；劉吉雖然認同甚至積極支持「六四」鎮壓，但以鄧力群為代表，包括王忍之等人在內的所謂「真正的馬克思主議者」，并不因此視劉吉為自己人，就同鄧小平親自下令鎮壓「六四」，但黨內左派仍然要咒罵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是一個道理。

社科院黨組沒有劉吉地位

王忍之在中宣部長的位置上被趕下臺後，本來已經放出風來要「提前退休」回家，關起門來專心著書立說。安排他出任社科院黨委書記兼第一副院長時，他開始還扭怩做態地表示了幾句「力不從心，難以滕任」，但一上任便把他過去的左派干勁發揮得比在中宣部時期更加肆無忌憚。

在此之前，海內外都清楚王忍之已經因為主持中宣部工作時奉行極左路綫受到大陸知識界甚至黨內理論界的强烈排斥，而且因此丢掉了在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連選連任中央委員的機會，但也正為如此，他似乎是横下一條心，不再給自己留有退路。他自己同幾個私交談話時也曾說過「我這個是就是認準一條死理，一條道走到黑，不撞南牆不回頭」。

王忍之到社科院之前，院里實行的還是所謂「黨委領導下的院務會議負責制」，胡繩是地地道道的第一把手。而王忍之到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大力强調加强黨委領導的同時，將領導

人名次排列，搞出兩份內容[illegible]公開的院務會議排名序列是胡繩、王忍之、汝信、滕藤……，內部傳達的黨委領導的排名序列是：王忍之、滕藤、汝信、胡繩、胡老先生成了第四把手．

自此，胡繩的一般的位置實際上已經被王忍取代，而老態龍鐘的胡繩或許是因為年齡和身體原因對權力方面的事情已經淡漠，或許是對王忍之的所做所為無可奈何．總之，過去還時常主持院務會議的胡繩，自王忍之到任後基本不再露面，院務會議也基本上被黨委會議或常委擴大會議所取代．

也就是在王忍之將這一切人事安排準備就緒的時候，劉吉才不緊不慢地交待了上海方面的工作，在中組部一名局長的陪同下到社科院報道．

没過幾天，王忍之煞有介事地召集了一個院、所兩級負責人會議，宣布了中央對劉吉副院長的任命書．接着，便大講了一通劉吉在機械工程方面的事長和在科學學術方面的造詣，令聽講者一頭霧水，搞不明白是在吹捧還是在貶低劉吉．

接著，王忍之便開始給劉吉安排工作，討論結果是安排他主管文學所．至於在院黨委的領導名單中，劉吉根本就没有位置．

自此，劉吉已經開始明白，不但是王忍之，就是溲信、滕藤等人，也都他這個出自上海方面的「外來户」有着著很深的偏見和提防．

其實，就在劉吉還没有到社科院報導之時，中央內部即已經傳出江澤民想培養劉吉做未來丁關根中宣部長接班人的議論．在此之間，也有議論説江澤民安排陳至立進京，準備接任中宣部長的機

會錯過之後，也考慮到如果安排劉吉未來接替中宣部長職務，在黨內引起的反彈勢必會小得多，因為劉吉畢竟還是理論家出身，陳至立則連一篇象樣的理論文章都没有發表過。所以，江澤民安排劉吉先到社科院不過是為了過渡，以等待中共十五大領導班子換屆時再安排他進中宣部。

但是，出生於一九三五年的劉吉，到中共十五大召開之時，已經年滿六十二歲，江澤民屆時若安排他進中央委員，然後再出任中宣部長，從干部年輕化的角度，仍然會引起黨內强烈反彈。所以，未來的劉吉即使能够升任正部級職務，中央政策研究室，或者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之類的地方，可能更適合於他。

問題是，劉吉是未來中宣部長的議論一出，自然令王忍之回想起自己不到退休年齡便被從中宣部長位置上拉下馬來，甚至連個中央委員都不許繼任一屆的耻辱，自然也要因此發泄到劉吉這位「通天人物」身上。

進北京自知禍福難料

入主社科院後，雖然王忍之對劉吉處處提防，但在起碼的生活條件方面還是不敢怠慢。院務部門根據慣例，很快給劉吉安排了一套有四間卧房的，供副部級干部享用的公家分配住房，但劉吉婉辭相拒，自他進京之日起，至今仍然居住在上海市政府駐北京辦事處的招待所里，妻兒老少則一直留在上海。

對劉吉的這一反常舉動，社科院上下自然議論紛紛，有自稱了解劉吉者透露，劉吉的太太本是一個從來不出人官場的上海人，對北京的自然氣候和政治氣候都十分過敏，故不願跟隨劉吉做京官，但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即認為劉吉雖然可能被江澤民暗示過今後的仕途走向，但他自己對江澤民的政治前途是否有保障也不敢打包票，所以才暫時氫家人留住上海，將來一旦在北京呆不下去了也不致於太狼狽。

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劉吉曾在日記中寫道：「到北京不久，對北京各方面情況雖風聞一二，但實不知底細，人說北京政壇深不可測，我想自己一介書生，根本不想卷入各種政治漩渦中去，祇想尋師訪友，求得學識上有所長進」。

雖然他自己稱日記是他這「純粹的內心獨白」，但這段日記恐怕祇有前一半是心里話，即對「北京政壇深不可測」的恐懼心理，而在記這段日記的前半個月，五月五日的日記里，倒是有另外一段「內心獨白」恰當地表現了他「一介書生」進京為官的悲劇：「學有學道，官有官道；此道非那道，彼此兩條道；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這也許是我的人生悲劇。」

而劉吉在朋友圈子里自己對家眷繼續留在上海的解釋是：總書記剛來北京時不也是一個人住在中南海里嗎？

事實的確如此，據一九八九年五月之前在上海市委時常接近江澤民的人士回憶：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江書記被中央派專機接去北京後，上海市委一班人都還以為祇不是接他前去參加政治局昆急會

議而已．但「六四」槍聲剛過，上海市委在接到的一份布署對北京「平暴」必須統一宣傳口徑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通知上，除楊尚昆、李鵬、喬石、姚依要[illegible]外，還赫然少有江澤民的簽名．上海市委有自作聰明者由此分析胡啟立和芮杏文兩人中至少有一人這回一定「落馬」，江澤民將調進北京主管意識形態．劉吉雖然知情却不敢提前走露風聲，祇能按照江澤民的吩咐，隨時到江澤民家里照顧其夫人．而江澤民夫人王冶坪女士聽到丈夫奉詔進京是要接替趙紫陽兒皇帝職位時，目擊者用「如五雷轟頂」描述當時王冶坪的表情．其心理壓力之大可想而之．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掀起中國大陸第二輪全民經商大潮後，大陸人便開始將放弃原有職業，從事經營活動稱之為「下海」，一時間弄得臺灣人好不理解．因為「下海」一詞在臺灣人的語言表達習慣中，不是什么好聽的內容，殊不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北京政界都將進入中共決策核心稱之為「下海」，因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中南海」的「海字而來．

而江澤民「下海」之初，可謂毫無信心．當時，他不怕拒絕接家眷進京，自己要求中央辦公廳暫時不要給他正式安排住房．這樣，整整兩個月的時間，江澤民就住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書記處辦公室里．勤政殿的原有古建築早已被拆除，并在原址建起一座現代混凝土建築充作中央書記處辦公地點，該建築面積不是很大，除了秘書、勤雜人員的用房外，每個書記和候補書記都有單獨的一所套間，里面辦公，外間會客．唯獨原來給胡耀邦用的一套辦辦公室面積最大、設備最全，辦公室里面還有一個供休息用的套間．胡耀邦主政年代，因為工作忙顧不上回家時常常就便住在這里．

胡耀邦去世之間，因為還挂有政治局委員頭銜，趙紫陽自然不好意思將此房間占領；胡耀邦本人被免去總書記職務以後也沒有再進去過。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胡耀邦為自己設計的這個小天地，終於被江澤民占領。當年年六月三日夜晚，江澤民就在這套房間里（距長安街直綫距離不足百米）里側耳傾聽著長安街上發生的一切，真可謂「槍聲炮聲口號聲聲凄厲；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揪心」。

兩年多以後，江澤民才把家眷接到中南海。

為江澤民招賢納士進展不順

社科院是中國大陸全部人文學界的權威機構，建院之後，原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下屬的一批研究機構并到它的名下「歸口管理」，甚至國家安全部的下屬情報咨詢機構臺灣研究所也被安排由科院和國安部雙重領導，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院里過去雖然正、副院長多達八、九人，但無一是江澤民親信。劉吉本是學機械工業出身，但在人文學界却并非外行。江澤民安排他進社科院時，一是從過渡角度考慮，二是希望他能够在社科院系統為江澤民觀察、選拔一批理論上能為江澤民所用，政治思想上較為可靠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幕僚人才。

但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禁個，社科院同時又是中共領導人十分頭痛的地方。近些年輕里，特別是經過八九「六四」鎮壓和九二年第二波經商熱的掀起，整個社會科學研究系統的中青年理論

工作者已經截在分成兩大部門，一部分或出於不甘貧困，或出於不願為現政權效力的考慮，紛紛踏上「先富起來」的不歸之路，科研成了「副業」或者乾脆拋至身後；另一部分雖仍留在科研領域，且不斷有成果出來，但這些成果中即使稱得上內容有份量的一部分，在中共領導人眼里看來，也都是批判性有余，建設性不足。

為此，江澤民雖然希望劉吉能够在社科院任職的幾年時間里，陸續為他物色出一批能够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各類治國方針方面，拿出所謂「務實可行的，真正具有針對性和建設性」理論成果的中青年專家，一批批納入他江澤民的幕僚隊伍之中。所以，有人挖苦劉吉到社科院的真實目的，是要把社科院變成中國封建王朝的「翰林院」，倒也真有幾分貼切。

可惜，一方面由於王忍之對劉吉的所作所為冷眼旁觀，從不配合；另一方面因為理論工作者隊伍中，確實被劉吉認為是有真才實學者中，對他的號召表現熱情的了無幾人，而水平有限，文章寫得令劉吉不忍卒讀者，却對劉吉的納賢舉措如蠅逐臭。這一來，劉吉干著急沒有良策，江澤民那里也不大耐煩。

理論工作者對劉吉的熱情號召反應冷漠原因較為復雜。有一部分理論工作者雖然仍然不為經商大潮所吸引，但出於對中共現政權的不認同，其研究方向或祇具有批判性，或其建設性已經屬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範疇」，不可能為江核心所用。另有一部分理論工作者雖然在主張「和平漸進」的前提下，不排除與中共現政權合作的可能，但却又因為對江澤民本人的政治前途不敢看好，而不願

冒然做出打入江澤民幕僚圈的選擇或努力.

搬不上臺面的『明主』論

在大陸社科研究界，特別是研究方向與時政有進接關系的研究界，持有兩種截然相對的觀點，一種是所謂『學而優則仕』，認為在專家治國的今天，學者就應該利用自己的所長參與現實政治；另一種是所謂『學而優不仕』，認為學者就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客觀的立場和對現實的積極批判態度．劉吉在對這批人進行游説過程中，搬出一套『明主』論説教．

劉吉認為：『君主，特別是昏君，無不是一意孤行，每句話都是金科玉律，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命運均由他主宰，他是一切決策的唯一主體．

『時代前進了，民主代替了君主．人民通過一系列科學程序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天下者天下人的天下」，人民當家作主是為民主．民主的決策也是一個主體——人民，祇是從個人變為群體．

『可是，還有一種情況，納諫如流的唐太宗是杰出的代表，可稱為『明主』，他能够并鼓勵人民及其代表發表各種治國安邦的意見，然後由他作出判斷決策，於是決策出現了兩個主體：一個人民，一個明主，官尚清官，主愛明主，這大概是中國政治一大創造，一大傳統』．

由古及今，劉吉進一步認為：我們是一個十二億人口多民族的大國，沒有黨的統一領導，是無法凝聚在一起的；十二億人口大多數還處於小生產方式和小生產觀念的陰影下，他們更多地要求的是『明主』，大多數人要求『明主』，這就是當代中國最實際的民主．在小生產觀念下，實行民主就

可能被理解為打倒一切權威的無政府主意.「文化大革命」就是在這種民主的口號下瘋狂起來的.萬不可好了傷疤忘了痛.」

無疑,劉吉的這套理論如果原封不動地寫成理論文章,即是對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反動,又逆現代社會潮流,正如他自己所哀嘆:「(明主)說,領導不愛聽,個人民主主義者們也不愛聽.但我認為這是當今一大實話,說老實話是不容易的.」

為樹江核心權威挖空心思

劉吉這里說的「領導不愛聽」,當然不是指的江澤民,如今江澤民恰恰是需要劉吉這樣的人為他制造「大樹特樹江核心絕對權威」的「理論根據」.而劉吉的本事就在於能够把他這套「明主」論雙通到共産黨的專統說教中心去.

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九日,剛剛到社科院工作不久的劉吉奉命與十數名「御筆」一同前往京郊玉泉出閉門造車,共同起草中共十四届四中全會文件《中共中央閞於加强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劉吉的具體任務是主要負責執筆文件第四部分「堅持和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

中共每逢有重要黨、政會議的長篇決定、報告之類東西起草,必將御文人們集中於京郊玉泉山,除了「好環境中才能造出好文章」的考量之外,也是對外保密的需要.而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後,劉吉已經數次上玉泉山「修行」,此行前一次是為了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報告起草.用他自己

的話說：「玉泉山空氣新鮮，景色宜人，確實是一個做學問寫文章的好地方」。

花香鳥語之中，劉吉果然不負江澤民所望，把個「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什么還要繼續强調（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學問」作和妙筆生花。

在十四屆四中全會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强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貫徹所謂「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被提到嚇人的高度，雖然文中提到了「民主和麻中是相輔相成、內在統一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正確的集中，沒有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確的路綫方針政策，不能形成全黨統一意志」，將「民主集中制」具體解釋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的制度」，似乎是把「民主」和「集中」的重要性都說到了。但通觀《決定》全文，再結合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官方刊物上一系列宣傳文章的內容，就不難看出，劉吉和那批「御筆」們為江澤民詮釋的「民主集中制」，關鍵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所謂「民主」不過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

該文中說：「黨章規定，黨員個人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個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四個服從）最重要的是全黨服從中央，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强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個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有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

這段論述，清楚地表達出劉吉等人為「江核心」重新祭出「民主集中制」破旗的真正用心，是要確立「江核心」的權威。

不難看出，所謂「發揚黨內民主」，便是劉吉所謂的唐太宗式的「納諫如流」；而所謂「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不過是把劉吉這個筆下的那位「明主」換了一種符合共產黨宣傳習慣的說法。

江明主糾正鄧氏假民主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十五年來，雖然一直没有放弃「民主集中制」的提法，但過去鄧小平强調這一「制度」時，主要目的是針對毛澤東時代祇要個人「集中」，破壞「民主」有感而發的。而劉吉等人幫助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則主要是針對所謂「中央權威」已經喪失殆盡，以及江澤民這個所謂的「核心」實在没有權威的現實政治情勢。

當然，從鄧小平實際掌控中共最高決策權直到變成政治植物人為止，他從來都是一言九鼎，黨的幾任表面意義上的「最高領導人」都要在他面前唯唯諾諾，不敢多說一句話，更不敢說錯半句話，但是，因為鄧小平自有其足够的個人權威，所以，他在强調「民主集中制」時，更多的目的是為了以「黨内民主」為幌子控制黨的總書記及政治局常委班子，必要的時候，他鄧小平金口一開，「不聽招呼」的總書記立刻就會變成「少數」，無論是華國鋒下臺，還是胡耀邦及趙紫陽的遭貶，從來都是在政治局工政治局常委「多數」意見同意的情况下進行的。也就是就，鄧小平垂簾聽政時，隨時可以用落實「黨内民集中制」為藉口，通過「少數服從多數」這一「合法」程序將其個人意志貫徹下去。

所以說，鄧小平憑借其個人權威，隨時敢打也善打「少數服從多數」這張「黨內民主派」牌，而江澤民恰恰相反，如果他聽任黨內各級濫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而不强調「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各種地方諸候不會聽他那一套先不等說，首先中央政治局內擁護他江澤民的人就不見得占多數，所以，眼看大家長已經來日無多，劉吉等人趕緊趁這次中央全會的文件，先昭告天下：另共産黨已經在組織健設方面，「完成了第二代喘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意思是鄧小平及其所有黨內退休元老的政治生命已經完結，「天下者，江核心的天下」，接下來，便用「民主集中制」這祇籮筐，巧妙地套進了劉吉的「明主」說：「決策出現了兩個主體：一個人民，一個明主」，而「人民及其代表」祇不過是發表意見而已，終究還要「由他（明主江核心）作出判斷決策」，真可謂用心良苦！

為江澤民開出治國藥方

這次上玉泉山之前，劉吉曾在江澤民家里又一次促膝長談，內容是交流他們對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其本意議形態」問題的想法，兩人共謀開出了一張中西醫合壁的治國樂方。

劉吉諫言說：一個社會總是有自己的基本意識形態，才能得以長治久安，中國封建社會如此漫長是和另封建主義精美的基本意識形態分不開的，盡管不斷必朝換代，但基本意識形態不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也在文藝復興時代建立起自己的基本意識形態，而社會主義國家過去祇有短期的政治

任務的宣傳，一以貫之的基本意祇表態始終不明確，無論前蘇聯還是中國，概莫如此，這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一手硬不起來的根本原因所在．盡管有强大的甚至激烈的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大批判，但收效不大，甚至有逆反作用．没有更高水平的真正社會主義的內容足以代替，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東西總是打不倒的，打倒了也會「春風吹又生」的．

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個人問題上的規範分別是「修身」和「自由」，社會主義則應該是「自强、奉獻」和「為人民服務」；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人與人之間關系上分別講求「信義」和「平等」；社會主義應該是「互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社會的規範範圍分別是「仁愛」和「博愛」；社會主義則要以「集體主義」封應；封建主義和次本主義在國家和民族問題上分別講求「忠」和「民主」社會主義則應該强調「愛國主義」，等等．

江澤民聽完他這番宏論，立刻表現也「納諫如流」的「明主」氣魄：「談得好，應該認真研究，我也一直有個考慮，你看對不對？

没有繼承就没有創新，封建文化就没有繼承的？都是錯的？恐怕不妥．孔子孟子的思想為何有强大那么巨大的生命力？綿延幾千年而不衰，為什么？海外華人，幾代生活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包圍之中，為何仍能保住孔孟之道？（學而時習之不亦悦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吾日三省吾身），（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些格言不知教育和激勵了多少代人，至今講起來仍然有動，總不能說這些思想都不好吧，去了封建外殼，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嘛！中華

民族要自尊、自信、自強，要熱愛自己的文化。當然，現在畢竟是二十世紀了，絕對不能自我封閉，經濟不能，文化也不能，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也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自由、平等，博愛為什么不可以鬥……都是經過時間和歷史考驗的，至今看了聽了仍使人振奮高尚，社會主義文化要學習所有先進的文化」。

君臣之間「朋友」相稱

一九九五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一套「名人日記」，其中劉吉的那本名為「匣中劍聲」，內容中詳細記載了他與江澤民之間的這段講話。當然，劉吉并沒有在這本公開出版的小薄書里，直接有寫明這是一次與「黨內明主江核心」的談話，而是以「敬愛的朋友」五個字代替的江澤民的名字。不過，他在這篇日記的最後寫道：「我聽了（「敬愛的朋友」的談話）感到十分振奮，如同聽了一次貝多芬第九交響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劉吉的對話者是誰。在他劉吉眼中，除了江澤民之外，誰的談話內容能够與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相提并論？

其實，在其私人朋友有追問下，劉吉也坦承主要是為了防止有人説閑話，才用「敬愛的朋友」代替總書記的名字。

劉吉在自己的目記中與江澤民以「朋友」相稱，公開出版這份日記時，既不願讓讀者們——特

別是江澤民身邊的人士認為他過於張狂，同時又不希望讀者們將他地對話者誤認為是一般等閑之輩，這才挖空習思地用「敬愛的朋友」幾個字，將他與張澤民的「政治哥兒們」關系若隱若現。

有劉吉身邊人士向筆者介紹，劉吉與江澤民一家的私交確實非同一般。江澤民入主中南海後，劉吉出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首官邸」從不用事先通報，負責江府內勤的警衛人員從不敢擋駕。在上海工作時，劉吉從未稱呼過江澤民的職務，總是「澤民同志」長、「澤民同志短。到北京後，「澤民同志」必成了「總書記」——僅僅從對外維護「明主」權威的角度，也不能再對至高無上的君王直呼其名，但在江澤民家里，對其夫人仍然以「嫂子」相稱。

據稱，劉吉調北京後，一般在上海駐京辦事處用餐，想換換口味時便驅車直駛江府，「第一夫人」王冶坪興致好時便親自下厨，烹飪幾樣劉吉喜歡的江南菜，其情其景，如同照顧自己的娘家弟弟一樣。即使「第一夫人」無暇顧及劉吉，身邊工作人員也早已習慣了他的這種想來就來，想走就走的特别權利，隨時替總書記為他打點用飯。

搞不清恩主是虎還是狐

江澤民身邊雖然理論謀士、政治心腹不止劉吉一個，但即使「大内總管」曾慶紅、「政治化妝師」王滬寧等人，在江澤民面前也從不過象劉吉那樣舉止隨便，更不敢在没有事先通報的情況下隨時闖進江府。

劉吉與江澤民之間的這層特殊關系，除了象曾慶紅這樣經常與江澤民有直接接觸者十分清楚，劉吉過去在上海和如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少數『理論知己』也略知一二。另外，也還有一些與中國大陸生意關系密切的港臺及外界富商，不知從什么渠道得知劉吉的真正背景絕非社科院的一介書生副院長。所以，劉吉到科學院工作的幾年里，出訪邀請接連不斷，除了香港、臺灣、日本等地，美國、歐洲也是他時常造訪之地。一九九六年秋，他再次應一位美國富商的私人邀請，到北美周游一圈，所到之地雖然沒有美、加政府官員的正式接待，但美國富商出面接待的規格絕對比政府部門出面邀請周到多少倍，反到可以令劉吉盡情享受一番西方資產階級的高度物質文明。

邀請劉吉造訪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如果目的僅僅是為了給自己利用中國市場尋找方便，完全可以理解；假如是懷有對共產黨政權『以誘促變』的政治目的，百分之百的打錯了算盤。劉吉心里無疑比誰都清楚，美國大款在他身上如此投資，絕不是因為他目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職務，王忍之比社科院黨委書記兼第一副院長身份為何沒有機會獲此殊榮？

雖然他劉吉的官位級別至今僅僅是個別是個副部級，而且任職單位又是一個既不理財、又不撑物的『清水衙門』，但就是因為與中共最高領導人存有一層私交背景，就是因為他是江澤民的政治心腹，才使得他劉吉被外界別眼相待，成為中共統治集團中的一位極為特殊的既得利益者。而僅僅為了使這層好不容易得到的既得利益不至成為過眼烟雲，他劉吉今後的思想意識衹會趨向保守而不是相反。

在玉泉山上挖空心思起草彰顯江核心文章時，劉吉還有一段無法直接寫進官樣文章里的『權威

論」祇得稍稍地留在私人日記本上，劉吉認為：「權威來自權之威，權威必須有權，有權才有威，有權不用，威從何來？有權不施威，權也是一個空架子……，教育是必要的，主要的，但不是萬能的，殺鷄也是對猴子的一個現實教育（慈不帶兵）．是虎，才能成為林中之王；是狐，必聚集一堆狐朋狗黨；是羔羊，必團上層層豺狼」．

或許正是受了劉吉這番宏論的影響，江澤民不久便開始藉權施威、藉威護權，具體作法便是先後擒住周北方、陳然同這兩只腐敗之「鷄」，對手下的一大群「猴子」進行所謂「現實教育」．但僅靠此舉至多能够彰顯他江澤民絕不是政治上的「待宰羔羊」，至於是否能够完全確立江澤民「山林之王」的權威，劉吉似乎也不敢過早結論．不過，用「是狐，必聚集一堆狐朋狗黨」來形容江澤民及身邊的劉吉等三干政治心腹，倒還真有幾分貼切．

劉吉小傳

安徽安慶人，一九三五年十月生.

一九四七年入杭州第一中學，受教於欽本立夫人方氏.

一九五三年考入清華大學動辦機械系.

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共.

一九五八年大學畢業，分配至上海内燃機研究所，歷任技術員、工程師、技術發展室主任.

一九八二年任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一九八五年任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

一九八八年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一九九一年任上漲市經濟體制改革辨公室主任.

一九九三年三月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同年底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滕文生

江泽民的幕僚

JiangZe-min, sCoumselors



從鄧力群愛將到江澤民文膽

——江澤民的大內御筆滕文生

江澤民自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接替趙紫陽的職務後，先是鮑彤被判了七年徒刑，然後是溫家寶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直機關工委書記職務，後者的位置被江澤民從上海帶來的「政治管家」曾慶紅頂替；前者的位置被一度在中南海里成為「待業人員」的滕文生取代。

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江澤民在上海的政治盟友隨主進京，乃是情理之中——雖然鄧小平扶他上臺時曾經再三警告不要搞政治的小圈子。令包括中南海圈子內的許多人都感到奇怪的是，過去問江澤民從無瓜葛，在中央機關里既無人望、又無威信的滕文生居然對江澤民投懷入抱取得成功，成為名符其實的「大內御筆」。

江澤民需要鮑彤式人物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已經坐滿七年監獄恢復了部分自由，雖然鮑彤當年被判刑是老鄧欽旨，但即使老鄧去世之後，衹要是在江澤民繼續主政，并且不對「六四」事件重新評價的前提下，鮑彤仍没有可能够重返政壇。

不過，江澤民一方面要對趙紫陽舊部趕盡抓光，以絶後患，甚至親自過問對鮑彤出獄之後的監

控措施，一方面却不能不在私下里感慨鮑彤的理論水平和他對前任總書記的忠心耿耿，實屬難得。

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為了給趙紫陽羅織罪名，江澤民親自下令要撬開鮑彤的嘴巴，希望能够從鮑彤嘴里得到趙紫陽的「反黨」證據；鄧小平為了拼凑理由，以便讓自己廢黜趙紫陽的行為能够在中共黨史上經得起考驗，也曾經暗示過，衹要鮑彤交待出趙紫陽支持動亂的具體事實，他本人即可以得到「寬大處理」。

二十多年以前，毛澤東和康生等人也曾為了趕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給劉少奇羅織足够的罪名，而對一大批在歷史上曾與劉少奇共過事的共產黨人進行瘋狂的政治迫害，終於為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拿到了足够的「叛徒、內奸、工賊」的「證據」。鄧小平本人則是這場中共歷史上最大政治冤案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二十多年以後，鄧小平竟然師法毛澤東、康生等人制造此類冤案的故伎。可惜鮑彤并沒有像他鄧小平當年在毛澤東面前那樣「委屈求全」，以致中共十四大上無法依趙紫陽的「罪行」將其「徹底打翻在地」。可見，鮑彤之所以被處七年重刑，自然是因為老鄧和江澤民對他從失望到憤恨的結果。

有人曾經拿蔣介石當年感嘆毛澤東怎么得到了周恩來這樣的人物，來形容江澤民對趙紫陽曾經得到鮑彤擁戴的嫉恨和感慨。嫉恨之餘，江澤民自然會想到自己身邊急切需要一個鮑彤式的人物。誰知物色來物色去，居然選到了滕文生頭上，真是令中南海里的在小權貴跌破眼鏡。

追隨鄧力群反對胡耀邦

出生於一九四零年的騰文生，一九六零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系學習．當年的所謂「調干生」，都是一些「實踐經驗」有餘而文化水平不足，基於政治需要被送進大學的基層在職干部，不但無需經過正式高考的節選，而且其中一部分正式接受大學本科教育之前，還要經過一段專門的文化惡補．

中共自八十年代開始注重干部知識化之後，陸續進入各級領導層，具有大學文科學歷者之間，門户之見很深，所謂「理論官」們更是如此．無論是出身於北京大學的，還是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者，對中國人民大學培養出來的「黨内理論家」從來是用非常刻薄的語言形容：「第二坤學院培養出來的人，沒有辦法不僵化！」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黨内人士戰稱中央黨校為「第一神學院」，五、六十年代曾經以「第二黨校」自夸的中國人民大學便被諷刺為第二神學院．

隨便到《中流》、《求是》、《真理與追求》等左派刊物的編輯部里走一走，就會發現那里的所謂業務骨干們，均可以單獨組織成立「中國人民大學校友會」．而滕文生又是這批人中最典型的一個．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内凡對滕文生稍有了解者，都知道該人為什么會象阿Q怕説「疤」字一樣，聽到「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字眼便會反感到生理上發生問題的地步．究其根源，概因為他在政治上「出道」、理論上「出名」，全憑當年追隨鄧力群、胡喬木積極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産階級自

由化』，而在這些左將、左棍們的眼里，當時中共開明派倡導的政治體制改革，完全是『精神污染』和資産階級自由化』在黨內的具體體現．

『文革』剛剛結束時，滕文生還祇是個《紅旗》雜志的小編輯：一九八一年一月，當時還被鄧小平十分器重的鄧力群出面組織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并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名義兼任研究室主任，立即開始招兵買馬、結黨營私，而被鄧力群網羅進去的第一批人里便有滕文生和他的理論師兄盧之超．

盧氏比滕文生年長七歲，一九五五年以『調干生』名義進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先是擔任南京市委黨校理論教員，後被選調回北京任《紅旗》雜志編輯．與滕文生共同被鄧力群調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不久，盧氏出任政治組織長，滕文生則擔任理論組組長．

一九八二年四月，鄧力群又把中宣部部工職務搶到手，盧之超隨之前往，出任中宣部理論局局長，接着，鄧力群又組建了一個中國職工思想民教育研究會，滕文生被安排擔任常務理事．

鄧力群研究室的理論特務

當時，鄧力群組建的這個研究室被規定為與中組部、中宣部、中職部平級，而盧之超和滕文生這兩位組長，則是正司局級干部，整個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負責重大政策的調查研究，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中央書記處交辦的其他事項等．鄧力群當上中央書記處書記後，一直兼任該研究室主任，直到一九七年鄧力群被迫退出權力核心，該研究室被趙紫陽撤銷為止．

其實，該研究室還有至少一項使命是無法見諸於公開文件的，那就是充當理論諜報員，秘密搜集黑材料的功能.

一九八二年九月的中共十二大上，鄧力群本人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自此便開始利用他這個研究室，事門與時任總書記胡耀邦唱對臺戲. 有人認為曾經在七十年代共同追隨鄧小平，反對「四人幫」極左路綫的鄧力群與胡耀邦之所以在八十年代里勢不兩立，表面上看是所謂「路綫斗争」，但背後隱藏的動機還是權力爭奪，小鄧對老鄧重用胡耀邦而不重用自己心懷不滿，自然要從「路綫」角度下手，處處與胡耀邦為難.

當時，中國大陸的思想理論界因為受到胡耀邦的支持而處於相對「活躍」時期，鄧力群和另一左將胡喬木為了達到一步步整垮胡耀邦的目的，一直利用這個研究室，大肆收集與胡耀邦親近，或受到胡耀邦賞的黨內改革派，以及代表思想解放陣營的大批理論界人物的「黑材料」，當時在該室受到重用的段若非、滕文生都積極參與了這一無法見諸陽光勾當.

事後有內部人士透露説：該研究室專門設有一間保密室，上自胡耀邦、趙紫陽、于光遠，……下至嚴家其、張顯揚、蘇紹智等人的黑材料，莫不皆備.

于光遠是黨内理論官，三十年代在北京投身紅色學潮後加入中共，資格甚老. 七十年代中期，他與胡耀邦、鄧力群、胡喬木共同追隨鄧小平，與毛夫人江青為首的極左派勢不兩立. 從八十年代初期開始，鄧力群、胡喬木越來越左，昔日反「四人幫」的戰友于光遠則從「實踐是檢驗真理標

準」的大討論開始，思想觀點日趨開明，從而成為鄧、胡二人的眼中釘、肉中刺，嚴家其、張顯揚和蘇紹智則都是八十年代風雲一時的「黨內自由派理論家」。

向蘇紹智先生透露此消息的一位内部人士曾開玩笑地說：「你要出你的全集，這里最全，不但有公開出版的書、文章，還有内部講話的録音」。

而且，這家研究室不但搜集黨内開明派領導人和理論界人士的「錯誤觀點」，也「研究」上述人等的其他問題，比如該研究室給蘇紹智羅織的罪名之一，便是蘇紹智曾經「為長期雲堅持資産階級自由化傾向的北京市社會科學院胡平聯繫去美國留學，而胡平到美國後即與反動組織（中國之春）王炳章一伙人合流，攻擊中國生産黨」。其實，當時蘇紹智不過是應胡平要求，以專家身份為他寫過一封推薦信。

蘇紹智先生還回憶說：一九七六年底胡耀邦在非法的所謂「黨的生活會」上被迫檢討并辭積以後，鄧力群的研究室不僅立刻抛出了開於方動之、劉賓雁、王若望的材料，用書記處的命令，開除他們的黨籍，還師「文化大革命」的故伎，用白頭文件印發了兩個材料，所謂「白頭文件」，就是説這些文件既無編輯單位，又無出版單位，也無無出版地點和日期，説明編印這些材料是見不得人的事，但這些材料，從内容到形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出諸鄧力群的研究室。

當時由該研究室弄出的黑名單，方勵之（時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王若望（上海作家）、劉濱雁（時任《人民日報》高級記者，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衹是第一批、批二批共十人：除文化界人士

吳祖光、《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王若水外，其餘都是理論界人士，包括張顯揚、蘇紹智、於浩成（曾任公安部群衆出版社社長）、李洪林（曾任中宣部理論局局長）、嚴家其、鮑彤（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原始名單上還有于光遠，據說被鄧小平親筆鈎掉．當時甚至還傳出有第三批一百人的名單，但未得到證實．

當時一位叫高放的理論界人士曾很得意地對人講，他的名字可能也在黑名單上，蘇紹智將此比喻為宋朝的元佑黨人碑，世人莫不以列名於此為榮．

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被鄧小平點名開除出黨後，鄧力群立刻命令滕文生等人拋出籌備已久的大量材料，或直接登在報上，或印成傳達材料，企圖「搞臭」他們，結果適得其反，傳達材料受到群衆歡迎，認為方、劉等說的真對．開除三人黨籍雖然由鄧小平決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通過，但所在單位的支部并不同意，只好由各個所在單位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作出開除的決定．劉賓雁被處分的決定傳開以後，收到兩千多封信，都是表示同情和支持的．人們絡繹不絕地去看望他，很多都是素不相識的人．

第一批名單上的人被處分以後，趙紫陽對處分第二批名單上的人興趣不大，王震不斷催他，并一再去找鄧小平催問．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北戴河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第二批名單，趙紫陽托辭來不及，祇帶去吳祖光、王若水、蘇紹智、張顯揚四個人的名單．討論結果是：吳祖光、王若水被勸退黨．討

論到蘇紹智的時候，據說趙紫陽說了一句話：『蘇寫了一些文章，對改革開放起了好作用』。於是決定祇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討論到張顯揚時，則決定開除他的黨籍。

會上，鄧力群表示還有一個孫長江，與張顯揚是一伙的，這兩個人都要開除出黨。

當時孫長江是科技日報副總編輯，總編輯是林自新。林自新曾長期擔任聶榮臻元帥的秘書。林自新給聶榮臻寫了信說明孫長江的情況，為他澄清一些問題，指出對孫長江的處理不妥。聶榮臻把信給陳雲，陳雲批示說：對黨內高級知識分子的處理要慎重，要把材料核對清楚，不要據不實材實輕易處置。於是孫長江幸而得免，未受處分。

堅決與思想解放者為敵

據曾與滕文生在一個單位工作過的人士介紹：當時，追隨鄧力群不得人心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據傳鄧力群本人在八九『六四』事件上以後，曾經對上門投靠的何新表示：現在我的名聲不好，你的名聲也不好，我們兩個如果公開攪到一起利小弊大（大意如此）。既然鄧力群本人都有如此自知之明，滕文生何當不明白這一事實？問題是他本人躋身中南海之初便是因為鄧力群欣賞，確實也有『士為知己者死』才考慮，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當初在人大受訓時，不但接受的『理論教育』內容僵化，更可怕的是被訓練完成了一整套僵化的思維方式，這就是決定了他即使想師法改革派，將自己的思想觀念『解放』一下，讓自己的理論思維跟上現代化水平，都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從八十年代初至今，許多人都奇怪為什

么上至鮑彤、于光遠、李銳（曾作毛澤東秘書、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等職）、李昌（曾任中紀委書記）、胡績偉（前《人民日報》總編輯）、杜潤生（前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慎之（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下至蘇紹智、劉賓雁、阮銘（前中央黨校研究室主任）等一批年齡較大、曾經接受過舊式教育的黨內知識分子干部和理論界人士能够在八十年代初迅速跟上時代步伐，而以滕文生、之超等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理論干部却僵化得可怕，究其原因，前者雖然早期追隨了共產黨，但當時的這種選擇本身就是一種從思想到行動上的「反叛」後者因為從五、六十年代接受理論啟蒙之初，便被共產黨鎖定在僵化思維模式里，特別是像滕文生、鄭之超這樣的「調干生」，進大學之前文化底子有限、綜合訓練先天不足，更決定了他們的「理論建樹」祇能在筆式大學課堂教育的基礎上「照葫蘆畫瓢」，認準一條死路走下去，所以，當鄧力群、胡喬木等人交待整理黑材料的任務時，滕文生執行起來完全是懷著一種的所謂的「使命感」在自覺行事。

蘇紹智先生回憶：當時鄧力群的研究室拋出的兩份最典型的「白頭文件」，分別是《關於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及《若干言論對照》，兩分文件都是對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三個人指名道姓地引用其文章、講話并注明出處，其他的人則不點名地被引用文章批判，包括于光遠、胡繼傳、李洪林、于浩成、王若水、黎顯（大陸著名歷史學家）、張顯揚、金觀濤（著名理論家）、劉再復（著名理論家）、戈揚（前《新觀察》雜志總編輯）、蘇紹智等。文件中將這些改革派、思想解放的學者的言論與「鬧事」大學生的大字報或言論互相對照，企圖說膽學生是受這些學者的影顯，甚至學生的言行是受

這些人指使的，而鄧小平然是受了這兩份文件的蠱惑，親自下令開除了方、王、劉三人的黨籍．

胡耀邦下臺後，趙紫陽采取的策略是對鄧力群的政治親信、理論隨從一概敬而遠之．此前，胡耀邦曾在一九八六年秋組織班子起草十三大報告，下令設置了幾個顧問組，其中的理論顧問組，于光遠、李銳、胡績偉、黎澎、于浩成、蘇紹智等「右派」人物均被延攬在內，趙紫陽上臺後，雖然因為形勢逼迫，不可能繼續重用這些黨內「老右派」，但在自己組織十三大起草班子時，也不願讓鄧力群的研究室起作用．

當時，鄧力群企圖把「反對資産階級自由化」的斗爭擴大到經濟領域，聲稱不但要批「說資産階級自由化的」，還要批「干資産階級自由化的」，引起趙紫陽的不安和公開批駁．於是，到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大召開前夕，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干脆將鄧力群的研究室撤銷．

對趙紫陽和鮑彤恨之入骨

鄧力群不甘心失敗，干脆組織了一個「反自由化寫作組」，滕文生在其中扮演了骨干角色．

據蘇紹智等人回憶：當時，鄧力群專門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租了一層樓，對滕文生等人極盡招待之能事，企圖組織起龐大的寫作班子，聲稱定了五百個大批判選題，并對用真名實姓寫大批判文章者許以三倍的稿酬，可惜響應者寥寥無幾，最終寫成僅有的幾篇，鄧力群還抱怨沒有人讀，用蘇紹智的話說：「士人均以加入這個班子為耻」．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趙紫陽組織的十三大起草小組，由鮑彤牽頭，下屬成員有袁木（曾任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發言人）、鄭必堅（曾任胡耀邦秘書、中宣部副部長）、吳國光（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辨研究室成員，『六四』後被開除黨籍、革除公職）等人，與滕文生所在的寫作班子同在一棟大樓里分租上下層，每日三餐都要在一個餐廳里見面，雙方壁壘分明，見面時不但互不過話，而且是怒目相視，但畢竟此時趙紫正在得勢，所以滕文生當時的那種忍辱負重的心境，和趙紫陽倒臺、鮑彤下獄之後的狂喜之情，外人可想而知．

正是國灰有這樣一段過節，八九『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受命參加對趙紫陽、鮑丹『罪狀』的搜集、整理工作，其狂熱程度和拼命精神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

鄧力群其人一九八七年在中共十三大上中央委員落選一事外界早有熟知，但他在當時的中顧委常委選舉過程中落選的內幕至今還未見外界披露．事真相是，胡耀邦下臺後，鄧力群為取而代之搞了大量兒不得人的幕後活動，王震、宋任窮等人都被他說服，幫他在陳雲等其他元老面前游說，并希望能够說動鄧小平；既然趙紫陽對出任總書記没有興趣，干脆就讓他代理到十三大為止，然後由鄧力群正式擔任此職．為此，王震曾專門找到趙紫陽說：我看你還是當總理合適．

於是，被逼無奈的趙紫陽委實感到自己可能斗不過王震和鄧力群一伙，同時，胡耀邦在臺上時說過的那句『兒皇帝不好當』的話，確實也令趙紫陽感到後怕，所以好幾次在公開場合講，他自己還是志在國務院，而不是黨務部門．可見，鄧力群的所謂『左』派立場，說到底還是為爭奪個人權

力服務的，

鄧小平知道此事後大為震怒，指責鄧力群在黨內搞「秘密組織串聯，嚴重違反黨紀」，但不知為什么，還是應允讓鄧力群繼續擔任一屆書記處書記，而鄧力群在中央委員選舉過程中，竟然没有過關，則是連鄧小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當時連個十三大代表都没有撈上的滕文生，每天打開他那反自由化寫作組的暗室窗簾，目睹的景象便是鮑彤及手下的一批筆杆子得意忘形地被毫華轎車接到人大會堂開會，直恨得眼睛里冒火，暗自咒罵「別高興得太早了！」鄧力群中央委員落選的消息傳來，一陣如喪考妣的痛哭失聲後，身邊的人直擔心滕文生一時想不開，干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蠢事。

樹倒猢猻散一度失業

當時，中共中央委員首次進行差額選舉，按規定中央委員落選者自動進入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中繼續接受「差額」，考慮到鄧力群如果在中央候補委員落選，面子上實在過不去，而成一對選成中央候補委員，同時又在公布出來的當選者名單中排在最後幾名之列（中央委員按姓氏筆補排序），而中央候補委員則按得票多少排序），那就不但是鄧力群本人的面子問題，簡直就是天大的政治諷刺。為此，中央政治局不得不連夜召開會議。趙紫陽在緊急請示鄧小平後，建議安排鄧力群出任中顧委常委、

按照當時的規定，中顧委委員是當代會等額選舉，鄧力群如願進入，而中顧委的常委雖然是由中顧委委員全體會議等額選舉，但規定必須得票過半數才能當選．在二百名中共元老參加的中顧委選舉會議上，鄧力群得票居然不過半數．千一屆中顧委常委的可能也徹底落空．

中共在建立顧問委員會制度時期，其內部排序為，中顧委主任、副主任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顧委常委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委員則祇相當於普通中央委員．正常情況下，凡是從中央政治局委員或書記處書記職位上退下來的元老人物，進入中顧委後都會被安排成中顧委常委，除非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比如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臺後便被連續安排了兩屆中顧委委員，而十三大在開過後，鄧力群不但從中央書記處的名單上消失，顧問委員會里也祇是個委員，知情者明白這是中共首次實行差額選舉這一體現所謂「黨內民主」的苦果，不知情者還以為鄧小平等人將鄧力群按照「犯了錯誤的同志」對待，自此至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前，是鄧力群及其手下人馬最難過的一段時光．

十三大開過之後，因為鄧小平眼看胡耀邦的下臺引來黨内保守勢和的瘋狂反撲，擔心因此會導致自己一向倡導的經濟改革付諸東流，於是便再次舉起自己的「右手」，聲稱「我們主要是反(左)」，强調「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關的其他各種領域的改革」，趙紫陽借此東風，趁機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由鮑彤牽頭，基本成員都是前述趙紫陽十三大報告起草組的的骨干成員，當然不會有人考慮滕文生的入選．

當時規定該研究室的任務是負責政治體制改革實施過程中的綜合研究和協調工作，同時承擔中央交辦的有關問題的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實際上是取代了過去鄧力群研究室的工作。自此，滕文生處於失業狀態，每天靠發牢騷、駡娘打發日子，幾個月時間里，中直機關系統的人士很難見到他一面，偶然見到他的形容：頭發不剪、胡子不刮、指甲老長，活像魯迅小說里的孔乙巳。

此時，滕文生的大師兄盧之超日子同樣不好過，早在一九八五年七月鄧力群被迫交出中宣部長職位後，盧之超在中室部立刻成了過街老鼠，繼任中宣部長是胡耀邦親自選定的朱厚澤，思想十分開明，自知繼續留在中宣部不會有好日子過的盧之超，回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又擔心受到同黨們的譏笑，何況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處境尤如「地下黨」，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統領的中辦系統，根本就不同意給這個研究室增加人事編制，衹好請求鄧力群幫他調個單位，鄧力群問了一圈，好容易說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負責人李琦收留了盧之超。

相比而言，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從業人員在都是擅長人物傳記寫作的普通文人，與盧之超和滕文生之類的理論左棍單竟有所區別，所以盧之超進入該室後，人人都對他敬而遠之，雖然被安排成室務委員，但却不擔任具體項目的組長職務，也沒有具體的工作項目分配給他。

盧之超到鄧力群處哀嘆幾次「人心不古」之後，鄧力群再次為他奔走求救，此時，趕上中共全國政協換屆，新任政協主席是李先念，主持常務工作的副主席是王任重，這一對典型的黨內僵化派元老，無論對胡耀邦和趙紫陽都非常痛恨，自然對鄧力群送上門的「真正的馬列主義理論戰士」很

感興趣，於是，一度人見人嫌，無人願意收留的盧之超，反而官升一級，以全國政協副秘書長身份，濟身副省、部級序列。

因禍得福官至副部級

本來，按照中共有關規定：祇有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才有權力用「列席」政治局會議方式干涉政務，而普通中顧委委員則最多祇能起到「迂回干政」的作用，也就是說，鄧力群自一九八七年十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後，對中共政權的影響祇能通過上不得臺面的方式進行，但鄧力群畢竟是無數次黨內殘酷斗爭的大風大浪里經歷過來的，其政治承受能力，滕文生等人無法與之同日而語，在愛到挫折的情況下，還不至於像滕文生那樣哭得死去活來，沒等滕文生等人到主子家里表示安慰，鄧力群倒是親自給滕文生等一干人馬逐一打電話，要求他們按照「主席的教導」：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雖然鄧力群其人因為站在改革派的對立面而遭世人痛斥，但中共內部即使是政治上與他站在對面立場上的人，論起他對自己手下人馬的體貼和關照，無不持肯定態度。僅就這一點而論，鄧力群比鄧小平的口碑要好得多。

為盧之超找好位置之後一，鄧力群便立刻為滕文生的工作安排四處奔走。他利用自己與陳雲、宋任窮等人的老關系，再加上滕文生過去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斗爭撰寫大批黑材料已經給

這些左派老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鄧力群力薦之後，老人們立刻同意安排滕文生出任中顧委副秘書長，由原來的司局級理論組長升至副部級.

接到中組部任命後，滕文生喜出望外、破涕為笑．立刻理了頭發，刮去滿臉臟兮兮的亂胡碴兒，重新在中南海里抖起了氣派.

當時，雖然鄧力群及其同伙個個聲名狼籍，相繼在理論部門失業，但換到左派元老執掌的部門以後，却都能官升一級，這就為一九八九年以後的左派全面復辟保存了「有生力量」，更為江澤民推行僵化政治路綫保留了組織基礎．除了盧之超、滕文生兩例，當年鄧力群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里，還有滕文生的難兄難弟衛建林．此人一九七八年才加入中共，曾有人議論鄧力群是他的入黨介紹之一，他是南開大學中文系出身，又擔任過著名左派文人賀敬之（曾任中共文化部代部長）的秘書，進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後被鄧力群委任為文化組組長，實際工作是專門搜集文化界「資產階級自由化」人上的黑材料.

一九八七年初，鄧力群的研究室拋出的整人黑名單，除了前文所述，囊括全部「黨內自由化分子」的那一份，當時社會上還風傳另有一份包括社會各界，特別是文學藝術界人士的黑名單，像北京高校以文藝批評著名的劉曉波、上海作家戴厚黄（有著名作品）《人啊，人》）、北京著名詩人北島等等，均名列其中，至少有當時在中共中央辨公廳任職的人士曾經表示見過這份名單，那么偉建林這位文化組組長因為「事業對口」，在搜集、整理、分析這些文化名人的「反動作品」方面，

豈不是信手拈來．相信連胡喬木、鄧力群都看得滿頭霧水的「朦朧詩」之類的東西，衛建林則可以用他的「馬列文藝理論」知識，一一分析出其中的反動內涵

中央書記處研究室被趙紫陽撤銷後，衛建林與滕文生共同在「反自同化寫作組」混了幾天後，便雙雙處於失業狀態．仍是鄧力群為他四處奔走求告，說服了兼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繩加以收留，委以該部門第三室的主任一職．但是，同盧之超一樣，黨史知識十分有限的衛建林進黨史研究室後幾乎無人願意與他為伍．於是鄧力群再次為他尋找更合適的單位，找來找去找到了時任中組部長宋平，安排了一個中組部黨建研究所研究員．

宋平雖然也是出了名的僵化，但與鄧力群最大的區別是「原則性」極强，一是從不拉幫結派；二是對黨內知識分子干部考察極為嚴格．故雖然接納了衛建林，但卻沒有給他在中組部內安排任何行政職務．

同樣也是因為「六四」鎮壓，令衛建林時來運轉，官運亨通，江澤民撤銷趙紫陽的政改辨，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時，然鄧力群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人員個個興高采烈，衛建要和滕文生奉命參與組建工作，并被江澤民封了副主任職務，衛氏官至副部級．有人說當時是鄧力群親筆寫信向江澤民推薦衛建林，歷數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功勞、水平，和深受趙紫陽錯誤路綫迫害的經過．

當然，鄧力群推薦滕文生和衛建林之所以馬到功成，說到底也還是「六四」鎮壓之後，由江澤民主導中國大陸政治形勢全面左轉的需要，所以，除了滕、衛兩個，當年鄧力群「反自由化寫作組」的

其他成員也都時來運轉，比如邵華澤和張雲聲分別接任了《人民日報》總編輯、副總編輯職務，丁振海則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

開明派元老亦在打擊之列

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力群曾經四處活動，上下串聯，堅持要將中顧委內部的四名「黨內自由化分子」「開除黨籍」。此四人是于光遠、杜潤生、李昌和李銳，均為黨內元老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他們從八十年代初其開始便與鄧力群存在越來越嚴重的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其中于光遠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即已經上了鄧力群研究室的黑名單；杜潤生手下一班人馬在八九學潮期被指為「動亂黑手」，其中一部分逃亡國外後成為海外民運的重要組織者；李昌除了本人反對「六四」鎮壓，其妻子馮蘭瑞亦是黨內知名的自由化理論官員，其女婿萬潤南因為「支持動亂」逃往法國并成為「反動組織」的發起人。至于李銳與鄧力群的矛盾，更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共的延安時代。

一九八六年一月，大陸《炎黃春秋》雜志曾經發表一篇《李銳與〈廬山會議實錄〉》，作者張揚文章中說：李銳一九三九年在延安結婚，妻子是他在武漢讀大學并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的伙伴和戰友，有很強的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口才文筆出衆，容貌也美麗動人，如此「才子佳人」的結合，怎么可能不引起某些心底骯臟人物嫉妒？

兩人結婚幾年後，中共「聖地」延安開始了康生領導的「搶救運動」（即共產黨史教科書中常說

的「延安整風運動」)：一時間，問題較小者，在各自機關單位「搶救」，確信無疑的「特務」則關押起來，刑訊逼供，李銳屬于後者．從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四年六月，被關押了一年兩個多月．此時，「康生手下的一名政治品質惡劣生活作風敗壞的職業打手借「搶救」李銳之機企圖破壞其家庭．」

可能是出於某種顧慮，文章作者張揚沒有點出這個康生手下的「職業打手」的大名，其實中共內部很多人都知道，這個康生手下的職業打手就是鄧力群．

延安「搶救運動」時期，鄧力群正在康生手下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組長，其理論打手的生涯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雖然奪妻陰謀最終没有得逞，但從此便為李銳的正常家庭生活埋下了很深的陰影．此後，即使李銳大人不見小人怪，作賊心虛的鄧力群也絕不顧放過李銳，一有機會便順手整治．

與鄧力群相反，李銳先生是中共黨內高層有名的「反對派」，因為延安「搶救運動」和「廬山事件」兩次被整得死去活來以後，更是對鄧力群等黨內左派理論家没有半點好感．前文提到的王震等人在十三大召開之前搞秘密串聯，試圖推舉鄧力群出任總書記的事情，便是李銳寫信向鄧小平反映的．而對自己中顧委常委的落選，鄧力群自然相信李銳起了作用，同時也相信前述三人不但投了否決票，當時肯定也在中顧委內部串連過其他人投否決票．

鄧力群一聲令下，滕文生立刻行動起來，利用自己過去在書記處研究室工作時，早已經為上述四人準備好的黑材料，在中顧委內部四處散發，聲稱「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今鄧力群和滕文生這一政治陰謀没有得逞的人，恰恰不是前述四人一貫擁戴的「改革派」的代表鄧小平，而是鄧力

群和滕文生當時最倚重的「保守派」的首領陳雲。此是後話。

「六四」鎮壓後不可一世

「六四」鎮壓之後，滕文生兩年前「別高興太早了」的咒語果然應驗。想起兩年前在中組部招待所里忍辱負重的經歷，滕文生不止一次要求親自提審鮑彤，目的是要好好出口惡氣。

至後來為什么被江澤民看好，局內人驚奇之余，認為無非是兩件事情促成。一是江澤民上臺的前提是對趙紫陽的廢黜，所以必須要啟用趙紫陽的敵手。越是對趙紫陽恨之入骨，與其不共戴天者，對江澤民來說越發可靠。

趙紫陽下臺後，一度被趙紫陽所重用的御筆之一袁木，曾經為江澤民起草過幾篇重要文稿，特別是一九八九年十月的「國慶講話」，其中重提階級斗争等方面的內容，都是袁木的杰作。但是，忌諱袁木因為「六四」死人問題搞得自己在海內海外、黨內黨外都臭不可聞可能還在其次，關鍵是袁木其人曾經一度為趙紫陽效命，而且頗得好評，江澤民對他不可能完全放心。更重要的是，袁木出身新華社系統，與鄧力群沒有深交，一心要把自己手下的大小文膽逐一推薦到江澤民身邊的鄧力群，犯不著為他袁木說情。

前文提到的滕文生的大師兄盧之超，「六四」後與滕文生一樣得意，經常以全國政協發言人自居，一再代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對外發表支持「平暴」的極端言論。可惜好景不長，某日

去天津巡游，一場車禍毀身傷腦，徹底喪失了工作能力.

排除上述二人後，中共黨內的另一御筆鄭必堅據説曾經被江澤民考慮過是否應該延攬到自己身邊．説起來，鄭必堅從資歷上講，還是滕文生在「第二神學院」受訓時的理論教頭；從水平上講，滕文生更是不能與他相提并論．鄧氏擔任胡耀邦政治秘書期間，給人印象最深的表現就是，胡耀邦講話時只要在引用馬、恩、列、毛的語録時卡殼，恭候一旁的鄭必堅隨時可以幫助提詞．即使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异端邪説者，也不能不承認鄭必堅能作到這一步，的確也是一種不可多得的本事．抛開意識形態的是非不談，鄭必堅的這一手功夫在黨内御筆中没有與之相比．從這個角度講，特別擅於在人前賣弄理論知識，以全面繼承馬、恩、列、毛、鄧自居，恨不能在未來中共黨史中將自己的名字列在其後的江澤民，最適合的政治秘書人應該是鄭必堅才對．但是，鄭必堅此前已經三度「政治急轉彎」的歷史，最終導致被從江澤民大内御筆的候選人名單上排除.

原來，早在「文革」剛剛結束時，鄭必堅曾經被委任為中共中央毛澤民著作編輯委員會理論組負責人，一度追隨華國鋒和汪東興搞「兩個凡是」．接下來便被鄧力群收進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任室務委員，被滕文生和盧之超等人以老師相稱．不久，因其理論水平取得時任總書記胡耀邦的好感，擔任了胡的政治秘書、胡下臺後，鄭必堅一面堅決反對「精神污染」，一方面又抱上了趙紫陽的粗腿，成為趙紫陽主持的十三大報告起草小組主要成員之一．所以，如果江澤民再重用一次鄭必堅，那他就真成了「四朝元老」了.

總之，鄭氏一再叛主的經歷很可能是令江澤民感覺大可利用却不可重用，特別是不可以令其隨侍左右。所以鄭必堅在中共十四大之後雖然也官升一級，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職務享受正部級待遇（因為中宣部正部長是政治局委員丁關根兼任），但江澤民却又接連派進兩名來自上海的心腹前去「加强工作」，說到底還是沒有把鄭必堅當自家人看待。

與鄭必堅相比，滕文生則很有些「士為已者死」的氣慨。從理論出道的那天起，雖然從未被江澤民之前的三任領導人正經當個人物看待，但却始終追隨恩主鄧力群，逆境中從未背判。

再者，滕文生從江澤民上臺那天起，便利用自己中顧委副秘書長的身份，幫助江澤民與政治老人們進行政治聯絡和私人交易，令江澤民更覺得此人可以重用，甚至不排除江澤民與老人黨之間的許多秘密交易，滕文生都是極少數幾個知情人的可能。

當時，中顧委的秘書長是李力安。此人當時已經年過七十，體力和精力都不允許承擔太多的工作，所以滕文生實際上總攬了中顧委的日常事務處理，除了逐一過問老人們最關心的生活待遇之外，也利用職權，隨時就老人黨的內部動向，向江澤民通風報信，反過來，江澤民也需要隨時把自己不便或無法親口向元老們進讒的內容，通過滕文生傳遞過去。

也有人認為，滕文生被江澤民收編之前，雖然從未有過被正式任命為某位領導人秘書的經歷，但他在中顧委時曾為薄一波打過「短工」所以薄一波也為他在江澤民面前說過「人才難得」之類的好話。

當時，中顧委主任是陳雲，副主任是薄一波和宋任窮。陳、宋兩人身體不好，老當益壯的薄一波不但時常參加各種活動，而且筆耕不綴，「回頭」、「回憶」之類的長篇大作接連問世。滕文生過去的本行是黨史事業，筆頭又快，幫助薄一波整理了幾次文稿後，立刻愛到格外青睞。

打毛澤東牌最合江澤民胃口

如果說八十年代的中共元老劃分為以鄧小平為首和「改革派」和以陳雲為首的「改革派」的話，當時的所謂「八大元老」中，唯有薄一波的派系歸屬最不明朗。此人在毛澤東時代就是個風派人物，在黨內被諷刺為「牆頭草」和「隨風倒」。

鄧小平時代開始後，薄氏舊習不改，鄧小平干脆利用他這一特點，讓他充任鄧自己和陳雲之間的傳話人角色，而江澤民無論是在上海工作期間，還是擔任中央總書記，但仍然聽命於鄧、陳左右制約的時期，為政作風可謂與薄一波一脈相傳。為了保證在鄧、陳之間走好鋼絲繩，薄一波不但成了鄧、陳之間的聯絡人，也成了江與鄧、與陳之間的傳話人。所以薄一波在江澤民面前為滕文生說好話，比鄧力群出馬還要管用。

為薄一波打短工的這段時間，可謂滕文生晉升大內御筆的見習期。隨便瀏覽一下薄一波已經出版的三本回憶錄，不難發現其中對毛澤東的評價頗高，滕文生對此起了重要作用，再者，經過滕文生捉刀，薄一波著作的字里行間，都能夠在推崇毛、劉、周、鄧、陳的同時，恰當地吹噓和表現自

己這更是滕文生為領導起草或潤色語文稿的過人本領

客觀上講，滕氏雖然思維方式極度僵化，但其文筆之流暢，一些改革派理論家也都表示信服，對江澤民習慣的『黨八股』套路，滕文生簡直就是信手拈來，只要江澤民交辦一份文件，講話稿之類，滕文生不但脫稿神速，而且絕對保證將江澤民的思路『錦上添花』，又絕無畫蛇添足和曲解領導意圖之嫌。

滕文生自我標榜其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的著作之一便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其出籠經過是：自鄧小平八十年代初提出所謂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馬列主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後，連中宣部內部都出現了很大的爭議，有人還編出順口溜：『說三道四，左右為難』，『三』指『三中全會』，『四』指『四項基本原則』，意思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反左，現在又型出個四項原則提倡反右，豈不是讓提理論和宣傳工作的無所適從？鄧力群手下的人，則牽強附會地將四礦原則解釋成三中全會方針、精神的發展，硬是在兩者之間找出了『共性』，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第一政策與毛澤東的閉關鎖國、階級斗爭為綱之間，分析出『內在繼承性』，滕文生正是在鄧力群的授意下，完全成了他的大作，而其中的『理論建樹』，『最合目前急於大樹特樹』第三代領導核心；』之權威的江澤民的胃口，江澤民曾經親自指示下屬：第三代領導集體不但要繼承鄧小平抓經濟建設的思想，更要繼承毛主席的政治遺產（大意），而正是根據江澤民的這一指示，滕文生等人才為江澤民炮制出『講政治』的意義所在。

修改黨章為鄧力群出氣

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以及江澤民的政治報告，滕文生都是主要起草人之一，其最得意的創作內容，便是將十三大通過的黨章修改案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內容淡化或取消。

自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曾一再强調堅持中共十三大改革路綫，并聲稱十三大內容一個字不能改，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其南巡的第一站武漢，便讓前往迎駕的湖北省委領導人向江澤民等人傳昭：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誰反對十三大路綫誰就下臺」

接下來，江澤民的地位雖一度岌岌可危，但終於反敗為勝，使得十四大人事路綫以江澤民、李鵬雙雙保住權位和楊家兄弟的交出軍權而告終。

當時，中共黨內黨外，海內漲外均將對大陸政治局勢的關注焦點集中在楊家的問題上，却沒有注意到江澤民等人已經將十三大修改過的黨章中與政治體制改革有關的內容悄悄作了變動，主要執行者便是一提政治體制改革便恨牙根直癢的滕文生。

中共十三大通過的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要的一條就是實行黨政職能分開，認為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為了保證行政首長負責制的實施，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部門和審判、檢察機關中不再設立黨組。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曾經轉發一份中央組織部《關於逐步撤銷國務

務各部門黨組的意見」指出：撤銷政府各部門現有的黨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利於政府工作的統一和效能。

雖然趙紫陽下臺後，鄧小平曾經向江澤民、李鵬等人强調，十三大的路綫沒有錯，但江澤民上臺還沒有兩個月，便在公開發表的講話露骨地批判了十三大上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江說：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强和改善黨的領導，決不是削弱和淡化黨的領導，江澤民還特別針對趙紫陽在十三大政治報告中强調的『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句話批駁說：『黨的領導作用只提政治領導不够，還應該有思想領導和組織領導』。

接下來，國務院各部門已經被撤銷的黨組陸續恢復，審判和檢察機關的黨組更是江澤民首先要求恢復起來的，已經實行了行政首長負責職的單位，特別是實行了校長負責制的單位，一律被迫『歸位』雖然沒有重提毛澤東時代的『黨委一元化領導』但所謂『黨委領導下有校長負責制』說白了還是徹底退回到『黨天下』的時代。

對江澤民此舉深表擁護的滕文生等人，在起草十四大黨章時，不但徹底否定了十三的相關內容，而且在一九八二年通過的十二大黨章基礎上，把設立黨組的範圍規定的更為細致：『在中央和地方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經濟組織和文化組織和其他非常組織的領導機關中，可以設立黨組』。

十三大在修改後的黨章中規定：『企業和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基層組織，對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在本單位的貫徹執行實行保證監督，這些基層黨組織應以主要精力加强黨的建

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群衆工作，支持行政負責人按規定充分行使職權，并對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

這一段在十四大黨章修改案中被改寫成：「全民所有制企業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圍繞企業產生經營開展工作」；「實行行政領導人負責制的事業單位中黨的基層組織，發揮政治核心作用」，這中間的「核心」兩個字，其實就是毛澤東時代「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極左口號的理論翻板，使所謂「行政領導人負責制」只剩下諷刺意義，而之所以還要保留這句空頭許諾，使江澤民政體與毛澤東政體在文字上還能略有不同，大概是江澤民還不敢讓滕文生等人在「無産階級復僻」問題上，走到令鄧小平再次感到忍無可忍的地步.

當然，在江澤民的十四大政治報告和十四大黨章中，鄧小平所要求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被正式寫入. 現在看來，江澤民在當時仍還在世的陳雲等人的支持下，就經濟體制改革問題向二大水平）問題上作了讓步.

早在江澤民上臺之前，鄧力群就曾經組織了一個中國職工政治工作研究會，鄧力群自認會長，滕文生本人在許多打着「學術研究」旗號的「學會」、「研究會」中都有挂名，但在對外介紹自己簡歷時，單單要其把中國職工政治工作研究會常務理事的名份專門列出，以示其重要無比.

當時，鄧力群及滕文生等人對胡耀邦及後來的趙紫陽「一味消弱黨組織對企業的領導權」憎恨無比，對事業單位取消黨組更是如喪考妣. 所以，十四大黨章修改案正式出籠後，滕文生認為替自

己人出了一口惡氣，鄧力群則得意地表示終於「打了一場翻身仗」。

五年前，連個十三大代表都没有撈上的滕文生，縮在「反自由化寫作組」的暗室窗後，眼看鮑彤等人皮囊里夾着由他們執筆完成的黨章修改草案騎車前往十三大會場，惡狠狠地詛咒趙紫陽的政治親信們「別高興得太早了」。五年後，他滕文生不但將鮑彤等人塞進中共黨章中的，本來就非常有限的那點政治改革内容逐條否定，鮑彤本人都已經成了共產黨的階下囚。

就在滕文生懷揣由他主筆的修改黨章的報告，跟在現在總書記屁股後面耀武揚威地進入十四大會場時，鮑彤因為長期置身單人牢房已經嚴重失聲，想説句「別設法得太早了」都發不出音來。

强調黨指揮槍為江澤民正名

在主筆修改黨章的過程中，滕文生直接為江澤民本人作出的重要貢獻是在「總綱」部分中，加進了江澤民個人最需要的内容。

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和十三大修改後的内容中，關於共產黨對武裝力量的領導都説得比較含糊，只是用「必須加强人民解放軍的建設」這樣的語言一筆帶過，所以，當時所謂「黨指揮槍」的提法，首先與中共憲法内容相違背，同時在黨章中也語焉不詳。

當時，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上連個中央委員都不當，黨内身份僅剩下個普通黨員，但却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十三大修改黨章時，特別為他的個人需要，而將過去黨章中規定的，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產生」這句話取消．

輪到滕文生主筆對黨章重新修改時，他曾主動向江澤民進言，表示或者將專門為鄧小平删去的這句話重新收入；或者干脆規定黨的中央總書記是中央軍委的當然主席，而江澤民很可能是基於鄧小平雖然已經讓位，但畢竟還没有去世的考慮，没有恩準滕文生的建議，滕文生又建議在「總綱」中加進了一段過去没有的内容：「中國共產黨堅持對人民解放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的領導」．敀得江澤民龍顏大悦！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一批在「文革」時代受毛澤東政治冷落或人身迫害的黨内元老人物聯手廢黜了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擁戴鄧小平為中共政權的實際領導人，開始了所謂「以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中共新時代，而當時比鄧小平黨内資格老的陳雲、彭真等人之所以情願鄧小平高居他們之上，關鍵原因是陳、彭等人從戰爭年代開始便没有過掌握軍隊的經歷、鄧小平在中共建政之後雖然脱下軍裝從事黨務、政務工作，但他畢竟是中共軍史上四大野戰軍的八位軍政一把手之一，到七十年代末，其他七位已經全部作古．

江澤民接替鄧小平軍委主席職務之後，自知没有可能像鄧小平那樣，論資歷和個人威望在軍内壓住陣脚，衹能靠拼命强調「黨指揮槍」來體現他江澤民在三軍統師的法理性．但無論黨内黨外，都不斷有人懷疑鄧小平去世之後，中共政壇内是「江指揮槍」，還是「槍指揮江」．滕文生在黨章内容中加入的這方面規定，一是為從「黨法」角度申明衹能是「江指揮槍」；二是要從意識形態範疇

將「軍隊國家化」的呼聲徹底對殺。

整個八十年代里，無論是胡耀邦還是趙紫陽，對「黨指揮槍」的口號一直進行淡化處理，而鄧小平從華國鋒手中搶到軍委主席職務後，黨內一把手胡耀邦居然連個軍委委員都不是：從一九八七年開始鄧小平僅僅以一個普通黨員身份繼任中央軍委主席，此時的黨內一把手趙紫陽雖挂名軍委第一副主席，但却又在這「第一副主席」後面設一常務副主席，趙壓根兒管不到軍委那一段。所以，鄧小平擔任軍委主席期間，成天把「黨指揮黨」持在嘴邊，既沒有必要，又破具諷刺意義。

另外，基於當時黨政職能分開的需要，解放軍的內衛部隊改編成武裝警察建設制以後，一度明確宣布歸屬國家公安系統，其總部直屬國務院公安部領導。

當時，鄧小平曾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表示：「有些屬於法律範圍的問題由黨管不合適黨干擾太多，就會妨得在全體人民中間樹立法制觀念」；「法律範圍內的問題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為此，特別給當時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喬石安排了一個國務院副總理的頭銜，中央政法委員會甚至一度被縮編成中央政法領導小組，目的也都是為了在「黨政分開」前提下，令政府系統對武裝警察部隊及公安、司法部門的領導顯得有名有實。

江澤民上臺之後，其在黨內高層玩弄的諸項權術之一，便是一步步將喬石以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身份一手掌控的武裝警察部隊完全納入中央軍委系統。在趙紫陽時代，武警總部的首長任命每次都是單獨由國務院發布，江澤民時代則是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共同發布，而此時的國務院不過是挂虛

名而已。從此，無論是上届中央政法委書記喬石，還是本届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都因為在中央軍委里没有職務，而再無可能參與對武警總部的人事安排，同時，又因為武警部隊的級別是套用正規軍系統的所謂「副大軍區級」，而副大軍區級的軍政人員任命，按中共内部規定僅僅由中央軍委決定，無須上政治局常委會征求諸常委意見。這一來，政治局其他人員即使想用「集體領導」的名言阻止江澤民在這支「内衛部隊」中安插親信，都鞭長莫及。

在外人看來，中國大陸的武裝警察部隊無論歸軍委系統還是歸屬國務院的公安系統，不過是其内部職權分工而已，歸來歸去，不仍然還在共産黨的的獨裁統治綱里。所以，外界觀察中國政治形勢時，幾乎無人注意滕文生幫助江澤民在十四大黨章中所做的這些細微手脚。

但是，如果從中共高層的權力斗争角度，特别是從未來鄧小平去世之後黨内可能發營廷政變角度，武警部隊的控制權和最高指揮權因為系統的歸屬，落在哪個具體人主管手上，絶對不是小事一樁。在外部環境相安無事的對候，對負責内衛的武警部隊的以控制權，甚至比對國防軍的控制權還要重要。而經過十四大修改後的黨章中，把解放軍和「其他武裝力量」并稱，目的就是把武裝警察部隊也必須由江澤民親自指揮，用「黨法」形式固定下來。

一九八八年萬里出任第七届全國人大委員長時，曾經在其「就職演説」中，將國務院工作和軍委工作一并列入全國人大的「監督範圍」，當年七月一日，七届全國人大常委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常委會工作要點」中，專門强調加强監督工作的範圍包括：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而中共十四大之後接任萬里人大委員長職務的喬石，則很知趣地將在這個監督範圍內去掉了「中央軍委委員會」從此，「軍隊國家化」問題終於被徹底禁聲，滕文生對此「功不可沒」。

總之，滕文生主筆起草的十四大黨章中的許多關鍵內容，不但是對十三大路綫的徹底否定，甚至比十二大黨章的調子還在。

榮升正部級對江澤民感激涕零

為了表示對滕文生的器重，中顧委在十四大上被撤銷之後，江澤民立刻半滕氏的正式編制安排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趙紫陽的政改辨早被撤銷）兼總書記政治秘書（正部級）最近幾年里，更是接連帶他出國，委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特別助理」的封號，令滕文生感激涕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雖為王維澄挂名，但此公却没有撈到一次以「特別助理」身份陪同江澤民周游列國的機會。

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再次號召反左，令江澤民一度非常被動，當時，中南海里曾經傳出消息：江澤民叮囑身邊的政治親信，理論幕僚們「不要與鄧力群走得太近」；無論當時是否真有其事，事實是十四大開過之後，江澤民便迫不及待地將鄧力群的文膽滕文生正式委任以「秉筆太監」，而且還故意帶他周游列國，將滕文生大名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別助理」名義論新

聞媒體一再曝光，好像生怕外界不知道他江澤民正在重用鄧力群文膽這件事一樣。雖然江澤民不得不把繼承鄧小平路綫之類的政治允諾時常挂在嘴邊，但滕文生等人私下里都曾經言論過：鄧的南巡講話政治效果很壞，給江總書記的黨内形象和威信造成極大傷害，所以，中南海里甚至有人分析說：江澤民重用鄧力群文膽，真好像是在與老鄧賭氣，鄧小平在其南巡講話中批判「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指的就是鄧力群及其手的理論打手，那么我江澤民偏偏就要重用這類人。

鄧力群自己都承認自己「名聲不好」，其手下以滕文生為代表的幾大文膽即使在中辨系統也既無人緣，又無聲望，江澤民對此不可能一無所知。但就像江澤民喜歡在嚴肅的公衆場合，甚至外交場合掏出把梳子梳頭一個道理，在別人看來有傷大雅甚至有損國家尊嚴，我偏偏再作幾次給外人看看。最后發展到西班牙進行國事訪問時，在人家的元首面前毫無顧忌地撓首弄資。從「別人看不出慣的事情我偏要作」類推，江澤民重用滕文生也許出於「別人不喜歡的人我偏要用」的心理。

按照中共現存政治體制，國家主席是一個象徵職務，中南海里也從來沒有為國家主席專門設立的辦公機構（比如國務院總理有總理辦公室），而江澤民身邊的常設辦公機構——包括秘書、警衛及生活服務等一應事項，都是中辨系統的黨務機構。所以，所謂的「國家主席特別助理」并不是一個列入中共行政序列的琥式官職，更没有級別上的具體規定（比如外交部部長助理被明文規定可以是副部級，也可以是司局級），而是江澤民藉口出訪需要，給部下的一個外交上的「名份」。

到目前為止，江澤民出訪時，祇有四名手下親信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特別助理」頭銜隨訪，他們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被稱之為江澤民大內總管的曾慶紅；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兼中共中央警衛局局長，被稱之為中南海總鏢頭的楊德中上將；由江澤民衛士長升任中共中央警衛局副局長職務的由喜貴，以及滕文生。由此可見江澤民對滕文生的器重程度。

雖然江澤民上臺後恢復了毛時代的「黨委領導核心制度」，但在與西方非共產黨國家打交道時，人家并不認同你「黨的書記是一把手」的政治制度，比如北京市代表團到美國訪問，人家請的是北京市長李其炎，身為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的尉建行是得不到這種出訪資格的。

整個八十年代里，很多中共司局至部級干部，都是寧願到國務院系統任職，而不願到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工作，原因之一便是出國不便。當時，中共高層考慮到這個問題，便在中職部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里安插一些中直機關負責人和各省省委書記，可惜也祇能出訪碩果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窮國，不大可能有機會到西方世界周游。

外人如不與中共官僚多作接觸，無法理解他們對出國周游的渴望之情。前文提到的中職部組團出訪時，各省省委書記都要「排排座，吃果果」，還常有「不公平」的抱怨傳到中共高層耳朵里，比如被安排出訪非洲的，往往攀比某省書記為什么可以被安排去東歐？被安排出訪北韓的，往往抱怨為什么自已輪不上去古巴，古巴雖然也是窮得令老百姓啼饑號寒，但畢竟與美國一水之隔，更何況其民風還比北韓開放，至少滿街都是身着比基尼的性感女郎，這種眼福在北韓如何可能得到飽嘗？

另外一些在位時没有撈到出國機會的領導人，退位後也要想盡辦法撈到一次「公派」．比如前中共人大副委員長賽福鼎例是由總政治部聯絡部的「民間」機構國際友聯，安排到美國一游，出面邀請的是美國富商．

所以，如今江澤民利用自己國家主席頭銜和出訪西方世界的方便之機，搞賞黨自己在黨務系統内像滕文生這樣的幕僚，確實是棋高一招．

從此，滕文生的意識形態事長得到了前所有的發揮．江澤民在一九九五年拋出的「講政治」事論，最滕文生的又一杰作．另外，中共十四大以後，從江澤民口中説出的，明目張膽否定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思想的許多極左口號，據信都是出自滕文生的禿筆，其中最典型的一句是：「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換取經濟一時的發展」．至於諸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證，經濟建設民是搞不好的」之類，則完全是毛澤東時代「抓革命，促生産」的翻版．

雖然連「國師」汪道涵都擔心這樣搞下去會「授人以柄」，但滕文生目的雖然是要幫助江澤民，用這種重新加强意識形態的辦法，對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在政治上造成的「負面影響」進行「理論糾偏」，進而阻止黨内外的政治反對力量打着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拉攏民心，涣散黨心．

有報導説，滕文生等人眼看江澤民對這些充滿毛色彩的政治口號不但不反感，反而一一接納過去變成了「江澤民語録」，喜不自滕，干脆鼓動江澤民一不做，二不休，下令在黨内制止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討論．

按照滕文生的邏輯：目前的黨務之急，恰恰不是改革政治體制，而是要强化現存政治體制一在思想戰綫，過去「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是本末倒置，政治工作必須是得到切實强加之後，才有是否需要和如何改善的問題。總而言之，共產黨的領導祇能是加强和完善，不但「改革」的提法不應再提，「改善」的提法也應少提或干脆不提，用「完善」兩個字更為妥貼。

滕氏還表示：對「改革思想政治工作」的提法，現在徹底肅清其流毒的時候了，趙紫陽所說的「改革」，其實是「取消」的同意詞。

也有報導說：滕文生曾經打着為總書記「集思廣益」的旗號，就政治體制改革「負面效果」的問題在左派理論家圈子里發起討論，一批自稱長期被鄧小平壓得抬不起頭來的左炮、左棍們，紛紛請求滕文生向江澤民轉達他們的强烈反映。幾家著名左刊編輯部的人甚至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口號已經完全為境內外敵對勢力和外對勢力所利用，成為國際反共、反華勢力「以壓促變」、「以誘促變」的代名詞。

相關報導中還透露：也許是感覺滕文生等人在這方面的「理論」過於露骨，與江澤民不時還要挂在嘴邊上的「發展社會主義民主」針鋒相對，互為諷刺，所以江澤民一方面同意滕氏關於停止改革討論的上奏，一方面加了一句時間限制詞，在會議上正多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黨的十六大之前不再討論」。

按照江澤民在政治局會意上的解釋：籠統地講「政治體制改革」，并且把它作為「一時常出現在報紙上、理論文章中的口號，很容易誤導與論。整個八十年代里，黨內自由化分子、社會上和境

外敵對勢力，一再利用我們黨自己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口號，以促進「改革」為名，與執政黨進行所謂的「合法」斗爭．一時間，什么「法大於黨」、「國際國家化」、「新聞自由」等等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冒出來了．所以在起草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時，我同意了下面同志的建議，沒有在文中繼續錯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詞匯，而是以「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完善黨規黨法，實現黨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等具體内容來説明問題．

上述報導是否完全屬實，無從查證，但一九九四年召開的中共四中全會《決定》里，確實沒有一處政治體制改革的字樣．此後，凡公開發表的相關理論文章中，「政治體制改革」這幾個字出現的頻率越來越低．

是否會成為毛遠新的第二

一位八十年代初、中期曾經在胡躍邦身邊工作的人士評論説：政治體制改革是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開始時計論并逐步實施，一九八七年黨的十三大上大張旗鼓宣傳并準備「大動干戈」．所以，一九八八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歷史上的黃金年份．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至今，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一直處於停止甚至局部倒退狀態．江澤民居然對此還不滿意，現在居然提聃上六大之前再不準討論此問題．那么假設十六大之後重新開禁，時間也已經到了二零零二年，等於是要將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代化進程．推進整整二十年．

將江澤民身邊的幕僚人物逐一排隊就會發現，唯有滕文生一人從出身經歷上與「上海幫」沒有歷史淵源。正因為如此，滕文生就更為抱上了江澤民這條粗腿而自感無比幸運，自我陶醉之余，倒也確實是隨時隨地表示他對江澤民的絕對效忠。

滕文生確實是把江澤民看成了「當今聖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員觀察到，他們的滕副主任祇要在屬下面前說起江澤民，總是語帶感情，從來都是總書記如何如何，省略掉「江」字，一方面表現出他對江澤民的感情，同時也體現出他與江澤民的親近。一次一位工作人員無意中說了一句江澤民如何如何，滕文生立刻變臉，怒斥道：身為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員，怎么可能對總書記直呼其名？

確實，中國封建明代里，不要說一個「秉筆太監」，就是敢於自封「九千歲」的宰相大人，也必須張口「皇上」，閉口當今聖上」，豈敢對萬歲爺直呼其名？

這位工作人員回憶，當年趙紫陽手下的鮑彤，正式場合里也不過是「紫陽同志」如何；稍微隨便一點的場合，則是「老趙」如何。有時大家正在談話間，趙紫陽推門闖了進來，連幾位年輕干部都敢嘻嘻哈哈地打趣：「說老趙，老趙到」。於是「老趙」也跟着大家一起嘻嘻哈哈。

相比之下，江澤民之於趙紫陽，滕文生之於鮑彤，孰優孰劣，誰得人心誰失民意，中辦系統的普通工作人員心里都清清楚楚。甚至已經有人暗地里引用滕文生過去詛咒鮑彤的話回敬：「別得間得太早了」。「秉筆太監」的雅號也因此從中南海里傳出。

更有中辦工作人員斷言：雖然滕文生如今的身份和地位都相當於趙紫陽時代的鮑彤，但鮑彤雖然系

獄七年，却引來同情者無數，今後的滕文生一旦跟着江澤民倒臺，下場不會比當年的毛遠新好多少！

滕文生小傳

一九四零年生於湖南常寧。
一九六四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
一九六五年加入中共，分配至《紅旗》雜志社工作。
一九八零年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任研究員、理論組組長。
一九八五年任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常務理事。
一九八七年任「反自由化寫作組」副組長。
一九八八年初開始擔任中人中央顧問委員會副秘書長（副部級）。
一九八九年七月兼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一九九二年底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澤民政治秘書。

王滬寧

江澤民的幕僚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專家當智囊 教授變幕僚

——江澤民的政治化妝師王滬寧

目前，江澤民正在努力學作新一代政治強人，故需要有新一套理論充實和武裝自己，更需要用這套新理論來向社會大衆，向黨內黨外解釋他這一任「領導核心」的合法性和他這一代領導集體所奉行的政治、經濟路綫的合理性。如果說鄧小平為代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是以資歷服人的話，江澤民為代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必須找出一個道理服人。據聞中南海的「帝師」汪道涵就曾對江澤民建議說：第三代領導核心必須抓緊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東西」。這便是江澤民政治幕僚群中增加了一個王滬寧的大背景。

從九十年代初開始陸續聚集在江澤民門下的政治幕僚們，個個都具備所謂的「知識化」水平——包括被稱之為「當代帝師」的王道涵，說起來還是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老學長。不過，若是按照西方對「知識分子」概念的定意，江澤民的全部幕僚中，唯有王滬寧可以自詡是知識分子出身，甚至還一度被認為是「體制外自由派知識分子」。正因為如此，王滬寧以政治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身份加盟江澤民智囊團的事實本身，便在中共黨內黨外引出一番強烈震動。而江澤民廷攬王滬寧入局的目的，則是在自知自己政治理論貧乏的前提下，希望借助王滬寧的「馬克思主義新解」為「經第三代領導核心作」一番理論包裝。所以，王滬寧的身影在中南海里出現不久，便被人指稱為江澤民的「（政治）化妝師」。

拉攏朋黨江澤民對官許願

一九九五年初，如果説江澤民借反腐敗為名，成功地整垮了以陳希同為首的北京幫，狠狠地教訓了以鄧家後代為代表的一批經商「太子黨」的舉措，一度起到了令黨內黨外刮目相看作用的話，他將上海復旦大學青年教授、著名政治學家王滬寧正式納入自己門下，則在大出知識界階層引起一番强烈回應。此消息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四月初即傳遍上海、北京兩地，王滬寧接旨進京前向朋友透露出的新任職務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室務委員兼政治組長。政治組長僅僅是個正局級職務，但室務委員是可以享受副部級待遇。

事實是，江澤民決心廷攬王滬寧入伙之初，即令曾慶紅為他安排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職務。無奈中組部系統過份僵化，一味强調干部培養，晉級都需要階梯式的過程，江澤民這才同意暫時將王滬寧安排進政治組。

王滬寧在復旦大學的行政職務相當於中共黨、政系統里的正處級。如果直接提升副部級的政研室副主任，等於是連升三級。

以往，中共組織系統在培養干部「第三梯隊」的過程中，連升數級的先例確曾有過，現公安部長陶駟駒便是其中之一。一九八三年陶氏曾以「優秀中青年干部」的名號，從公安部副處長直升副部長等於是連升四級。後來，因為陳雲一再强調「過程」二字，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這種「直升

飛機」式的干部冒升現象被基本杜絶.

另有一種説法是，當時中組部已經在朱熔基經濟智囊升官的問題上接過一道，所以對江澤民的理論智囊也要一視同仁安排「考驗和過渡期」：一九九四年朱熔基手下的所謂經濟理論界「四大天王」周小川、李劍閣、樓繼偉、郭樹清先後都在官途上受阻.

樓繼偉早在八十年代即被朱熔基從北京帶到上海，然後又被從上海帶回北京，安排到國家計委當了個司長．朱熔基進入政治局常委，在組織問題上有一定的發言權後，便積極為樓繼偉争取財政部副部長職務，但中組部那一關就是過不去.

樓氏的父親是五十年代的老副部長，説起來他也是「太子黨」成員」，本人確實也理論建樹頗豐，按照中共干部「四化」標準，中組部長期卡他也於理不通．在朱熔基再逼問之下，樓氏終於在一九九五年年底被晉升副省，部級，但却是被發配屋窮鄉僻壞，任命為貴州省副省長．有人前往道賀，舉例説當年胡錦濤便是被從北京發配至貴州，如今已經高居「領導核心」．樓氏没好氣地反駁：所以我貴州干幾年後也得去西藏是不是？

有來自中國國務院的消息説：海外關於樓繼偉出任貴州副省長的消息比中組部的任命整整晚了半年，原因就是樓繼偉接到任命之後，還藉口朱熔基交辦的項目没有完成，遲遲没有到貴州上任．與此前後，朱熔基提議周小川提任中國銀行行長（副部級）也遭到中組部的抵制，以致提拔李劍閣和郭樹清的動議一直就没有敢端上臺面.

周小川的父親是中共元老周健南，曾任國家進出口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和機械工業部部長。周健南在進出口委任職期間，汪道涵與他平級，江澤民是他的助手，李嵐清是他的部下，相互之間關系甚好。江澤民和李嵐清上門參與拜見周健南時，周小川都是稱他們「澤民叔叔」和「嵐清叔叔」。

周小川一九八五年獲博士學位後，出任國家體改委委員和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在師兄弟里政治出道最早，自然與他曾在進出口委任主事的父親不無關系。所以，周小川和他的師弟樓繼偉等人，常常被人稱為「理論太子黨」。但周小川就是這樣雄厚的政治背景，再加上朱熔基的力薦，中國銀行行長和職位還是沒有輪到他頭上，可見領導人的理論智囊要想在行政級別上平步青雲，也不是那么容易。

中共國務院里早有傳聞說，如果樓繼偉如願擔任財政部副部長，十五大上便會進入中央委員序列，一九九八年的九屆人大上便可接任財政部長職務。至於周小川，朱熔基原來推薦他出任衹是副部級的中國銀行行長也衹是過渡，本希望讓他過渡一下便可接替吳儀的對外經貿部部長職務。而李劍閣，據聞被朱熔基看好為下届國家税務總局局長（正部級）接班人；資歷較此三人淺的郭樹清則準備被安排為國家計委副主任。但現在看來，朱熔基的這一組閣計劃，在十五大上全面實現的可能性已經不是很大。十五大之前的朱熔基，必須全力以赴先爭取實現他個人的宰相之夢。

但不管怎么說，中組部卡了樓繼偉一下，還是級了一個副部級職務。依此類推，江澤民已經向

王滬寧許諾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職務，遲早也會在中組部系統過關．

不當外交官有先見之明

出生於一九五五年的王滬寧，十九歲時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時，本意是被作為「工農兵大使」培養的，他所進入的班級亦被稱之為「大使培訓班」．當時中共政權分別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校，開辦這類培訓班，北京方面應選入校的多是一些高干子女或外交部，中職部系統的干部子女，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陳毅元帥的女兒陳姍姍，而且是經周恩來提名，毛澤東御筆特批．

不過，陳姍姍等人在國內培訓一段時間後，即被派往英國深造．而王滬寧可能是因為學習的法語，沒有外派機會．待完成三年工農兵大學生的學制後，已經趕上「文革」結束，中斷十一年的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有待恢復，王滬寧扭頭便進入了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從師《資本論》專家陳其人，攻讀碩士研究生．

有接近王滬寧的人士介紹：他的法語極棒，英語閱讀沒有問題，口語不很過關．關於他為什么沒有成為外交官的問題，王滬寧自己不願介紹，人有便挖苦他法初選錯了語種（事實上當時選學什么語種很可能由不得王滬寧個人），後來因為不願意被派到法語系的非洲小國家吃苦，才改換門庭．

不過理在看來，王滬寧不當外交官的選擇不失為聰明之舉．以陳毅女兒陳姍姍為例．王滬寧已

經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的時候，陳姍姍不過是上外交部的副處長，與王滬寧根本無法比知名度．從選擇仕途的角度，外交系統一般說法來是升遷最慢的地方．

在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讀研究生時，王滬寧結識了從北京來的女同學周琦．周氏是中國大陸老一代國際戰略專家周季榮的女兒．周季榮因為長期在國家安全部直屬的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一九八三年以前隸屬中共中央調查部）工作，所以在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邀請訪美時，被冠以中國國家安全部顧問頭銜．

女承父業的周琦在國際關系專業上也頗有成果，畢業後也没有要求回北京，不知是因為與王滬寧的關系，還是因為復旦大學確實需要而留校任教．不過，王滬寧奉調北京之前，周琦因為與王滬寧的婚姻關系破裂已經先期調回北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任副研究員．反正兩人結婚後各顧自己的事業，一直都没有要孩子，如今各奔東西倒也無牽無挂．

王滬寧進京後，復旦大學過去分配給他的住房仍然保留．因為已經是獨身一人，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徵詢他的意見時，他主動表示兩室一廳的住房已經足够．有私人朋友到他在北京方莊小區「官邸」拜訪，不相信這位江澤民親信的生活條件竟然如此清苦．感慨之余則開玩笑說：既然你在幫江澤民詮釋反腐敗的重要性，也衹能如此委屈自己．

八十年代初開始「理論介人」

攻讀碩士研究生後，王滬寧至少是上海方面的同批青年學生中，進入角色最快者之一，用其崇拜者的話說：「出道甚早，八十年代曾經在政治學、國際關係研究領域獨領風騷，」這樣高的評價，特別是「獨領風騷」四個字，在北京、上海等地的理論界認同者有多少，令人懷疑。不過如此肯定王滬寧的人同時也承認：理論界本來就是看誰都不順眼。所以，王滬寧出道之始，即不斷遭受各種批評，比如認為他的著述過於「淺白」，不够」理論化」，并不具備「程式化」特點。跟不上時代發展的毛主義衛道士認為他的觀念和理論是標新立异和離經叛道；支持改革政策的黨內理論工作者認為他擅長用馬克思主義解釋新問題，其見解和主張起到了賦予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以現代實用意義的積極作用；而從理論基礎上否定中共建黨治國之指導思想者，則認為他不過是學會了一些《毛澤東選集》和《鄧小平文選》中没有的政治學時髦術語，生拉硬扯、牽強附會地圖解馬克思主義「新意」，充其量具備一點為中共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找出「現代理論根據」的實用價值。更有看不起王滬寧的人干脆認為他的所謂「政治新論」不過是把馬列文論、鄧小平文選及西方的《君王論》、東方的《資治通鑒》「一鍋燴」。

無論哪種評價較為中肯，也不得不承論一個事實，那就是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王滬寧即開始在大陸思想理論界顯露頭角，一度曾是上海復旦大學最年輕的人文學科副教授，在整個大陸的政治理論界是叫得響的幾位青年學者之一。用滬寧自己的話說：「我的長項是政治哲學，對此道一向念兹在兹。但在中國變革的大氛圍中，終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熱烈運動之感召，動手寫起有關中國政治

發展的文章，鬼使神差竟然寫了一些，而且與味愈增」。

政改理論曾受胡耀幫關注

一時間，王滬寧的論文和譯作在《社會科學戰綫》、《國外政治學》、《政治學研究》等專業刊物一篇接著一篇，令同行新老學者不得不瞪大眼睛關注；其觸及當時最補充關心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時論文章則在《讀書》、《世界經濟報導》等理論先區報刊，及《文匯報》、《解放日報》、《光明日報》等擁有衆多知識份子讀者的報刊上連篇累牘，不但將影響力擴大至政治學專業之外的學界領域，也逐漸受到一些中共高層領導人和上海市領導人的注意。其《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背景與前景》、《轉變中的中國政治文化結構》、《建立一種新的政治發展觀》、《初級階段與政治體制改革」等長短立論，曾引發起出許多或贊成或反對的討論意見。其《論民主政治建設》、《推進政府功能的國際化》、《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主體性》、《論政治透明度》等文章，僅從標題看便給人思想非常「前衛」的感覺；而《當代美國民主共和制比較研究》、《當代西方政黨的結構組織比較》、《當代政治學分析》、《國家主權》等文章和專著，更給人以研究視野十分開闊的印象。王滬寧自己解釋自己這段時間的表現是：「頗有點（理論）（介入）的味道」。

大概從一九八八年開始，王滬寧「理論介入」的冲動漸漸淡了下來，對於外界褒貶參半的評價，王滬寧統統回報以不經意的微笑，借編輯自己作品集之機詮釋自我説：「我一直給自己設計了

一種生活：清心寡欲地作學問，不受外部紛繁世界的騷擾和誘惑，像魯迅先生所言：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冬，我相信學問出於清靜，應當保持（大腦衛生）。」

但熟知王滬寧的人士則反駁他的這段表白言不由衷。就在他熱衷於「理論介入」的同時，即已經同當時上海市委的四大政治「新星道理」開始熱綫聯絡，這四大政治「新星」分別是吳幫國、黃菊、曾慶紅和潘維明。

當時，一九八三年才從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的潘維明已經高就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雖因為黨齡太短而沒有被安排為市委常委，但在市委新、老領導人眼中則是一個有能力、有思想的後備人才。

潘維明就任上海宣傳部長後，曾發起一項「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的構想，在招賢納士的過程中，與王滬寧十分投機，就此王滬寧也開始被曾慶紅等人看重，據聞王滬寧的文章和著作又被曾慶紅推薦給胡耀幫看過，胡耀幫下臺後去上海休息，曾點名要見曾慶紅、潘維明兩人，言談之間還提到王滬寧有關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研究很有建樹。

「一國兩制」的證明人？

更有與王滬寧接近者透露，中共對香港采取「一國兩制」政策的理論機架，最先是包括王滬寧在內的上海「二王」提出來的。「二王」的另一位叫王邦佐，復旦國際政治系教授，曾經擔任過復旦大學教務長、上海師範大學校長等職，是王滬寧的學術前輩。

八十代初期，上海理論界即有「二王文章」一說：二人當時曾經寫過一篇從未發表過的理論報告，內容是根據中共當時已經許諾的，大陸與臺灣統一，臺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等內容，從理論上詮釋一個國家內分別實施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可行性，認為將香港從英國人手上拿回來後，應允許其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并首先提出了「一國兩制」這個用詞。

透露這則消息的人士稱：此信息確實没有從王滬寧本人那里得到證實，今後也將是一樁「無頭案」。

道理很簡單，毛澤東死了這么多年了，當年為他捉刀帶筆的人，有幾個敢於聲稱毛的某幾篇文章或某個綱領性口號是并非出自毛澤東的腦袋？所以，果真是「二王」率先提出「一國兩制」的理論構架，包括具體用詞，他們兩人豈敢向鄧小平討「專利權」？中共的官式宣傳，一概標明「一國兩制」這一概念是鄧小同志一九八二年九月在會見外賓時首先提出的，一九八四年又經過全國人大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具有了「法律效力」。但是，為什么一國可以兩制要從政治原理、政治學角度進行一番自圓其說，自己承認只讀馬列主義ABC的鄧小平絕無這個水平。非但是「一國兩制」，諸如「四項基本原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等概括性政治崗領，最先都不是出自鄧小平之口，「四項基本原則」的提法是胡喬木的杰作；「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趙紫陽的發明（更大的可能是當時效命趙紫陽的某位文膽的發明），只不過這些東西從鄧小平的嘴里正式發出後，才能够成為「最高指示」，然後便被以「黨法」的形式固定下來。

『新權威』理論的始作俑者

雖然對「一國兩制」的原始出處從未正面回答，但論起「新權威主義」來，王滬寧倒是私下承認過，她本人才是千真萬確的始作俑者。

早在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不久，即表示了對新加坡模式的欣賞。王滬寧隨即寫出十份內部報告，力陳「新權威」（當時沒有「主義」二字）對中國改革的重要性。鄧小平看過報告後，是否對文章本身及作者有過具體評價，王滬寧本人也無從知道，但從鄧小平曾經對香港媒體讀過「我是欣賞新權威的。新加坡搞得不錯」之類的話看，顯然是受了王滬寧文章的煽情和蠱惑。

後來，海外對大陸「新權威」的宣傳講座只知「南有蕭功秦，北有張銘九和吳稼祥」，其實，他們的「新權威主義」不過是在王滬寧最早論證的「新權威」後面加上了「主義」兩個字。

王滬寧心里非常清楚，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期表示欣賞「新權威」，完全是基於貶毛的目的。當時，毛澤東是中共黨史上的「紀念碑」，鄧小平無力也不敢將它推倒，但却下決心要將它挪位，讓全中國億萬人民和全世界各國領導人的視野，集中到一直被壓在「紀念碑」陰影之後的鄧小平身上。

而蕭功秦、張銘九、吳稼祥等人，自以為加上了「主義」二字，便已經從理論上升為政綱，却沒有想到至少當今共產黨統治者，在「新權威」的問題上是能做不能說的。

捧鄧不捧趙避免惹禍上身

趙紫陽在臺上的時候，張銘九、吳稼祥等人從一厢情願的政治理想出發，把『新權威』三個字移植到趙紫陽身上，自然犯了大忌．王滬寧炮制的『新權威』，望文生義便明白是表示一種對『舊權威』的否定，上奏的政治背景是鄧小平急於完成『非毛化』．而張銘九、吳稼祥將這三個字移植到趙紫陽身上，所要否定的『舊權威』自然會被理解為當時還健康在世、有黨內決義將其『垂簾聽政』合法化的鄧小平．所紀輕輕即已經表現出强烈政治敏感的王滬寧，一見張、吳等人走偏了方向，隨時可能惹禍上身，立刻退出了熱鬧而又時髦的『新權威主義』大討論凡與此有關的文章一律不寫，學術會議一概不去，采訪此議題的記者一概不見．

趙紫陽在接替胡耀邦中共總書記職務後，既開始籌備中共十三大，在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趙紫陽為了集思廣益，特別要求起草班子組織全國各地的政治、經濟理論工作者到北京議政．王滬寧雖是獲此殊榮的一百多位專家、學者中最年輕者之一，他所潛心研究論證的政治體制改革內容又是十三大報告中較為重要的一部分，但仍然没有引起趙紫陽的特別關注．原因之一是來自北京的專家、學者搶盡了風頭；原因之二可能是王滬寧已經從趙紫陽風頭最勁的此時此刻，即看到了背後隱含的政治殺機，故不希望引起趙紫陽對自己的注意．

一九八九『六四』學潮時，大學生的知識分子在北京街頭貶鄧抬趙，自然與張銘九、吳稼祥宣傳

新權威主義的目的聯響在一起．鎮壓過後，中共點名批判吴家祥，并將他與張銘九投入監獄，內部文件上也點過蕭功秦的名字．但此時的蕭功秦很快將自己過去宣傳的「新權威主義」改頭換面，將自己與張銘九、吴稼祥等所謂「北派」的新權威主義鼓吹者「劃清界限」，弄出了一個叫作「新保守主義」的東西，繼續强調「開明專制」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必要性，并在海外在發文章，頻頻接受采訪．

而此時的王滬寧，仍然避開「新權威」的是非，更不顧議論「新保守」與「新權威」的异同，埋頭於國際關系方面的著述論證．

不但要走對路，還要進對門

正所謂「理論界誰看誰都不順眼」，關於蕭功秦對王滬寧如何不服氣的傳說，至少在上海理論界時有所聞．王滬寧自「理論出首」之始，便壓過蕭氏一頭．蕭氏一九八二年自南京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被分配至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工作時，上海理論界已經有了「二王文章」之說．蕭氏歷經周折拿到副教授職稱時，王滬寧早已是正教授、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導師——雖然他本人沒有攻讀過博士．

一九八五年以後，中共有關部門規定，在提升教授之前沒有博士學歷者，今後不能出任的博士導師．此前已經被批準帶博士生者，不在此規定之限．新規定作出後，大批沒有博士學歷的正教授，紛紛回過頭去攻讀「在職博士」．一時間，正教授讀博士的現象成了中國各大學校園里的一大奇景．王滬寧私下里自然會因為自己早已經是博士生導師而沾沾自喜，但同他一樣是沒有博士學歷

的正教授的人，一想到自己與王滬寧唯一的區別便是沒有趕上這一新規定之前爭取到「博士點」，自然會對王滬寧一百個不服氣。

八九「六四」事件之前，在王滬寧的積極爭取下，他所在的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政治學教研室單獨成系，王滬寧擔任系主任。不久，他又兼任了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新保守主義」出籠後，雖然蕭功秦在海外名噪一時，被稱之為陳元派「太子黨」的代言人，但其職稱仍然是副教授。

據與王、蕭二位都有接觸的人士分析：假如蕭功秦在「新保守主義」的理論框架上，確實是NO．1，但祗要是江澤民在臺上，蕭是沒有機會作官的，除非陳元上臺。

蕭功秦本來是研究清史出身，為應時政所需，將「康梁變法」之類清末新政內容，揉進西方政治學體系內容，說到底還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那套東西，尤如馬褂瓜皮帽配上西服外套。更有人諷刺蕭功秦的理論是中式瓜皮帽、美國西服加上南韓或者新加坡的領帶。

與蕭功秦相比，王滬寧同樣是反對浪漫和激進的。但他進入政治學領域之初，便緊緊抓住改革與穩定的相關研究，這一當今共產黨的核心命題。所以，雖然王、蕭二位骨子里都是維護共產黨權威的，但正所謂「不但要走對路，還要進對門」，王滬寧那套獨特的研究語言，妙就妙在不但深入淺出，讓以江澤民為代表的，技術官僚出身，對當代政治學內容一竅不通的領導人們一看就明白，一聽就覺得順耳，而且絕對能夠堂而皇之地端上共產黨的會議桌面。

中共第三代領導人的政治辭黃

整個八九學支過程中，王滬寧表現非常低調，既未熱血沸騰，也未公開出面替政府辯護．「六四」鎮壓過後，凡有較大影響力和讀者群的刊物、報紙上干脆見不到王滬寧的文章，自然給人以消極抗議的感覺．所以北京方面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剛剛聽到王滬寧調進中南海的消息，一時都覺得難以置信，弄不明白王滬寧是什么時候開始受到江澤民的器重．

接着，各種傳說紛至沓來．有人說是曾慶紅力薦王滬寧成功，有人說是吴邦國在接替上海市委書記後即已經請王滬寧主持上海市委的理論和政策研究部門，王滬寧猶豫之間邦國已經進了中央於是也有了王滬寧隨之前往；也有人認為汪道涵長期對上海社會科學界特別關注，對其間出現的新人、新觀點興趣無窮，王滬寧在八十年代初、中期即已經是汪老前輩的「青年知已」，故汪老前輩早就在江澤民面前對王滬寧推崇有加……

無論是那一種傳說更接近事實，王滬寧的理論建樹令江澤民等中共現領導人找到了「共同語言」是毫無疑問的．注意一下中共十四大政治報告中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重新解釋，注意一下九二年下半年以來江澤民、李鵬、喬石等人在各種場合里對「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承諾就會發現，類似的話語在王滬寧數年前的文章和著作中都能找到．比如王滬寧關於「一定的政治體制必須適應一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不能靠移花接木（即不能搞「全盤西化」），也不能搞揠苗助長

（即「穩定第一」）的論述，關於「發展民主政治不能超過我國現階段的條件」，「以發展生產力為中軸來發展民主政治，發展民主政治才能卓有成效」等論述，實際上已經為江澤民等人對內對外講話的模式化用語；而王滬寧關於「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推進民主政治，必須有統一和穩定的政治領導」、「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等論述，更是為江澤民等人運用自如，所以大陸有人說王滬寧的論文選實際上已經成了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政治辭典」，并不夸張。

工程師治國需要「文人」幫親

中共用槍杆子取得對整個中國大陸的統治權至今，毛澤東一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便確立了他至高無上的領袖身份；鄧小平一句「改革開放」令十二億中國人民有了睜開眼看世界的機會，即奠定了他一言九鼎的權威地位。歷史把江澤民推向中國黨第三代領導核心的同時，便宣告了中共政權個人英雄主義時代的結束和平庸政治時代的開始。而在平庸政治時代的「領導核心」絕沒有可能僅靠一句口號、一聲號令便可使億萬臣民俯首貼耳，必須在前朝舊制基礎上升華出一套新的，系統的政治概念，藉此彰顯自己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礎上指導治國救黨之實踐。不然，這代核心非但自己的領導地位朝不保夕，整個共產黨政權也有可能毀在這代領導集體手中。

帝師汪道涵想江澤民所想，急江澤民所急，一句「第三代領導核心要有（不同於毛、鄧的）自己的東西」，更使江澤民對建立自己理論體系的問題有了一層緊迫感。問題是自己手下的大內御筆

滕文生雖然能够及時將江澤民的意圖妙筆生花，但畢竟祇是一介「操作型」的人物，在王滬寧的眼中，此人無疑應屬於那種祇會圖解政治，全不知道政治學是怎么回事的人。而與滕文生，以及他那一代和他上一代的「政治理論家」相比，王滬寧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從現當代政治學角度來包裝「第三代領導核心自己的東西」。

換言之，身為大內御筆的滕文生，靠得是自己的隨機反應在江澤民處得到重用；而王滬寧則是以現代政治學和當代國際關系這兩個領域中的概念性研究擅長。

一九九六年江澤民關於「講政治」的重要講話正式發表後，中共官方媒體連篇累牘的「學習體會」文章拼命從左的角度進行詮釋，令外界感覺江澤民旨在全面復辟毛意識形態，甚至認為江澤民又要大搞「階級斗爭為綱」。據聞帝師汪道涵對此現象深感不安，建議江澤民適時給予正確引導。接下來，官方媒體果然心領神會，把「講政治」三個字的中心意義宣傳為全心全意擁戴江核心。

顯然，這位當代帝師雖已八十高齡，頭腦却還十分清醒，十分明白要把江式「政治」與毛式「政治」區別開來才可能有生命力。而這正是王滬寧到江澤民身旁急於完成的首要工作。

過去，鄧小平倡導的「干部知識化、專業化」表面上看是一條為適應中國社會朝向現代化發展的專家路綫，但從第三代領導集體整體上的知識結構來看，鄧小平式的「專家制國」實際上是「工程師治國」。整個第三代領導集體，包括江澤民個人在知識結構上的先天不足（只受過某一門類的理、工科專業訓練，缺乏政治學、現代管理學等人文科學方面的綜合訓練），使得江澤民在其領導

實踐過程中越來越意識到中共式的「專家治國」還必須有「文人」幫襯，需要借鑒當年趙紫陽組建政治智囊團的辦法.

但是，就如同鄧小平復出後無法批毛，所以只能搞非毛一樣，江澤民沒有能力、沒有勇氣走當年蘇聯的戈爾巴契夫的取消主義，故只能是修正主義. 這就是王滬寧終於被納入江澤民智囊陣營的所謂「大背景」.

起草十二大關系糾正鄧小平誤區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尤其是王滬寧所擅長的改革與穩定關系的研究方向，可以說是整個江澤民時代（無論長短）隨時隨地都要嚴肅面對的核心命題.

王滬寧一九九五年初正式進入中南海，接受的第一項具體任務便是參加起草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文件，特別是江澤民在這次會議上的主要講話內容：在政治上已經完全獨立自主的江澤民政權如何面對和解決鄧小平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系列「帶有全局性的重大問題」.

一九九五年十月九日，中央各在官方報紙以統一格式同時刊登出江澤民在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的講話（第二部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 全文共論及了十二對矛盾，故被海外稱之為江澤民的「論十二大關系」（過去毛澤東曾經有所謂「論十大關系」）. 仔細分析該文的核心內容，正是王滬寧所潛心鑽研的改革與穩定的關系.

該文所論的第一大「關係」，就是「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第二為「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第三為「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第五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關係」；第六為「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關係」；第七為「公有制經濟和其他經濟成份（即「私有制」經濟成份）的關係」；第九為「擴大對外開放和堅持自力更生的關係」；第十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第十一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第十二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關係，講來講去，這十一對「關係」都是「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係」這一大題目下面的子題目。

衆所周知，在鄧小平和陳雲共同主政、相互制約的整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前幾年里，鄧小平（或所謂「改革派」）從來是把「改革」及「發展」作為當務之急的，而陳雲（或所謂「保守派」）則是從來强調「穩定」壓倒一切的。

人們還記得鄧小平在其「南巡講話」中一再强調所謂「緊迫感」的問題，而陳雲則到處書贈他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鄧小平文選經三卷的最後一篇文章是一九九二年初的「南巡講話」，通篇貫穿一個「快」字；而陳雲文選第三卷的壓軸文章則是一九九四年二月對上海負責人的講話，通篇强調一個「穩」字。

問題在於，雖然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統治的整個時代里的鄧、陳斗法雙方互有勝負，而且陳雲老先生雖然已經去世但仍然「人去音留」，但是無論是共産黨黨内還是黨外，無論是在國内還是海外，鄧小平路綫已經成為「改革」和時代進步的象徵，而陳雲政策則被當成其對立面——「保守」

和思想僵化的代表．但事實上第二代領導集體主控過去十幾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時，就好比一輛汽車有兩個駕駛員分工合作，鄧小平只管油門，陳雲負責踩剎車．

而隨著中共對外宣布第二代領導集體向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權力）『交接』已經完成，中共統治中國大陸的政權這輛汽車的駕駛員角色，已經開始由他『江核心』一人扮演，鄧小平和陳雲過去的『分工』如今已經變成他江澤民的左脚和右脚的『合作』．

面對如此局面，他江澤民當然明白如果不踩油門他這個駕駛員會立刻被淘汰，但他更明白如果他手底下的這輛汽車制動失靈，結果勢必是車毀人亡．

我們不妨試想一下：雖然中國大陸和中國共產黨的過去的十幾年已經被歷史學家和中共自己都界定為『鄧小平時代』，而陳雲僅僅是被當作一個配角甚至是矛盾的對立面而存在，便假如過去十幾年里没陳雲這位『副駕駛』的忠於職守，没有能够做到該剎車時當機立斷，那么今天的中國會是一番什么樣的景象？今天的中共政權又會是一番什么樣的下場？

這個道理在陳雲去世前後雖然已經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專家、海内外學者所認識，但一想起毛時代鍋里没油、菜里没鹽的窮日子就渾身痙攣的中國平民，一對比西方發達國家人人有汽車，家家有電話的生活就恨不能一夜就富的大陸百姓，早已聽不進『汽車没有制動就會翻進陰溝』的道理．特别是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發表之後，類似『没有效益速度終究不能持久』、『没有宏觀調控市場就會亂套』的大實話連共產黨的基層干部都没有人要聽．

更要命的是，當共產黨的各級基層干部一旦成為改革開放的既得利益者之後，他們突然發現自己在本部門、本地方的權力基礎，自己老婆孩子、至愛親朋的致富財路，甚至自己在地方上的選票都是同發展速度、基建投資等直接聯系在一起的。特別對於各級地方領導人來說，深知「吃祖宗飯，斷子孫路」是鞏固本屆領導人權力基礎的捷徑坦途。同時，打著為公的旗號徇私向來是共產黨領導人最大特點，再加上前十幾年里鄧、陳兩人及他們各自代表的兩大勢力集團的政治運作已經令共產黨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種習慣思維：提高速度就是鄧小平，强調效益就是陳雲；放權就是改革，收權就是倒退；强調市場就是開放，加强調控就是保守。

面對這樣一種習慣思維，王滬寧進入中南海的當務之急就是幫助江澤民對鄧小平時代遺留下來的理論誤區、思維方式誤區進行「糾偏」，而在此同時還要讓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相信他江澤民并沒有背叛鄧小平，確實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繼承人，真可謂任重道遠！

誰都知道，鄧小平的經濟思想也好、改革方針也好、開放政策也好，集中體現在「大膽」與「高速」四個字上，只要能快，不怕擔風險，不怕犯錯誤。問題是，鄧小平靠他的個人權威能夠受得住因為大膽而必然導致的千百種社會問題，則無法想像江澤民有鄧小平那樣的心理承受力和實際操作力；鄧小平能够把油門一踩到底閉著眼睛向前冲，是因為一遇翻車危險自有陳雲脚下的刹車起作用，而服江澤民如今必須自己配合左脚刹車與右脚油門之間的「辯證關系」。所以，王滬寧參與起草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通過的另一份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

和 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引用了鄧小平一句「發展是硬道理」之後，立刻又加了一堆限制詞，比如「快是有條件的，要講效益，講技師」，「快是有區別的，各地發展速度可以有所不同」，「快必須是沒有水份的，實實在在的速度」等，接著又加了一堆要抑制通貨膨脹、防止經濟大幅度波動等等理由。總而言之，籠而統之，那就是「小平同志的（快）是要在陳雲同志的（效益）前提下的；小平同志的（速度）是要受陳雲同志的（條件）的約束的」。

現在回過頭去看王滬寧的研究方向，就會發現他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理論著述，就是試圖在小平同志的「改革」、「發展」與陳雲同志的「穩定」、「效益」之間，找到一個最佳結合點，作到「在政治和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和發展，在改革和發展的推進中實現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雖然像江澤民「論十二大關系」這樣的重要講話，一般都是一個陣容龐大的寫作班子「群策群議」的結果，但只要將這份文件與王滬寧過去陸續公開發表、出版的文章、專著作一內容上的對照，就不難發現王滬寧在這份文件起草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經常僅僅是「妙筆生花」。一位熟知王滬寧的大陸理論界人士評價說：在「十二大關系」這樣的文件起草過程中，王滬寧所提負的任務是概念的提出和理論的升華，然後才輪得上一批「工匠」式的人物進行具體的文學操作。

可見，當初江澤民「禮賢下士」、「三顧茅廬」非請王滬寧出山不可，就是希望發揮他王滬寧的理論所長，以保證如今必須由他江澤民駕駛的中共政權這輛已經被第一代和第二代駕駛員破壞性使用了四十多年的老汽車，即要繼續向前，又要保證不翻。

海外資深政論作家何頻先生曾經分析道：任何成功的政治繼承人，沒有一個不對前任的政策進行修訂以適應新的情勢．堅持「凡是」，衹能是華國鋒下場．江澤民上臺最初幾年，講話都有出處，沒有幾句自己的話，如果江澤民圖有所作為，修正鄧小平路綫就成了一個選輯結果．

這個歷史邏輯如果成立，江澤民就必須建立自己的治國思想體系，有別於毛、鄧，不能衹是詮釋毛澤東思想、鄧的講話，從一九九四年開始，江有了一些自己的語言，像全國科技大會上提出科教興國戰略．「十二大關系」被認為是江澤民比較完整地闡述了他的治國理念．這是一份亦毛亦鄧、非毛非鄧的東西，即使包裝陳舊，許多內容還是值得肯定，顯示江似乎有意建立超越毛、鄧的，自己的決策法理．

有大陸理論界人士更將這份「論十二大關系」評價為王滬寧等人為江澤民完成後鄧時代「政治概念塑造」打響的第一炮．

開墾平庸時代的政治處女地

一向自恃才高又自命清高的王滬寧以中國大陸着著名政治學家、復旦大學青年教授身份叩開中南海大門，正式充當江澤民幕僚的消息，在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群中引起一陣不大不小的震動．有人認為這是江澤民借此向知識界表示本領導核心自有開明之處；有人認為王滬寧「學而優則仕」的選擇，代表了大陸知識界經過「六四」後長達六年的沉寂和反思，開始了對中共現政權的重新認同．這些分

析都不能說是錯，但最關鍵的原因還是江澤民急於趕在鄧小平咽氣之前在治國救黨方面「拿出自己的東西」，搞出鄧後時代政治概念的塑造．而王滬寧在政治學理論上的建樹正投江澤民的政治品味．

當然，大陸理論界對王滬寧「從政」的選擇頗不以為然者也大有人在．進入中南海前，王滬寧曾是一份理論界同仁刊物的編委之一，他進入中南海之後其大名便在這份刊物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其他幾位編委都認為既然你王滬寧已經後政，你的身份便從事家變成官僚了，繼續在學術刊物上挂名不太合適．

其實，對江澤民政權是否應該忍同是另一個角度的問題，但就政治學專家、戰略學受充當一屆政權決策者的幕僚這一現象本身來說，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進步，至少應該被看作是決策者明智的表現．衆所周知，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視其為政治對立面、打擊對象；鄧小平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視其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令其靠邊站——「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意思就是論搞社會理論研究的人別搗亂，所謂「鄧小平思想」概括成一句話就是「摸着石頭過河」．

而到了江澤民這一代領導人，如果繼續沿用鄧小平的辦法，沒等摸到石頭或能就淹死在河里了，江澤民正是看明了這一點，才下决心在決策層周圍建立起由理論界人士組成的幕僚圈．

王滬寧曾經說過：「歷史告訴我們，政治常有，而政治學不常有」，自己過去在寫政論文章時，「完全是受變革時代的召喚，逐漸地悟出了責任、良心和向往」，他在將這些文章結集成册時，曾將厚厚一本「王滬寧集」冠「比較、超越」的副標題，如此說來，自中共九二年的十四大之後，特別是自

江澤民對外宣稱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獨自理政之後，王滬寧經過反復「比較」，深深感覺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已經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僅有「政治」的時代，再次進入一個有「政治學」的進代，進入一個他自認為可以「超越」某種境界的時代，形象一點說，就是在對目光復旦大學的教學「小樓」和中南海里中共中央辦公大樓進行比較之後，終於超越了他「保持（大腦衛生）」的清高。

王滬寧曾以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潘恩自比，并引用潘恩的話來比照自己這位政治學者對政治的態度：「以我自己來評判，如果不是為了美國的事務，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不論什么題目上我永遠不會以一個作家的身分而聞名。」

看來，念後的王滬寧是要靠「中國的事務」，靠開懇中國平庸時代的政治處女地，使自己得到一個普通學者無法得到的高度「聞名」，但這前提條件必須是江澤民等人靠他王滬寧的政治理論包裝，成功地把政權維持下去，此其一。

其二，既然已經正式進入江澤民的政治幕僚圈，他王滬寧就必須努力適應一個全新的生活環境，後作人心態至作學問的方式；從個人志趣到事業興趣都必須迅速完成後事家至智囊，從教授到幕僚的轉變，先不說別的，如何對付目前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內的兩個頂頭上司滕文生和東建林，對王滬寧來說就是一門全新的「學問」。

另外，一黨專事制條件下的統治者幕僚，與民主開放國家的領導者智囊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從在理論界初出茅廬直到問鼎中南海之前，王滬寧有的是機會出外訪問，僅到美國已經有七、八次

之多，雖然自正式成為江澤民理論智囊之後，其王滬寧在名除了被西方學是同仁熟知，亦開始受到西方政界乃至情報界的重視，但也正因為如此，他王滬寧從此以後，再沒有可能像從前那樣，接到一紙外國某大學、甘學術機構的訪問邀請便欣然前往，去了以後，更同有可能像過去那樣舉止行動上隨心所欲座談討論時暢所欲言．

不得不承認，自鄧小平時代開始後，中國大陸的體制外知識分子相比於毛澤東時代自由了許多——特別是言論自由，但只要是已經進入體制内并想長期保住這只飯碗的知識他子，却還没有西方國家的政府智囊們活得瀟灑，不僅僅是言率自律，連心的話也不得不說．這也許是王滬寧進入中南海之後反而鮮有自己署名的文學公開發表的原因之一．

進入中南海之前，除了散見各理論刊物和綜合性報刊的長短文章，王滬寧還給自己定下了一年一本書的工作計劃．如今，他的某種思想觀點不被江澤民接受自然不能公開發表，而一旦被江澤民接受又會立刻以江澤民講話、中央文件之類的形式公之於衆，再無可能署上他王滬寧的大名為個人打知名度．這也是曾經對王滬寧比較敬重的一些大陸理論人士，對他召集作出的這種選擇頗感遺憾的原因．

专家当智囊，教授变幕僚

王滬寧小傳

主要經歷：

一九五五年十月六日出生.

一九七一年實中畢業後邊工作邊在家堅持自學.

一九七四年夏被工作單位選派為『工農兵學員』進入華東師範大學西語系法語專業學習法語.

一九七七年夏華東師範大學畢業.

一九七八年被録取為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研究生.

一九八零年參與中國政治學會籌建工作.

一九八一年初獲法學碩士學位并留系任教.

一九八六年成為復旦大學最年輕的副教授，同年出任國際政治系行政學研究室主任.

一九八七年中以『中青年理論工作者』代表身份就應邀進中南海，參加對中共當局就『十三大』徵求意見稿的講座修改.

一九九零年提升正教授，不久即出任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

一九九五年四月左右奉迢進京，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務委員（副部級）兼政治組組長.

主要學術職務：

中國政治學會理事、副秘書長

國際政治學會候補理事

上海政治學會常務理事

上海行政生理學會理事、副秘書長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專家組成員

主要學術著作（包括譯著）和重要論文：

《國家主權》

《論我國政治和行政發展的道路》

《比較政治分析》

《現代政治分析》

《政治學概要》（主編之一）

《反腐敗》

《美國反對美國》

《生態政治學》

、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王沪宁

《社會學主要思潮》（與人合譯）

《王滬寧集——比較·超越》（自選集）

《政治的人生》（日記式著作）

周瑞金

江澤民的幕僚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江澤民的幕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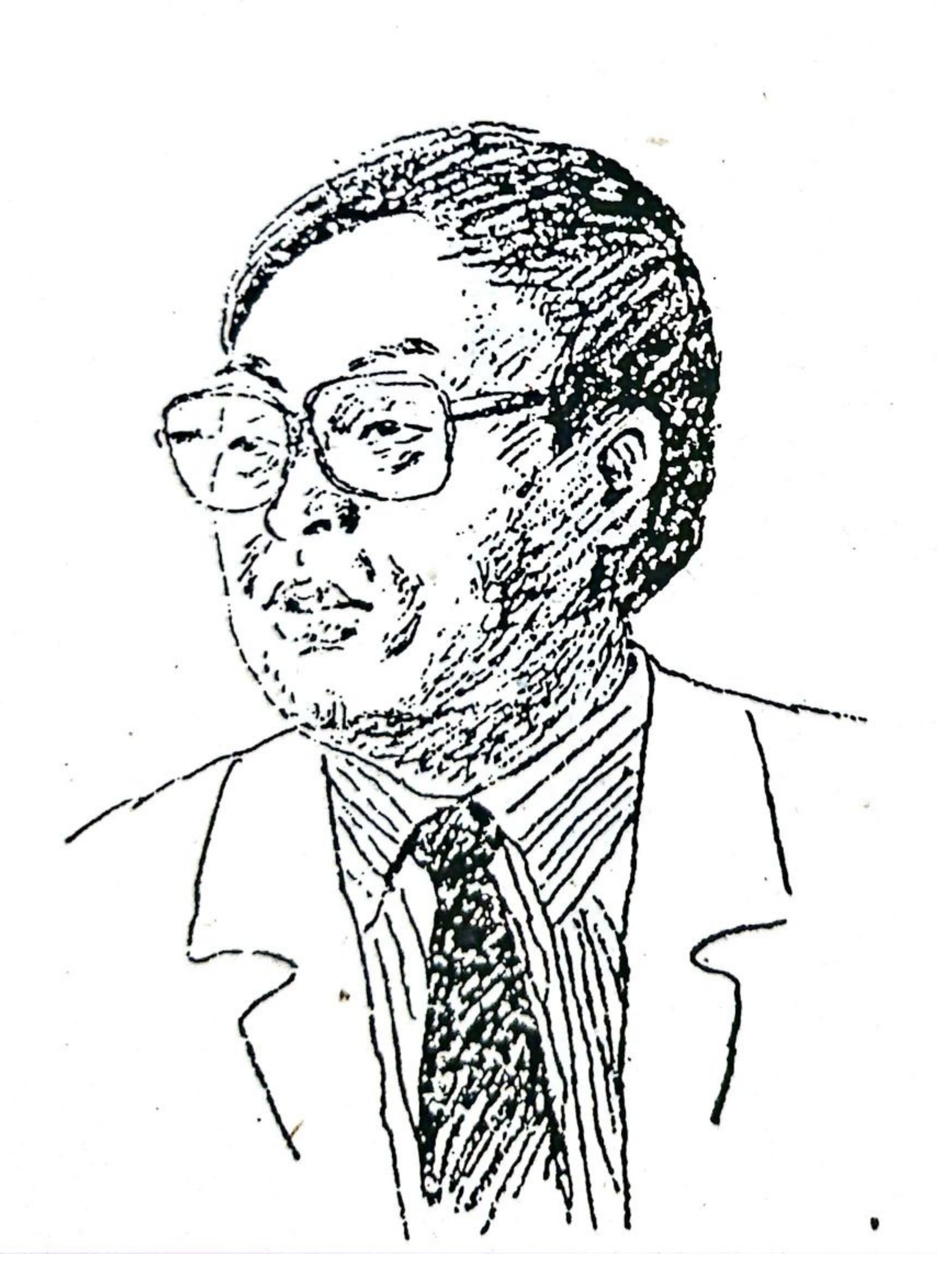
龔心瀚



徐光春

江澤民的幕僚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上海幫主控與論陣地

——政治親信周瑞金 龔心瀚 徐光春

一九九五年初上海復旦大學的青年政治理論家王滬寧被江澤民欽點調進央智囊班子後，北京政壇便流傳江澤民大內總管曾慶紅的一段感慨之言：總書記剛進中南海的時候，輕易不改調上海干部進京，現在情況不同了。

曾慶紅果真如此不加掩飾備考，但在王滬寧進京之前，江澤民已經陸續把一批上海干部，特別是上海宣傳、理論系統的干部調進北京分兵把口。除調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擔任副院長的劉吉，原上海市「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副總編輯評論部主任周瑞金被調進《人民日報》提任副編輯，仍然主管堪稱「喉舌中喉舌」的關鍵部門評論部、理論部的業務；原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龔心瀚高就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主管新聞出版審查。據聞江澤民當時還有意要調時行上海市委宣傳部的另一副部長龔學平到中央廣播電影電視部掌握實權，後後不知何故未將此計劃立即實施，而是先把龔學平提拔為上海市委副市長過渡。

另外，一九九三年從新華社北京分社社和提拔為《光明日報》社總編輯（副部級）的徐光春也是江澤民欽點。不知道徐光春歷史的人自然不會把他也算在江澤民麾下的「上海幫」之內，事實上徐光春過去擔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時，便是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一心延攬到自己門下的宣傳

人才，當年，江澤民為新華社總社死活不同意讓徐光春到自己手下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而耿耿於懷，如今，徐光春在《光明日報》總編輯位置上過渡了兩年多，終於再獲江澤民重用，委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職務．

黨報社論要由上海人把關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人民日報》社是被當成所謂「動亂重災區」進行重點整頓的中央級單位．社長錢李仁、總編輯譚文瑞一并下臺，手下一批牽涉「自由化」嫌疑的部門負責人輕者調離，重則發配外地，社長和總編輯職務分別交給中央黨校調來的高狄和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邵華澤．此二人六月四日當天伴著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坦克聲進駐《人民日報》社，再加上邵華澤一身刺眼的少將軍裝，大有一副軍事接管的味道．幾天後，中共十三大召開之前曾經與邵華澤一同效命於鄧力群「反自由化寫作組」的丁振海亦任命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主管評論部、理論部．一時間，整個《人民日報》社黑雲壓城．一直左到令鄧小平感學忍無可忍，江澤民才不得不下令再次調整《人民日報》領導班子．

此時，江澤民已經通過十四大站穩脚根，從上海調自己的親信進京掌控與論陣地立刻成為當務之急，因為劉吉、周瑞金和龔心瀚三人幾乎是同時接到進京調令，而且全部都官升一級（從正司局到副部），連上海市委都有人言論總書記事情做得太露骨．

過去，海外在報導周瑞金時，都稱他在上海的職務是《解放日報》總編輯，其實，他在《解放日報》從未當過一天總編輯，行政職務最高是副總編輯兼評論部主任．比較奇特的是，該報社的黨委書記却是由他這位副總編輯出任．一個單位的行政（業務）第二把手反而擔任單位黨委一把手，這種情況在宣傳口里可能僅此一例，一般像社會科學院、高等院校里，才會有黨委書記兼任第一副院（校）長的情況．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王忍之同時擔任該院第一副院長．

周瑞金的經歷比較簡單，一九六二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分配至《解放日報》評論部後，除了「文革」初短期下放勞動，整整三年没有動過地方．

「文革」後，報社内曾有人抓了周瑞金的政治小辮子，一紙告狀信遞到上海市委，列數他在一九七六年「反擊右傾翻案風」其間積極參與批鄧的事例，企圖阻止報社黨委交他列入社内的「干部第三梯人」名單．雖然止面以「人才難得」為由仍然表示對周瑞金要「放手使用」，但因為在此之後，幾乎每次晉級提薪的時候，都有報社内的人翻出這筆陳年老賬與他過不去，周瑞金嘆息之余，漸漸已對官場上的進取不甚積極．即使口口聲聲對周瑞金要「放手使用」的上海市委部、宣傳部，故意將周瑞金這位副總編輯安排成黨委書記，總編輯丁錫滿的黨內職務則安排成黨委副書記，顯然是要達到令此二人相互牽制的目的．

一九九一年上海的「皇甫平」事件雖然是周瑞金主導，但他完全是一時心血來潮，事先根本没有想到會引來中宣部的興師問罪，更没有想到接下來竟又產生了「塞翁失馬」之功效（「皇甫平」

事件經過詳見劉吉一文)．

一九九三年初周瑞金接到中組部調令後，報社里的人紛紛前去祝賀，此時的周瑞金反而又型不明白這次升遷對自己的一生到底是禍還是福了．可憐他一介黨內書生，哪里經得住市委副書記陳至立的一番威逼加利誘，特別一提到「黨性」兩個字，周瑞金只能乖乖地安頓好家人進京赴任．下車伊始，《人民日報》社內「黨報社論要由上海人來把關」的風凉話便傳到他耳朵里．

事實也確實如此．周瑞金到《人民日報》社的前兩個月，丁關根剛剛到報社宣布了「中央決定的高狄同志不再擔任職務」，原總編輯邵華澤改任社長，原《經濟日報》總編輯範敬宜調任《人民日報》總編輯．接下來，過去追隨高狄在報社内搞得非常過份的張雲聲等幾名極左派副總編輯或被迫退休，或强迫調離，被他們把持了三年多時間的《人民日報》理論部、評論部監管權，全部落到新任副總編輯周瑞金身上．

周瑞金上調北京後，上海方面也有一種分析認為，當初「皇甫平」事析雖然在鄧大人那里大大得分，并因此令周瑞金大撈取了一筆政治資本．但從組織程度角度，周瑞金組織撰寫「皇甫平」文章之初没有與市委通氣，因而令上海市委一班人大為不滿．雖然事後吴幫國、陳至立，以及劉吉等人都借此往自己臉上貼金，私下里却又暗暗給周瑞金記了一筆「目無組織」的政治黑賬．甚至擔心周瑞金因為有了這一層政治資本，將來隨時都可能得用《解放日報》這塊陣地再給上海市委捅出點漏子來．

而在這種背景下，不排除吴幫國、陳至立等人，特别是陳至立主動要求江澤民、曾慶紅給周瑞

金安排個去處的可能．那么，正因為「皇甫平」事件的影響太大，要調周瑞金出《解放日報》只能做讓他官升一級的考慮．

不過，即使持這種分析的人，也承認周瑞金畢竟已經「老馬識途」．既然江澤民在十四大之後地位越來越穩，他周瑞金本人也已經被外界與論認定是北京城里的上海幫主筆，那么他周瑞金只要還想在共產黨政權里繼續端牢自己那「黨的新聞工作者」的飯碗，除了一心效忠江澤民，別無選擇．

新聞出版對江澤民至關重要

黨報的理論、評論部門牢牢抓在自己人手里之後，江澤民還要考慮與論方面的全盤控制，對全國各地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所有出版物，所有廣播、電視等現代傳播媒體進行有效監察．於是，江澤民在上海市委工作期間提拔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龔心瀚便應了那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話．

生於一九四零年的龔心瀚與周瑞金是浙江同級，復旦大學新聞系同學、上海《解放日報》同事．不過，龔氏在《解放日報》工作一段時間後，便調至上海市委擔任黨刊《支部生活》雜志的負責人．升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後，同時還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對外宣傳小組副組長及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副會長等職務．

當年毛澤東手下的林彪曾經有句名言：槍杆子，筆杆子，鞏固政權靠這兩杆子．江澤民顯然對

這句話感受甚深，上臺之後，他情知當時還牢牢掌握在楊家將手中的解放軍人事大權暫時還抓不到自己手里，便先抓「內衛部隊」武警系統的高層人事安排，將本來已經準備退休的上海市警備區司令員巴忠炎調任武警總部第一把手．與此同時，還計劃將已經被提拔成上海市委副書記和陳至立調進北京擔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只是因為當時主管組織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堅持「組織原則」，同時敢不排除當時主管文宣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暗中作梗的可能，才令江澤民的這一如意安排沒有得逞．

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之後，人們注意到政治局常委們的分工同過去已經不太一樣，一是再沒有常委具體分管政法口（十四大之前是喬石）；二是再沒有常委具體分管文宣口（十四大之前是李瑞環）．這樣一來，政法口和文宣口在政治常委一層，便只需對江澤民一人負責了．

接下來的一年多時間里，江澤民在人事問題上抓得最緊的就是軍隊、武警系統的高級干部飾選和調上海干部對北京輿論部門的「掺砂子」舉動．當時，隨着劉吉、周瑞金、龔心瀚相繼進京，與龔心瀚同為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龔心平也一度被傳說將調進北京接掌廣播電影電視部．龔心瀚與龔學平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內被部下們對稱「大龔」、「二龔」，二龔比大龔小二歲，也是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畢業後一直從事電視臺新聞編輯工作，後又陸續擔任過電視臺臺長、上海市廣播電視局負責人等職務，也是在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提拔的市委宣傳部負責人之一．如此「專業」對口的上海親信，自然被視為替江澤民把持全國聲像傳播媒體的最佳人選．

接下來，雖然龔學平沒有進京，留在上海直接安排成上海市副市長，上海方面仍然傳說這僅僅是「過度」而已，總是江總書記在北京坐得穩，龔學平進京是遲早的事．

龔心瀚從上海調進中宣部受命主管全國新聞出版事務後，深知如此特殊崗位在江澤民所面臨的多事之秋尤其重要，工作起來特別賣力．因為他是當時中宣部內最年輕的副部長，部內上上下下都在議論他將在十五大上成為丁關根的接班人．可惜好景不長，進中宣部的龔心瀚便因操勞過度而一病不起．江澤民特別安排曾廣紅等人前往表示關懷之情的同時，自然會想到接替龔心瀚工作人選的問題．

徐光春被江澤民看好多年

一九六九五年七月底，時任《光明日報》社總編輯徐光春接到一紙出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任命．消息傳出後凡熟知徐光春經歷者都相信此命無疑是江澤民親自點將，根據便是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徐光春擔任新華社上海分社社長．其實，徐光春與江澤民之間的政治糾葛還不止這一點．

徐光春一九九九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後被分配至安徽新聞圖片社擔任攝影記者，接着又擔任新華社安徽分社的文學記者．

一九八四年後，徐光春被提拔為安徽分社副社長，當時的安徽省委領導對他十分器重，希望新

華社總社同意將他的組織關系調到安徽省，出任省委宣傳部部長。遭到拒絕後，安徽省委不死心，安排徐光春當上了省委候補委員。新華社總社生怕徐光春經受不住官場誘惑，立刻將他調往上海分社，并官升一級擔任正社長。

徐光春幾乎是同時與江澤民到上海工作。在江澤民擔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委的兩年中，對徐光春印象極好，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芮杏文對徐光春也十分欣賞。於是，兩人一拍即合，鄭重找徐光春談話，希望他出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職務。此時，原上海市委宣傳部長潘維明因為「自由化」的問題已經被調離。

徐光春一句「服從組織安排」的回答後，芮杏文、江澤民囑曾慶紅給中組部門打了報告，希望中組部出面說服新華社總社。結果，就在江澤民接替芮杏文市委書記的同時，新華社將徐光春調進中央黨校「脫產」學習。

一九八八年春徐光春回上海過寒假，專門到市委向江澤民匯報新華社總社領導的決定：黨校學習結後，不再回上海工作新工作將在北京安排。此時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江澤民無可奈何地表示：我們宣傳部長的位置一直給你空着呢。地方黨委要服從全局，我們有什么？

徐光春走後，中組部向上海市委發文，任命了陳立至為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在上海市委，幾乎無人不知陳立至是江澤民的鐵杆政治心腹之一。當時如果徐光春能夠到上海市委出任宣傳部長，江澤民就不會考慮陳立至。由此可見江澤民對徐光春的器重程度。

中央黨校一年脫產學習結束後，徐光春被任命為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因為北京本來就是總社所在地，所以北京分社還不如外省市的分社作用大．而且，北京分社在級別上與外地分社同樣，正司局級，此前，無論徐光春出任安徽省宣傳部長還是接受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職務，都會因為進入省（市）委常委而官至副部級．不過，這暫時的委屈對徐光春來說也是「塞翁失馬」．既然江澤民已經進主中南海，他徐光春必然會再有被江澤民啟用的機會．

一九九一年，還是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的徐光春專門向中央寫報告，提出了新聞報導「五避免、五提倡」的建議，具體內容是：避免概念化提倡具體化；避免數字化提倡形象化；避免一般化提倡典型化；避免工作性提倡新聞性；避免一窩蜂提倡長流水．結果，江澤民親自在他的報告上批示：「所提意見很好，實際上這不僅是宣傳部門所能解決，及到各個部門都要有務實的作風，再好的主意，不落實也是空的，抓而不緊，等於不抓．」

總書記一句批示，上上下下自然緊急動員，不但中央有關部門開會研究，《人民日報》還專門為此發了社論．接着，徐光春便奉調《光明日報》擔任副總編輯．

一年多以後，又開始了江澤民逐一向輿論部門安排自己親信的過程．幾乎與劉吉、周瑞金、龔心瀚等人調進北京的同時，中組部一紙任命，徐光春升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此時，江澤民坐穩了他的寶座，已經沒有人再有膽量抗命來自中南海的「欽旨」．

捧江文章總書記龍顏大悅

公正地評價，徐光春其人在中共新聞干部中確實是比較得力的一個，當年江澤民、芮杏文同時看中他的才干，應該說首先不是基於「結幫」的目的，而是貪「才」。到《光明日報》一年後，他能夠令該報的發行量達到歷史最好水平，僅此一例，足以說明這張報紙在他的手底下確實有了起色。

至於一直看好徐光春的江澤民為何急於再將他提拔，應該說有為一九九七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做「政治暖身」的考慮。但也有人認為，徐光春決定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一篇吹捧江澤民的文章，讓江澤民看了龍心大悅，客觀上促成了江澤民決心把整個與論界的看家職責交給徐光春統攬。

人們還記得一九九四年九月底召開的中共四中全會曾經發表一份《中共中央關於加强黨的建設的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最「重大」的內容，莫過於强調江澤民這位「核心」的「特別重要」。這份決定在强調了所謂「四個服從」後，又强調其中最重要的是「全黨服從中央」，接着便露骨地提出：「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强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

這份《決定》被全文公布後隔了一天，《光明日報》便搶先發表一篇山西省副省長李澤民的學習體會文章，將《決定》中强調的「民主集中制」總結成為「六個意識的强化」，一是「强化維護

中央權威的意識」，二是「强化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三是「强化地方服從中央的意識」；四是「强化組織紀律意識」；五是「强化民主意識」；六是「强化為人民服務意識。」

李澤民的文章中露骨地吹捧說：只有「强化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領導的意識」，才能「充分發揮黨中央集中統一的作用」：「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人民群衆所創造的時候，充分肯定杰出人物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充分肯定領袖人物對於政黨的作用。半個多世紀以前，中國共産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毛澤東同志成功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道路，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的勝利，開創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時代；黨的十一届三中全會以後，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同志又成功地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條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黨的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來，堅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綫，處變不驚，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堅持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贏得了全黨全國人民的依賴。……實踐已經證明，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是全黨全國人民愛戴的黨中央，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是對黨的利益、人民利益和愛護。鑒於我們黨完成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交接，黨的建設又面臨著新形勢和任務，加强黨的團結，維護黨中央的權威，維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持領導，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這種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的吹捧文章，在大陸已經多年不見。一九九三年出版《鄧小平文

選》第三卷時，在江澤民親自做的「學習報告」中，雖然把鄧小平拔高為「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者」，吹捧其理論為「我們民族振興的强大精神支柱」」但畢竟還是强調了整個「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集體作用」．江澤民在起草十四大政治報告時，鄧小平對前幾稿的意見之一就是不要過份强調他個人的作用，他個人只是把集體的智慧集中起來．

海外曾有報導說，李澤民的這篇文章最先是送到《人民日報》理論部的，有編輯當面挖苦他說：四中全會《決定》的全文我們這些编輯們都還沒有看到，目前只看到的是《會議公報》的內容，可是《公報》中對《決定》內容的概述沒有你在文章中引用的那些東西．就算我們登出你的文章，那不是擅自泄露黨的「機密」嗎？

在《人民日報》碰壁後，李澤民又親自跑到《光明日報》，《光明日報》負責人立刻答應在《決定》正式發表後以顯著地位刊登．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決定》全文刊登隔了一天，李澤民的大作便刊登在《光明日報》頭版．

如上報導的內容是否完全屬實待考，但四中全會《決定》發表之後由《人民日報》發表的相當文章中，確實還沒有一份像《光明日報》李澤民的文章那樣，幾乎是在用毛澤東剛剛去世時吹捧華國鋒的語調吹捧江澤民．

競爭中宣部長最有實力

從八十年代中到一九九三年，新華社總社把一個本來可以直升副省級（省委常委即享受副省級待遇）的徐光春一壓就是八年，而江澤民欽點徐光春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後，這「副省（部）級職務僅僅干了兩年便再次獲得崛升．龔心瀚調升中宣部長時，僅僅是副部級．龔氏因病入院休養的同時，時任中宣部常務部長徐唯誠因為年齡已到被迫退居二綫改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負責人，徐光春直接被任命為享受正部級待遇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如果再考慮徐光春年輕有為、精於業務的優點，未來由徐光春接任中宣部長職務不是没有可能．

從一九九六年下半年開始，海外又有報導説，在十五大前後的高層人事變動中，因為丁關根已經是政治局常委人選，現《人民日報》社長邵華澤將調升中宣部長，徐光春則將以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身分兼任《人民日報》社社長．這種安排當然也不無可能．不過，到一九九二年召開中共十五大時，邵華澤已經六十四歲，距中共規定的正部級干部的職上限僅差一歲，而屆時的徐光春才五十三歲，年齡上占絶對優勢．至於《人民日報》社社長或總編輯職務，對徐光春來説當在是《專業對口》，但如果他本人已經决心在官場上掙扎一番的話，《人民日報》的職務從級別上已經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至於徐光春在所謂「革命化」方面是否符合標準，他在出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之後的表現已足可以令江澤民放心．

自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大陸圖書出版、報紙雜志發行等方面，也不可能不受到經商大潮的冲擊．一時間，各種出版社、雜志社尤如雨後春笋；各種日報、周報更是多得令人眼花繚

亂。面對如此形勢，中宣部最頭痛的事情就是對這些報紙、刊物的內幕根本做不到「嚴格把關」。雖然丁關根在一九九五的宣傳工作會上大呼黨的宣傳工作者「守土有責」，但即使各級黨務宣傳部干部人人忠於職守，上萬種報紙、雜志，如何嚴查得及？

徐光春其人無論是在新華社系統工作還是在《光明日報》負責期間，給人留下的印象不但是筆頭快，而且還點子多。到中宣部上任不久，他立刻想出了解決報刊審閱不及的辦法，先在中央一層設立一個老干部講報小組」，將一大批主退休之後閑得發慌的「老革命」為組織起來「發揮余熱」。北京方面試行見效後，又及時將此經驗向各生活上、市、自消費品區推廣，在職宣傳干部人手不足的困難迎刃而解。

那些曾經為共產黨打江山出過力甚至流過血的「老革命」們，只要能識字，自然會對各各報刊上不合共產黨口味的內容——特別是在政治上對維護共產黨政權有弊無利的內容及時發現。有了這批人分兵把口，徐光春只會提心他們在嚴審過程中把篩子孔收得太緊，將一些無利也無害的內容當成反動內容打入另册，而絕不用擔心他們的眼皮底下會溜出漏網之魚。

僅這件具體事情，足可以見出徐光春對共產黨與論控制的責任心。而一點正是目前的江澤民最需要的。

周瑞金小傳

一九三九年十月生於浙江平陽.

一九六二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

一九六五年加入中共.

歷任《解放日報》編輯、評論部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解放日報》社黨委書記、副總編輯.

一九九三年初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

龔心瀚小傳

一九四零年十月生於浙江蕭山.

一九六四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次年加入中共.

歷任《解放日報》記者、《解放日報》郊區版黨支部書記、上海市委《支部生活》雜志負責人.

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上海市委對外宣傳領導小組副組長、上海文化發展基金會副會長.

作者後記

此書前后寫了一年，但資料的積累其實從與何頻兄合著《中共「太子黨」》、《高干家庭檔案》兩書時即已開始。在此特別要感謝何頻兄在過去幾年里就中共人物研究、寫作方面與我的精誠協作，以及他在我獨立寫作本書過程中隨時給予的幫助和督促。同時也要感謝何頻兄及明鏡出版社各位同仁就本書出版事宜所做的各積極笄和宣傳推廣。另外，也還要感謝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為我查找資料提供的方便。

此書出版之前，其中部分內容已經在美國、香港、日本、澳洲等地的華文媒體刊登過一些，收到一些熱心讀者的意見和反響。雖然成書過程中，已經將相關文章發表過程中出現的疏漏進行了補充、修改，但仍然避免不了缺憾之處。好在《江澤民的幕僚》的題目也許不會太短命，所以日後有修訂再版機會時，相信會采納更多的讀者的建議和信息。也非常期望本書中所涉及到的具體人物對書中內容有所反應，那怕是完全否定的意見我也樂於洗耳恭聽。

作者聯系地址：P.O.BOX 382343 CAMBRIDGE, MA.02238 U.S.A 電話：(617) 628－4379 傳真：(617) 625－1988

一九九三年初調任中宣部副部长，。

徐光春小傳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生於浙江紹興。

一九六九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一九七三年加入中共。

一九七零年至一九八二年任安徽圖片社記者、新華社安徽分社記者。

一九八三年升任新華社安徽分社副社長，實際主持工作。

一九八五年調任上海新華分社社長。

一九八七年底至一九八八年底在中央黨校學習。

一九八八年底至一九九零年底任北京新華分社社長。

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任《光明日報》社副總編輯；一九九三年起任總編輯。

一九九五年七月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

《中國局勢》系列(9)　　總策劃：何 頻 高 新

書　　名：江澤民的幕僚
著　　者：高新
發 行 人：JESSICA LIU
責任編輯：張雲飛
校　　對：任知初
封面設計：黃志民
出　　版：明鏡出版社
編輯部：57－17 136 S T.2 N D F L，F L U S H I N G,NY 11355 U. S. A.
TEL：(712) 463 －1270　FAX：(718)460－6248
社務部：8636 MISSISSAUGA RD RR10BRAMPTON. ONT CANADA L6V 3N2
TEL：(905)451－7401 FAX：(905)451－7492
駐香港辦事處：香港郵政信箱 5281
香港皇后大道西 335－339 號昆保商業大厦 601 室
電話：(852)2344－5615 傳真：(852)2559－3813
香港總發行：長城圖書貿易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并源道 55 號開聯工業中心 A 座 14 樓 20－21 室
電話：(852)2344－5031 傳真：(852)2341－6938
臺灣總發行：三友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27 巷 11 弄 17 號 5F
電話：(8862)240－5600 傳真：(8862)240－9284
海外總發行：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九龍紅磡民裕 41 號凱旋工商中心八樓 C 座
電話：(852)2303－1024 傳真：(852)2764－1310
洛杉機總發行：長青文化公司 EVERGREEN BOOKS
760W.GARVEY AVE MONTERY PARK,CA 91754 U.S.A.
TEL：(818)281－3622 FAX：(818)284－1571

國際統一書號：ISBN 1－896745－17－2
定　價：HK＄96元 NT＄ 330元
版　次：2000年3月第一版



Jiang Ze-min's Counselors

By Gao Xin

● 紅朝帝師汪道涵指點江山

● 大內總管曾慶紅謀韜劃略

● 鐵杆心腹劉 吉塑造明主

● 政治技師王滬寧理論包裝

● 上海灘三大文膽進京護駕

● 大內禦筆滕文生捉刀代言

《中國局勢》系列總策劃：何頻 高新

封面設計：黃志民

ISBN 1 896745 17 2
9 780969 991151
HK$96 NT$330